

目 录

· 中外关系史研究 ·

- 中印边界是否划定? 苏·斯瓦米 (1)
季耕砚 译
- 1937—1941年外国对中国的援助..... 阿瑟·N·杨 格 (15)
任东来 译 李安山 校
- 法国垄断资本家控制中东铁路的
企图..... H.C. 因杜卡耶娃 (27)
姚宝珠 译 陈春华 校

· 中美关系史研究 ·

- 灾难的边缘..... 斯蒂芬·莱文 (35)
章白家 译 袁明 校
- 魏德迈在华回忆录..... 魏德迈 (53)
林海 朱雪芳 译
- 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华..... 威廉·斯图克 (93)
陶文钊 译
- 国务院与白宫：一项没有实现的决定..... 南希·塔克 (122)
任凡 译

· 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 ·

- 辛亥革命前夕和辛亥革命期间的俄中革命联系和布
尔什维克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E.H. 恰普凯维奇 (151)
吴永清 译
-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新疆的影响... A.A. 哈基姆巴耶夫 (165)
韩世滋 译

赤色职工国际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

- 个访华代表团.....戈罗多维科娃 (171)
曾宪权译
- 蒋介石寻求苏联参战.....约翰·高沃 (180)
谷世宁章百家译

· 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研究 ·

- 鸦片战争研究.....佐佐木正哉 (203)
李少军译
- 19世纪西方对鸦片贸易的评论.....梅森 (238)
郭曦晓译
- 1910年前后日本对华走私鸦片吗啡的
秘密组织的形成.....山田豪一 (251)
穆传金译

· 宗教史研究 ·

- 拯亡会修女在中国.....艾资沃 (270)
顾裕禄译
- 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大学.....刘广京 (285)
曾钜生译

· 人物研究 ·

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

- 及孙中山.....黄宇和 (296)
区铁译
- 驻美大使胡适——温文尔雅的劝
导性外交.....保罗·海尔 (318)
黄小玲译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2辑目录..... (332)

中印边界是否划定？

苏·斯瓦米博士

（原编者按：作者斯瓦米博士根据历史记载论证道，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上的立场是错误的。）

译者按：斯瓦米博士为印度人民党议员，对中印边界问题提出了自己独有的看法。他的观点，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及中国对边界问题的主张等抱有一定的偏见，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现实，特别是对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提供了不同于印度一部分舆论界的看法。）

没有是非概念的爱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不寻求真理的民主是幻影。当历届政府歪曲和编造真相的时候，历史最可悲的章节就写出来了。有时候，政治领袖们就那么愚昧，企图用欺诈和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不学无术。后来，他们被自己无根据的论断缠得脱不了身，于是就乞怜于爱国主义来掩盖谎言。这类文过饰非的代价总是高昂的，甚至往往要付出人的宝贵生命。

近代的中印关系史是建立在无视真相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个独特的事例。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国家的总理，不明了实情，随意处理问题，陷入他们先前采取错误行动的泥沼。其结果呢？打了一场战争，死亡上万人，破坏了经济，破裂了两国关系达20年之久，对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好处。

研究历史所得可悲结论之一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是完全不

必要的。印度人称之为中国的侵略，中国人称之为印度的扩张主义，都不对。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奥斯卡·王尔德^①说过：“哪儿无知是幸福，哪儿愚蠢就是明智。”事情确是这样。然而，我们再也经不起把无知当成幸福这样的事了。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后一年，即1950年10月7日，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去“解放”它。仅一个月之后，即1950年11月7日，铁人萨达·V·帕蒂尔^②给贾·尼赫鲁总理写了一封长信，特别讲了下面的话：“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必须考虑，由于西藏之消失，我们现在面对着什么样的新局势……因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很快他们就会不承认西藏曾和我们达成的全部条文……边界未经确定之状态以及在我们一侧存在着与西藏人或中国人有姻亲关系的入口，这些都会在中国和我们之间产生潜在的麻烦。”

接着，帕蒂尔先生向尼赫鲁提出了对付形势的11点计划，包括需要制定“对麦克马洪线的政策”。然而，尼赫鲁一看到这一正确意见，就很恼怒。对于外交政策，尼赫鲁自认是得天独厚的，这反映在他于1950年11月18日给帕蒂尔的回信中，他颇为傲慢地写道：“假如我失掉我们的远见和世界战略观念，而屈从于未加思量的害怕，那么，我们可能制定的任何政策，都可能失败。”

帕蒂尔想从尼赫鲁那里得到的是，承认这样一点，即既然中国不久将会拒绝接受西藏与印度签订过的一切条约，边界未定的状况要求制定“一项关于麦克马洪线的政策。”但相反，尼赫鲁却给他上了一堂关于“远见”的课。

不久，尼赫鲁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此前，尼赫鲁一直在说印度不会比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走得更远。1950年代后期，有一次他在议会告诉纳脱·白伊^③说，中国语言中的主权和宗主权

① 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爱尔兰诗人，戏剧家。

② 国大党元老，以激进著称，故有铁人之称。

③ 国大党议员。

没有区别，因此将印度照会译为中文时产生了一个错误，宗主权被译为主权。这完全是谎言，几个世纪来，中国就一直用“宗主权”来表述SUZERAINTY，而用“主权”表述SOVEREIGNTY。糟糕的是那时候议会里没有一个人懂中国话，以揭露尼赫鲁的无知。此前一年，帕蒂尔先生就建议，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前，“我们应当在内阁进行一次讨论。”尼赫鲁回答说，“那没有用，因为内阁的多数成员都不大懂这种复杂的外交谈判、外交磋商。”这种傲慢与不顾事实的态度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1962年事件。

历史将证明帕蒂尔是正确的。当西藏变为中国的一个省——这就是主权的意思——由西藏签订的一切条约都完了，因为中国拒绝承认它们。在这些条约中，有一个是画有麦克马洪线的条约。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在议会明确宣布：“不丹以东的边界已清楚地被麦克马洪线所规定，这条线是由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所确定的。”而西姆拉条约则是西藏同印度签署的。

尼赫鲁的论断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如果西藏不再是独立的，那么同一个已经消失的国家所签订的条约，怎么会仍然有效呢？

达赖喇嘛於1959年刚逃到印度，就在新德里印度世界事务协会发表谈话说：“印度政府的论点是，印藏边界已经根据麦克马洪线而得到了最后的解决。但是这条边界是由西姆拉条约规定的。这个条约仅仅是在西藏和英国政府之间才是有效和有约束力的。如果西藏在会议结束时没有国际地位，它就无权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因此十分清楚的是，如果你们否定西藏的主权地位，你们就否定了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

但是，尼赫鲁在他担任总理职务的整个期间，采取了矛盾的立场。一方面因有1914年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才是一条正式的边界，另一方面西藏在现在和过去都是中国的一个省。尼赫鲁本应重视帕蒂尔的警告，因为中国政府在1914年就拒不同意签署

西姆拉条约。所以，尼赫鲁在1950年本应为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索取到代价。他本该要求中国领导澄清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这就是帕蒂尔所要求的。但是，尼赫鲁却高傲地专心致志於他对世界事务的“远见”之中。

当尼赫鲁谈论麦克马洪线已经肯定时，印度政府官方的制图机构印度测绘局出版了一幅名为《新印度共和国政治区划图》，其中注明沿麦克马洪线的边界是“未经划定”，而且在阿克赛钦地区还注明“边界未经规定。”这是1950年的事，是在独立三年以后，当时尼赫鲁正要议会确信与此相反的一些话，即边界已经确定和规定。很明显，内政部并不了解外交部的立场，结果总理对本国出版的地图却一无所知。

很久以后，尼赫鲁于1962年11月8日在议会提出动议时（这项动议很出名，因为当时议员们都起立宣誓“赶走侵略者”），他甚至在1914年条约的真相问题上，向议会提供了错误的情况。他当时在人民院说：“即使中国拒不接受麦克马洪线，我要说，他们于1913年所提的异议并非基於他们反对麦克马洪线，而是基於反对条约的另一部分，即关于划分内外藏，而麦克马洪线本不在此列。”

尼赫鲁的这段讲话从以下两点来看是虚假的：首先，中国人的确反对麦克马洪所画出的全部边界线。1914年6月13日，在麦克马洪与西藏全权代表伦钦·夏扎司伦草签西姆拉条约大约三周之前，中国外交部长孙宝琦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特别对麦克马洪线（当时称之为红线，因为麦克马洪用红铅笔画出了这条线）提出了抗议。

1914年6月16日，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把孙的备忘录转告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说：“我谨送上中国外长孙宝琦本月13日交给我的备忘录的译文，并附上一张地图，上面画有亨利·麦克马洪建议的内外藏边界（用红色和蓝色），和中国政府现在建议的由中国人在会上初次提出的内外藏分界线（黄色）。 ”

由此可见，并不是象尼赫鲁对国会所说的那样，中国仅仅反对过内外藏的分界线，它也反对过包括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在内的内外藏的界线。其次，如果英国确实把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看作是确定的和最后的，那么英国为什么要把那些地图压了22年不出版呢？

印度测绘局在西姆拉会议三年之后的1917年，出版了一份官方地图。在那份地图上并未标出麦克马洪线，相反却标出了“传统”边界线，它是沿着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脚，在达旺地区南面，远远在麦克马洪线南面。

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问世，其中也有印藏边界地图。在该书第24卷的地图上，在达旺南面标出了同样的“传统”边界线，而没有标出15年以前由麦克马洪决定的那条边界线。难道尼赫鲁不知道这些事实吗？

为什么英国当局没有把麦克马洪和伦钦·夏扎司伦达成的协议付诸实施呢？不妨顺便提一下耐人寻味的事，那就是英印、西藏和中国这三方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不久都被他们各自的政府撤了职。中国代表陈贻范的撤职是因未经政府批准而擅自草签了这些地图。事实上，他被怀疑是英国人的走狗。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在1911年8月20日发出的密电里这样写道：“在边境问题上能有象陈贻范这样一个人物，是个显而易见的收获。”西藏代表伦钦·夏扎司伦也由于把达旺奉送给了麦克马洪而消声匿迹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为英属印度作出了极大贡献的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也被立即调离到埃及，这是英国官僚机构表示不满的方式。英国甚至在此后22年间，拒绝承认他所炮制的地图。

为什么英国人这样作出反应呢？理由之一是，英国不愿它的在华商业利益受到损害。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成为中国的总统。英国人正笼络袁世凯，不想触怒他。此外，麦克马洪在同西藏人谈判中藐视伦敦的指示，越出了他的权限。因之，印度事务大臣罗伯特·克鲁——米尔恩在1914年7月1日，即在西姆拉条约签字前两天，向哈定总督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有关西藏会议

事。谨涉及你上月29日来电，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应于7月3日召集最后一次会议。届时，如果中国的全权代表拒绝签字，亨利爵士就应断然终止谈判。他应对会议未能解决问题向西藏代表表示很大遗憾，并向伦钦·夏扎司伦作出保证，如果中国方面继续其侵略活动，西藏可依仗陛下政府外交上的支持和军火上的任何援助。”

所以，麦克马洪并未受权在中国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同西藏签订任何协定。这也是英国在1907年英俄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正当哈定总督迟疑之际。克鲁——米尔恩在1914年7月3日又发了一份电报：“关于你本月2日来电，陛下政府不能授权（麦克马洪）同西藏单独签署。如果中国代表拒绝签字，麦克马洪爵士应按我7月1日和2日分别发出的电文所定的方式行事。”然而，麦克马洪无视这些指示，一意孤行，在1914年7月3日同西藏人草签了一项包含11项条款的条约，明目张胆地违反了1907年的英俄条约。

哈定勋爵对麦克马洪采取了放纵的态度。他在发给克鲁——米尔恩的电报中常常提到，俄国人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正在蒙古如何如何地得手。然而，他在1914年7月23日向伦敦呈递麦克马洪备忘录时，甚至也不得不说：“……我们承认，考虑东北边境的东部或印中两国的部分边界并不属于这次会议职责范围，因之，我们请求把已提出的那些观点和建议，看作是麦克马洪个人的。它们在目前，并未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

麦克马洪利用从伦敦指示中找出小小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以及借口未及请示等官僚们的古老伎俩，得以为自己蔑视指示的行为开脱责任。他在记录自1914年5月1日到7月8日期间的谈判进程的备忘录上这样写道：“在陛下政府对待最后行动的确切意图方面，我有些把握不住，……我没有时间进一步向伦敦请示，据此，我决定，倘若中国全权代表在最后时刻拒绝进行合作，我将不同西藏方面签署，但要同我的西藏同僚一起草签修正后的条约

和地图。”

因此，印度政府每一次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时都提到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即对中国政府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或条约所产生的法律效力。有人也许会把草签的1914年备忘录说成是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从我们接受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那一天起，那种脆弱的基础也就消失了。甚至麦克马洪与伦钦·夏扎司伦草签西姆拉条约，也是违背1907年英俄条约的，根据英俄条约英国已经答应不同西藏打交道，除非通过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直到1936年还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存在。从1914年到1933年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以改变英国政府的这一态度。然而，1933年13世达赖喇嘛涅槃，国民政府派以黄慕松将军为首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拉萨吊唁。这个代表团携带的黄金之多，足以贿赂整个西藏当局，他们为哀悼13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停留了6个月。这吓坏了当时在印度的英国人。黄将军也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再次肯定，中国人对西藏拥有宗主权。

1935年，一位英国植物学家华金栋先生，因经过达旺进入拉萨而被西藏人逮捕。他们告诉他，他必须有当局的证明才能通过达旺地区。印度政府的外交政治部承办过此案。副秘书长夏洛调阅了案卷。他在仔细阅读档案时，偶然发现关于“麦克马洪线”的麦克马洪——夏扎司伦协议。若干年以后，夏洛在1960年1月份的《亚洲评论》（伦敦出版）杂志上，发表了以下一段记载：“麦克马洪线正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画出的，随后就被遗忘了。我知道这一切，因为是我发现它被遗忘了。”

印度政府为了增强它在华金栋被捕案件上的论据，在副秘书长夏洛爵士的推动下，决定寻求伦敦陛下政府认识到有必要正式公开批准麦克马洪线，并追溯既往的效力。

那时官方公开批准的条约、地图等等，都载于经印度政府外交政治部授权每隔15年出版一次的、由艾奇逊编纂的《契约、条

约、证书集》^①，但这个条约集没有一个地方提及麦克马洪线。1929年出版的这部《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没有提到“麦克马洪线”，但是里面有一段讲到1914年西姆拉条约和想解决中国与西藏边界的企图（不是印度与西藏的边界）。该条约集还记载着中国政府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卡洛爵士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从小档案转到了《艾奇逊条约集》，他的目的是想得到官方对“已被遗忘的”条约的承认。为此，卡洛写信给伦敦的印度事务部，要求准许在《艾奇逊条约集》中发表1914年的协定和地图。卡洛於1936年4月9日在给印度事务部助理下级秘书约翰·瓦尔顿的信中这样争辩说：“……印度政府认为，在其公开的记载中塞进1914年条约的副本是有利的。如果在《艾奇逊条约集》这样的出版物中没有那些副本出现，如果中国政府知道了，那就会被他们大大地利用来支持印藏之间不存在经过批准的协定的论据。”

1936年6月4日，瓦尔顿记下了印度事务部会议记录，其中他列举由於未公布1914年文件和地图，“有招引不宜出现的中国方面注意的危险。”其后，在1936年9月9日印度事务部的会议记录中，他写道：“关于东北边界的法律地位并非完全可靠，因为在这方面1914年的条约仅仅是同西藏缔结的，而不是同中国缔结的。而中国对西藏拥有公认的宗主权。”

要求发表1914年地图而施加的其他压力也增加了。印度政府1935年法案需要对部落地区阿萨姆精确地划出一条界线。缅甸即将分离出去，也同样需要对边界作出精确的描述。卡洛利用这种压力来力陈他的论点。他说：“当缅甸政府被通知有关这条边界（麦克马洪线）的位置的时候，显然阿萨姆政府却被忘掉了，而且似乎直至今日还蒙在鼓里……”卡洛达到了目的，英国政府敦促他采用“不显眼的”只引起“最低限度注意”的办法把1914年会议的文件列入《艾奇逊条约集》。伦敦还要求印度政府发

^① 以下简称《艾奇逊条约集》。——译者

行《艾奇逊条约集》的修订版。

这一切都很合卡洛的胃口。他悄悄地下令把《艾奇逊条约集》的老版本都收走，并于1938年重印了新版本，但年份都注明为1929年。这完全是不道德的，但是卡洛却滑得更远。他用经过修饰的长达三段的文章，来替换关于1914年会议的一小段陈述事实的话。他在这篇文章里，尽可能多地塞进有利于印度的话。这种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犯了伪造罪。（见附录）

再版的伪造本就这样“不显眼地”在全世界替代了原有的《艾奇逊条约集》版本（原版本只发行了62本）。然而，在三个地方尚存有原版本——一本在卡洛的办公室（以后在外交部），第二本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第三本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我的母校哈佛大学拒绝出让原版本。

此后，印度测绘局长受命修改该局的地图，把麦克马洪线画进去。他于1938年照办了，但事先指出了这条线在地理上的许多反常情况。甚至后来，印度测绘局的地图把麦克马洪线标明为“未经标定”，并把阿克赛钦地区标明为“边界未经规定。”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1954年。

因此，萨达·帕蒂尔在1950年11月要求尼赫鲁就“我们边界未定状况”制订一项政策是对的。尼赫鲁不仅把这个经过清醒思考的忠告搁置一边，而且于1950年11月20日在议会宣布“不管有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已经肯定了的边界，不允许任何人越过那条边界。”尼赫鲁正好在12年之后吃了苦头才知道，他在两方面都错了。

1952年，前外交秘书，当时老孟买邦邦长吉里加·香卡尔·巴杰帕伊写信给尼赫鲁，采用了当初帕蒂尔告诫的办法。他写道，对中国来说，麦克马洪线可能是“英国侵华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伤痕之一，中国可能要在调整边界的基础上设法治愈或消除这个伤痕。这种调整也许对我们是既不愉快也不有利。”因此他敦促尼赫鲁向中国提出此事。

尼赫鲁同驻北京大使潘尼迦讨论了这封信。尼赫鲁用了无视现实的语言，给巴杰帕伊写了回信。他写道：“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对印度没有好处。如果中国人提出此问题，我们就采取这样的立场，即此问题无需讨论。”巴杰帕伊并未被说服。他回信说，中国人“不到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是无意提出那个问题的。”他再次要求尼赫鲁向中国人提出边界问题，因为这样印度至少会知道它的立场如何。对这种正确的劝告，尼赫鲁却置若罔闻。

尼赫鲁不仅不了解情况，而且还让有知识和了解情况的人愚蠢地重复“不管有没有地图”的论点。因此，他所信任的情报局主任莫力克在《中国的背叛》第155—156页中说，在政府谈判“1954年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之时，“我们的代表团在汇报情况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印度的北部边界问题也应在谈判中得到解决。但大家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让中国利用这个机会把整个问题都翻腾出来。反正中国将不承认那条我们认为是北部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谈判。”还能有什么比这更蠢的呢？用莫力克的话来说，只有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后，才能谈判边界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谈判的呢？

按照1954年通商协定，印度政府单方面把1914年我们在西藏获得的一切治外法权移交给了中国。当时所提的理由是，这些权利都是英国人以帝国主义的手段得来的。那么难道麦克马洪线不同样也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吗？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充满了这种矛盾。在1954年，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本应是把经过谈判解决边界的办法写进通商协定，作为我们放弃根据1914年条约在西藏所获权利的代价。可是相反，印度政府不仅失去了一个最后解决问题的重要机会，而且还把事情弄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竟然在1954年悄悄修改1950年印度测绘局的地图，并且武断地画出了克什米尔（阿克赛钦地段）和东北边境特区的边界，好象这些边界已经确定和标定。印度政府就这样通过官僚政治的伎俩，开头在

1914年，继而在1936年，最后在1954年，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确定了中印边界。这种确定边界的方法在现代国家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当尼赫鲁通过他的鸵鸟般的对华政策，用中印人民是兄弟的摇篮曲哄骗印度人民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正迷惑住了尼赫鲁。1954年10月尼赫鲁访华，他受到了按中印人民是兄弟精神的隆重接待。在公开场合里，只字未提边界未定。然而，后来尼赫鲁在1958年12月14日给周的信中写道，他曾向周提起过中国出版的“错误地图”的问题。尼赫鲁为什么违背了他在巴杰帕伊1952年写信时所作的决定（不提出问题），这就不得而知了。按尼赫鲁的说法，周告诉他说，“这些地图是解放前的地图的翻版，中国没有时间去修改它们。”尼赫鲁称他对此有记录（然而在1954年他没把它送给周作参考）。我们不知道周到底说了些什么。因为周在1959年9月8日的复信中否认了此点：“不过，既然中印两国尚未通过友好协商和联合勘界而划定边界，中国就没有要求印度修改它的地图。在1954年，我以同样的理由向阁下作了解释，中国政府现在修改旧地图也是不合适的。”

尼赫鲁由於没在早些时候正式提出边界问题可能要受责备，周恩来也肯定未完全按外交惯例，根据他在给尼赫鲁的半官方信件中说的去做。周当时本应知道印度测绘局1954年地图不是一幅印度的老地图，而是新修改的地图。周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尼赫鲁在1958年12月14日的信中说，当周恩来1956年访印时，“我记得你告诉我，你不赞成把这段边界叫作麦克马洪线，……你当时告诉我，你已经接受了同缅甸接壤的麦克马洪线边界，而且不论很久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鉴於中印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你打算也承认同印度接壤的这条边界。”尼赫鲁继续补充说，“那时我曾想就此问题写信给你，但是我决定不拿这样一件小事情来打扰你。”

这可不是“小事情”。尼赫鲁1956年没有给周恩来写一封正式

的信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但周恩来当时也没能写下他的政府的立场。这些小错於是就促成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周周来在他1959年1月23日的复信中作了下面惊人的承认：“1954年中印双方谈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的确没有提出边界问题。这是因为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不成熟。”这种承认明显意味着周恩来把尼赫鲁给迷惑住了，尼赫鲁天真到了走上迷途的地步。

此后，形势发生了两位总理不能控制的变化。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这使中国人产生了非常大的怀疑。他们称他是叛徒，要他回去。印度加以拒绝，称我们有给予政治受害者避难的传统。当然，我们的立场不是一贯的。多少年后，在1982年，当美国给卡利斯坦^①领导人拉格吉特·乔汉博士签证时，印度递交了一份尖锐的照会，与中国1959年就达赖喇嘛问题给我们的照会非常相似。

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以后，尼赫鲁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允许一些西藏移民飞往美国科罗拉多，并训练他们沿中印边界伏击中国的车队（在1968年，甘地夫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允许他们在南达·德维山顶上安置设备，以监视中国的核试验）。

到1961年，中印各向两极疏远，随后是1962年战争。我们双方做了我们的无知和立场的俘虏。16年来，直到1978年，当莫拉尔吉·德赛^②要我访问中国时，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甚至还没有对话的关系。

这篇研究文章得出什么教训呢？中印边界并未划定，麦克马洪线没有合法根据。关于阿克赛钦和所谓中段边界画法的论点甚至更加无力。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在边界问题上有无可争辩的理由。因之，两国的地理学家和军事专家必须坐在一起，

① 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族人要求独立，成立卡利斯坦国，意即纯洁之地。

② 老国大党元老，1977年人民党执政时任总理。

来彻底讨论出一条相互有利和便于维持的边界。为此，有必要树立一个全国一致的看法。

附录：《艾奇逊条约集》是怎样被篡改的？ 下面引用的是，印度政府外交政治部授权出版的艾奇逊编纂的《契约、条约和证书集》第14卷（1929年）

原版：

“1913年，西藏、中国以及英国的全权代表在印度举行会议，试图解决有关中藏边境事宜。一个三边条约被草拟出来，并于1914年草签。但是，中国政府不准其全权代表正式签字。”

伪版：

“1913年，英国、中国以及西藏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会议，谈判试图就西藏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就三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就西藏同中国和同印度的边境达成一项协议。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主持下，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会议草拟了英国、中国和西藏的三方条约。三方代表于1914年在西姆拉进行了草签。但是，中国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条约，这样就丧失了他们可以从条约中得到的好处。其中包括条约明确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的宗主权以及允许一名中国官员随带不超过300人的卫队驻在拉萨。英国和西藏以声明接受条文在双方之间具有约束力的方式，批准了这个条约。

“条约包括了对中藏边界和印藏边界的确定。在中藏边境，规定了两条边界。这两条边界中间的部分叫内藏，西部边界以西的那部分西藏称作外藏。

“由于未经中国政府批准，这些边界仍然是不固定的。由陛下政府和西藏政府接受的，在阿萨姆和缅甸边境的印藏边界，是确定在不丹东部边界和位于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分流处的伊索拉希山口之间。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弯曲部以西，这条边界，大部分沿着喜马拉雅山主山脊，此点以东则包括处于阿萨姆政府和

缅甸政府政治控制之下的所有部落地区。整个这条边界线离印度平原和缅甸大约100英里。

“根据条约，英国和西藏签署了一套新的贸易规定，来替代1893年和1908年的旧规定。”

译自印度《星期日》周刊，1982年3月

28日和4月3日两期。

李耕砚 译

1937—1941年外国对 中国的援助^①

阿瑟·N·杨格

不充分的援助

中国同强敌孤军奋战长达四年零五个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长。友好国家虽有援助，但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的援助次多量少，太不及时，对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增加它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机会来说，这种援助方式并不是最好的。

多亏摩根索（Morgenthau）财政部长，美国在最初两年购买了中国的白银，这对中国非常宝贵。尽管并没有提供贷款，但这种购买使中国不能使用的白银储备转变为价格坚挺便于使用的美元。1937年7月10日以后的购买额总计为3.62亿盎司，价值1.57亿美元。再加上战前的购买，共计约5.5亿盎司白银，价值2.52亿美元。美国的白银政策改变了历史。这一政策迫使中国在1935年放弃了过时的银本位，转而采用管理货币，使中国能够充分利用通货膨胀来筹集军费。若以白银为本位，中国便无法找到一种灵活办法来满足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财政需要，有组织的抵抗就可能只会维持几个月而非几年。战争在时间上的延续后来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主要因素。

给中国提供了唯一及时的信贷和军援的是俄国。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国从俄国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军火、飞机以及“志愿”飞行员。俄国没有等待正式协定——正式协定迟至1938年3月才签订。除了对日本抗议以及美国购买白银外，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将近18个月中对中国的援助微乎其微。到1938年12月美英

^① 此标题为译者所加。原标题为《总结：1937—1941年》。

两国向中国提供第一笔有节制的贷款时，俄国已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大部分已经使用。1940年以前，俄国已经批准的贷款是西方贷款的3倍多。而且，与西方贷款截然不同，俄国的贷款可以用于购买战争物资和军火。尽管俄国本土比其它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有可能遭到日本的报复，俄国仍然迅速向中国提供了军事顾问和实际为中国作战的“志愿”飞行员。在对中国的这种“志愿”行动中，俄国堪称“第一”。陈纳德的飞虎队只是过了3年才参加进来。对俄国而言，这场战争是解除日本对自己威胁的替罪者的战争。所以，俄国颇为“正确地”把援助只限于提供给国民政府而不是提供给中共（甚至在中国内部冲突明显加剧以后也是如此）。俄国贷款的利率只有3%，要比1938—1941年间英美对华提供的购货贷款优惠得多。俄国的援助也不附加政治条件，国民政府明智地利用了这种援助，却又不过分依赖苏联。

太平洋战争前外国批准给中国的贷款大约相当于5.13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采购，9300万美元用以支持通货，细节见附表2。俄国提供的2.5亿美元用于支付补给品和服务工作。来自西方的2.635亿美元援助中，美国提供1.7亿美元，其中1.2亿美元用于采购，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通货。英国提供7850万美元，其中3550万美元用于采购，4300万美元用于支持通货。法国提供1500万美元用于修建铁路。除贷款外，美国在1941年还提供了2600万美元租借援助。1937—1941年来自国外已经批准的援助（包括租借）总计5.395亿美元。

然而，这一时期实际使用的各种贷款加上租借援助总计只有3.5亿万美元，即不到已批准数的2/3。用唯一可作比较的美元数字统计，中国在太平洋战争前所利用的俄国与西方的援助大体相当^①。在最初两年半中（即1940年以前），中国已利用的俄国贷

^① 1937—1941年，俄国援助的利用额估计为1.7亿美元（总数是1.73亿美元，到1942年实际上全部用完）。西方的援助估计如下：美国购货贷款9500万美元（到1945年初用了1.04亿美元）；美国租借援助2600万美元；英国购货贷款2000万美元，稳定通货贷款2700万美元；法国贷款1200万美元。三国总计1.8亿美元。美国稳定通货贷款完整未动。

款数几乎是已利用的西方贷款数的3倍。但是，到1940年俄国贷款逐渐减少，西方援助的势头随着购货贷款和支持通货贷款以及1941年开始的美国租借援助而增强。

西方的采购贷款（1.2亿美元来自美国，3550万美元来自英国）用于帮助中国获得大量自身不能提供的货物和服务。通过一个纽约的中美合营公司——（环球）贸易公司，利用美国贷款所进行的采购颇为顺利。联邦政府的采购官员帮助中国获得优惠价格，交易一清二楚，不掺“水分”。这种贷款不能用于购买军火或支持通货。但它腾出了其它资金（尽管有限），以满足那些主要用途。华盛顿默许购买一些组合配件，它们很容易转作军事用途。与俄国贷款的灵活性相比，禁止购买军火给中国造成不便。1941年5月，中国成为租借对象，从而减轻了利用贷款的需要。中国在珍珠港事变前利用的美国贷款约为9500万美元，战争结束时，用了1.45亿美元。虽有极大困难，中国还是输出了已经允诺的战略物资。这些物资对参战前和参战后的美国都是有价值的。截止1949年6月30日，中国已经基本偿还了美国的贷款。在英国的贷款中，中国已经偿还了2859万英镑贷款中的一部分和500万英镑贷款中的90万英镑。中国用掉的俄国贷款总数估计为1.73亿美元，到1946年中期，只有5500万美元尚未偿还。^①

从1938年底开始的西方各种采购贷款，出色地向中国提供了除严格限制的军事项目之外的中国所需的供应品。由于运输的困难，中国采购的物资并非全能运抵中国。十分不幸，日本对印度支那和缅甸的侵略，使中国损失了许多运输途中的物资。

但是，这些贷款也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中国不得不用当地货币购买桐油、锡和其它出口物资来偿还贷款。可靠的资料表明，通过输出原料，中国在1938—1941年所偿还的贷款连本带利为8,500万——9,000万美元，其中6,000万——6,500万美元是付给

^① 《美中关系，1949》，第32页；英国财政大臣办公室1962年8月15日的信；俄国资料来自中国财政部记录。

俄国的。这种支付所需的款项，远远超出其它开支，只能来源于印钞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看出了这一点。他在1940年10月23日的电报中指出，美援“是以高昂代价提供的，它正在吸尽这个国家的钱财和资源，而这些钱财和资源本来是可以支持通货和遏制物价飞涨的”。^①直接馈赠，或战时暂缓支付本金，是好得多的援助形式。但是，在租借法通过以前，馈赠在政治上不可能。而贷款，在西方国家看来，也必须在商业上是公平合理的。

1937—1941年的援助未能满足中国的首要需求：支持通货和军事采购（特别是飞机）。中国在这一时期合理地利用了多少援助呢？

英国早在1939年初就开始支持通货了，当时它提供了500万英镑的贷款，折合为2300万美元。这是英国在劝说美国参加联合行动或相应行动的企图失败之后提供的。这笔贷款很及时，但毕竟太少了。甚至只要再增加50%——100%就有可能使中国免于1939年7月货币基金的灾难性崩溃。

我认为，除了1939年英国的贷款外，中国在太平洋战争前的1938—1941年间还应该得到1亿到1.25亿美元，以支持通货和向自由市场投放。尤其不幸的是，在1938—1940年下半年的危机年代中，美国不愿与英国一道作出联合或相应的努力来支持中国的通货，当时法国曾一度准备参加。国务院逐渐同意这一行动，但财政部不同意。中国的处理办法可能也远非完善。不过，从1938—1941年中国只有有限的基金用于这一目标的经历来看，我相信，这笔基金是会妥善加以利用的。通过机智的谈判，是有可能在援助上附有所希望的“条件”的，比如，由能干的中外委员会来管理，这将对中国和援助国双方都有利。

这种援助原本可以制止通货膨胀并全面加强中国的地位。即使办法不完善，财力不充足，中国也能由于这种援助保持住外汇

^①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51/7145。

牌价，在上海维持住一个有秩序的市场，从而有助于保持对通货和政府的信心。同时，这种援助也向自由区和沦陷区的中国人民表明，政府仍然是一个兴隆发达的实体。这一点在充满失败、敌人破坏通货和发生其它不利事件（这些不利事件在容易引起恐慌的市场上会产生加倍的影响，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影响）的时期显得尤其重要。支持通货有助于友好国家确信中国是值得帮助的。它会阻止敌人征服所带来的剥削，并使敌人比较难于推行伪币。中国无法摆脱发行纸币以弥补大部分战费。虽然印钞机在抛出大量纸币，但对通货的支持会在全中国范围内使之保有价值，并把这一过程继续下去。而且，出售外国货币支持市场，中国货币就会回笼，这种支持活动就可以阻止通货膨胀。

通货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如果1938—1941年间中国没有借助英国相对来说数额不多的援助，并得以在“小本经营”情况下进行稳定通货，那么，中国在战争中（甚至在珍珠港事变前）能否避免财政崩溃则是大有疑问的。中国没有正确评价英国援助的价值实属不该。

美国虽然后来在1940年答应给予中国支持通货的援助，但实际直到1941年8月18日，即珍珠港事变前三个半月才践约。那时，美、英、中三国计划提供大约相当于1亿美元的款项，这是一个够用的数量。但是，美国财政部坚持汇兑管制试验，无视这种试验效果不佳的警告。结果是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其代价远远高于在自由市场上支持通货的政策，并造成了僵硬的和超出实际价值的汇率。这一制度增加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为得到中国货币而付出的代价，并导致中美之间严重的争执。

而且，汇兑管制制度的实行有赖于冻结中国在海外的资产，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除非同时也冻结日本资产。大约1941年7月底，当美、英和荷兰同时冻结中国和日本资产时，这一行动实质上对日本并未起作用。不管局势如何，日本军国主义者业已决定南进。不过，联合行动很可能促使日本在12月7/8日突然对这

三个国家发动进攻，而非蚕食性地南进。对荷兰和英国蚕食性的进攻或许会将美国卷入战争，但不会造成偷袭珍珠港所产生的举国一致群情激昂。

1938年下半年本应该是友好国家开始帮助中国在自由市场上支持其通货的时候。由美国带头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甚至只要美国在1938年7月给英国以鼓励，就会使形势变得有利于这一援助。那时，中国正在用自己可怜的财力成功地支持着通货。如果友好国家当时着手以联合的或相应的行动给予适当援助，就会对中国发生重大作用，也会缓和以后中国内部以及中国与西方朋友间的矛盾，甚至可以帮助中国战后的复兴。并阻止局势的恶化，这种恶化的局势后来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就军事采购而言，很难估计中国在1937—1941年合理使用了多少钱。不仅是因为“重武器”价格昂贵，即使有迅速和大量的西方援助，有效地利用也是大成问题的：如何在日本封锁的情况下将相当数量的军火和其他物资运送到中国所需要的地方；运到后，又如何有效地加以利用。正象国务院所觉察的那样，迅速而有效地给予不发达国家大量援助远非易事。战争暴露了中国缺少物质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也提出了内政和军事改革的基本需要。

在空军方面，中国本来可以在战争开始时十分出色地使用许多西方的飞机；这只需要在提供飞机时附加一些“条件”：比如，在陈纳德或其他干练军官指挥下训练飞行员和使用飞机。如果向那时的中国航空委员会仅提供飞机，则全然无济于事。^①而且，提供飞机也可以刺激西方的飞机产量，并能使西方注意日本的航空能力及其发展，如1940年日本零式飞机的发展。如果西方和苏联一样，较早地提供“志愿”航空人员，无疑会得到更大好

^① 这一点在以后的战争中就表现出来了。当时，在未经美国训练的指挥官的指挥下，美国所训练的中国飞行员表现平平。而当这些飞行员编入陈纳德的飞行队时，他们就干得很出色。

处。俄国的经验表明：1938—1941年不卷入战争也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或许还会阻挡日本后来的冒险行动。但直到1940年末，这一问题还未提到美国可行的政治日程上来。

在1937年11月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出于战争需要，中国曾向美、英、法三国请求5亿美元的贷款。回想起来，这个建议就数量而言，的确符合实际。如果这些强国发现它们有能力提供这笔援助的话，那么事态发展进程本来会大为好转的。如果在1937年花费5亿美元，就可以避免后来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笔代价至今尚未了结。一年后，西方仍然没有向中国提供贷款，在上海的英国期刊《金融与商业》对此发表了有预见性的评论：

“严峻的事实是：除非大量的援助很快到来，否则中国的民主人士就会在绝望中被迫转向共产主义。民主国家将在一场压垮这个国家的灾难中失声痛哭。这个国家如果一开始就得到本应该迅速到来的援助的话，将会发展成为和平的政治进步事业中一位最有力的盟友。”^①

中国孤军奋战的四年半事关重大。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正在为美国的孤立主义付出重大代价。正是这种孤立主义阻止了美国带头给予中国所请求的迅速援助，甚至在1941年春租借法批准以后，美国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欧洲。援助中国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援助也受到政府一些部门的反对。那时，以及在战争的其余时间中，中国感到被人忽视，有一种不平等之感。

援助与平等

未能得到更多更及时的援助伤透了中国的心。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不好的情绪，非难中国的立场，忽视它与日本孤军奋战

^① 《金融与商业》，1938年，第23期，第402页。

四年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1941年8月27日的电报中说：“正象他们需要物资援助一样，中国人希望自己被视作反侵略斗争中平等的一员。”^①他们觉得在1941年夏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中，中国被忽视了；中国也应与美英一道参加这年秋天的莫斯科会议。在1941年10月10日的广播讲话中，蒋介石夫人声称：

“我们认为中国已经赢得了与其他民主国家一样的平等地位，但我们并不希望把这当作对我们的恩赐，……在一些国家商议亚洲和太平洋事务时，我们拥有一种责无旁贷的权利，他们应该和我们协商，我们的观点也应该为人所知。我们是反侵略斗争中的主要国家，因此在反侵略国家共同会晤中我们不应被视为小伙伴……除非你们毫无保留地承认我们的权利，即在计划一种可以防止未来侵略的世界秩序中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否则，我们不会感到安全。”^②

1941年美日之间长时期的会谈曾引起中国紧张不安。中国担心自己会成为绥靖政策的牺牲品。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除了军事胜利之外，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机会来结束日本占领。国务院也认识到这一困难。在珍珠港事变前几周，一份有关日本侵华的分析报告指出：日本人已经“细致入微地”管理着中国占领区的交通、通讯、公用事业、邮政、财政和主要市场。成千上万的日本文职人员正忙于这些活动。军队“在中国的商业和‘欺诈’中从各方面‘获得既得利益’”，“享受着以前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权力、财富、权威和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军队是不会轻易放弃中国的。”^③

蒋委员长在11月25日的一份文件中告诉华盛顿，敌人的宣传机器正在散布日美将签订密约。他说，任何放松对日本财产冻结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1》第4卷，第395页。

② 同上，第503页；第552—553页。

③ 国务院远东司：W.R.兰登（Langdon）1941年10月25日的备忘录。出处同上，第543—546页。

和禁运的行动都会使中国人民感到“美国完全牺牲了中国”，中国将会崩溃，“每个亚洲国家都将丧失信心”，^①即使美国以后援助中国，局势也将毫无希望。从谈判角度考虑，丘吉尔也为中国担忧。他在11月26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

“理所当然，这件事应由您来处理，我们肯定不想再来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感到不安。蒋介石怎么样了？他不是正在用粗茶淡饭吗？我们担心的正是中国。如果他们垮了，我们面临的共同危险就将大大增加。”^②

从记录来看，11月26日美国给日本的最后建议不是一项绥靖建议，也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向日本所提草案的极其重要的一点，即作为一项可能产生的协议的讨论要点，是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其所有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③

然而，中国因为未能参加可能严重影响其前途的重要谈判，还是感到受了伤害，尤其是在它坚定抗击日本并付出几乎是难以相信的牺牲之后。植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被人欺侮的不平等感，在这次战争中一直隐隐作痛。这种不平等感使得战后与国民党以及以后的共产党中国打交道变得更为困难。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1》第4卷，第660—661页。

② 同上，第665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日本，1931—1941》第2卷，第769—77页。

附表1 1937—1941年外国援华贷款和租借

援助国	协定日期	总数(百万)	利率(%)	最后到期日	保 证	目 的
俄国	1938年3月1日	(美元) 50	3	1943年	农矿产品出口	军需物资等
法国	1938年4月22日	(法郎) 150 (英镑) 0.144	7	1953年	盐税、矿税; 法国政府信用保险部作80%保证	南宁铁路建设
俄国	1938年7月1日	(美元) 50	3	1945年	农矿产品出口	军需物资等
美国	1939年2月8日	(美元) 25	4.5(后为4)	1944年	桐油出口, 中国银行作保	非军事采购
英国	1939年3月10日	(英镑) 5	2.75	1945年①	本金由英国财政部作保, 利息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作保	稳定通货
英国	1939年3月15日	(英镑) 0.5	5.5	1943年	中国银行和英国商务部作保	购买汽车
俄国	1939年6月13日	(美元) 150	3	1952年	农矿产品出口	军事物资等
英国	1939年8月18日	(英镑) 2.859	5	1949年	中国银行和英国商务部作保	采购英国商品

续表1

援助国	协定日期	总数(百万)	利率(%)	最后到期日	保 证	目 的
法国	1939年12月11日	(法郎) 480	7	1954年	盐余(盐税收入剩余)和铁路收入, 法国政府信用保险部作80%保证	昆明-叙府 (今宜宾——译者) 铁路建设
美国	1940年4月20日	(美元) 20	4	1951年	锡出口, 中国银行作保	非军事采购
美国	1940年10月22日	(美元) 25	4	1945年	钨出口, 中国中央银行偿还	非军事采购
美国	1941年2月4日	(美元) 50	4	1948年	锡和其它输出品; 中国中央银行偿还	非军事采购
美国	1941年4月1日	(美元) 50	1.5	②	中国政府和中國中央银行偿还	稳定通货
英国	1941年4月1日	(英镑) 5	1.5	③	中国政府和中國中央银行偿还	稳定通货
英国	1941年6月5日	(英镑) 5	3.5	1951	农矿产品出口	在英镑区采购
美国	1941年	(美元) 26			以后决定	租借

① 根据自己的保证, 英国政府在1945年付给英国银行500万英镑认捐额。

② 这笔信贷的偿还要求在事先30天提出。不过, 偿还问题并未提出, 因为平准基金委员会支付的美元来自中国的银行认购的2000万美元和该会的美元收入。此项贷款在1943年还清。

③ 这笔贷款的偿还要求在事先1个月提出。中国主要靠手头现存的1939年和1941年平准基金的英国货币结余, 在1944年偿还了这笔贷款。

附表2 1937—1941年各国援助小结

下表所列贷款是在1937—1941年间已经公布,或已经达成尚未公布,并
是以百万美元计。俄国贷款用美元计算;英国和法国贷款折合成相应美元。

年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西方援助 合 计	苏 联
	采购贷款	稳定通货 贷 款	采购贷款	稳定通货 贷 款	各种贷款		军援贷款 (等)
1938	25		2.3		5	32.3	100
1939			13.2	23	10	46.2	150
1940	95	50	20.0	20		185.0	
总计	120	50	35.5	43	15	263.5	250

附表3 利用总额

到1941年底实际利用的贷款近似额如下(部分是估计数,以百万美元或
折算成百万美元计):

美国采购贷款	95
美国租借援助	26
英国采购贷款	20
英国稳定通货贷款	27
法国贷款	12
合计(西方贷款和援助)	180
俄国军援贷款等	170
总计	350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这些采购贷款进一步利用数的资料不全,但粗略估计此数如下:美国贷款:1000万美元;英国贷款:
相当于800万美元;俄国贷款:300万美元

译自《中国和援助之手(1937—1945)》(«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第11章,第206—214页及附录第440—
442页

任东来译 李安山校

法国垄断资本家控制 中东铁路的企图

H. C. 因杜卡耶娃

尽管法国对中国东北并无多大兴趣，但在日美两国为争夺中东铁路而进行角逐的情况下，法国统治集团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企图借助道胜银行和沙皇驻北京外交使团，对中东铁路实行控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当时，苏维埃政府宣布解除驻北京公使库达舍夫和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将军的职务。但库达舍夫拒不服从命令。中国政府继续把库达舍夫视为俄国的代表，并向他和驻日本大使库朋斯齐交付所谓“义和团赔款”的俄国部分。这样一来，反革命代表就掌握了在中东铁路地带和全中国代表俄国利益的“权利”。关于控制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协定签署后，曾参与这一协定谈判的美国驻日本大使莫里斯，将协定文本通知了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霍尔瓦特在1919年2月26日给库达舍夫的报告书中，从对苏维埃俄国进行反革命斗争的组织者的利益观点出发，批准了该协定。他写道：“您从这些文件（1919年协定——H. C. 因杜卡耶娃）中可以看出，为中东铁路的命运担忧是毫无根据的，相反，在北美政府和日本政府签署的、且已通知其他盟国并为盟国所接受的秘密节略中指出，他们经营这条铁路将和经营西伯利亚铁路一样，是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是考虑日后在不违反任何现行章程的情况下将其交还有关人员”^①。

^①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远东鄂木斯克政府外交部办公厅全宗、案卷17，第116页。

库达舍夫之所以赞成盟国对中东铁路实行控制，是因他得到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克一梅利的担保：“斯蒂文斯将代表俄国行事”，“铁路局不致力开创先例或为美国谋取任何权利或侵害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权利”^①。

对加紧进行反苏维埃武装干涉感兴趣的高尔察克政府也赞成盟国控制中东铁路。在这一问题上，高尔察克政府已得到中东铁路局的完全赞同，因为该局担心中东铁路地段工人的革命情绪会阻挠运送干涉者的军队。1919年8月，高尔察克政府代理外交部长苏金请该政府驻远东代表克列姆“问盟国代表提出一项请求，要他们把外国护路队和必要时能使火车正常运行的铁路营开进铁路地段”^②。克列姆在复信中通知苏金说：“霍尔瓦特热烈欢迎所提出的措施。我认为必须请盟国的护路队进驻，因为从俄国回来的中国人被灌输的布尔什维主义正在中国工人中间发展。霍尔瓦特还认为必须组建铁路营，保护中东铁路。当时，克列姆指出，不需要盟国派太多军队护路，“因为可以划清职责，让中国人剿办红胡子，而让外国军队保护铁路”^③。

1919年12月，霍尔瓦特通知高尔察克政府外交部说，北京政府建议将监督中东铁路之权交给他，并允许组建独立于共管委员会的新的监督机构，但铁路局以美国驻日本大使莫里斯曾发表声明不允许俄国铁路局的权利有“任何变化”为籍口，表示拒绝^④。

1919年末，当高尔察克军队被红军打败，美日之间控制中东铁路的斗争日趋尖锐时，库达舍夫提议由道胜银行，即由控制该银行的法国实际管理中东铁路^⑤。这一建议得到法国银行家的积极支持。但是遭到指靠美国和英国的高尔察克“政府”的反对，驻

①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对满洲和外蒙古的政策》，第126页。

②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远东鄂木斯克政府外交部办公厅全宗、案卷20，第217页。

③ 同上，第214页。

④ 同上，案卷17，第645页。

⑤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全宗，案卷56，第17页。

北京的“俄国使团”和高尔察克“政府”之间就此问题函电往来频繁。代理外交部长特列季亚科夫写信给库达舍夫说，他从日本和美国驻西伯利亚代表的谈话中了解到：“关心该问题的是美国，特别是日本”，所以，不能把“将铁路交给银行视作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①。库达舍夫认为，只有“让一个大国”，即让法国“非正式管理铁路”，才能使铁路摆脱混乱，他反驳特列季亚科夫说，铁路混乱的主要原因不是铁路的财政状况，“而是来自外部的各国占领中东铁路的明显意图”，并列举了争夺中东铁路的主要竞争者：中国、日本、美国和白匪军头目^②。

库达舍夫在给霍尔瓦特的信中阐明了关于必须同道胜银行签订合同，以便将中东铁路交给法国控制的主张。他写道：“争夺铁路的斗争尤其骇人听闻。这是块肥肉，许多人垂涎三尺。我很不喜欢时而美国人，时而日本人，时而中国人盛情要求铁路接受任何垫款和贷款。这样，我们就像昔日不经心的地主将自己的地产放给高利贷者，而自己却并无觉察。另一方面，日本人占领铁路的危险也临近了”^③。

旅居巴黎的前沙皇政府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也积极支持法国垄断资本家对中东铁路的图谋，因为他认为“解决中东铁路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铁路交给道胜银行”^④。

在红军把干涉军赶出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取得节节胜利，俄国和中国的铁路员工对铁路局的反苏维埃政策日益不满，并于1920年发展成反对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将军的联合罢工的情势下，前沙皇驻北京外交官和代表法国的道胜银行代表便迫不及待地同中国政府商谈中东铁路的命运问题^⑤。

① 同上，第16页。

② 同上，第17页。

③ 同上，第31页。

④ 萨佐诺夫1920年1月2日致库达舍夫的信，存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全宗，案卷56，第21页。

⑤ M. 贾丕才：〈苏中关系史〉，第31—32页。

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书，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沙皇俄国在华的权利和特权，并声明，取消前沙皇驻中国和日本代表的全权，所以应停止向他们交付“义和团赔款”^①。1920年初，中国收到上述告中国人民及中国南方和北方政府书。帝国主义者和白卫军阻挠中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协议解决中东铁路问题。当收到上述文告后，库达舍夫立即给中国外交部递交一份备忘录，声称：“目前，苏维埃政府尚未得到全俄各地的承认。因此，只有在苏维埃政府得到全俄承认，该政府才有权放弃俄国根据两国条约规定的在华权利。无论如何，这种放弃不能触犯俄国公民和机关根据专约所享的权利……根据（加拉罕提到的）1896年条约，道胜银行对中东铁路享有的权利……”^②

1920年4月，使团让道胜银行立即正式向“中国政府声明其对中东铁路的权利。这使得我们同法国公使向中国人发表的关于俄国私人和机关权利不可动摇的声明更加有力。”此外，拟于不久的将来在北京举行中东铁路股东会^③。

北京政府一开始便反对法国资本家代表同俄国白卫军的这笔交易。北京政府试图借口道胜银行不是铁路股票持有者，中东铁路的一切事务均由沙皇财政部掌管，铁路建筑经费由沙皇俄国支付，拒绝道胜银行对铁路的要求。^④此外，中国政府在取消了沙皇驻北京使团代表“驻华的俄国人”讲话的机会后，试图使鼓吹和积极拥护将中东铁路交给道胜银行的库达舍夫的行动保持中立。中国政府趁以И. П. 尤林为首的远东共和国代表团抵达北京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1卷，第221—223页。

②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全宗，案卷74，第28页。

③ 同上，第31页，属沙俄政府所有、存于巴黎分行的中东铁路大部分股票以及存于道胜银行彼得格勒分行的股票被1917年逃到法国的道胜银行彼得格勒分行经理们偷走，分给霍尔瓦特、高尔察克、乌斯特鲁戈夫等“股东”。1918年，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中东铁路“股东”会。这次会议代表9个股份，即霍尔瓦特3股、高尔察克3股、乌斯特鲁戈夫3股以及其他股份。

④ 1920年4月20日《意志报》。

之机，于1920年8月7日向沙皇驻北京使团声明，不再向使团交付“义和团赔款”的俄国部分^①。北京政府针对法日两国所支持的库达舍夫提出的抗议，再次答复说，北京政府认为继续向不代表任何政府的某一个人交付“义和团赔款”是不可能的^②。1920年9月23日，北京政府声明将沙皇政府原在天津、汉口和中东铁路的租借地交给俄国事务特别委员会^③，继而取缔了沙皇政府驻中国各城市的领事馆。

为了不使外国控制中东铁路，中国报界呼吁政府同远东共和国代表团讨论铁路问题。《北京导报》在谈及法国对铁路的要求时，指出：“无法证实法国的要求是有根据的”，并写道：“除俄国和中国外，谁都不能干预铁路问题。法国给俄国贷款一事，对解决铁路问题没有任何意义。鉴于莫斯科已委托远东共和国同中国政府讨论铁路问题，所以，必须着手同尤林谈判”。^④

但帝国主义列强坚决反对中国同尤林使团谈判，反对中国政府对原沙皇外交官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已授命美国驻华公使阐明列强对俄国在中东铁路地带、哈尔滨和天津的租借地实行临时国际共管方案的态度^⑤。美国国务院建议克赖因对中国同苏维埃政府谈判采取“相应对策”^⑥。驻北京外交使团领袖于远东共和国代表团抵达北京之后立即向中国政府递交一份照会，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已经中止俄国使团及领事团的活动，但不允许中国政府同远东共和国政府缔结任何协定”^⑦。

归根结底，一方面由于某些大国，特别是法日两国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害怕对中东铁路实行美国所力争的国际共管，中国

① 1920年8月8日《上海生活报》。

② 1920年9月3日《上海生活报》。

③ 详见M·贾丕才：《苏中关系史》，第53页。

④ 援引1920年4月30日《意志报》。

⑤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0年第1卷，第691页。又见A·康特罗维奇：《美国争夺中国》。

⑥ 1920年10月7日《弗拉基沃日报》。

⑦ 1920年11月4日《意志报》。

已同意与道胜银行代表举行谈判。谈判经历了尖锐的斗争过程。中国政府询问何以证明道胜银行对中东铁路享有权利，即何以证明道胜银行拥有铁路股份。银行请法国政府证明这些权利。法国驻华公使通知银行说，革命后逃亡伦敦的前沙皇财政部代表可以证明道胜银行对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将有关文件寄给中国外交部。文件称：“我是俄国财政部代表，现住伦敦俄国大使馆，我以本函证明，道胜银行对中东铁路享有股份权”，法国总理米尔朗和银行董事在这份文件上签字证明无讹^①。

尽管这份文件显然令人怀疑，但是中国政府担心日本或美国帝国主义者占领中东铁路，所以同意根据这份文件同道胜银行签署合同。合同是1920年10月2日签署的。合同第1条规定，中东铁路公司即道胜银行要向中国偿还债务库平银500万两。除留给彼得格勒的铁路股票外，全部交给中国。第2条至第5条谈到铁路管理问题，规定成立董事会，董事会应由5名中国代表和5名“股东”代表组成。^②

正值远东共和国代表建议中国政府解决有关共同管理铁路并同意中国对中东铁路地带拥有主权时，签署了这一合同，该合同赋予中国对中东铁路的权利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中国政府的某些代表对这一点一清二楚。在中国外交官吴蔼辰和魏良声的著作中，这份合同被描述成证明“中国政府具有极大盲目性”的文件^③。吴蔼辰写道，中国政府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虽说只有中国在中东铁路的利益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政府未同苏维埃政府就中东铁路达成协议，而“使它（指中东铁路—H·因杜卡耶娃）落入国际机构之手。更加荒唐的是，当时中国同第三方达成了协议”^④。

中国政府明白同道胜银行达成协议不会得到中国舆论赞同，

- ① 中央国家列宁格勒历史档案馆，全宗323，目录4，案卷1142，第142页。
- ② 《与中国签订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919—1929）》，第30—31页。
- ③ 魏良声：《俄中外交》，第239页。
- ④ 吴蔼辰：《中国和苏联》，第137页。

好几天都没有公布合同本文，而公布之后，便开始同由白卫军组成的中东铁路董事会展开斗争。根据合同第6条，中国有权限制中东铁路公司的活动，北京政府声明说：“它认为推举众所周知的反动分子霍尔瓦特、乌斯特鲁戈夫等人加入铁路董事会是不可能的”^①。

经过一段斗争之后，道胜银行将前沙皇驻上海领事格罗谢、沙皇驻中国使团前工作人员杰斯尼茨基、前高尔察克部长德·郭业尔拉进了中东铁路董事会^②。法国安插的奥斯特罗乌莫夫被任命为中东铁路局局长。

1920年10月2日的合同反映了在争夺中东铁路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尖锐的矛盾。该合同引起美国国务院的极大不安，它证明日本和法国在对付美国这个问题上正在相互接近。中方签署合同的是日本的仆从、交通部长叶恭绰。亲日派也成了中国董事。北京政府的英国顾问伦诺克斯·辛普森在《远东时报》上载文，估计引起这一协定的原因：“多亏约翰·弗·斯蒂文斯坚决，技术部才阻止占领南满铁路和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始于哈尔滨的整个铁路……技术部在地方政府人士的眼中仍然是个障碍。为了将技术部的技术特长学到手，似乎中国仍有对铁路进行长期国际监督的思想。所以，1920年10月合同是荒唐的，在许多方面是幼稚的”^③。

合同签署后，道胜银行驻远东代表皮缅诺夫声明，没有必要对铁路实行国际共管。他认为需要在不久的将来举行股东会，审议中东铁路所需借款问题，因为这笔借款如由国际银行团提供，则后者“会要求对铁路实行监督”^④。

然而，中国和道胜银行所缔结的关于中东铁路的合同并没有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对北京政府同法

① 1920年9月2日《意志报》。

② 1920年9月29日《消息报》。

③ 中央国家列宁格勒历史档案馆，全宗323，目录4，案卷79，第11页。

④ 1920年9月28日《意志报》。

国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这笔非法交易提出了抗议^①。驻北京的远东通讯社社长A·E·霍多罗夫力争公布有关道胜银行对中东铁路所享权利的全部文件^②。

然而，中国政府对远东共和国代表的正当要求不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从莫斯科召回了正同苏俄政府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的军事外交使团。召回使团，同道胜银行签订中东铁路合同，积极支持蒙古恩琴匪邦，北京政府的所有反苏行动，在颇大程度上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授意和压力下采取的。1921年初，北京政府借口要在北满进行瘟疫检疫，关闭了中国与远东共和国的边界，并中断远东共和国和中国之间的运输。《上海生活报》刊登的一篇题为《鼠疫是原因吗？》的文章证实，正如铁路局所声明的，关闭边界的原因不是检疫，而是“准备新的反苏冒险”^③。

译自《美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第2章第3节

姚宝珠 译

陈春华 校

① 《远东共和国在苏维埃政权为建立同中国友谊的斗争中的作用》，载于佩尔西茨著《远东共和国与中国》一书，1920—1922年，第158页。

② 1920年10月31日《意志报》。

③ 1921年2月7日《上海生活报》。

灾难的边缘

——1945年的美中关系^①

斯蒂芬·莱文

1946年，战后的第一年，美国人摆脱了那些恼人的战时经济管制，口袋里又有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费热很快打消了他们对战后会出现另一次经济大萧条的恐惧。士兵们大批复员，开始新的家庭生活。在郊外新住宅区安顿下来的人们对于汽车、家具和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的需求急剧增长。对比之下，在中国，随着美国倡议的马歇尔调停使命的失败，内战再度爆发。中国人为着政治上的原因又开始互相厮杀。在内战的头两年里，国共双方在军事冲突中的伤亡人数就达230万左右。此外，在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激烈的农村阶级斗争中也许还有200万地主和其他土改对象丧生。

到1955年时，中国内战除去地位特殊的台湾之外已经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正迅猛地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计划对私人工商业实行国有化改造。中国进入了一个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与美国有联系的人，由于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与外国的交往而受到批判。苏联被当作“中国的社会主义老大哥”，美帝国主义则被视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它所奉行的革命准则的主要威胁。

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人正在享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和平与

^① 本文是1986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1945——1955）”上由美方学者提交的首篇论文。——译者

繁荣之果。仅在1955年一年之中，美国人就建造了100多万幢新住宅、购置了近800万辆汽车。许多汽车是那种大型轿车，带着高高翘起的尾巴，流露着美国人那种趾高气扬自鸣得意的民族情绪。不过，就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也生活在对于外部世界的恐惧之中。他们相信美国以外的世界是受着国际共产主义围困的危险地区。正如杰出的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说：在美国政治中占上风的依旧是那种偏执狂似的排外主义和“无所知主义”^①传统的混合物。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对中国抱着双重幻觉：他们把这个分裂的国家的绝大部分视为被莫斯科的奴仆们统治着的“红色中国”。他们相信，这个中国尤如一座蚁丘，那些身着蓝衣服、倍受奴役的大众就生活在黑暗之中，上帝、民主和自由事业的光芒永远无法射入。而那小小一隅——台湾——则被看作是“自由中国”，一座海滨要塞，发射出自由之光，照亮了集权制的空洞幽谷。

在研究1945——1955年中美关系时，上述情形为学者们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背景。它提醒我们注意，在此期间，一个巨大的鸿沟割断了中美两国的交往。究竟应该怎样勾画这10年的中美关系的轮廓呢？作为这个时代两国关系特征的那种互不理解、彼此仇视和相互冲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或许如同某些学者所争辩的，仅仅是由于未能把握住机会、路子走得不对头？这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对塑造它们的双边关系起了多大作用？国际体系中的诸因素，特别是美苏关系的份量又是什么？当时是否存在一种现实可行的政策选择，如果中美两国采取了这种政策的话就可能改变双方的敌对关系，改变双方在朝鲜的对抗以及中美之间的冷战？如果确有这种政策选择的余地，那么，哪些政治领导人曾动过这种念头？这些仅仅是值得进一步研

^① “无所知党”（Know-Nothing）是对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个反对移民入境、主张采取反天主教措施的政治派别的贬称。因为在外界询问其内部活动时，该派成员总是答称无所知。后来，“无所知主义”（Know-Nothingism）成为美国史中指秘密党派的排外主义的专用名词。——译者

究和阐述的许多问题中的几个。

本文不是在研究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那种构思严谨的探讨，而是有意采取广泛议论的形式。其目的在于：

- (1) 围绕几个重要问题，概括1945年之前的中美关系史；
- (2) 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当作酝酿战后10年许多棘手问题的温床而加以回顾；
- (3)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展中美关系的机会及其受到的限制这一点出发，较为广泛地探讨当时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关系的演变。

显然，完成其中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具备极为广博的知识，而我能力有限。因此，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无意提供任何最终结论，只选择了一个有限的目标——激发大家更深入地思考。

中美关系：历史的重负

凭借事后认识的诸般便利，让我们从1945——1955那10年间起支配作用的重大争端中提炼出一些有关中美关系史的问题。为此，必须首先确定40年代和50年代中美关系的基本问题。我想，也许可以把这整个10年的问题表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美国对这一胜利的反应。我们经常研究的那些具体事件，从马歇尔使命至金门、马祖危机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发生的。

中美两大民族在以往的一个世纪里截然不同的经历，不仅使得双方难以相互理解，而且使得两国在1945——1955年期间无法建立起圆满的关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于革命，作为影响政治和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

一方面，我们看到，19世纪晚期，美国已出现了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社会，有着制度化的政治体系和充满活力的经济。此外，它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领导成员，还滋长着一种力图在世界

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癖习。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正处在一个衰退的农耕社会中，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徘徊，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深刻的社会冲突，经济增长迟缓。由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已沦为从属地位，因而不断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

两国的政治文化也极其不同。在美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一心追逐个人成就的道德观与那种认为社会理应和谐一致的神话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自从南北战争之后，两种相当不协调的思想渗入了美国的民族结构，并成为贯穿美国生活方式的主线，至今依然如此。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历史是和谐一致的和不断进步的，而不是充满冲突的和往复循环的。美国的杰出人物们把社会冲突看作是一种机能失调和返祖现象。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欧洲人的疾病而与美国无缘。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大同社会中几乎人人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有色人种被排在末位。第二，美国人的斗争概念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这种斗争概念是保留给国际体系的。在这一体系中，美国自认为受到全能的上帝的特殊恩宠，注定不仅在西半球而且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扮演一个既行使支配权又乐善好施的角色。下等人（大多数是黑人）在这个自然的民族等级制度中必须接受他们的从属地位。这两种思想的结合培植起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乐观主义和自信精神发展到近乎自大狂的地步。实际上，在美利坚民族意识中缺乏的恰恰是那种自我怀疑的成份和那种对人类悲剧的领悟力；而只有这两者才是能够帮助美国人深刻理解中国近百年来的遭遇的要素。

与中美关系相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在美国人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如何理解革命的。美国人依然保留了一些杰斐逊时代的民主思想，对于与暴政和专制主义作斗争的人民怀有同情，但是这种同情一旦面对社会革命便消失了。除去痛恨攻击财产私有的权力（包括美国人的财产）之外，社会革命还意味着对美国人的一个基本信条提出了挑战；这个信条即是：只要使用现

存制度来协调那些现时相互冲突、但最终仍能和谐一致的利益就可以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在美国人看来，社会革命并不象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历史变化的动力，恰恰相反，他们把革命看作一个怙恶不悛的怪物。他们认为革命打翻一切正常秩序，或是引起无政府状态，或是引起暴政；革命导致对私有财产的蓄意毁坏或非法占据；而且革命还在国际范围内纵容颠覆活动。在他们的心目中，革命领袖也并非英雄豪杰，充其量是一些流浪汉和人类渣滓的操纵者，甚至有可能是外国势力收买的代理人。革命政府则被视为暴民登基的标记。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还有另外两个特征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第一，在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中的那种油腔滑调的道德主义有时会助长反对革命的气质。革命之所以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或邪恶的，是因为它破坏了现行的宗教原则和社会礼仪、攻击私有财产、崇尚暴力、不按法律程序而任意判决。第二，由于许多美国人头脑中存在着原教旨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只能从字面上理解革命末日说中极为常见的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词和乌托邦式的雄心壮志。结果，这种倾向往往使得美国人任意夸大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美国人就是这样用他们自己编造的“启示录”式的革命幻境把自己吓得半死。

总的看来，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那些始终未成气候的左派，大多数美国人对社会革命的看法是极端病态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这种对于革命的反感就反复地在国际活动中表现出来。例如：自从19世纪开始，华盛顿对拉丁美洲的不断干涉就说明了这种反革命倾向。华盛顿宁愿把军事寡头统治的联盟当作秩序和财产的保护者，而毫不理会军事寡头的镇压和统治会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①

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他们对从孙中山时代开始的中国革命运动抱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其中既混杂着对于那些想

^① 见沃尔特·拉费贝：《不可避免的革命》。

要按照美利坚合众国兰本改造中国的温和派的同情，又混杂着对于那些一心打算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危险的过激分子的厌恶。当这些激进主义分子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与革命瘟疫的外国传播者发生联系的时候，美国人的敌意就变得更为明显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恰恰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莫斯科有所联系。真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有什么机会能够指望美国对于4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出例外的反应呢？

如果把美国人的价值观归结为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是反映美国国力不断上升的一个侧影；那么，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则反映了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遭遇以来，深受耻辱而造成的创伤。这种经历使中国人得出了两种观念，它们显然与刚刚讨论过的美国人的想法大相径庭。在19世纪晚期，中国的爱国人士毅然决然地摒弃了孔子的寻求完美政府的理想，越来越把政治视为权力的直接的和赤裸裸的表现形式。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间，各式各样的野心家、宗派集团、政党和军阀们在争夺权力的角逐中铤而走险、一掷乾坤，中国内战因此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的中国革命者对那种寻求社会和谐的目标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那只是统治者为使不公正的现状永世长存而施用的诡计。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把阶级斗争和革命视为推翻旧政权、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恢复国家领土完整的唯一途径。

其次，中国人实际上也是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世界体系的。他们痛惜中国未能在这个体系中进行有效的竞争。尽管所有的中国领导人的长期目标都是振兴民族力量，以便维护国家独立，但在短期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却因受到诱惑而去寻求一个强有力的外国庇护人，他既能在国内的权力斗争中向他们提供援助，又能帮助抵御另外一些掠夺成性的外国势力。这种托庇于外国势力的倾向由于旧的帝国制度的死亡所引起的价值观的长期危机以及大批知识分子涌向海外寻找西学而得到助长。在这

一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与美国人的那种傲慢的自信不同，在中国的民族性格中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不仅助长了那种寻求依附的倾向，而且引起了中国人民族自我否定和民族自我肯定这两种情绪的起伏交替；伴随着这两种情绪的起伏交替，中国愿意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的程度也不断发生变化。

在这里，我已经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美两大民族的不同经历和它们各自的观念。我之所以采用一种漫画式的笔法是为了以简洁的方式、更明了地刻画出中美关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两国在对方的历史中仅仅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在两国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致力于中美关系，即便在那些有识之士中也是如此。正如美国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极为精辟地阐明的：在美中之间存在的所谓“特殊的友好关系”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遮蔽了美中相互之间仅存在着极为有限的吸引力的现实。亨特把“门户开放”的思想称作美国扩张主义和实行家长统治的一种表达方式。他认为：“这两者不仅来源于而且反馈回美利坚民族能够拯救世界并能够统治世界的幻想之中。”^①就中国方面的情况而言，亨特认为，那些晚清时代的政治家们不时尝试着将美国的在华利益（他们经常把这种利益加以夸大）转换成一种在他们反对其他外国势力时可资利用的战略财富。然而，他们往往因为来自美国的支持远少于他们的期望而感到沮丧。那个时代的整个美中关系实际是在美国人强烈的种族歧视和旅美华人饱受凌辱的背景中呈现出来的。亨特总结道：“通过对于那种虚构的美中关系的认真考察，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个启示，所谓‘特殊’是指两国关系中的这样一个阶段：中美这两个存在着显著差别、曾在各方面互相隔绝的民族仅仅由于近代的冲突才被密切地联系起来；因此，两国人民多少成了他们各自对于对

① 迈克尔·亨特：《特殊关系的产生：1914年之前的美国与中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03页。

方的错误理解以及各自制造的神话的牺牲品。”^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中关系由于极其缺乏互惠的交往和互相尊重而受到损害。在每一个领域的交往中——政治、商业、宗教、文化等等，人们都会遇到一种美国式的设想：只有从美国的经验中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除非在美国“老大哥”的指引和驱赶之下，中国是不会前进的。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人仍然未能认识到中国人完全能够处理自己的事务。美国人往往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先生，中国人则因为感到自己的不足而觉得他们应该是美国人的学生，双方的这种感觉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也许可以把这种扭曲的师生关系看作是孙中山提出的监护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的外化，但是无论如何，孙中山绝不主张中国应当永远从属于一个外国势力。

总而言之，由于双方以往的经历，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缺乏在中国革命的年代里进行交往的准备。不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的这些不一致还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重大影响，因为当时对双方来说中美关系都处于边缘地带。可是，双边结构中的这些细小的裂缝在战时的压力下扩展了；1949年，当一个革命政府在北京出现的时候，双方的那些歧见终于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美关系

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在无意之中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美同盟。可是这两个在逆境的逼迫下结合起来的国家依旧是同床异梦。我在这里无意对许多学者撰写的极为出色的研究战时中美关系的专著做一番总结。如前所述，我仅想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某些主要问题发表几点看法，以便促进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① 前引亨特书，第300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之间的相互影响显著增加了，这使得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但这种情况既未使双方悬殊的实力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也没有改变双方政治家们观察对方时的那种习惯方式。从这种观点看来，众所周知的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美国方面不断想用注入西方的技术知识、组织能力和人民主义的价值观的办法来改造和重建中国社会的最后的和最喧嚣的一次表示而已。与以往的唯一不同之处是，这次这种设想看来是出自美国政府的最高层次，因而被更认真地对待了。就中国方面而言，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激烈争执表明，中国人的愿望一直是利用美国在华利益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与美国的目标甚少共同之处。当然，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双方都从原先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中美在珍珠港事件后建立起来的那种充满希望的伙伴关系从此迅速瓦解了。只是因为彼此之间仍然互有所求，它们才没有变得更加疏远。

在罗斯福政府内部，有关对华政策争论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怎样才能有效地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减少中国内战爆发的危险，促使中国更加团结一致地对日作战。（正如毛泽东对谢伟思所说，美国没有办法不实行干涉；唯一的问题是这种干涉的性质是什么。）尽管美国的军人和外交官们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莫衷一是，特别是在支持中国哪一方的问题上从来没取得过一致意见，但他们都认为华盛顿能够而且必须通过介入中国政治来增进自身的利益。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人一直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来寻求对于中国政治的理解。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漠视中国连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所显示的征兆，想让国民政府拥有如同美国政府那样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合法性。当他们正确地观察到蒋介石政权并非一个完美的典型，他们便申斥国民党人为反动的、腐败的、暴虐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点已变得十分明显：国民党政权只不过是那种极为普通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中

的一员，它无疑是集权主义的和不民主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既虚弱又缺乏效率。与现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相比，国民党人在战时困难的条件下的腐败与金融管理不善看来并不是十分惊人的。为了寻找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人物取代蒋介石，美国的左派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把毛泽东装扮成一个朴实的哲王、革命的预言家，正象他们后来吹捧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自由主义者错误地把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平等的人民主义当作赞成民主政治，把中共大规模地动员群众混同于普通群众自由表达出来的参政意愿。

与此同时，美国的保守主义者错误地把蒋介石看成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值得信赖的反共斗士。他们的眼光仅仅局限在蒋介石营垒中的那小小一群由西方培养的银行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身上；却忽视了那些贪官污吏、遗老遗少以及象苍蝇一样聚集在战时重庆的拍马谄媚者。与自由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也表示相信，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的政治生活将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照此看来，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们满可以被称为民主主义者，只不过正处在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因而值得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和鼓励。后来，在把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看作是“自由中国”的冷战神话中，这种观点又被抬出来了——一个被围困的亚洲的雅典坚定地面对化装成“红色中国”模样的现代东方斯巴达。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意见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的美国人力图培植他们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温和的第三势力。这些人是美国民主政治体系的真正追求者。^①然而这些可信赖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毫无力量。在战时中国他们总是遭到威胁，既受重庆国民党人的折磨；又受延安共产党人的指责。

从中国的观点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仅是两次国内战争的一个插曲。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战争时期扩大了美国在华利益为中国互相竞争的党派提供了一个寻求外部支持的新机会。围绕着尚

① 最突出的事例可见费正清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纽约，哈波出版社，1982年。

未了结的中国政治权力之争，各派力量都在不断地进行活动，以确保他们与美国的联系。

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党派，国民党在获取美国的金钱、军事援助、技术援助和政治支持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可是，一个恼人的问题始终是怎样才能既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好处，又不致招来可能损害他们政治权力的变化。按照蒋介石的观点，一个像史迪威那样认为重庆的政治充满污秽和腐败的人，是一个危险的、靠不住的支持者。值得庆幸的是美国人并非仅此一类。很快，国民党人就学会了培养他们自己的朋友，并利用美国人之间的不和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当然，美国人也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个人争斗和派别冲突玩同样的把戏。

总的结果是互有得失。蒋介石成功地阻止了史迪威要把他拉下马的企图，但这位国民党领袖也同时失去了他曾一度在华盛顿享有的尊敬。到1945年，蒋介石夫妇的形象已暗淡无光，而那炫目的色彩在战争初期曾是国民党人的无价之宝。重庆和华盛顿在掀起这场争吵之后都省悟到，那种以为双方利益恰好吻合的看法终究是一种幻觉，双方同时也都为对方对待自己的态度而深感失望。在接踵而来的内战中，只有美国的右翼分子仍然坚持把蒋介石看成是一个伟大的领袖。直到“失去中国”的创伤愈合之后，蒋介石才得以摆出一付反共元老的架子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同样，尽管中共的处境要不利得多，他们也渴望从战时美国陷入中国的状况中谋取好处。无论在重庆，还是后来在延安（当美军观察组建立之后），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都极为精心地关照他们与美国的联系。他们一再申明，愿以在对日作战中实行有效合作的保证来换取美国的援助。（顺便指出，中共反对外国干涉的原则并未妨碍他们尝试着说服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不幸的是，那些肯于认真听取毛泽东意见的美国人，或是职位过低，或是远离权力中心而无能为力。正如现在大家所知道的，当时毛泽东希望的是把信息直接送给在华盛顿

的罗斯福总统本人，但他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共到底在何种程度上重视他们与美国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这一点只有在查阅了中共的档案之后才能知晓。也许中共的文献还能告诉我们，当时党内是否存在着坚持寻求苏联援助的领导人与那些主张加强与美国联系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中共立场的变化不过是对机遇变化的一种反应。美国史学家詹姆斯·里登·安德森根据中国方面现已公开的资料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共领导人在战时亦不愿放弃进行军事扩张的机会，即使这意味着可能得不到来自美国的支持。^①无论如何，赫尔利大使一旦表明了他对中共的敌意，延安便明显地把获取外国援助的希望转向了莫斯科，直到马歇尔使命又重新点燃了中共力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使之符合自己利益的希望。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加以概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美国在中国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为华盛顿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影响中国内政的机会；但是华盛顿永远不可能明确地构想出做什么或怎样做。由于美国人一直打算在中国培植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和有效的政府，这使它很难转向另外一种能够适应中国政治中令人困惑的、充满分裂和冲突的现实的政策。从1944年至1945年，美国试图作为中间人寻求政治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结果遭到彻底失败。赫尔利大使因被认为应对这一失败承担部分责任而受到指责。他随即强烈主张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并清除了那批不走运的、曾对他的判断力表示出疑问的下属。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中国内战重新爆发的威胁已迫在眉睫，然而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仍旧举棋不定。

第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实说明，华盛顿是一个吹毛求疵、令人沮丧的伙伴。在国民党人眼中，华

^① 詹姆斯·里登·安德森：《延安和大国：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起源，1944—1946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

盛顿允诺的太多而相对说来给予的太少，开出的却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价钱：它要求从根本上重建中国内部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力均衡。战时中美合作所勾画出的那种模式，在美国战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援助计划中屡见不鲜：双边关系往往从一个过高的期望开始，继而进入一个艰难的、停滞不前的工作关系，最后终因双方都感到大失所望而一下跌入一个互相怨恨的泥沼。在战后10年里，国民党人那种明显的亲美主义既不是那种自吹自擂的历史上“特殊关系”的产物，也不是中美战时“和睦”状态的延续。相反，当内战的潮流改换了方向，国民党已处于不利境地之时，这种亲美主义不过是这个四分五裂的政党政治破产的又一个日益明显的象征罢了。绝望的国民党人想凭借着美国反共十字军的营火重温自己的希望。

在延安，一些美国人，大部分是中级官员，对支持中共表示出兴趣；这些迹象诱使共产党领导人向华盛顿寻求援助。可是，美国尽管与重庆之间困难重重，但它却不愿抛弃蒋介石，转而支持一个似乎仍与莫斯科有着密切联系的令人怀疑的伙伴。华盛顿令人难堪的拒绝激起了中共革命的反帝情绪和反美情绪。在内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它始终充斥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之中。

国际体系和中美关系

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华盛顿不愿接受日本人占据亚洲势力均衡中的主宰地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在1941年的美日谈判中要求东京停止其在亚洲的战争。珍珠港事件造成了一个短暂的假象，似乎中国将在美国对日作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这种幻想在全球和区域性军事需要的重负之下，在与重庆政府无休无止的争吵中很快就消失了。中缅印战区始终死水一潭，它只是埋葬一个不现实的计划的墓地。作为有关战后世界庞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罗斯福总统还是把中国包括

在“大国”的行列中。但是，他实际认为，中国也许还要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不是与华盛顿关于战后世界的设想联系在一起的话，中国很可能早已回到传统的、美国意识中的边缘地位上去了。直至罗斯福逝世前不久，他对战后世界的基本构想仍是以美苏继续合作为前提，他希望以此阻止进一步的侵略。中国内战重新爆发的前景可能会把美苏都卷进去，而且各自支持一方；这将威胁美苏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华盛顿寻求和平解决中国政治冲突的一番努力付之东流。罗斯福死后，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杜鲁门政府开始把苏联视为战后亚洲势力均衡的一个真正的威胁，正象珍珠港事变前的日本一样。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家们是以双重概念来看待中国的。首先，从双边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国对美国的利益来说仍旧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从多边关系的意义上来看，中国——作为世界政治游戏中角逐的一个对象，决不能被美国的敌人所控制，无论是战前的日本还是战后的苏联。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新的看法来源于美国把自己当作新的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和保护者。作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亚洲、欧洲有着同美洲一样重要的利益。在美国看来，苏联是一个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它横跨欧亚，有革命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并得到遍布全球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拥护。在华盛顿冷战专家们的能够预知未来的魔镜下观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无论在其胜利之前或胜利之后，都是亚洲区域政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而且很可能还是苏联的一笔宝贵财富。在美国的力量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反共逻辑必然会驱使美国干涉中国内战，以阻止共产党夺取胜利。事实上，这就是内战期间国民党一直紧抓不放的救命草，尽管美国显然已因能力有限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而排除了采取干涉行动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同样是具有讽刺意味

的。本来，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设想，尤其是在军事安全方面，首先是针对苏联这个军事、工业大国的，而并非打算对付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贫弱的不发达国家。（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的公众舆论已开始认为中共比苏联更具危险性，而到了肯尼迪政府时期，反革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美国占了上风，北京终于取代了莫斯科的地位，成为华盛顿最主要的敌人。）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苏联与美国一样，把正在形成的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对抗看作是构筑战后东亚国际政治关系中最基本的因素。从1941年6月至1945年8月，苏联不得不全力从事其拯救欧洲心脏地区的战斗，在亚洲政治中它只能扮演一个相对消极的角色。但就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这个有着敏锐的历史嗅觉的人就预感到，一旦日本被击败，苏联将获得一个可以在亚洲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机会。1945年2月，在美苏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中写进了苏联提出的有关领土和政治调整的要求。随着1945年8月中苏条约的签订和红军在战争最后的几天里采取的行动，这些要求终于实现了。这使得苏联得以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由于军事上的虚弱而失去的在远东的重要地位。

基于日苏历史上的长期敌对，斯大林无疑希望能够完全掌握战后日本的命运。可是早在1945年10月，华盛顿就断然拒绝了苏联要在北海道建立占领区的企图。由于无力在占领问题上与美国实质上的垄断地位相竞争，斯大林不得不承认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权。尽管他远比当时的大部分领导人更清楚地了解日本具有迅速复兴的能力。

但中国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至少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他了解在战争骚乱中必然蕴藏着潜在的革命因素。但是，面对强大的西方势力，斯大林并不打算冒险支持外国革命，他宁愿要西方承认苏联是一个平等的大国并在东方和东欧有自己合法的安全利益。与斯大林那种旧式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嗜好并存的是他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扩张社会主义疆界的欲望；不

过，斯大林仅希望在不惹怒帝国主义老虎的情况下实现这个愿望。

在1937——1941年期间，苏联向国民党提供了长期的、具有重要意义援助，以支持中国为生存而斗争。但是德国的入侵迫使苏联结束了它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此后，按照美国人的设想，中国将会落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但苏联人却无意接受这种暗示。斯大林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正式承认了美国的影响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同时又设法尽快地削弱它。当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斯大林显然认为，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将能保持它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他因此告诫中国共产党不要搞革命的冒险主义。^①目前我们仍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细节。中国共产党所保存的档案应该可以告诉我们相当多的有关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情况。这些材料对我们理解中美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

斯大林通过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确保了苏联在华利益。此外，苏联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目标，这些目标有些一致，有些互相矛盾，总起来看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设想。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斯大林力图减少中国对美国的依附程度，并防止中国追随正在形成的、在他看来是苏联对头的美国势力集团。尽管在1945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前景有所怀疑，但他仍然看出，他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具有相当大的潜在价值，可以以此为手段诱使国民党屈从他的要求。（但斯大林低估了苏军介入满洲所激起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反响，这种反响挫败了苏联控制满洲工业经济的企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对华政策的首要特征是在对各种不断变化的机会和压力作出反应的时候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我们只能推测苏联在华的明确目标。但可以肯定，苏联和美国一样，都是从美苏对抗的角度来看

^① 约翰·高沃对于1937——1945年中苏关系所进行的研究是目前有关这一专题的主要的和最值得重视的成果。

待中国的。促使苏联克制它对中共援助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担心这样做将会引起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干涉。这种援助即使有记载的话也从未公布过。在马歇尔使华期间和随后的内战中，苏联显然乐于让华盛顿肩负重担并承担由于调解失败和对国民党半心半意的支持所遭致的不可避免的责难。当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共即将取得胜利表示惊讶。正象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在1945年他也未能预见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材料，对于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任何判断都只能是尝试性的。学者们在研究这个时期莫斯科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时，借鉴了克里姆林宫学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即通过一种学术推测来求得对真象的大致了解。如果能够允许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查阅与此有关的中国方面的档案，那将可以重新勾画这10年期间中苏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从此段至今仍相当混乱的历史中理出事实真象。

本文实际只是这次讨论会的一篇引论。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实际是为了促请诸位作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它能敲开迄今为止还紧闭着的档案之门，那将有助于满足我们的历史好奇心。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上述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只不过引起了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的兴趣。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回答只不过是把我们全都感到困惑的问题摆在一起罢了。毫无疑问，甚至在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史料之后，围绕这一历史时期的争论仍然不会消失，各种对立的解释将继续竞争。这当然是完全应该的。我们怎样对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史进行思考呢？我们必须将它与此后双方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每个人更加充分地了解这10年的重要意义。

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流，不仅将丰富我们彼此的知识，提高我们的学术鉴赏力，还可以使我们摒弃学术上那些极其荒谬可笑的东西，那是冷战政治在不同程度上强加到美中历史

学家的学术生涯中的。现在，我们不必再去啃那些外壳坚硬的民族自我隔绝之果——那或许是政治王国向我们提供的唯一食品。让我们作为学者，无论来自中国还是美国，一起分享这席有如此之多精美菜肴的盛宴吧。本文在短短的几页纸中涉及了不少问题，如果它有助于激起诸位的进一步思索，那就无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章百家 译
袁 明 校

魏德迈在华回忆录

编者按：这是魏德迈所著《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的一部分，自本辑起连载。魏德迈是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派到中国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1944年10月来华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在美国政府决定召回史迪威时，他是蒋介石指名要三个美国军人之一。

魏德迈与史迪威不同，具有强烈的反共立场，这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表述得十分明确。作为美国驻华重要代表的魏德迈的这种立场，自然会表现在各种决策上，这也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中国的头几个月

我于1944年10月29日抵达新德里，当即前往丹尼·萨尔坦将军的办公室。他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军事成绩优异，为人十分正直，有忠诚感。他比较熟悉中国的复杂性，因为作为史迪威的副司令，他曾数次视察中国战区。不过他告诉我，史迪威对中国人指挥一切，又在策略计划上保守秘密。萨尔坦知道不少有关史迪威与蒋委员长及陈纳德的纠葛。他象我一样，对于促使史迪威免职的事件，确切情况知之不多；但他推测，这主要是由于史迪威

坚持指挥一切中国军队，不仅在缅甸，也在中国。

萨尔坦估计，英国人也与史迪威的免职有关。他说，整个事情异常复杂，而且他把我将要遇到的问题喻为排解一大堆尚未解决的复杂纠纷。又说，陈纳德将军经常不经许可即将供应物资弄走，供其空军部队使用。史迪威加以禁止时，他便将物资交给中国的薛岳将军，置命令于不顾。萨尔坦告诫我，我自己也会遇到与陈纳德的纠纷，中国人十分喜爱和尊重这个人。

我决不会忘记那天傍晚我向丹尼·萨尔坦告别时，他是如何答应尽一切可能帮助我在中国的工作。他在阐述他所得到的训令时告诉我，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向中国运送供应物资，并给我一切支持。萨尔坦至少比我大15岁。他的态度对我印象极深。我下定决心，想各种办法证明他的信任、忠诚和友谊是正当的。

次日清晨，麦卡菲和我乘飞机前往阿萨姆，在该地，我与西点军校同学约瑟夫·克拉斯顿准将共同度过了当天的夜晚。他是这一地区后勤部队的指挥官；他向我保证，以后会格外热情地向中国运送供应物资。

10月31日，我飞过海拔21000英尺的喜马拉雅山。下面是伸入阴暗云层的山峰，左边可以看到三座极高的山峰，中间一座是埃佛勒斯峰（珠穆朗玛峰——译者），海拔29000英尺以上，直插蓝天。

我们于阴雨中在昆明降落时，无人迎接。但我的随从副官注意到，大约1/4英里以外有一长列排成的队伍，还有一支乐队和一大群人。到值勤室时，得知那支部队和乐队是护卫队。值勤军官立即给我派车驶往集会的人群。这有点尴尬：我的座机驾驶员误解了给他的命令，人们以为他要将飞机滑到机场上那人群聚集的地方，但他没有这样做。我用检阅仪仗队弥补了这个错误。陈纳德和他的参谋长格伦准将也来了，还有若干中国官员。我简直没有机会视察候机室，人们告诉我，那里甚至比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候机室还要忙乱。

这天晚上是与陈纳德在昆明进行愉快的谈话而度过的。我发现，这位著名的飞虎队首脑耳朵非常不灵，这使他英雄般的造诣更加卓越不凡。他的客观性与我记忆中史迪威对他的酷评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次日上午，我们飞行800英里前往重庆，该市在日本发动战争的第二年——1938年汉口失陷后即为中国陪都。宋子文，赫尔利大使，蒋委员长的参谋长何应钦将军，还有几位中国显贵，都在机场迎接。麦卡菲和我迅速驶往该市，居住在以前史迪威将军的寓所。汽车从机场进入该市时，我对上次访华以来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向赫尔利表示惊异。赫尔利说，向总统预告史迪威必须离开的是他。他说，中国人不遗余力地要与史迪威合作，这不过是徒劳而已。尽管赫尔利极力赞扬史迪威个人，并说他本人也喜欢他，但是很明显，赫尔利的同情是在蒋介石一边。赫尔利告诉我，他曾亲自建议由我接替史迪威。有趣的是需要指出，汉迪将军曾经告诉我，我是马歇尔将军提名的。后来我在杂志上看到前副总统华莱士的一篇文章，说是他建议由我担负这一任务。

次日，赫尔利和我正式拜会蒋委员长。我上次访华见他时，他身穿深蓝色长袍，外套朴素的黑马褂，无任何勋章饰物。这天上午我作为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首次拜会他时，他身着暗褐色军服，佩五星上将领章和国民党青天白日章。这表明，他是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和中华民国主席。我再一次被这位清瘦、庄重、优雅、长着锐利的黑眼睛、露出动人微笑的人物所打动了。

蒋介石接待我的这间宽敞大屋子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将熟悉起来。在这次首次会见中，我注意到，墙上挂着美丽的中国画和版画，光亮的地板上铺着地毯，屋里摆着中国式的柚木桌子和椅背镶嵌大理石的椅子。茶几和桌子上放着插满鲜花的精美时新花瓶。身着蓝色大褂的侍者进进出出，端茶送点心。房子周围拉起那么多帘幕，使我感到诧异，会有多少人来注意窃听我们的谈话。

我进屋时，委员长站起来和我亲切握手，并说“please, please”，这是他让我坐下时所说的唯一一句英语。他拿着一把扇子，不停地煽动。我觉得他是神经质的。他似乎有点拘谨，但又机敏警觉。很明显，他在判断我，正如我在估价他一样。

除赫尔利和我之外，出席的还有宋子文。蒋请我紧靠他坐在长沙发上，并以回顾上次的相会开始了谈话，那次是蒙巴顿海军上将派我赴华讨论中缅边界线的争议的。

我说，能在抗日战争中与他直接交往，感到非常荣幸。蒋说，他知道我对中国并不陌生，因为我还是低级军官时就曾在中国工作过。又说，他很高兴能在开罗与我相会，并高度评价我上次交给他的访华观察报告。我说，我一直钦佩中国人民，认为在中美两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实现有效的、周密协调的活动不会有困难。虽然我告诉蒋，通过与陈纳德与萨尔坦的谈话，我对军事形势相当明了，但在这种场合我们并未详谈这一问题。

我在重庆的第二天晚上，遇到了空袭警报。汽笛一鸣，人们即飞步钻入沿陡峭山岩的防空洞，重庆就建在这些山岩上。有时炸弹就落在某个掩蔽所入口附近，封闭洞口，将人活活埋在洞里。我在重庆经历的空袭帮助我明了对中国的供应确实十分不足。没有高射炮，也没有报警设备。因此日本人就能不受惩罚地进行轰炸，尤其是在傍晚。必须为此做些事，并采取许多同样重要的步骤，以便在更为同等的条件下同日军作战。

在四川省的这个受围的中国陪都，我遇到了五角大楼参谋人员或在欧洲战区作战的军官所梦想不到的问题。现在，我突然感到自己对于在距离物资供应地极为遥远、在所有战区中优先地位最低的地区处理军事作战所负的责任。联合王国和苏联一直接受着美国巨额工业产品中最大的份额，而自1937年以来一直对日作战的中国所得到的援助，只不过是涓涓细流。但它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尽管遇到西方的冷淡和忽视，还是设法生存下来了。

中日战争之初，蒋介石确信，如果他能“以空间换取时间”，

坚持下来，美国最终是会卷入对日战争的。因此中国就能得救。但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尽管有美国人要求对日作战的压力，罗斯福还是与丘吉尔一起，把击败德国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因此，远未从战争初期的状况（当时西方以向东京出售作战物资积极帮助日本侵略）中得到改善的中国局势，此时又因日本攻击英美而弄得更加危急。日本对香港、马来亚和缅甸的占领，切断了对受到强大压力的中国军队的军事援助，在中国易于得到这种军事援助的时候，我们却否认中国比珍珠港更重要。

几个星期过后，我开始认识到，中国国民政府远不象史迪威和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样，不愿作战，而是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了惊人的顽强性和耐力。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势之后，6个星期就屈服失败了。到1944年，即在日本发动首次进攻之后的第7年，中国却依然在抵抗。

对形势知道得更多时，我认识到，中国悲剧的部分原因，多半是因为我们美国人对它在1941年以前抗击日本的自我牺牲努力一直持冷淡态度。珍珠港事件向美国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注意真正的局势，但此时的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困顿不堪，再也无法作出象1937—1938年那样的军事努力了。甚至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1937年夏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为抗抵日本侵略者，曾经在上海坚决奋战达3个月之久，进行过“自举世闻名的凡尔登战役以来最残酷的战斗”。

中国的抵抗使日本人感到意外。他们发动战争，是要阻止中国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统一，从未想象会遇到这样英勇的抵抗。有人评论说，蒋介石在上海、接着又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精锐部队，是犯了一个军事错误。或者说，如果中国按照法国的事例，不作多大抵抗即被占领，等待美国最后拯救自己，那么战后的命运就不会如此悲惨。

蒋介石曾经竭力避免对日作战，至少要等到他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以及他的政府日益增大的权威，即使在边远省份

也能奏效，并把中国统一和加强到如此程度，使它能够自立起来，能够阻挠日本以中国为牺牲推行其扩张计划。

日本1937年发动进攻时，蒋介石明白，在这种危急局势中，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表明自己有作战能力，从而最终得到西方的援助。正因为中国还弱，它就必须表明，它是能够抵抗，也愿意抵抗的。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国已“到了忍耐的限度”，要“以一切力量为民族生存和独立而奋斗”。他在1937年7月对国人发表的历史性讲话中还说：“时间和环境都不容我们中途停顿，谋求和平。”

由于中国由美国来拯救的希望远比英国和苏联为小，因此蒋介石的话就比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战役之后著名的“流血，流汗，流泪”的演说表现了一种更加豪壮和坚定的精神。蒋说：“要让人民明白忍耐限度的意义，明白不言而喻的牺牲程度，因为一旦此种时刻到来，我们只能牺牲，血战到底。只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随着战争初期最精锐的部队和大量装备的损失，中国争取胜利的希望只能是坚持抗击日本优势兵力，期待日本迟早卷入与西方列强的战争。向全世界证明中国能够作战之后，委员长即采取妥善的战略，力求消耗日本兵力，迫使敌人过份拉长战线。

在这几年当中，日本一直在诱和，但都被拒绝了。但在坚持抗日时，国民政府还得与中共部队进行斗争。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接着又签订日俄协定之后，中共军队退出了统一战线，主要反对国民政府，而不抗日。

蒋介石始终在4条战线上作战：抗击日本人；反对代表中共的俄国；反对由前军阀或半独立的地方长官和将军代表的离心势力；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者”，特指英国人，由于他们的利己战略和对中国的态度，使他没有理由相信他们。蒋介石的伟大和弱点都在于，他从不忘记国民党原来的目标，即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他觉察到，如果击败日本后中国仍象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样，再次分裂成互相斗争的派别，或者被分割，软弱无力，一

任西方和俄国帝国主义摆布，那就没有意义了。矛盾的是，中国的政治统一由蒋介石来保持，将来得利的正是共产党。

美国人多半是或者不承认蒋介石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未能关切中国战后的命运。我们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不管中国如何困顿，如何付出可怕的牺牲，不管它的人民如何贫困，总要竭力使它“在这场战争中起积极作用”——这就是我被指派到中国战区时陆军部给我的指示中所说的话。

虽然委员长拒绝了日本的一切和议，但他当然也希望中国摆脱压力；至少他希望不致刺激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挺进得更远。这就引起了指责（经常被戴维斯等人），认为国民党已与日本达成了一种妥协。

在国民党人看来，西方帝国主义者、俄国人和中共都是敌人。美国与英国人结了盟，蒋介石知道，英国对中国有过一段很长的剥削与统治的历史。中日战争的头几年，美国和英国曾向日本提供过作战物资。正如人们所主张的那样，对美国来说，最佳战略是让德国人与俄国人两败俱伤，因此蒋介石也可以作如是观，对中国来说，最好是让西方人与日本打到底。

不管怎么说，由于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军事援助不多，他就得节省有限的物资。据他看，把他拥有的一切少量现代化装备都用于对日军的进攻行动，这对战后中国的独立事业将是致命的。

如果蒋介石已经得到了美国在战后支持他反对共产党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确切保证，他就敢于将他所有的精锐部队投入战斗，制止日本在中国和缅甸的挺进。由于他总算信任罗斯福和赫尔利，在最近几个月的战争中他才在贯彻美国战略方面同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不过鉴于以前知道史迪威及其顾问们同情共产党，他对美国的意图越来越怀疑，因此也就拒不动了。

我并不以为从一开始就理解或充分估计到蒋介石的困难处境，或者他在4条战线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十分真实的问题。不过看看我的职责，我知道这要求我改善美中关系，如果我可能办到

的话。我知道，这一任务要求对委员长和他的政府有一种同情友好的态度，以代替那种“叫你干什么，训斥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徒劳无益。请原谅我在这里引用美国陆军的官方历史，罗马纳斯和森德兰合著的《时间耗尽》（第1卷，第3页）：

在魏德迈参谋部一些成员的想法中，可以感到在关系方面有一种无形的但又是积极的影响力，那就是魏德迈与蒋介石之间迅速建立的一种轻松愉快的个人关系。魏德迈的老练机敏，他那使人消除疑虑的个性和注意温厚的特点，使他的意见令人感到心情舒畅；而委员长，正如人们所知，也能按是非曲直，考虑魏德迈的意见。

在1937和1938年，中国红军的抗日作战相当积极，尽管，或者说因为，他们有不愿告人的目的：在抗日战争中扩张自己，最后击败国民党。他们的方针是“七成扩大自己，二成对付国民党，一成抗日”，最后是“准备反攻，把领导权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来”。由于共产党采取这种方针，其结果，凡共产党游击队作战的地区，受害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民。日本人焚烧无辜的村庄，报复中共的劫掠，共产党则杀害拒不与他们合作的人，称之为“汉奸”。共产党无法，甚至也不想法保护抗日的人民，日本人又对保护反共的人民毫无兴趣。处于腹背受敌的广大中国人别无选择，只有选择他们的刽子手。

无论是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前或以后，共产党最大的便宜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命运不负一点责任，国民政府无论如何无效率，也要想法保护自由中国留下的一切。中共忙于袭击日本人或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对于那些不愿投降敌人、因负伤而痛苦的人，他们扮演着帮凶和鬣狗的角色。

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的战役中，都没有中共军队作

战。他们既未在1937年的上海作战，也未在1938年的台儿庄（华北）作战，当时广西的李宗仁将军使日本遇到重大失败；也未在同年保卫武汉和长沙，以及后来的萨尔温江和缅甸前线作战。根据即使是同情中共事业的美国人的证据，中共从未在任何重要的日军驻防地或日本控制的中国铁路系统发起过战斗。因此，例如白修德在他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雷鸣》中承认，中共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作战：“在他们有机会袭击一支很小的敌军时……。在重大战役中，向敌人冲击、咬住敌人、最后阵亡的，乃是中央政府的士兵。”

我并不自以为立即就明白了中国局势的真相。我也象我的上级马歇尔将军一样，曾因史迪威的报告而抱有偏见。但我不象史迪威和马歇尔，我曾从经验中得到过好处，这种经验提醒我注意共产党的威胁。尽管为证实中共具有无情的目的，使我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我从一开始就对他们不抱幻想。我从不相信史迪威的说法：共产党是中国最后、最大的希望。我也没有赞同过赫尔利大使的信念（后来他放弃了）：莫斯科已抛弃了他们。

我在中国运用统帅权的头几个月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我明白，我们有机会展开和实施一种为美国赢得真正永久胜利的战略。在中国，对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创造或鼓励一种什么样的局势。

当我还在华盛顿陆军作战计划处工作，以及后来参加卡萨布兰卡、开罗和魁北克会议时，我就竭力促成一种战略，不使共产党在欧洲有取代纳粹暴政的机会。在中国，我无须再过分警戒，或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提出意见时含糊其词，因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同样了解，或者比我更了解共产党威胁的现实。在这个遥远而又重要的地区，美国处在与共产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共产党是自由的大敌，甚至比纳粹还大，不让它在中国获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我充分了解共产党在华北的活动。我委派曾任美国驻苏大使

馆武官伊凡·叶顿上校前往延安美军观察组工作，这个观察组的负责人是我的前任史迪威将军领导下的包瑞德上校。伊凡·叶顿向我提供有关共产党阴谋和在他们控制地区的中国人民中进行颠覆活动的优异报告。我知道，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对日作战上并无兴趣，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占领国民政府军队退却时撤出的地区。

在重庆我的官邸，与毛泽东、周恩来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时，我问他们，他们和他们的下属为何不采取主动而不用外国意识形态，完成体现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伟大目标。周恩来回答说，中国的解放者无法与社会主义国家分离开来，也不能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而行动。于是我又问，“这是否意味着，你们一定要从苏联得到援助？”他断然回答说，中国共产党既须接受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也须接受苏联的援助，“否则我们就无法取得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毛泽东一直注意倾听我们的谈话，并由陪他们的一位女译员向他翻译，这时他插话说，“中国革命是全世界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说：“我们一定要在中国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革命，使人民能有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我们不仅要消灭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还要帮助我国十分愚昧落后的人民，使他们受教育，开化，进步，换言之，要使我国全体人民有一种新文化。”

于是我回想起1927—1937年的情况，当时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正在力求实现这些同样的目标。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不认为已采取了激进的步骤；实际上他们强调的是贫困，卑劣，腐败，恶政，坚持认为这些都应直接归咎于国民党。我评论说，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目标，由一位热情的共产党人理解甚至叙述时，似乎都是人道主义的，富于建设性的，但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这些高尚的目标都被证明是一种欺骗和圈套。所谓的无产阶级，决无言论自由，也没有机会决定由谁和如何统治他们，得不

到与工作相应的报酬，甚至没有礼拜上帝的自由。周恩来非常急于打断我，但我继续说：“共产党用以获取控制权的各种办法——虚妄，恐吓，杀戮，奴役——在各种情况下都已成为证明他们取得和保持政权时的品质的标记。”

听了我的话，周恩来激动起来，因为他突然说起中国话来。见我听不懂，他又回到英语，字斟句酌，想找出确切的措词来反驳我。他强调说，世界上的反动势力强大得很，人民为了推翻他们的死敌，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然后他引用列宁的话：“无产阶级一定要为反对资产阶级而继续斗争，直到将它摧毁。”

这次大部分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谈话是枯燥而费劲的，其所以费劲，是因为我想确切了解两位共产党领袖的奋斗目标。我曾多次听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关心人民福利的土地改革者。但这次非正式的历史性会晤当面拆穿了正在美国流传的这类报告的虚妄。中共客人离去后，我立即记录下这次引起争论的谈话。

共军偶尔也对日军防地进行有限的突袭，目的在于夺取武器装备。在制定全力攻抵中国东海岸的计划时，我要求中共领袖以他们可用的部队在北方向日军施加压力。这项要求是以典型的共产党方式接受的。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我首先向延安运送美国装备和枪支弹药。

十分奇怪的是，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让我指挥共军。我婉言谢绝了，并谈到我作为战区司令所领受的命令，这项命令要我支持国民政府。但也应提到，共产党地区遇到严重流行病时，经美国大使和委员长认可，我曾送去11吨药品，缓解那里的疫情。

不过这都是后话。我到重庆不久，即召集参谋人员和专业人员开会，说明我并不立即作人事变动。我希望他们象对我的前任一样，也对我忠诚，并给我以有效的支持。我告诉他们，我将巡回视察，这不是为了找错，而是为了考察，看我们是如何组织起

来完成任务的，如何才能最好地加速日本的失败。

一开始，我发现有许多纯行政问题史迪威将军未加处理，这无疑是因为他集中精力处理有关他免职和突然离开这一地区的一些问题。

我发现我的桌子上放着许多关于奖励和奖章的推荐书。一名军士长告诉我，有些已放了好几个月，等待史迪威将军决定。他说，史迪威将军认为，战斗奖章和奖励大大地被滥用了，尤其是在第14航空队。我询问史迪威的参谋长赫恩将军，他证实了那名军士长的说法。于是我命令立即批准在史迪威司令部被忽视了的一切奖励和奖章。我还指示我的参谋长，任命一个长期的奖励奖章评议会，评议会成员出自我自己的司令部，第14航空队，后勤和地面部队。我下达指示，今后这个评议会只要能开会，奖励和奖章的推荐工作就由它执行，我不想在行动上拖延这种工作。陈纳德将军后来告诉我，批准第14航空队呈报的奖章，对他手下年轻的飞行员起了极为有益的作用，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国家，每天都在拿生命冒险，忍受着许多苦难与危险。

我逐渐不得不对我的司令部的人员作某些更动。每个指挥官都有自己的特点，我所作的人员更动决不是对前任的苛刻。不过为保证我的意图得到贯彻，我需要这样的军官，他们熟知我所认可的参谋机构和工作规程。这就意味着，由于需要，许多与史迪威一道，在他们知识和经验许可的范围内为史迪威认真而有效地工作的忠诚军官，要在中国战区被解除职务。

在执行我所指派的任务中，我给我手下的将军和专业参谋人员以很大的自由。我只要求一件事，即他们的行动要与我的战略和策略相一致。我想尽可能分散指挥职责。我向我手下的重要人员保证，虽然他们无可避免地会犯错误，但只要他们力图贯彻我所下达的指示，我还是支持他们的。我还强调，我们要尽可能树立良好的榜样，作为美国军官，不仅要有效地执行任务，而且要与中国各级人员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

在重庆，由于对新的环境和我所面临的任务逐渐适应，我同意中国新闻署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要求。中国方面告诉我，其目的在于将有关局势告诉中国人和外部世界，如果可能，自然也是发布消息，这种消息将维持士气，使人民在依然存在的艰苦与牺牲面前坚定意志。我到重庆后在我的司令部召开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发自中国战区司令部的一切新闻报道，均不强调我的名字，公报则称为中国战区公报，而不是魏德迈将军的公报。我还要求不引用我的话。自然，参加这种会议的50多位记者都渴望得到一点珍闻，能够写进激动人心的文章中。我允许他们提问题，而我的答复就得措词谨慎，不致妨害军事安全，或者引起恶意的揣测和思考。我发现我的新闻事务官缺少经验，遂电告马歇尔将军，要求更换。我决心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与新闻界合作，并创造一种友好和互相信任的气氛。我知道，他们能够帮助我，也能够使我的工作更加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感到我对中外记者的这种态度得到了充分的报偿。有好几次，在战区旅行的记者们，明确记下需要改正的某些问题，不是向国内写引人注意的恶意文章，而是向我送来一种正式的意见。

在我国人员分布的广阔地区，很难建立和保持卫生设备和生活设备。请想一想在比林斯、蒙大拿的一支空军部队吧，那里公路很糟，又没有与供应中心芝加哥相连接的铁路。与我手下广泛分布的部队保持接触，实在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加上交通困难，就可看出这样一种事实：不论为了作战，还是为了生活上略为舒适一些，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当局”都没有向中国战区提供很多东西。担任在中国的指挥职务之前，我访问过除中国之外的所有作战地区，因此我不能不作一比较——向俄国人和英国人提供的物资是千百万吨，而向中国提供的，不过是点滴而已。

在我到达中国后大约一周的时间内，伴随我或在我的参谋部工作的少数军官，昼夜都在压力下工作，这种压力有的来自敌人，有的是因为缺乏组织，缺乏协调，缺乏合作，以及在重庆缺乏适当

的设备而造成的；还有，每天要与委员长举行会议；从战场上发来的紧急电报，要求增援，要求装备，要求空军支援和运输工具。除了建立一个精干的司令部外，我们还得应付我们从桂林—柳州地区参谋机构和部队中发现的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

我抵华之后的第一周，日军迅速向前推进，袭击并夺取了桂林和柳州。这种形势不稳的报告送来以后，我即与委员长和他手下的军事首脑会商，并作出安排，另调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去击退敌军进攻。委员长总是向我保证，我们要调去的部队象所要调换的部队一样，非常精干，是不会溃散的。十分令人沮丧的是，就连我们作了很大努力用飞机和汽车运到桂林—柳州地区的这些受到吹捧的部队，也溃退下来了，因而产生了敌军向昆明或重庆挺进的可能性。自5月的长沙战役以后，中国军队在作战方面实际上已经名不副实了。在长沙，他们曾经进行过极为英勇的阻击，但如今他们似乎缺乏斗志，根本不愿坚守阵地。日军大约有12个师集中在长沙以南，并扩展到柳州。我认为，这是他们用以进攻有限目标和保护粤汉线的两倍的兵力。因此我断定，敌人有继续进犯的意图，而且也明白，必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他们前进。我们决不能丢失设在昆明的供应终点站，而丢失陪都重庆，在心理上也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在重新部署兵力堵击日军前进时，我看出我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与其他地区的作战相抵触，尤其是缅甸作战。我刚离开蒙巴顿的司令部，完全了解他的计划，而且我也不想做妨碍他取得胜利的任何事情。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美国的主要目的，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的那样，是建立和维持一条通向中国的交通线，使中国人留在战争中，成为一支有效的作战力量。我推断，如果我们丢失了中国，就没有在缅北作战的必要，自史迪威宣布他返回缅甸的意图以来，美国人似乎一直无可挽回地专心致力于这种作战。而且，中国若在战争中被打败，在中国作战的大约100万日军就能够调往他处——如调往菲律宾、马来亚，甚至緬

甸，这对尼米兹、麦克阿瑟和蒙巴顿来说，就比较棘手了。

因此，在争取美国人力物力方面，我就成为我以前的上级蒙巴顿海军上将的竞争对手了。他自然会受到妨碍。据说他的参谋人员非常吹毛求疵，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在利用我完全清楚他们的计划与目的这一事实，而他们又得依靠我所提供的有关中国战区形势的情报。实际上，蒙巴顿参谋机构的情报专家低估了敌人在中国的作战能力，而我自己的情报人员又作了过高的估计，并描绘出一种危急局势。但英国首相派给委员长的特派代表卡顿·德·威亚特同意我本人对局势的分析，认为我完全有理由要求从缅甸调回美国训练和装备的两个师，挽救中国的局势。

在我的参谋机构和一些成员看来，英国人在印度的反应是可笑的。他们知道在我离开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之后不久，大英乔治六世国王陛下即庄严决定，授予我一枚重要的勋章，巴斯爵位勋章。一位爱说笑话的人说，在我们完成与英国人争取人力物力的竞争之前，蒙巴顿肯定会拔掉管道的塞子，让水流走，这样我就无法成为他的巴斯勋位获得者了。这种事情并未发生，而且当我以前的上级蒙巴顿将这枚十分珍贵的勋章送给我时，我非常愉快，也受到了尊重。

在委员长就日本潜在作战能力举行会商时，我论述了保卫昆明和重庆两城市的问题。我指出，如果日军夺取了贵阳（我认为，除非能够迫使与日军对抗的中国军队坚守，否则肯定会被夺取），他们就能够在短期内向北进军，夺取重庆。然而，如果日军采取另一办法，向西进攻，夺取昆明，那就不仅是心理上和政治上的一种打击，而且也是灾难性的，因为昆明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个供应终点站。我指出，我们已无法再进行一次名副其实的军事努力了。委员长理解丢失我们这个唯一供应终点站的含意。我告诉他，我将尽一切可能保卫重庆，但我又告诫他，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保卫重庆的努力应优先于决心保卫我们的供应终点站——昆明。

由于对日军具有危险性的作战能力的情报估计，以及第14航空队的侦察报告（大意是日本人正在汉口地区集中大量的飞机和滑翔机），我们感到非常着急。对于可供使用的地面部队是否能进行有效的作战，我们信心不大。倘若日军企图用地面部队或空运部队夺取这座陪都，为了防止在重庆出现混乱，我指导我的参谋机构秘密制订计划，要将美国人和中国政府的所在地有秩序地迁往数百英里以西的成都。我不是一个杞忧者，但我能够想象到三支日军空降在上百万逃亡者早已在道路上和建筑物中拥挤不堪的重庆的那种混乱情景。我也知道，日本便衣特务能够通过扩音器传播互相矛盾的号令而增加混乱。实际上，这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我根本无法应付的局面。中国人对我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和我的每一个声明都在仔细评价。谣言迅速传播开来，大意是我们打算撤走。我发表了坚定的辟谣声明，而且表面上还流露出有能力制止敌军的信心。我从未向任何人吐露我的见解。当时东京的女广播员播放的流行音乐点缀着微妙的宣传——例如，她在轻快的声音中宣称：“魏德迈将军如果要进他的圣诞节晚餐的话，那将是在印度。”

在这种气氛中，委员长坚定地宣布了即使日军包围也要留在重庆的意图，并泰然自若地说：“如有必要，亦可牺牲。”这使我深受感动。我赞赏他所持的立场，但也听说，在另外的两种场合，他也曾表示过同样的意图，一次是在南京，第二次是在汉口。不过当日军最终接近这些地方时，他还是听从了他的顾问们要他撤离的劝告。我明白告诉委员长，我不想留在重庆被俘或被杀，如果我能去昆明，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在那里组织强有力的保卫战，我还是要走。

11月，被任命为大使接替即将离任的高斯的赫尔利，受命返华盛顿与总统会晤。我派了手下两名最干练的参谋，保罗·卡拉韦上校（后来是陆军少将）和约翰·H·考伊上校，与帕特一起到华盛顿，直接讲明有关局势的全面情况，以及我所面临的问

题，包括本战区侵略敌军的问题。我告诉卡拉韦和考伊，要强调以下意见：如果到时候我们能安然度过所面临的危机，如果到6月份我们能避开日军的打击，我希望能于过渡时期在后方地区创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领导有方的大约30个师的部队，这样我们就能在1945年秋季以此向广州发动实实在在的攻势，打通通向战区的海上交通。我这种预定的计划是根据这种情况制订的：有增无已的供应物资和装备，是通过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输油管道和公路不断运送的。后勤专家们——包括负责修筑公路的萨默维尔和美国工程师刘易斯·皮克准将（后来是陆军中将）——估计，公路建成后我可以指望每月得到10万吨供应物资。然而我的好友、现任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副司令并被认为是出色工程师的惠勒将军再次告诉我，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将净载重量的货物通过雷多公路运到中国。他指出，维持这条公路的运输将消耗掉大量的劳力和供应物资，因此运到中国的就非常有限了。

我到中国战区后，即要求赫恩将军汇报已制定的本战区对日作战计划，以及史迪威将军如何具体实施协调的、果断的对日作战。赫恩说，他不太了解作战计划，因为这位“长官将这种报告藏在他的臀部口袋里”。

起初我以为赫恩将军是在开玩笑，不久我即得知，他说的完全是实话。不过还是有某种计划的，而且是不错的计划，史迪威的作战部长“汤米”·泰勒上校向我概述了这种计划。大家公认这种计划不完整，需要另作努力，加以补充，但它在设想上稳妥，而且后来我手下的新计划工作人员在制定一项战区全面计划时，它也是有助益的。我知道，有两名优秀军官，威廉·克里西上校（后来是陆军少将，美国化学作战部部长）和迪安·腊斯克上校，他们在为中国制定计划时做了不少工作。我从以前在华盛顿和新德里的接触中知道，克里西和腊斯克的工作总是具有非常高的质量。我的战区新参谋机构正在逐渐完整起来，新军官也在到

达，并被指派到关键岗位上。除B·F·泰勒中校（后来是上校）和T·H·考伊中校（后来是上校）外，我正式向陆军部要求任命的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也来到了。雷·T·马多克斯准将（后来是少将）被指派到本战区，最后成了我重要的和信任的参谋长。

我的参谋机构开始工作，方针是，既保证迅速有效地制定妥善的作战计划，又保证迅速有效地处理行政事务。同时，我也在竭力弄清中国战区的复杂问题。我必须决定，我们能够以可利用的有限手段做些什么。日本人会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什么障碍？我如何才能将人们所作的努力最大限度地调整好？我得依靠萨尔坦将军的参谋人员向我提供有关可获得的供应物资的情报。一定要劝告中国人，将他们自己有关工业和运输能力的情况告诉我。我必须有我在本战区作战部队——第14航空队和混合空军部队的绝对支持。已经有许多可供利用的书面资料，不过我还得亲自考察地形，并获取有关中美两支部队训练和作战的第一手资料。我将当时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将军留下管理司令部，自己在适当的参谋人员的陪同下，飞往昆明和其他关键地区。我们往访美中两国的司令官，听他们汇报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并作出较好的调整。

在竭力促进美国人之间良好的协作精神的同时，我日益关心与中国军政官员建立互利合作关系的问题。

赫恩将军回国前不久，我曾与他讨论过整个局势。他附和他以前的上级史迪威将军的信念，并告诫我，要想从蒋介石的军事司令部或任何政府部门弄清任何问题或取得合作，都是不可能的。这种情绪当时正在美国人中间广为传播。我到美国大使馆问候高斯大使时，他那种彻底失望的态度使我感到震惊。他说：“我们应当将塞子拔掉，让国民政府流到阴沟里去。”

赫恩将军告诉我，中国人态度暧昧，又不诚实。他认为，他们因绝望而窘迫不安，或者因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拙劣努力而感到惭愧。不久我自己也得出结论，国民政府并未得到有关中国军

队驻防、行动计划和作战能力的充分情报。

赫恩将军告诉我，每星期六上午，史迪威或他的司令部的代表，表面上都要往访中国的司令部，讨论和评价一周的作战。史迪威很少参加这种会议；他视这种会议为喝茶和消磨时间的滑稽戏。赫恩将军还告诫我，什么也弄不清楚，而且如果我提出许多问题，中国人还会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他，我要参加中国参谋机构的下次会议。

下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在赫恩将军和军士（后来是上尉）霍勒斯·恩格的陪同下来到中国的军政部。经介绍和亲切寒暄之后，我们便察看铺在一张桌子上的地图。中国军队参谋长何应钦将军谈了整个局势的梗概。我无法接着谈什么确切的意见，也未透露更多的消息。

怀着等待具体消息的希望耗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知道我是失败了。不过我早已设想了一种突破难局的办法。在乘车返回我的办公室的路上，我告诉赫恩将军，我打算组织一个美中联合参谋部，由它每周在我自己的司令部里安排会议，如果形势需要，会议可以更经常一些。

我的战区司令部没有作战室或大会议室，不过委员长向我保证，我可以随便改建，或另找地方，以便有足够的方便。赫恩将军断言，我与中国人的蜜月不久就会成为过去。我是新来的，他们要把我考验个够。可以作出一大堆许诺，但永远也不会兑现，他的怀疑论调使我感到沮丧，但我并不承认失败，而且要继续表现出热情；不过直到此时为止，这种热情并没有什么基础。

委员长批准了关于联合参谋部的设想。作战室在我的司令部一建立，我提议的每周举行的那种会议就开始了。新任命的军政部长陈诚将军挨我坐在首席，右面并肩坐的是中美人事部门首脑；左面是中美情报部门的首脑，靠他们坐的是作战部门的首脑，如此等等；中美双方在每个参谋部门中都完全结合为一体了。

一开始中国人不大谈意见。他们感到拘谨，但并不淡漠，我们所提的问题他们都作笔记。我逐渐满意地看到，中方代表在不断地参加讨论。不久他们便与美国人所提的建议发生分歧，这正是我希望创造的气氛。我们的不同观点以友好和互相尊重的精神解决了，大家都承认，在我们所提的计划中找弱点，要比在战场上让敌人暴露这些弱点好。这种会议开得很成功，委员长听多了，便提出自己也参加一次。我自然大喜过望。他从未见过如此现代化、如此完整的作战室。我手下出色的参谋人员在一面宽大的墙上架起滑架，可以在墙上图解式地指示各个地区和部队的部署。航线图，座标图，各种项目表，武器图，敌军各种飞机的剪影，以及有助于我们计划演变的一切类型的情报资料，在会议桌的任何座位上都可以看到。委员长十分满意，十分热情。

这种在高级领导机构的友好合作精神普及到了整个战区，直到远离战时陪都的最低层。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重新组织作战部队。我担负中国战区指挥任务时，中国有350个师。组织机构表要求每师约1万人。美中联合参谋部认识到，美国或中国都无力向这么多的师和这么多的人供应必需品和装备。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只集中训练39个师。我告诉委员长，只要我们的空军继续占压倒优势，我们就能以较少的训练有素的师驱逐日本出中国。

我们指派美国顾问团携带电台到中国的各师和各军去。每个顾问团的高级成员都充当中国军队司令长官的军事顾问。中国军事长官如不同意顾问的意见，可以按自己的判断行事，不过要求他这样做时通知中国指挥序列中的下一级较高的指挥官，他未采纳他的美国顾问的意见，并说明理由。同样，要求美国顾问也通知下一级较高的指挥官，他的意见未被中国伙伴采纳。判断上的意见分歧一般都在指挥系统的较低一级解决，如有必要，他们可以继续争论，呈报委员长和我考虑，作出最后决定。

在实施这些步骤，提高效率，并在各级美中人员之间建立友

好合作精神之际，从美国来了一批足够数量的水平高经验丰富的军官，这样我就能在我的参谋机构中组织一个作战计划处。这批军官所做的工作使我感到自豪。他们交给联合参谋部考虑的计划常常几乎不加变动即被批准。对日战争胜利日到来时，我们正准备实施他们制定的夺取广州—香港地区的出色计划。

现在，让我们回到1944年秋季面临的形势吧。在萨尔温江地区，我们的部队与在缅甸东北部的一师日军作战，以“百战百胜”闻名的卫立煌将军就负责这一地区的指挥工作，他的美国首席顾问是布兰克·多恩准将。我收到指挥中国在缅甸的这5个师的萨尔坦将军发来的一封电报，说在缅甸的盟军，包括英美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正集中于曼德勒平原，驱逐日军南下。这一战役如果胜利，缅北将从敌军手中解放出来，雷多公路的修筑即可不间断地进行。

萨尔坦将军要我保证，在他从密支那一八莫地区发起进攻时，中国在萨尔温江地区的部队要向前推进，对该地区日军施加最大的压力，将日军牵制在该地区。我与委员长商讨萨尔坦的这一要求，他充分肯定了我去萨尔温江地区前线会晤卫立煌将军的计划，并授权我命令他向日军发起全面攻势。

因此我飞往昆明，迎接我的是多恩准将。我们从昆明乘一架小型飞机到附近的一个地点，然后乘吉普车前往卫立煌将军的司令部。

卫立煌将军友善而好客。我开始着手处理工作问题，询问日军实力与作战能力。他的回答与我以前所得到的情报大体吻合。于是我们检查中国军队的实力与当时部队可利用的火力，并对双方作战能力大体作一比较。这一切在我向委员长提出进攻方案时都已做了，不过我认为与负责的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再探讨一下整个局势也是有助益的。

按照对形势估计所得的结论，我通知卫立煌将军，要他在一定日期的一定时刻向日军进攻，并到达我在地图上标出的具体目

的地。我向他表明，这一命令是以委员长的名义发出的，他充分了解局势，知道在约定时间和地点发起进攻的必要性。我还提到，萨尔坦将军将与在密支那（缅甸）地区与他对峙的日军艰苦奋战，英军将从钦敦江流域向东推进，因此有力地进行这种全面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

我有礼貌有自信地下达的这种指示，与我向美国军官下达的完全一样。我讲完后出现了一阵沉默，然后卫将军告诉我，这种攻势恰恰不能在这种时间和情况下发动。他说，他需要相当大的增援，更多的部队和更多的弹药。这次是我对中国人作的第一次试验。我有两种职务：战区司令和委员长的参谋长。在卫立煌司令部和他的主要指挥系统（包括师）工作的顾问，都是我直接控制下的美国人。他的部队主要是美国装备。我必须坚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游移不定，在今后的接触中我的主张就无法坚持，不仅对这位特殊的指挥官是如此，对其他人也一样。

因此我说：“卫将军，我仔细考虑过其中的一切因素，我所考虑的意见（委员长也同意）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和时刻发动进攻。所以我以委员长的名义命令你发动我所概述的这一攻势。”

卫立煌将军眯缝起眼睛，我意识到他是要推迟行动。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事实上，我感到再讨论下去就会削弱我的地位。因此我就与一群中国军官和他们的美国顾问一一握手告别，祝他们交好运。我告诉他们，我将密切注意他们在预定的进攻日期获胜的报告。我再次与卫将军握手，向他友好地告别，就离开了帐篷。我注意到，多恩准将拱了拱手退出帐篷，并微微鞠躬——这是告别长官和重要官员时公认的一种十分温文尔雅的中国姿势。

多恩和我跳进吉普车回机场，乘我的座机返回昆明。多恩在途中说：“魏德迈将军，我知道你经常要求我对你坦率，在我认为批评合适时提出批评。”我向他保证，这是真的。我总是重视

我手下的任何人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我强调，如果他在中国长期工作（多恩是一位研究中国语言的学者，战前就在这一地区工作多年）之后不把他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告诉我，那对我将是有害的。

于是他就提意见了。他说，我侮辱了这位将军，并打赌说，这种攻势不会象我所命令的那样发动。

关于多恩所提的第一点，我回答说，过去我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十分熟悉他们的习惯和态度。我的看法是，我是坚定的，但按美国的习惯来说又是有礼貌的。我还说，如果用拱手作揖、鞠躬后退的办法能够成功，或许就不会命令我来接史迪威之任了。我打算试一试自己的办法，我相信这种办法是直率的，也是有礼貌的。

关于第二点，即卫将军不会发起进攻的问题，我告诉多恩，如果卫将军不进攻，我就将目前在他身边工作的一切美国人免职，并从他那里调走一切美国装备。这些人和装备将交给服从我的命令的中国军队及其领导人。然后我说：“以后你别再让我看到你对任何中国官员卑躬屈节了。我希望所有军官与中国人接触时都要有礼貌，老练，而且十分诚恳，但要按美国的传统习惯。”

我飞回重庆后，将我与卫将军接触的这段经历只告诉了我的参谋长，再未告诉任何人。预定的进攻日期到了，我早早起来，因为我想收到首战的报告，但一份也未收到。那天上午我一直感到不愉快。我整天都在作战室询问有关敌军部署和我军在萨尔温江一线的战报。除沉静之外什么都没有。那天晚上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

或许多恩毕竟是对的（我自己这样想）。果真如此，现在我怎么办？我的参谋长和我共进晚餐，饭后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最后我决定，在采取行动之前再等一天。次日上午在我离开住所前往办公室之前，来了一封电报，写道：“凌晨5时发起进攻，

拿下第一个目标。我军继续推进，日军之抵抗似在增强。”

我大喜过望。上午11时去委员长办公室开每日例会时，我告诉他，萨尔温江地区的我军据报已在胜利前进，并建议他致电卫将军祝贺。他这样做了。后来与多恩谈及此事时，他告诉我，他虽同意我对形势的估计，即卫将军有足够的兵力胜利地发起进攻，不过我若不给卫将军额外的人力物力，他不相信卫将军会依从我。他认为我在卫立煌全体人员面前使卫丢了脸。他又说，他对发起进攻感到惊异。或许卫将军此时心情好一些，以后会执行我的命令。

我不知道我们这些性急的、敏感的、与汽车时代合拍的美国人是否有可能象劝我们以人力车的节奏慢走的中国盟友那样聪明，他们劝我们“以用餐叉吃中国茶的办法赶路”。

不管美国人能否从中国人的古老文明、哲学和各种观念中学到某些东西，反正我不久即确信，蒋介石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对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极为关心。他对现代军事战略知之不多因为他是在游击战争中训练出来的；但他懂得很多使他的人民忠于目前事业的政治谋略。他善于使两个人相争而坐收渔人之利。至于我，由于使用蜜而不使用醋（正如中国的军事史家刘馥所建议的那样），我发现他非常乐于同意他在其中主要是旁观者的计划制订工作。

史迪威、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

我于1944年秋到达中国战区时，作为总统特派代表的帕特里克·J·赫尔利在重庆已有几个月了。长期以来，他是罗斯福先生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在大战初期，他曾被派遣到澳大利亚组织一支小舰队，向被围困的菲律宾群岛运送供应物资。以后又被派到莫斯科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远东问题。他是被允许参观最重要

的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情景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军官之一。

赫尔利这个感情奔放、个性色彩鲜明的人物，并非总是老练机智，但他享有罗斯福总统对他完全信任，总统对他充满信心。他发现在蒋介石将军和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之间存在着令人叹惜的局面。为了最大限度地运用中国可用的人力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史迪威正努力采取一种办法，使中共军队与国民党中国的军队共同作战。

在赫尔利将军与我本人之间建立明确的谅解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十分明确地表明，我将竭力不卷入政治和外交事务；如果这种事情无意中发生了，我将使他充分了解情况。当赫尔利奉命继高斯出任大使时，我告诉他，我的司令部将尽一切可能与他和大使馆人员合作。

为了协助史迪威将军在中国这个复杂地区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陆军部长史汀生与国务卿赫尔商定指派4名国务院专业人员到中国战区司令部充当这位总指挥的政治顾问。赫尔先生勉强同意了这项不寻常的安排。不过国务卿经常被总统绕过。总统实际上既担负国家行政主管人的职责，也担负着国务卿的职责。当我接替史迪威将军时，这4个政治顾问是约翰·戴维斯，约翰·谢伟思，雷蒙德·鲁登和约翰·埃默森。前3人对中国的情况具有十分广泛的知识，也熟悉中国主要军政领导人。他们是汉语学者；戴维斯先生曾在中国度过相当长的时间，能讲十分流利的中国话。埃默森先生对日语和日本进行过广泛的实地研究。

所有国务院的这几个人都被准许在中国到处游历，并向史迪威将军呈交有关他们对局势观察和分析的报告。他们的报告一致表现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而且常常表露出有利于共产党的观点。他们的评论经常包括军事方面的问题。我担任总司令时，命令他们为我提供我要接触的中国重要官员的简况，以便了解我必须与之来往的那些人的背景、能力和特性。我的政治顾问对国民党持有一定的敌意，由于这一事实，这些简况就成了对我

有益的东西。

人们能够希望我所接替的史迪威将军暂留中国战区，等我到达，将在该战区的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有关情况告诉我——他们居于何种地位，如何有效地合作，我可以期望他们干些什么，等等。如果史迪威只多留一天，将有关预定作战的计划向我作一简要介绍，那对我也是有助益的。史迪威从陆军部接到的是什么指示，我并不确切知晓。很难相信，马歇尔将军会不准他留下，那怕只给我一天的时间，向我简要介绍他的预定计划，并向我提供其他重要情况。

我到达昆明时，依然相信，史迪威会留下备忘录，向我指出我必须注意的问题；告诉我他对哪些人特别有信心，这些人的才能和担任的主要工作；提出我要留心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指明他们的弱点和他与他们共事时可能遇到过的纠葛。但什么也没有，也没有留下祝我走运或咒我该死或别的什么话。于是我想，也许他把某种要给我的备忘录留给了他的参谋长赫恩将军或在重庆的某个美国高级军官。但是一个字也没有留；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对这一地区的主要问题特别熟悉情况，有些则可怜得一无所知。后来我才获悉，史迪威将军在新德里能拿出足够的时间举行一次历时几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因此看来他本来是可以等待我，给我一些帮助的。

不久我就得知，史迪威与陈纳德都很敏感，而且显然都在互相激怒。但这并不是他们不能友好和有效合作的主要原因。我常常听史迪威和他的参谋机构的人员说，陈纳德将军是一个阴谋家。但研究司令部的记录，并与一些美国人和中国人谈话后，我得出结论：史迪威本人也不是一个卑劣的阴谋家。他和陈纳德都为谋取权力和地位而要手腕，而且为了确保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都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中间寻求支持。两人都竭力讨好有权势的中国人，陈纳德在这方面更成功、更理所当然，因为他是一位出众的指挥官，对朋友和原则都能深切忠诚。他深得委员长、蒋

夫人和宋子文的欢心，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和他的司令部成员心目中的英雄。史迪威在中国军界领袖中有一些至交，他的美国参谋人员也在狂热地效忠于他，一往情深地称他为“老总大叔”。

我们战时的在华军事人员都没有看清历史的演进进程，不知道中东和远东新旧秩序之间斗争的含义及其在二次大战中对中国局势的直接影响。史迪威将军被视为陆军部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高手，不过我还是发现有许多证据，表明他同样未理解复杂的政治问题和心理问题，这些问题是以往西方人在中国的经历所产生的结果。

我在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军事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又是引人入胜的。我最不希望的事，就是象我的前任一样，牵连到政治中去。我将有关史迪威免职的文件封存起来，存入叫做“俄克拉何马”（以帕特·赫尔利的故乡州名命名）的档案中，决定战后再读。一开始我与赫尔利大使达成严肃的协议，在没有给他机会作出评价或提出建议的情况下，我决不将任何有关政治、经济或外交的情报送回华盛顿。

作为相应的措施，他也同意在使我有机会作出评论之前不将任何军事情报送回给总统（他与总统有直接来往）。这一相互协议导致了对我的参谋机构成员，包括我的政治顾问，所下达的相应指示，即，凡政治、外交性质的文件都要送交大使馆，由大使过目。

1944年12月初我到萨尔温江前线视察，那里是远离任何能够提供安全通讯联络的地方。我接到一份电报，大意是，昆明有一封绝密亲启的急件等我去看。这使我缩短了我对部队的视察，赶回几百英里外的昆明。这封绝密件是马歇尔将军发来的，通知我赫尔利大使已向总统报告，说我的部下破坏了赫尔利正与中共进行的微妙谈判，他想通过这次谈判使共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作战。马歇尔将军命令我调查此事，并立即报告。

我立即飞往重庆，与大使取得了联系，对于他给总统的报告

送出前未让我看表示失望。这毕竟是一次违背协议吧？赫尔利坚持说，事情很紧急很严重，因此他未能等我回来。我同意如果他的消息属实，我便采取严厉措施，并向他保证，我要立刻调查。

赫尔利的说法特别涉及到戴维斯和谢伟思。但他还对麦克卢尔将军和包瑞德上校的忠诚进行中伤。我绝对相信我的参谋长鲍勃·麦克卢尔的忠诚和正确判断；包瑞德上校则是一个老中国通，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他。包瑞德一直在史迪威将军创建的延安联络组行使他的职责；虽则他在延安与共产党友好亲近，经常对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表示同意，但很难使我相信他会不忠诚，阴谋反对赫尔利或我本人。

中国危险的军事形势自然使我要调查能使所有中国武装部队和我自己一起协同对日作战的一切可能性。在我的参谋人员所提交的调查报告中，有一项计划，涉及使用中共军队的问题，设想中共军队从延安向东挺进，给正在华北作战的日军施加压力。我不在萨尔温江前线的时候，这项计划已经制订好了；麦克卢尔将军已与军政部长陈诚将军和其他中国官员进行过讨论。他这样做时曾向我保证，这项计划的提出和讨论都是探讨性的；要经作为战区司令的我的认可，还要经作为总司令的蒋委员长的最后认可，这自然都是必要的。

我认识麦克卢尔将军已有20年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受过伤，因作战勇猛顽强而获得勋章。在和平时期的工作中，他被公认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在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司令部工作时，他又以杰出的作战领导人著称。我不能也不会相信，在赫尔利认为自己发现的阴谋中他起过任何作用。

经过彻底调查，我得出结论：赫尔利大使所得到的情报是错误的。但由于我很了解赫尔利，我想我是明白他仓促行事的原因的。

为使读者也明白，我必须说明我们这位大使在中国正在竭力

完成的任务，而且也想概括描绘一下我这位亲密而尊贵的朋友的个性。

象罗斯福总统一样，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位私人外交的大信徒。两个人都设想过，通过诱惑或者信任的同志式的接近，能够解除中共的武装，把他们变成朋友——或者至少可以诱导他们在所设想的共同目标中进行合作。尽管赫尔利经过在中国的幻灭经历之后，已成了俄国、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反对者，但他似乎原来并不象罗斯福总统那样，对共产主义的真正性质或它的目的、手段有较好的理解。他在1944年9月的第一周抵达中国，这时他刚在莫斯科与莫洛托夫进行过会晤，显然相信他所得到的保证，即苏联政府不与中共“交往”，也不对他们“负责”。按照赫尔利本人对这次会晤的叙述，莫洛托夫告诉他，某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只是对经济状况表示不满而已，一旦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自己的政治倾向。

因此在1944—1945年，赫尔利也象马歇尔在他之后的1945—1946年一样，按照虚假的推断处理中国的统一问题：认为中共不是莫斯科指挥下的真正共产党，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派别，可以用外交谈判的办法诱导他们同国民党政府妥协。不过赫尔利又不象马歇尔，他从不试图强迫蒋介石与共产党分享权力。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中国之前，就与总统在下述方案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见唐·鲁贝克审定的传记《帕特里克·J·赫尔利》，第280页）：

既然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那么对美国来说，企图维护中华民国而又武装一支想要摧毁它的力量，就是无益的。因此总统决定，只有中共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才将租借物资用来武装他们。

赫尔利原来的使华目的，正如给他的指示所说，是“促进蒋委员长与史迪威之间有效的、和谐的关系，以便史迪威将军对置于他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

赫尔利于1944年9月到达中国时，发现蒋介石对国务院和史迪威为强迫他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而作的努力日益感到惊恐。史迪威走得太远，竟然告诉他的挚友（见《史迪威文件》第321页）：

“解救中国困境的良策是除掉蒋介石”。蒋介石告诉赫尔利，美国应当让反叛的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权力，而不是试图强迫他去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如果共军被美国武装起来，那么中国的全部战争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中国就会因被拱手让给共产党而完蛋。

赫尔利同情、理解蒋介石的处境和正确主张，很快就与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尽管如此，他还是告诫蒋委员长，如果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而结束内战的威胁，那么美国还是有意给中国军队不断增加援助。

当然，蒋介石是处在严峻的局势中。陈纳德告诉委员长，在保卫桂林时，史迪威故意拒绝给他以帮助，为的是迫使委员长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9月16日，赫尔利到中国10天之后，史迪威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送去一张便笺，说“如果委员长不满足关于任命他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要求，他（史迪威）就建议美国从中国撤出，而在苏联领土上建立自己的亚洲基地。”（这是《帕特里克·J·赫尔利》中揭发的，见第290页。）

面对将国民党政府和所有中国军队及一切人力物力都置于史迪威指挥下的要求，面对如果他拒绝，美国就会撤回其军队并停止一切对华援助的威胁，委员长有礼貌而坚定地作了声明，内容大体如下：请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不能放弃我作为中国主席的职责。如果他撤回美国军队和租借物资，我们就用自己的一切来尽最大努力，即使得不到外援，我们也将继续作战。告诉总统，我希望免去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一切职务。赫尔利对我说，他将

上述消息报告了华盛顿。

应当强调的是，赫尔利在这种关键时刻支持了蒋介石，随后又归纳出他对史迪威的论断（见鲁贝克：《赫尔利》，第305页）：

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经历在历史上是无可挽回地与推翻中国国民政府和代之而建立共产党政权的阴谋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当时存在于华盛顿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组织或机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赫尔利仍然认为，达成一项使中共军队进入抗日战争的妥协性协议乃是他的责任。在任命他为驻华大使后，他为一项可能达成的协议起草了一份五点建议书，自认为“相当保险”，并于11月7日飞往延安与中共领袖进行商谈。当他们急忙赶到机场迎接他时，他表演了他最喜爱的绝技，发出美国印第安人作战时的高叫声，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曾“使斯大林格勒的俄国士兵高兴”过。他的想法是，“有感染力的友谊能构成外交上基本有效的部分”。

当天晚上，他成了庆祝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节宴会上的贵宾，他觉得与主人一起过得融洽满意。

在随后的两天里，正象赫尔利告诉罗斯福总统的那样，他与共产党人以“最友好的方式”进行了争论。他们“对他的建议再三斟酌”，直到最后加以修正为止。实际上是作了这样的“修正”，使它无异于重申了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对蒋介石不和解的立场。

共产党再次拒绝承认国民政府权力。正如“修正”的那样，第一点重申中共拒绝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赫尔利的第二点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加入了一项要求，即“当前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括一切抗日政党和无党派政治团体代表在内的联合政府”。由延安的共产党重写的第四点声称，美国租借物资应

在共产党军队和国民政府军队中“公平分配”。第五点提出了中共的合法化。

延安共产党给赫尔利的这个重新制定的五点建议本应使他预先得到一个警告，除非以摧毁国民政府的权力为条件，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可能性。

然而，不是因为赫尔利被延安的热情接待所迷惑，就是他认为自己在试图完成一项任务，其难度并不比调解工会与老板之间的劳资争端大。他告诉主人，他不能为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说话，但他想让周恩来和他一同回重庆谈判。

在唐·鲁贝克关于赫尔利将军的传记里，我们得知（见第314页脚注），“尽管对共产党作了这么多让步，赫尔利仍然认为，这一建议为国民政府与武装的中共之间进行谈判奠定了基础。”

难怪当宋子文将共产党五点建议送交蒋介石时告诉赫尔利：“共产党把你骗了。”委员长的这位内弟这时还警告赫尔利大使说，接受共产党协议的结果，将是共产党最后控制政府。由于要完成华盛顿指示给他的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赫尔利听不进蒋介石和宋子文给他讲的真话，即，象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那样准许共产党进入联合政府，将导致一切反共民主集团的毁灭。

赫尔利搞这样的尝试自然未能如愿以偿。尽管他有魅力，尽管他以动人的非正式方式处理外交问题，以及他的雄辩才能，他仍然无法在持绝对相反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政治派别之间妥协处理内部分歧的基础上制造出联合来。赫尔利不明白莫洛托夫在中共问题上欺骗了他，反而恼怒起来；不去纠正他对中国政局和苏俄作用的估计，反而指责戴维斯和谢伟思以及他们在国务院的支持者。这是可笑的，因为戴维斯和谢伟思在中共不是莫斯科的傀儡、而是一支主要由土地改革者组织起来的独立力量这一点上总是与赫尔利的意见一致的（至少他们声称一致）。赫尔利使自己陷入的困境显然在1945年他在参院外委会作证时就已形成了。当时他指责他在国务院的对手破坏了美国的政策，因为他们私下告

诚共产党：“他（赫尔利）为防止国民政府垮台而作的努力不代表美国的政策。”但他仍然声明，似乎他相信苏联政府并没有控制中国共产党。他在辞职书中说，苏英两国政府支持美国统一中国的政策，那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许多美国人都被巧妙的宣传所骗，相信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共产党，只不过是土地改革者而已。赫尔利似乎被故意作对而又致命的神话欺骗了。在他看来，斯大林、莫洛托夫都可以信赖，或者说他们的话都可以相信，而作祟者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我的参谋机构从史迪威那里承接下来的政治顾问所代表的国务院。

回顾以往，检查证据，今天我才明白，我太全神贯注于试图遏止日本在中国的决定性攻势的军事任务了，以致没有时间充分估计我手下的政治军官戴维斯、谢伟思、鲁登和埃默森的报告。他们对中共的同情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报告中，表现在要我们支持共产党而不支持国民政府的建议中。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支配这种动机的，或许是从错误信仰的唯心主义到赤裸裸的追名逐利或更坏的东西），他们的活动实际上与赫尔利和马歇尔竭力徒劳贯彻的国共合作政策都不协调。即使我不同意国务院派来的顾问对中国局势的估计，不同意他们要我们最终抛弃蒋介石的建议，此时我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忠诚。

当时我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一封电报中指出，赫尔利一直在努力实现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联合；政治方面的谈判未成，又转而通过合併中国武装部队的办法谋求解决；他自始至终都知道，中共拒绝将自己的军队置于国民政府的指挥之下，同时又要求我指挥他们的军队。

赫尔利看到我给马歇尔的电报后十分生气。当时他住在我的寓所里，好几天都不同我说话。这是极为尴尬的，因为我们还得一起同桌用餐。我对赫尔利有着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和热诚的敬仰。他的体型与我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他的气质正与我父

亲那种冷静、深沉地观察世情的方法相反。我为赫尔利的不近人情而深感难过。我早已开始了解他多变的脾性，而且也明白，他认为我只不过是一个军官，没有按本来面目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能力。我从不设法让他知道，我的兴趣和调查研究已使我在了解中国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共产主义的含意方面，也许并不比他差。

我们相互不说话几天之后的一天晚上，当我半躺在床上看书时，赫尔利走进了我的房间。他坐在我的床沿上，双手紧握着我的右手，说他为他对我的行为感到抱歉。我向他保证，我仍对他友好忠诚，并建议他给总统发一封电报，说明他所得到的情报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说明我的参谋机构成员的行为被误解了。

回顾往事，我现在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多少有些天真，或者说，在对戴维斯和谢伟思的估计上太无知。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讨论某个人和他在这个地区对我们事业的忠诚，赫尔利说：“你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就会懂得，任何人只有证明他值得相信，你才相信他。”我想了一会，然后说道：“不过，帕特，我一直遵循恰好相反的理论。我信任别人直到他们证明自己不值得信任为止。”我把我的思想发展了一点，指出，我的经验是：如果你希望人们达到一定的标准，并为你忠诚、有效地工作，他们一般说来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对帕特说：“这似乎会使他们做出最好的表现。”

如果赫尔利没有不公正地攻击我的参谋长麦克卢尔的忠诚，我或许会比较注意他对戴维斯、谢伟思和国务院派到我的参谋机构的其他政治顾问的完全正当的怀疑。今天，通读了由戴维斯、谢伟思、埃默森和鲁登送给我和国务院的报告之后，可以看出，不仅他们的同情似乎显然是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且他们有意无意地散布有关国民政府的夸张的，或者虚假的、由共产党鼓动的报告，有意激起中美之间各种各样的不信任——例如，戴维斯曾

给我送来内含谣传或违背事实的长篇报告，说委员长在与日本人合作，或者已与日本人暗中达成了互不侵犯协定。

鉴于此时国务院的态度，鉴于戴维斯的前上级史迪威的观点，人们认为他的设想可能是正确的，即美国打算援助共产党。不过我该明白，如果没有确证说明戴维斯同情共产党，那么下述情况就是不可思议的：在他1944年12月15—17日访问延安的报告中，他本该十分关心，中共的一位重要将领彭德怀“对美国将做些什么来帮助共产党并不太相信”。

戴维斯并未满足于强烈要求援助共产党，在一份秘密报告中，他走得很远，居然建议美国中止对国民党军队的物资供应，除非他们停止遏制共军的作战。他显然是要我们把蒋介石搞成米哈伊罗维奇。他在这份文件中所提的意见（见下述引文）使人想起丘吉尔，这位英国首相告诉麦克莱恩，他在南斯拉夫的工作只是帮助那些消灭德国人最多的人，不管政治后果如何。戴维斯写道：

是我们毫不含糊地告诉蒋介石的时候了：我们要自由选择，要与我们认为在对日作战中能够作出最大贡献的无论何种中国军队合作，并给他们以物资供应。我们应当告诉他，我们将不与表明有促进国内冲突倾向的任何中国军队共事，也不以物资供应他们，不管其为中央政府军队，还是地方军队或共军。我们应当告诉他，我们打算将给予各类中国军队以何种供应物资的情况通知作为被承认政府首脑的他。

是我们向蒋介石说清楚的时候了：我们希望中国人解决自己的政治歧见；我们不再卷入中国国内政治争端，并成为其中的一方。我们殷切希望中国在这次战争中以统一、民主、独立和强盛的姿态而出现。我们以为，如果美国在中国所作的努力主要用于与能够对加速日本失败作出最大贡献的任何力量合作，并给他们以援助，这

一目的就会最快达到，而且中国人和美国人流的血可能最少，财富的消耗也会最小。

戴维斯在另一份报告（其摘要收入国务院1949年的《白皮书》）中写道：尽管“我们目前不应抛弃蒋介石”，因为此刻我们会因此而“得不偿失”，但也“不应因最终抛弃他以利于中国的进步势力——共产党——而感到疑虑不安”。

正如戴维斯在许多信的一封信中所说：

……如果我们公开宣布倾向于共产党，蒋介石政府就会立即降到一个地方政府的地位……会出现某种混乱（但不象某些方面所预料的那么大）。在军事上、法律意义上和行政上对国民党的忠诚，将大规模地转向共产党中国，我们将支持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力量。

戴维斯报告中关于蒋介石与日本休战的说法并无实质性的东西，这一点已被战后对日军参谋机构高级军官的审讯所证实。1951年，当问及1944年的日中关系时，他们否认日本与国民政府达成任何谅解。不过据罗马纳斯和森德兰在《时间耗尽》中所说，这些日本军官一致认为，“在华南曾与持异议的国民党军事长官有过广泛的接触”，“曾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告诉中国人，在华东的攻势对他们不构成威胁，只威胁到美国机场”。

如果此种说法属实，那么蒋介石不从自己不足的供应物资中拿出武器供给那些对他的忠诚值得怀疑的中国军事长官，就是正当的。正如罗马纳斯和森德兰所说：

总之，魏德迈将军负责指挥中国战区的美军时，在中国，除国共两党间非常公开和人所共知的潜在内战状态外，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国民党军事长官之间存在着严

重的不和，而经济形势又是一种不利因素，严重地影响着美国在中国所作的任何努力。在这种情况下，防止中国分裂成互相争斗的派别集团（有的日本支持，有的苏联支持，有的美国和英国支持），使它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地理名词，就是一种重大成就。对这种情况的正确认识，逐渐形成了魏德迈对自己使命的看法。

我本人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与戴维斯所持的蒋对日本的行为的说法大不相同。我听说国民党有一些最精锐的师在对付西安以北的共产党，要求从这些师中抽调一部分用于桂林-柳州地区的对日作战。蒋介石并未犹豫，当即允许从西安地区空运两个师，这两个师从事对共产党的包围，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史迪威曾提出过这种要求，但遭到了拒绝。委员长知道，我和他一样，都是反共的，不过为了在这种关键时刻制止日军，适当的风险还得承担。

德鲁·皮尔逊于1945年6月15日在他的专栏里写了一篇部分根据事实部分根据虚构的文章，赫尔利在重庆所经历的那些纠葛便在美国公之于众了。这篇文章我在这里加以详细引用，因为这是当时（和以后）某些报纸和电台评论员在有关中共的问题上误传和曲解的例证——如果不是他们明确同情中共的话。

谈到国务院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人员因被控向共产党递送政府秘密报告而被捕的《美亚》事件时，德鲁·皮尔逊写道：

在两名国务院官员和一名海军军官因被控向杂志撰稿人传送秘密文件而被捕一事的背后，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其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两派（蒋介石的华南军阀与华北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实际是一个土改党）之间激烈的残酷斗争。搅在这一切中间的是中国特务人员的行动，他们在美国秘密活动，反对任何与蒋介石作

对的人。卷入其中的还有一位非常易于冲动的美国大使的自负。最后，还有这样的争论：美国是否象在波兰各派之间一样，使自己纠缠于蒋介石的各种政治派别之间。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被海军部和国务院逮捕的所有三名远东问题专家都强烈地感到，美国在中国下错了赌注。他们认为，中国北方政府（原文如此——引者）更能代表中国人民，进行过更多的对日作战，蒋介石则是他自己的南方军阀的一个有地位的俘虏。而且，持这种看法的不止是这三个人。史迪威将军同情这种看法，结果从中国被撵走。美国大使馆秘书戴维斯相信这种看法，在一阵口角之后被赫尔利大使驱逐了。大使馆的另一秘书谢伟思相信这种看法，被赫尔利赶出中国，如今已被国务院逮捕。最后，完全出于关心迅速赢得战争胜利的美国军事人员认为，北方的中国人能够成为在中国广阔大陆上击败日本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

这在美国的一般态度中太具有典型性了。德鲁·皮尔逊或因受口头误传的影响，或因受叛逆操纵者的影响，把中国共产党人说成是“北方的中国人”。

我的参谋长麦克卢尔要比我所验证的不谨慎，或者说，不克制。德鲁·皮尔逊对此时麦克卢尔与赫尔利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相遇时发生的事情的记述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不过就实质来说，是真实的：

约在同一时间，魏德迈将军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将军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与赫尔利不期而遇，指责赫尔利不经磋商就发出他的持异议的电报。

“你这不中用的家伙”，这位来自阿克拉何马州的前牛仔吼道，“比这小的事我都揍过人”，并奉以老

拳。麦克卢尔亦非怯懦之辈，赫尔利更不退让。但在问题发生之前，友人们劝了架。不过有中国人在场，目睹这两位美国高级人士当面挥拳相向，这可是无助于保持美国威信的啊。大约也就在此时，大使馆顾问戴维斯和谢伟思（后者已经被捕）被赫尔利命令离开了重庆。他声称，在他的周围不要附和北方中国人的任何人。从此华北与华南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结果俄国或许会正式承认北方中国人，而将另一种有关波兰的卢布林-伦敦之争留给美国，成为一种负担。这在国务院的下级官员中成了最热门的争论话题之一。但高级官员坚决反对争论。

鉴于德鲁·皮尔逊的专栏文章和其他歪曲和夸大重庆这种局面的报道，赫尔利和我于1945年6月19日向新闻界发表下列声明：

下述声明是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阁下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A·C·魏德迈将军联合发表的：

“有关我们自己之间和我们下属之间不和的报道，不论其为个人的或官方的，均属虚妄之谈。存在过分歧意见，但均迅速和睦地加以解决。美国驻华外交代表与军事代表共事和谐融洽，今后仍将如此。”

在赫尔利的坚持下，戴维斯被国务院调回，随后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正如赫尔利向我所说，他希望戴维斯“体验一下共产主义的暴虐，也体验一下它的狡辩”。

戴维斯离重庆前，来向我告别。赫尔利和我正在餐桌上共进早餐。我与我的高级政治顾问的关系总是真诚友好的，我希望他交好运，并要他与我通信，保持接触。他要与赫尔利先生交谈几句，这是不可避免的。交谈变得尖刻起来。由于我的部下在场，我提议我们3人到另一个房间去谈。这位大使与戴维斯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论，赫尔利指责戴维斯是共产党，不拥护自己国家关

于支持国民党的指示。戴维斯强烈否认赫尔利的指责，眼泪夺眶而出。赫尔利说，他打算将他踢出国务院。戴维斯恳求大使不要毁了他的名声和前程。我竭力让他们平静下来，终于使他们停止了对话，提醒戴维斯先生赶快去机场赶乘飞机。他走后赫尔利有点心平气和了，声称不会对戴维斯立即采取行动。后来我接到戴维斯从莫斯科的来信，坚持说他从未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生哲学加以接受，并感谢我的帮助，使赫尔利对他的态度变得温和。

戴维斯曾向我提供过有关中国官员的有价值的情报，还帮我考察过可资利用的内河航运。他的有些报告里包括着有关使用中共部队的建议，也有关于国民党军队腐败、混乱和效率低下的尖锐评论，经常赞扬中共的政府和军队。在估价这些报告时，我认为最好留有余地，待运用军事手段时再加判断，因为我毕生都是研究军事策略和军事战术的。因此，当我的政治顾问提出军事性质的问题时，我并不特别受他们的影响。从未发生过我的4位职业外事军官不忠于我、不忠于自己国家的事。

如果我怀疑他们的动机，我就可以得出他们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结论。后来听说他们是可疑分子，使我大为震惊。例如，很难相信如报上所说，谢伟思会把秘密文件交给共产党在华盛顿的代理人贾菲先生。联邦调查局人员曾在许多场合向我询问过我手下这4位政治顾问的忠诚问题。我完全能够理解由于自己的交往、行动和人生哲学而遭受怀疑的这儿个人的心情，因为我在1941年就被怀疑为亲纳粹分子。后来在印度的某些美国人认为我完全属于英国阵营，与此同时，我在英国人中又得了仇英分子的名声，因为我始终坚决反对丘吉尔的地中海战略。由于我本人的亲身经历，我在一切场合谈到戴维斯、谢伟思和其他驻华人员时，都很谨慎。但也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国民党是虚伪的，提到共产党时则加以赞扬。

译自魏德迈著：《魏德迈报告》第275-320页

林海 朱雪芳 译

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华

威廉·斯图克

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华代表了美国旨在使中国在一个非共产党政权下保持稳定、并以此防止整个东亚的混乱和苏联扩张影响的努力。两个使团都深深植根于美中两国的政治事件之中，它们暴露了美国的权力及其在亚洲大陆的承诺是有限的。苏联和中国国共两党的要人对两个使团态度各异，这是那个国家迅速变化的形势，以及大而言之二次世界大战后紧接着的几年里国际关系迅速变化的一种反应。两个使团的结果强烈表明，中国如今已是它自己命运的主人，而非一个多世纪中以往任何时候可比。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索恩对大战年代有这样一段评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和感恩的中国作为它在远东的代理人，这是因为，无论从地理上说，从长远的利害关系的意义上说，从它愿意作出必要牺牲的程度来说，事实上美国本身并不是一个远东大国。”^①大战没有改变这一事实，至少在东亚大陆上是这样，马歇尔使团的由来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据。

狭义说来，另一位调停人赫尔利大使1945年11月27日戏剧性的辞职，以及杜鲁门总统力图平息国内由此引起的轰动的愿望，导致了马歇尔衔命赴华调处。^②然而从更广阔的角度看来，杜鲁

① 克里斯托弗·索恩：《徒有其名的同盟者：美国、英国与对日战争，1941—1945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

② 杜鲁门图书馆藏爱德温·洛克口述历史，1967年4月5日，第79—80页；约翰·布卢姆编：《幻想的代价：亨利·华莱士日记，1942—1946年》，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73年版，第519—522页。在10月至11月间，赫尔利

自派马歇尔赴华是因为，一方面，促进那里的稳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另一方面，他承认，由于其它地区要优先加以考虑，加上国内政治上的紧张状态，美国不能通过大规模使用其武装力量来达到促使那里实现稳定的目的。

从8月中旬日本投降前夕以来，对苏联在华活动和中共活动的关注与日俱增。由于苏联要求在满洲取得超过1915年2月《雅尔塔协定》规定的让与权，国民党人同苏联人在莫斯科的谈判起先进展不顺。与此同时，开始有报告提到，苏联与中共占领的中国北部地区的空中交通增加了。^①最后，苏联与国民党中国于8月14日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人保证其“道义的、物资的和军事的援助”只给予蒋介石政府。^②然而美国对莫斯科在满洲的打算仍不放心，苏联根据先前的协议已经开始占领满洲。

随后的事件立即证实了美国的担心。苏军进入满洲后立即开始拆卸其工业设施，又常常为中共军队进入满洲并缴获日军的轻武器和弹药库提供方便，并且阻挠力图攻打共产党的国民党部队向这一具有战略意义地区的关键地点调动。^③为了协助国民党接收中国沦陷区，美国把蒋介石的军队运到华北和东北，甚至用海军陆战队在华北执行占领任务。美国没有在战胜日本后停止对国民党的租借物资运输，事实上，它在战后的几个月中增加了这种

几次表达过辞职的想法，但就在他宣布辞职前一天，他告诉杜鲁门，他打算不久就回中国去。（布卢姆：《幻想的代价》，第519页）。显然，赫尔利改变主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健康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同时他还担心，民主党人（赫尔利本人是共和党人）把他树立起来是为了让他承担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罪责。见罗素·布海特：《赫尔利与美国外交政策》，伊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58—265页。

①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59—260页。

② 《对华关系白皮书》，第585—587页。关于《白皮书》产生的分析及其内容和意义的估价，见罗伯特·纽曼：《自作自受的伤害：1949年的〈对华关系白皮书〉》，载《序言》第14期（1983年秋季号），第141—156页。

③ 近年来，美国一些最主要的学者仍然相当强调苏联在满洲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见斯蒂芬·莱文：《苏美在满洲的竞争与冷战》，载薛君度编：《中国外交面面观》，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7年版，第33—34页；里尔登-安德森

运输。^①

尽管美国作了这种种努力，到11月国民党在满洲仍进展甚微，离控制整个华北也还相距甚远。在重庆与中共的谈判处于僵局，加之国共军队之间的冲突频繁发生，这些都反映了一种全面内战发展的趋势。^② 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尤其是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陆军部长帕特森和海军上将，以及在中国战场的魏德迈将军都担心苏联会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富于侵略性的帝国。加之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力量不断增长，如此发展下去，势必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③

尽管有这些担心，杜鲁门政府却不能增加对蒋的直接军援。虽然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人民仍然不愿意在国外运用其武力，如果这意味着在和平时期保持庞大军队的话。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着手匆忙拆除其庞大的战争机器。到11月中旬，已有将近400万人复员；尽管陆海军部的高级官员和文职人员表示了关注，复员的步子却没有减缓的迹象。^④ 美国的

《延安与大国：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起源，1944—1946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109页；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年》，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225页；罗素·布海特：《苏美在亚洲的关系，1945—1954年》，俄克拉荷马州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0页。

①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69—270页。

② 关于中国的军事事件，见莱昂内尔·蔡辛：《共产党对中国的征服：1945—1949年内战史》，蒂莫西·奥萨托和路易斯·盖拉斯译自法文，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4章。

③ 关于反映这些想法各个方面的最主要文件，见布卢姆：《幻想的代价》，第519—522页；陆军和海军部长1945年11月26日致国务卿的备忘录，国家档案馆，第59类303.001号文件；庄莱德（国务院中国处处长）1945年11月15日备忘录，载《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629—634页；罗伯特·帕特森（陆军部长）与詹姆斯·福莱斯特尔（海军部长）1945年11月26日致詹姆斯·贝尔纳斯的信，载同上书，第670—678页。

④ 关于复员及最高层对此的担心，见《纽约时报》1945年11月14日第15版，17日第11版，21日第4版，28日第44版；沃尔特·米利斯编：《福雷斯特尔日记》，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51年版，第102、107、110页，对军队复员研究最具体的是约翰·斯帕罗的《人员复员史》，华盛顿，陆军部出版社，1951年版。

公众真是急不可待。在10月和11月，书信如雪片般飞进那些重要的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和国务院，抱怨美国士兵继续留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因为在那里他们正日甚一日地面临卷入内战的前景。历史学家肯尼思·彻恩极好地总结了杜鲁门政府的处境：

“既然美国公众要求遣返美军的喧嚷不可抗拒；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庞大的战时军队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复员，美国领导人又不想招致国内的政治灾难或去冒与俄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保卫美国利益的唯一途径便是说服俄国领导人，苏美两国的在华利益是可以调和的。”^①

杜鲁门尚未完全控制外交机构，尚未熟谙众多国际争端的复杂性，但他承认，他在中国的选择是有限的。^②他显然希望，马歇尔的任命是承担了足够的义务，以说服莫斯科，并通过莫斯科说服延安在一个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实行妥协。^③虽然马歇尔在中国享有相当的行动自由，但在国民党人继续努力把军队调往华北这一点上，马歇尔最终不能不支持国民党。从表面上看，这种援助是为了使国民党遣返仍在华北的日军；但美国领导人懂得，它对中国国内力量的平衡有重大意义。他们同样意识到，在没有国

① 肯尼思·彻恩：《中国的困境：1945年美国政策辩论》，康涅狄格州哈姆登，阿琼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页。彻恩对1945年秋的国内情绪作了最好的叙述（尤见121—122，132—133，135—140，147，161—165诸页）。其他的第二手叙述，见詹姆斯·费策尔：《国会与中国，1941—1950年》（密歇根州立大学1969年博士论文），第52—67页；乔治·劳奇第三：《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华政策，1941—1951年》（科罗拉多大学1965年博士论文），第80—105页；关于给国会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的信，见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康纳利文件第103匣。关于国务院作出的一个重要的估价，见《国务院收文所见团体组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1945年12月13日，国家档案馆，第59类第711·93号文件。邹说在他的巨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71页上认为，马歇尔使华“与不使用美国军队干涉[中国]的决定显然是密切相关的”。

②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87—289页。

③ 这一观点可能是从下列两书中推断出来的：布卢姆：《幻想的代价》，第520页；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纽约州花园城，达布而代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7页。

共之间的一项政治协议的情况下给予这种援助，可能使中国分裂永久化，包括苏联继续占领满洲。而这种事态发展将——如同马歇尔所说的——挫败“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目标”，即建立一个强大和联合的中国。^①很难说这样的结局有什么吸引力，但它仍然比苏联势力控制整个国家要强得多；而如果美国完全撤离，这一种前景是有可能的。

由于可供使用的文件有限，要叙述苏联、国民党和中共三方对马歇尔使团的想法，得进行许多猜测。三方对马歇尔的任命都公开表示赞同，但在背后毫无疑问有着许多算计。^②

苏联人看来有两个互相关联的目标：一个是正面的经济目标，另一个是反面的政治目标。就第一个目标而言，苏联寻求剥

① 麦克阿瑟1945年12月11日的谈话备忘录，载《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768页。

② 关于苏系和中国方面的总的看法是综合了各种第二手资料的结果，这些资料中最主要的是：莱文：《苏美在满洲的竞争与冷战》，第14—21页；《美国调处中国内战新探：马歇尔使华与满洲》，载《外交史》，1979年秋季号，第351，355页；《为胜利作准备：1935—1948年共产党在满洲的革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1、2、7章；威廉·麦卡格：《严阵以待的斯大林，1943—1948年》，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94—200，202，211—213，377，380—381页；罗伯特·斯拉瑟：《苏联的远东政策，1945—1940年》，载永久阳之助、入江昭合编：《亚洲冷战的起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23—146页；布海特：《苏美在亚洲的关系》，第1、4章；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大国》，第84—130页；鲍里索夫与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年》，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作序，印第安那州布鲁明顿，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7—53页；孔华润：《美国观察家与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66年，第36期，第347—349页；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1931—1946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章；威廉·陶布曼：《斯大林的对美政策》，纽约，诺顿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123页。有用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铁托自述》，纽约，韦登弗尔德—尼科尔森出版社，1953年版，第331页；米洛凡·杰拉斯：《与斯大林谈话集》，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与世界出版社，1962年版，第83、182页，驻苏公使衔参赞1945年8月8日的谈话备忘录，载《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60—965页；哈里曼与阿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年》，伦敦，哈钦森出版社，1967年版，第493—497，526—527，531—532诸页。

削中国，如同在它占领的东欧国家所做的那样，以便使其从二次大战的灾难中加快得到恢复，并推进其长远的发展。就第二个目标而言，苏联人寻求防止出现一个强大的、联合的中国，尤其是与美国结盟的中国。达到以上两个目标的中心环节是要在边疆地区，尤其是满洲，取得强固的地位，因为满洲有丰富的资源，众多的工厂，以及与俄国的宿敌日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防止使满洲、外蒙古和新疆归属中国中央政府，既能增进经济上剥削这些地区的前景，又能保卫苏联的安全。由于美国在对日战争中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苏联最初能获得这样的地位而不疏远美国。1945年8月的中苏条约规定外蒙独立，如果那里的人民在公民投票中赞成这样做。战后苏联人迅即采取措施以确保这一结局。结果蒙古人在10月20日投票一致赞成独立。于是只剩下新疆了。在那里苏联人对伊犁地区早在1944年下半年就拿起武器反对中国统治的回族人加以鼓励。

中国内部国共两党之间的平衡也是符合于苏联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在华北的继续存在看来对苏联有利。国民党既然还没有牢固控制满洲以南的地区，自然难于集中力量来为东北地区进行竞争。苏联人在战后初期的计谋是，他们自己要在满洲立定脚跟，同时防止国民党人控制华北，而这一切都不要激起美国的愤怒。因为不管美国过去和现在在亚洲大陆上的承诺多么有限，苏联人还是不能忽视美国令人生畏的军事—工业潜力。

对于实现苏联目标的最大威胁或许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决心利用战后动荡不定的形势来推进其事业。苏联人并非对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国兄弟抱有恶意，他们只是担心，如果毛泽东及其军队迅速向与国内敌人发生对抗的方向前进，国内冲突将会升级并失去控制，而美国却还有若干个师——以及多得多的日本士兵——占领着华北的大片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大陆的军事卷入无论在规模和时间上都会大大超过遣返日军的需要。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感到幸运的是，1945年8月下旬，毛

泽东勉强同意去重庆参加与国民党人的新谈判。

这年秋季，斯大林一方面在满州为中共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培植大国合作及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端的希望。他在这两者之间做得极为巧妙。到11月中旬，中共已经在满洲部分地区立定脚跟。华北战火蔓延，在中共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间也发生了几次小冲突。有一回魏德迈宣布，他已授权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对共产党人占领的村子进行惩罚，如果他们拒不停止对美军的射击的话。^①然后，他和贝尔纳斯国务卿宣布，美军尽早撤出中国的可能性甚微。魏德迈甚至披露说，蒋介石已经邀请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访问中国，麦克阿瑟表示，一旦他在东京的职务许可，就愿立即访华。^②与此同时还有传闻说，蒋准备在与中共的斗争中使用尚留在国民党控制地区的日军。^③苏联人现在起码从表面上已经转变为同国民党合作。11月底，莫斯科同意了重庆提出的把满洲的权力顺利移交给国民党的一项计划。协议规定，苏军的撤离时间推迟到1946年1月。中共象征性地退到了农村。

中共对苏联的意图兴许还捉摸不定，但他们可以从马歇尔取代赫尔利作为美国驻华高级代表这一事实中得到希望。赫尔利态度坚定地反对共产党，并且促使在1944年10月把史迪威将军从中国战场召回；而马歇尔作为华盛顿战时陆军参谋长，是史迪威——他主张美国援助中共，以此推进对日战争——的朋友和支持者。无疑，马歇尔的任命展现了一种美国以更公允的态度对待中国内部冲突的前景。

对比之下，苏联人大概把马歇尔这样一个有威望、有影响的

① 《纽约时报》，1945年11月7日第1版。苏联报刊开始对美国援助国民党发出怨言是在10月中旬，见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04页。

② 《纽约时报》，1945年11月22日第8版，25日第4版。

③ 同上，1945年11月11日，第4版第5栏。11月16日，魏德迈估计，不算满洲，尚有109.1万人的日军部队在中国，其中67%的人已被解除武装，但被遣返者却不足1000人。同上，1945年11月17日第2版。

人使华看作是对他们在满洲的希望威胁。尽管如此，他们通过操纵国共在满洲的平衡，避免与重庆发生尖锐的冲突，仍然把握着极好的机会以保护其在华至关重要的利益。而且只要他们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在大陆上的力量就不大可能增加。

马歇尔使团的宣布仅仅在一个意义上是受国民党人欢迎的消息，即它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继续感兴趣。史迪威旧日的盟友取代了坚决反共的赫尔利，这很难在国民党各界，尤其是反动的CC派中激起什么热情，CC派是要通过武装手段来解决国内冲突的。当苏军还在满洲时，蒋介石也不愿单独去同中共较量。这年早些时候，他试图说服英国人和美国人同他一起与苏联人达成某些协定，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一方面强烈要求美国增加对其军队的援助，一方面寻求与俄国人进行双边会谈。莫斯科在11月下旬同意在满洲帮助国民党人，这个迹象给蒋介石以希望；但他对苏联在8月中苏条约后几个月中暗中帮助中共仍然记忆犹新，因而他对美国的继续依赖依然过于明显。他无疑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马歇尔，同时又不损害他认为他对于中共的优势——其军队的数量和装备。

既然中国的竞争者们对大国的意图不甚了了，而大国又决心避免在中国发生公开冲突，马歇尔就有很好的机会在寻求避免内战方面取得初步进展。他于1946年1月10日取得了这种进展，国共双方同意停火。由三名委员——国共双方各一人、美方一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京成立以实施停战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因改组军队建立了军事小组，以马歇尔为顾问。2月25日该小组通过了《关于军队整编和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3月11日，马歇尔离开中国回华盛顿作短期逗留，以讨论再给国民政府若干援助的问题。这时，他对解决问题抱有很大希望。^①

① 《美中关系白皮书》，第136—145页；马歇尔1954年5月18日的《中国备忘录》，见杜鲁门图书馆藏，杜鲁门文件，总统后姓氏档，第57匣第1—4页。除在《白皮书》中有大量马歇尔使华的材料外，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见于《美国外交文件》，1946年第9—10卷，范力沛编：《马歇尔使华，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报告及文件》，两卷集，弗吉尼亚阿灵顿，美国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关于使团档案收藏最多的是国家档案馆第59类，马歇尔使华档案，1944—1948年。但其中许多文件都已收入上引资料集中出版。

具体的执行过程是对看来朝着和解方向发展的趋势的考验。代表军调部的执行小组在各地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国共双方在执行小组的使命问题上争执不休。蒋介石直到3月11日才同意允许执行小组进入满洲，此后又花了两个星期，双方才就执行小组在满洲据以活动的一项专门指示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国共双方在满洲的军队进行了发狂般的调动。苏军在过了撤离的最后期限仍留在满洲，并恢复了对中共的暗中帮助。^①

马歇尔觉得初期中共代表比国民党人更抱合作态度；但在3月的第3个星期，延安断定“和平已经无望”，准备在满洲发起军事攻势。^②在4月的第二个星期，当时苏军在国民党和美国的外交压力下正在迅速撤离，美国的物资和后勤援助仍在源源不断地向蒋的军队提供，马歇尔为明显表现出对中共有成见的吉伦将军所取代，美国海军陆战队缩减到了仅有3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满洲的中共军队占领了长春，一些观察者认为这是对1月停火协定的公然违反。与此同时，延安对美国的宣传攻势也升了级，这显然是同莫斯科协调一致的。^③

国民党将领从来不热心于在会议桌上解决国内的不和，他们发动了春季军事攻势作为回击。他们凭借在人数和重装备方面的优势，于5月23日重新占领了长春，并继续往北和往东，朝哈尔滨和吉林方向推进。然而中共在山东和江苏两省的行动迫使蒋把军队撤离满洲，如今他要求停战；在美国帮助下6月6日达成了停战。^④

6月满洲停战坚持得相当好，但长城以南的斗争实际上却加

① 《白皮书》，第146—147页。

② 引自周保中的谈话，周是在满洲的共产党部队的副司令员。见《纽约时报》，1946年5月15日第12版。

③ 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大国》，第149—151页；布海特：《苏美在亚洲的关系》，第47—49页。

④ 《白皮书》，第149—150页；蔡辛：《共产党中国的征服》，第78—82页；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大国》，第10章。

剧了。马歇尔4月18日回到中国后继续他的调处努力，尽管在中共报刊上对他有些零星攻击。^①在美国继续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情况下，马歇尔为了显得貌似公正，撤销了任命魏德迈中将为新的驻华大使的计划。魏德迈是在1944年下半年取代史迪威的，经过头几个月的犹豫之后，他成为赫尔利仅仅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的鼓吹者。他被任命为大使的可能性引起了共产党的强烈抗议，于是马歇尔转而求助于司徒雷登，他在中国从事传教和教学多年，他的偏见远不如魏德迈明显。^②

在中共的压力下，马歇尔3月实际吊销了美国向中国出口与内战有关的战斗装备的许可证；他想以此劝阻国民党人寻求军事胜利，他们是不大可能取得这种胜利的。^③但国民党的这类物资贮存已经足够，而在中共的眼中，由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了廉价转让太平洋岛屿剩余物资的协定，马歇尔的上述措施立即受到了损害。协定虽则把武器弹药排除在外，但国民党的经济力量因取得机器、机动车辆、通讯设备和其它物资而增强，这能给国民党人的反共斗争提供间接的好处。不管怎样，内战从7月初开始迅速蔓延，在中共的报刊上也对美国发起了攻击。^④

尽管解决问题的谈判仍在继续，大人物们依然只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争执不休，而不大想约束其军事行动。最后，10月1日，马歇尔威胁说要结束其调停努力，4天后他写信给杜鲁门总统，建议结束其使命。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向马歇尔提出了张家口有限停火的建议，从而使马歇尔撤销了他上述对华盛顿的提

① 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大国》，第154页；布海特：《苏美在亚洲的关系》，第42—43页。

② 关于此事的文件见：国家档案馆，第59类马歇尔使华档案第8匣，魏德迈1947年6月30日给勃兰德·考尔德的信；胡佛图书馆，魏德迈文件，魏德迈1946年6月14日、7月12日给马歇尔的信；《美国外交文件》，1946年第9卷，第259、446、512、927、1059—1060、1297—1298、1317诸页。

③ 以下的叙述根据《白皮书》第176—217页，关于军事方面的详细情况，见蔡辛：《共产党对中国的征服》，第84—100页。

④ 关于共产党的宣传攻势，见《美国外交文件》，1946年第9卷，第1310—1316、1346—1347、1448—1449诸页。

议。以后几星期中，在4月以后成为国民党首都的南京又展开了紧张活动，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在长期离开南京后又回到了该地。但是军事行动依然如故。当国民大会于11月中旬正式召开时，中共代表没有出席会议。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从此再未回来，直到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

眼看调停无望，疲惫的、遭到挫折的马歇尔于1947年1月8日回到美国，就任国务卿。^①他已经在13个月中主宰美国对华政策，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远离美国的地方；如今，他要在华盛顿主宰今后两年的对华政策了。

马歇尔离华时致杜鲁门总统的公开信反映了他受挫折的心情。他宣称：“和平的最大障碍，在于国共双方彼此完全以猜疑态度看待对方”。在国民党中，他看到“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反动集团……对于我促成建立一个真正联合政府的努力几乎无不加以反对”；在共产党中，他认定有“激烈分子”，或“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决心不惜代价推翻国民政府。马歇尔总结说：“要挽救局势，惟有使政府中和小党派中的自由分子居于领导的地位，他们是一群优秀人物，但还缺乏政治权力以发挥其支配作用的影响”。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他们方面的顺利工作……将通过一个良好的政府而导致团结。”^②一个美国外交官在其日记中写道，这一声明使中国国民党人“在不知所措的沉默和极度痛苦的抗议两者间举棋不定”，他们“对现时能从美国方面指望什么已不再抱有幻想”。^③其实，马歇尔的声明中既然建议“挽救局势”，仍然有赖蒋的领导，有赖新近为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有赖经过改组的国府委员会，声明最起码也暗示了，美国并不准备

① 关于马歇尔使华饶有兴味的资料丰富的叙述，见约翰·梅尔比：《天命：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纪录》，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48—177页。书中描写了马歇尔的乐观主义、遭受挫折后的心情和愤怒。梅尔比是个有才华的美国外交官，当时正在中国工作。他的书兼有日记和叙述，后者主要根据《白皮书》。

② 《白皮书》，第686—688页。

③ 梅尔比：《天命》，第177页。

放弃国民政府。

确实，从全球背景看来，美国新近在中国的经历使美国未必能够完全撤离这个国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马歇尔在1945年末看待马歇尔的使命时曾经希望，中国政治将以相对孤立于国际竞争的方式发展；到了1947年初，他们的这种希望小得多了。他们转变态度是在1946年冬春之交，当时美国观察者开始发觉，苏军和中共军队在满洲的行动以及延安和莫斯科的宣传都是紧密配合的。^①

其他地方的事件更加强了这种重新估价的说服力。1946年冬春，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了那个有名的“长电报”，苏美在伊朗对抗，德国和朝鲜的事态陷入僵局。夏天，由于苏联在土耳其的要求，局势更趋紧张。秋季，华盛顿对希腊内战的担心与日俱增，在那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雅典的保守政权形成了威胁。尽管苏军已经撤离了满洲，国务院在8月仍作出了这样的估计：

我们被排除出中国大概将在下一代导致苏联在满洲和中国的人力、原材料和工业潜力方面扩张势力。那时美国 and 全世界会在中国海及其南边面对一个与1941年的日本帝国相似的苏维埃大国，不同的是，苏联人可能在欧洲和中东也强大得占有压倒优势^②

因此，尽管美国对蒋介石及其亲信已不耐烦，但1947年初的问题已不是美国是否援助中国的反共力量，而是如何援助，何时援助。

① 布海特：《苏美在亚洲的关系》，第41，44—50诸页；海尔比1953年11月致哈里曼备忘录副本，见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赫伯特·菲斯文件第13匣。麦克莱恩在其《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52—258页上把苏联开始表示支持中共的时间定为1946年6月。

② 马歇尔·卡特1946年8月14日致马歇尔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6年第10卷，第27—28页。

对问题中“何时”这一部分的回答是清楚的：“还不到时候”。援助一个未经改革的国民政府，如不借助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将是成效甚微的。而美国的大规模干涉只能在美国公众和国会中得到脆弱的支持，它将使苏联——它在影响中国事态方面占有地理上的优势——采取相应的措施，还将使有限的资源不能用于更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这还将进一步疏远中国人中那部分善于表达意见的人，如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因为美国在调处期间援助国民党而批评美国。在当时审慎的做法是待以时日，进行观察，希望中国的形势以及马歇尔在1946年最后几个月中对蒋介石一再重复的强烈劝告，最终将说服蒋介石，进行重大的改革是必要的。^①

随着1947年最初几个星期的过去，在华盛顿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中对马歇尔态度的反对意见增长了。在五角大楼，早就对在华的调处努力感到不耐烦的文职和军职官员论证说，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时机已到，等待国民政府内搞一场纯洁化运动只对共产党有利。此外，根据二次大战期间的协定，美国有义务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补给。在共和党控制的第80届国会中“中国帮”开始要求政府为蒋介石作出新的努力。当杜鲁门政府对地中海和欧洲的事态发展愈来愈感关切，并得出结论，只有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大规模援助才能从共产主义和苏联统治的威胁下拯救这些地区时，对从国会山传来的诸如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众院外事委员会有影响的成员周以德和沃里斯的声

① 关于杜鲁门政府对国内要求完全从中国撤出的压力的担心，见 米利斯：《福雷斯特日记》，第109页；卡特给马歇尔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6年第10卷，第766页。关于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劝诫和警告，见司徒雷登1946年12月2日和21日给贝尔纳斯的信，载同上，第580—581，651—652诸页，马歇尔将军1946年12月9日与魏道明的会议记录，载同上，第602—605页。关于1946年中国反对美国援助国民党人的情况，见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2—53，57—53页。

音是难以置之不理的。^①

部分是因了回答上述压力，部分是马歇尔对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日趋衰败真正感到关切，马歇尔逐步承认，必须给予某些援助。早在2月，他准许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去同进出口银行探讨为中国建设提供贷款的可能性。范宣德的努力没有成功。但在4月，当蒋介石在新年发动的两次军事进攻均遭失败以后，马歇尔批准将塘沽的军火堆栈移交给国民党人。一个月后，国务卿批准取消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弹药的命令。6月初，他终于批准向中国转让某些海军装备和有关零配件。^②

但这些只是权宜之计，它们既不能阻挡中国共产党的潮流，也不能使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者感到满足。司徒雷登大使6月7日报告马歇尔说，国民党人在中国东北遭到了“大规模的军事失败。”尽管他们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城市，但他们不能保卫农村和田野上的运输和通讯设施，这就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一种危险的孤立境地。^③两天后，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发表一项强硬的公开声明，表示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并给予它“精心计划和有选择的、实行有效监督的〔物质〕援助”。^④6月下半月，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对国会山发起了一场要求美国增加对国民党援助的紧张斗争。^⑤众议员周以德见了马歇尔，敦促他派魏德迈将军去中国对形势作出新的估价。^⑥

① 上述观点在我的《通向对抗之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年》（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6页上作了深入阐发。

② 同上。

③ 司徒雷登1947年6月7日给马歇尔的信，国家档案馆外交分部，魏德迈使华档案，第3匣。

④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务院、陆、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备忘录》，1947年6月9日，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838—848页。

⑤ 顾维钧日记，1947年6月24—28日所记；顾维钧1947年6月23、25日谈话备忘录，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顾维钧文件，第217、124匣。

⑥ 美国国务院政策信息委员会：《日志》，1947年6月30日所记，见国家档案馆，第59类，执行秘书处一般档案，第40匣。这一关于魏德迈使团起因的材料，是我的《魏德迈使团：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与外交政策》（乔治亚州阿森斯，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的叙述压缩而成的。

马歇尔仍然举棋不定，至少在是否大规模援助国民党人这一点上是这样。6月，他忙于使国会通过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拨款法案，并忙于帮助西欧各国政府制订一项复兴经济的可行计划。他认为范宣德对参谋长们——他们主张拟订计划，向中国提供精心监督的援助——的反驳意见有可取之处。范宣德争辩说，增加美国对蒋的援助将促使苏联人支持中共，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美国“无限期地指导中国的军事行动和行政”，美国的干涉“将不会有确定结果”；美国的这种卷入将在中国激起广泛的对抗，并可能在美国公众中引起更大规模的反对。范宣德对苏联控制中国的能力也表示怀疑。尽管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有着意识形态上的结合，但是“中国人在行政管理方面效能低下”，他们“对外国干涉很容易产生反感”，他们的“工业不发达，物质资源缺乏”，俄国人为中国发展和建设提供援助的能力有限，这一切使一个苏联控制的中国不足以成为一种“迫在眉睫或很有可能的”威胁，因而没有充分理由说明，美国应该去冒对中国内战干涉升级所固有的风险。^①

然而没有人否认，中国局势的继续恶化是符合苏联目标的。既然马歇尔对开始实行一项新的援蒋计划举棋不定，而国务院又不能从进出口银行为国民党取得贷款，那末，宣布一个新的赴华使团，尤其是以亲蒋的魏德迈为首的使团，可能鼓舞国民党人的士气。由于魏德迈“深受委员长的尊重”，他的使华可能为国民政府的重大改革铺平道路。^②这个使团至少能为杜鲁门政府在作出关于中国的最后决定前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不管这个决定性质如何，它肯定会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后果。

当然，也有这样的危险，魏德迈从中国回来后会提出令人讨

① 范德宣1947年6月20日给马歇尔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849页。盖里·梅的《中国替罪羊：约翰·卡特·范德宜的外交磨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共和国书店，1969年版）对范宣德作了极好的研究。

② 马歇尔1947年7月2日给洛维特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636页。

厌的建议，譬如大大加强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卷入。马歇尔和魏德迈的关系也许消除了前者的这种担心。魏德迈可说是马歇尔的被保护人，他在二次大战中在陆军军阶方面的迅速晋升与马歇尔的支持密切相关。马歇尔或许推测，他可以把魏德迈引向他所希望的方向。^① 考虑到当时的种种压力，派遣魏德迈去中国的风险，看来比在国会中与亲蒋集团遭遇，或发动一场大规模援助国民党人的运动都要小得多。

于是7月初，马歇尔使杜鲁门总统同意派遣魏德迈使团赴华。为了避免以后的混乱和危险的承诺，马歇尔对于确定魏德迈使命的总统训令给予缜密的注意。在最初魏德迈自己起草的训令稿中说，他有权向国民党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准备立即对一项复兴和援助的计划提供切实可行的援助，如果中国政府规定、保证并接受由美国代表实行的明确的监督措施”。马歇尔没有批准这一提法，他修改了这个句子，使之读成：魏德迈应当向国民党领袖“表明，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办法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再则，任何援助……都必须接受美国代表的监督。”^② 这一训令得到批准后，宣布了派出使团的消息，并对使团成员作了适当的简短指示，7月16日，魏德迈一行启程赴华。

从表面上看，在使团的领导和目的方面，魏德迈使团与马歇尔使团适成鲜明的对照。魏德迈是一个信誉很高的人，他在中国的经历相对而言比马歇尔丰富。但魏德迈对总统的影响比较小，而且一年半来，他是不赞成美国的对华态度的。他希望通过他的使华来改变那种态度。不管怎样，他的使命不是在国共两党之间

① 斯图克：《魏德迈使团》，第11—14页。邹说完全根据国内政治因素来看待选择魏德迈出使，见《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453—454页。布海特则从魏德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又了解中国情况的角度来看待这种选择，见《苏美在亚洲的关系》，第63页。

② 魏德迈1947年7月2日给马歇尔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636页；1947年7月9日《给魏德迈的指令》，载同上，第640—641页；斯图克：《魏德迈使团》，第16—17页。

调停，而是考察，能做些什么——如果确有可能的话——来阻挡共产主义的潮流。马歇尔选择魏德迈率领使团表明，从1945年下半年以来，官僚机构的势头朝着魏德迈观点的方向转变了，虽则仅仅是些微的转变。

另一方面，派遣两个使团部分地都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它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增进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不受共产主义或苏联控制的中国的前景。在1945年11月到1947年7月间，中国的形势变化如此之大，人们对用什么办法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的想法剧烈改变了，虽然美国大规模武装干涉仍然不在考虑之列。尽管杜鲁门本不打算把他1947年3月的号召——用美国的援助“使正在抵抗少数人凭借暴力的征服或外来压力的征服的人民获得自由”——用于全世界，但这个号召却是为达到先前目的而改变手段的先驱，这远不止于东地中海，乃至西欧。

中国形势的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的两极化，在美国之外产生了对魏德迈使团的各种不同的反响。中国国民党人最初对使团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而中共和苏联人则对使团大加指责。

国民党把魏德迈使团看作美国政策向大规模援助反共势力转变的开始。虽然国民政府官员对华盛顿在宣布使团的消息之前不先同他们商量感到恼怒，但他们和国民党的报刊一致表示赞成派这个使团。^①近来他们发起了一场说服美国的运动，声言增加对他们的援助是阻止共产主义和苏联影响在中国推进的唯一途径，他们无疑认为指派魏德迈是这场运动的结果。^②

当然，国民党人指望美国支持其反共为时已久。1946年初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请他访问苏联的邀请，从那时起，这位国民党领袖就坚定地倒向美国一边。^③苏军撤出满洲后，委员长对他的

① 司徒雷登1947年7月17日给马歇尔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651—652页。

② 关于对国民党人争取美援的运动所作的冷嘲热讽并带有刺激性的分析，见利奥·拉姆（驻南京英国使馆官员）1947年7月11日给基特森（英国外交部中国处官员）的信，英国基尤国家档案局，外交部档案，371/63326号文件。

③ 关于斯大林的邀请，见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纽约，法勒、斯特劳斯和卡达希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156页。此书是在蒋夫人的指导下翻译的。

军队能在战场上打败中共充满了信心。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在满洲的攻势前途叵测，这才使他信服，他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他远不是没有意识到他的政府进行改革的必要性，^①但这样的改革会对他本人的统治地位带来风险，因为改革的矛头将指向黄埔系和CC派中绝大多数他可信赖的助手。蒋也许指望，美国的干涉能保证打败中共，而不用冒险在他自己的队伍中发动一次政变。

中共对魏德迈使团的反应表明，他们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信心增强了。尽管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中共在他们与美国人的交往中以及在宣传方面直到1946年都是很谨慎的。从2月起，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笔墨战和唇舌战激烈起来，延安却只是逐步走向与美国破裂。3月开始发生转折，但直到7月7日——当时只有1.5万人的海军陆战队留在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才发动了反对美国的重大宣传攻势。^②即便那时，周恩来也力图与马歇尔保持亲切的个人关系，直到他11月离开南京。

显而易见，关于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和“反民主的”力量对比以及由于这种对比应当采取的适当策略这个问题，1946年在中共内部一直是有争论的。1947年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乐观主义者获胜了。在这篇文章中，党的宣传部长和中央委员陆定一论证说，现在的民主力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大得多，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反民主阵营内部，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世界性的民主力量与反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是不大可能的。^③

3月，当苏联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建议讨论与中国内战有关的争端时，中共是追随苏联领导的。^④然而美国表示异议。4个月

① 易劳逸：《谁丢失了中国？蒋介石在作证》，载《中国季刊》第25期（1981年12月号），第658—668页。

② 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大国》，第146—158页。

③ 《白皮书》，第232，710—719页；冈边辰己：《冷战与中国》，载永久阳之助、入江昭合编：《亚洲冷战的起源》，第230—233页。

④ 《白皮书》，第233页。

后，当杜鲁门政府宣布魏德迈使团的消息时，中共没有显出任何受到威胁的迹象。7月16日，中共的新华通讯社把魏德迈描述成“受过普鲁士式军国主义教育的美帝国主义者”，他过去在中国的记录“象赫尔利一样丑恶”。他的使华表明美国“十分惊慌，要求助于野蛮的、对中国进行公开的直接干涉的手段，如同在希腊的所作所为一样”。但是中国人民比希腊人民强大“许多倍”，他们将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那样打败美帝国主义。^①

如同中国本国的竞争者一样，苏联也把魏德迈使团看作是美国更深地干涉中国事态的序幕。^②使团的消息宣布时，美国正在制定一项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并在试探早日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虽然这一事态发展引起莫斯科的关注，但几乎早在3年前，苏联已经在达到其在亚洲大陆上的基本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③如今苏联已经在北朝鲜取得了强固的地位，鉴于美国在南朝鲜的脆弱处境，苏联的这种地位可能不久就会扩展到整个半岛。苏军虽已撤离满洲，但苏联人仍然在旅顺和大连保持着支配地位，它与该地区的经济关系是大有可为的，而且由于国民党在那里愈来愈不走运，苏联人的政治地位也是大有希望的。在再往西一些的边境地区，苏联人的前景甚至比以前还好。^④对美国更深卷入中国事态的担心无疑仍然存在，但随着日本军队离开大陆并被遣散，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直接的危险看来已经过去。事实上，从1946年6月起，苏联在中国的路线是公开批评国民政府——如今称其为“国民党”政府——及美国对它

① 引自司徒雷登1947年7月17日给马歇尔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652—653页。

② 见塔斯社7月播发的报道的译文，载《苏联新闻译文集》，第2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出版社，1948年版，第146页。

③ 迈克尔·沙勒：《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亚洲冷战的起源》，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章。

④ 见约翰·梅尔比在一个未署日期，但显然是1947年7月下旬写的备忘录中的分析，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678—682页；并见美国中央情报局1947年11月的分析，《中央情报局报告》缩微胶卷第1卷，弗里德里克，美国大学出版社，1982年制。

的援助，苏联和中国的宣传较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惊人地相似。尽管有这种变化，苏联人仍然与国民政府保持关系，依旧避免给共产党公开的物质援助，并继续表示对通过谈判结束内战感到兴趣，^① 总之，灵活性与乐观主义仍然是苏联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

地理原因加上国内政治上的牵制，使美国在影响中国事态方面处于弱于苏联的地位，或者说马歇尔和范宣德是这样认为的。魏德迈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不这样看。他们更多强调的不是国民政府的根本弱点，而是苏联与美国相比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的局限。马歇尔希望魏德迈不带偏见地提出赞成或反对加强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干涉问题，他还挑选了倾向于范宣德观点的中国处的第二把手石博思作为使团中国务院的代表。与此相对照的是，魏德迈自己把他的任务确定为：第一，“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提出证据，证明美国援助将不会被浪费”，第二，“说服华盛顿，必须给予这样的援助”。^②

魏德迈劲头十足地执行他的第一个任务。他7月22日到达中国后，立即就有好几打中国官员向他特别请求美国的慷慨大度。但这位人们所期待的施主却什么也没有答应。8月初，魏德迈在访问了满洲和华北的几个城市，并亲眼看到普及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令人震惊的状况、行为和态度后，他采取了直接施加压力的策略。8月10日，他向蒋介石详细说明，他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中实行哪些变革。军队中应有论功行赏的制度，军官应与士兵建立更好的关系，南京应当对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减少干预；腐败无能的官员——不论是军职的还是文职的——均应去职；秘密警察的活动应予控制；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须加改变。^③ 魏德迈此后对中国南方和台湾的短期旅行进一步证实了他在各地所发现的倾

① 关于对苏联政策的有用叙述，见马科恩·贝洛夫：《苏联的远东政策，1944—1951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6—58页。

② 阿尔伯特·德迈：《魏德迈报告》，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58年版，第388页。

③ 魏德迈与蒋介石的谈话备忘录，1947年8月10日，见胡佛研究所魏德迈文件。

向。^①回到南京后，他开始对国民党内“互相竞争的力量进行突然袭击”，使之联合起来为改革而努力。^②在蒋的官邸对数十名中国高级官员的讲话中，魏德迈列举了一大堆国民党的缺陷，他甚至没有暗示，他将建议美国援助这场反共斗争。一位国民党的显贵在魏德迈讲话末尾痛哭流涕，蒋介石本人也为讲话的直率生硬感到气恼，以致借故没有参加魏德迈预定第二天举行的晚宴。^③魏德迈临行前两人在24日的最后会见也远不是愉快的。^④魏德迈在行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实行激烈改革的紧迫性。国民政府必须清洗那些“无能的和（或）腐败的官员”，少花精力去为其问题“指责外部的影响”，少花精力去“寻求外援”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要作出更多的努力来打扫自己的屋子。他坚持认为，中国具备为实现其自身繁荣所需的大多数物质条件，中国所需要的是“鼓舞人心的领导和士气与精神的复活”，而这“只能来自中国内部”。^⑤蒋介石私下对其侍从官说的与此相仿。^⑥

值得赞赏的是，魏德迈在对华盛顿的报告中也没有作什么保留。到中国仅仅一星期后，他就给马歇尔写道，国民党人“在精神上破产了”，而共产党人却表现了“极高的士气，几乎是一种狂热”。^⑦三星期后，魏德迈在访问了华南和台湾之后告诉国务卿，这些地方的国民党政权是腐败的、独裁的、乃至没有作用

① 魏德迈1947年8月18日给马歇尔的信，见国家档案馆苏特兰（马里兰州）分馆，第319类，绝密来文和发文，1938—1955年。

② 魏德迈1947年8月22日给洛维特、9月3日给司徒雷登的信，见胡佛研究所魏德迈文件。

③ 司徒雷登1947年8月26日给马歇尔的信，《白皮书》第824—826页；莫内·戴维斯（美国驻上海领事）1947年9月3日给马歇尔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749—764页。

④ 梅尔比1947年8月25日给沃尔顿·巴特沃思的信，见杜鲁门图书馆，约翰·梅尔比文件第1匣。

⑤ 司徒雷登1947年8月24日给马歇尔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759—761页。

⑥ 见易劳逸：《谁丢失了中国？》

⑦ 魏德迈1947年7月29日给马歇尔的信，见《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682—684页。

的。他说，他的报告将“充满〔令人伤心的〕揭露”。^①如果以前人们以为魏德迈更多是国民政府的代言人，或者以为他对从共产主义制度下拯救国民政府的内在问题并不了解，那末，魏德迈在中国的活动肯定把任何残留的这种想法都扫除干净了。

尽管魏德迈对中国的状况感到惊讶和沮丧，但除了一项广泛的援蒋计划，他不能建议别的东西。中国简直太重要了，不能冒险让其落入共产党手中；而蒋又是在斗争舞台上唯一有潜力在未来斗争中联合反共力量的人物。魏德迈透过地缘政治的透镜来估价中国。因而，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在战时，一个友好的中国能向我们提供“重要的空军基地作为轰炸前站之用，以及亚洲沿海的重要海军基地”，还能提供伟大的人力与资源储备。相反，如果中国被“苏联或一个亲苏的政权”所控制，中国将向我们的敌人提供这些财富，从而危及美国在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基地的效能。除了这些考虑外，满洲作为苏联在东北亚的附属地，有着十分巨大的经济潜力，这种潜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全发展乃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魏德迈建议实施一项经济援华的五年计划，给中国以广泛的物质支持，并建议美国顾问深深地卷入财政部、拟议中的经济计划组织的工作之中，参加到从战略和后勤到战场的军事行动的各种军事机构之中。对于满洲，他建议实行五国“监护”，如果不成，就实行联合国托管。^②

虽然魏德迈把自己想象成是有一定影响的战略思想家（而且实际上他确在二次大战中开始取得这种声望），但他没有作出努力将中国的重要性同其他地区——如西欧和中东——的重要性进行对比。虽然他承认国民政府改革的必要性，他仍然不想在改革开始以前不给援助。虽然他坚持认为，不必要派遣美国军队去拯救蒋介石，但却建议对满洲实行监护和托管，并且不加解释，在

① 魏德迈1947年8月18日给马歇尔的信，见国家档案馆苏特兰分馆，第319类，绝密来文和发文，1938—1955年。

② 《白皮书》，第802，810页。对报告更详尽的讨论见我的《魏德迈使团》第4章。

没有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能实行监护和托管。虽然他对中国状况措辞强硬的描述使他免于被指责为天真幼稚，但正是这种描述严重损害了他的下述观点：美国可以通过承租物力资源方面的有限义务建成一个稳定的非共党政权。

撇开魏德迈的满洲计划和反对把美援同国民政府的改革联系起来的意见不说，魏德迈的建议与国务院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想法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石博思的建议，他同意魏德迈的看法，认为美国撤离中国“明明白白是不可能的”。既然美援若不伴随着大规模的改革就无济于事，那就需要有一项能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实行必要改革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应为：在这些改革切实实施之前不予援助，美国对援助严加监督，将来如不继续实行必要的改革便撤销援助。^①

最终决定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行动方针的过程从9月18日——这天魏德迈将其报告呈交总统，一直延续到11月初——其时马歇尔宣布，他将在明年初向国会提出一项在15个月之内给中国3亿美元经济援助的计划。差不多与此同时，国务卿批准将马里安纳岛上的美国军火通过处理剩余物资的程序转让给蒋介石，批准从对外救济援助项下拨出2770万美元给蒋介石，批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补给和部队训练给予有限的、却又是广泛的援助。最后，马歇尔选择了这样的方针，国务院政策设计处处长乔治·凯南把它描述为：“给予为满足美国公众舆论所必需的以及——如果可能的话——为防止中国政府的突然的全面崩溃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援助。”^②

马歇尔选择这一方针出于多种原因。他之所以拒绝魏德迈比

① 石博思1947年8月23日给魏德迈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752—753页。更早提出有条件援助这种意见的，是中国处一份名为《中国》的备忘录，备忘录未署作者和日期，从上下文看该是初夏写的，见国家档案馆，第59类，中国处的档案，第12重；另见1947年7月5日《驻华使馆为使馆公使衔参赞准备的备忘录》，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222—228页。

② 凯南1947年11月4日给马歇尔的信，见国家档案馆，第59类，政策设计处档案。

较广泛的干涉计划，主要因为他不相信这会成功。若无美军承担大规模的义务，魏德迈关于满洲的建议是行不通的。^① 鉴于欧洲比中国占有优先的地位，考虑到国会和美国公众对美军在国外承担新的任务是否支持也大有疑问，魏德迈计划中的这一部分是没有吸引力的。甚至一项长期的援助计划和美国在国民政府民事与军事行动中的广泛卷入，也将使美国并不充裕的物力和人力用于一个只有第二等重要性的地区。然后，如果这样的行动尚嫌不足，美国将面临它所承担的义务无限升级这样一种不令人羡慕的选择，这种义务甚至可能包括派遣无法预知人数的战斗部队；或者美国选择在某种情况下撤离中国，那将在全世界使美国的信誉受损。^②

由于中美两国的事态发展，石博思以援助换取改革的策略看来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魏德迈9月回到美国后，国会里的中国帮发起了敦促给蒋介石以新援助的攻势。抵抗这种压力要冒使杜鲁门政府的紧急援助西欧计划遭到挫败的风险，甚至还可能使1948年初将提交国会的更广泛的复兴计划胎死腹中。^③ 因此，不给国民党人以新的援助将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不能接受的危险。然而没有不给援助这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石博思敦促蒋实行改革的策略就鲜有成功的机会。11月初，泄了气的马歇尔得出结论：

“我们或许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他〔蒋〕的政府是必须保留的，尽管我们希望改变其性质。”^④

又过了一年多，马歇尔和魏德迈使团被牵扯到关于谁“丢失

① 迪安·腊斯克（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给巴特沃思（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320—324页。

② 约翰·卡博特（美国驻上海领事）1948年2月6日给巴特沃思的信，载《美国外交文件》，1948年第8卷，第467—471页。关于马歇尔想法更详尽的分析，见我的《通向对抗之路》，第54—58页。

③ 斯图克《魏德迈使团》，第47—53，92—99诸页。

④ 《两人委员会会议记录》，1947年11月3日，国家档案馆，第319类，第337号（绝密）。

了”中国的美国党派斗争之中。中共1949年在大陆的胜利——就在前一年民主党在美国大选中挫败了共和党——在美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和中共在那里的干涉，使得这场论战具有了历史意义。1951年年中，被许多人视为“最伟大的活着的美国人”的马歇尔成了麦卡锡参议员恶毒攻击的对象，麦卡锡把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本人称作“一个活生生的说谎者”。在马歇尔的许多罪过中，麦卡锡把马歇尔使华“这一有罪的蠢事”和他扣压魏德迈报告达两年之久不予公布这两件事置于显眼的地位。麦卡锡认为马歇尔使团有三重目的：

第一、制止中国政府去镇压红色力量，而后者是发誓要把全中国纳入苏联轨道的；第二、如果中国政府打算用武力制服共产党少数派，就不向它提供美援；第三、不顾欧洲的教训和俄国帝国主义野心在亚洲的明白证据，一贯坚持要蒋介石接纳共产党人进入其政府。

至于说到“扣压”魏德迈报告的原因，麦卡锡解释说，报告“是以各种直接的和间接的方式否定马歇尔的政策”。当报告写成时，“中国还有可能借助我们的援助去击退赤色帝国主义者。1949年，当报告终于得以引起公众注意时，这种希望已经消失，马歇尔为中国制定的计划〔即让俄国统治中国〕实际上已经获得成功。”^①

麦卡锡的论调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令人作呕的攻击，但它与当时更负责任的评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说在周密的观察者中指责马歇尔故意把中国交给苏联的人寥寥无几，那末持下述看

① 参议员麦卡锡：《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纽约，德温—阿代而公司，1951年出版，第91，150，170诸页。这个长篇激烈演说最初是在国会中发表的。见《国会记录》，第117卷，82届国会第1次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出版局，1951年版，第6556—6603页。

法的则大有人在，这就是：马歇尔从1945年底直到1947年犯了悲剧性的大错误，这是他听信了他的同情共产党的顾问的结果，或者起码是他对中国和共产主义极端幼稚无知造成的。^①

在当时的政治激情过去之后，这种观点还延续了很久，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学术界。最杰出的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10年之后，理查德·桑顿在他的1977年以来中国政治述评中对马歇尔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指责。邹与桑顿对于国民党需要多少美援才能打败共产党的估计不同。邹意识到国民党群众基础有限，其自身又十分腐败无能，因此他论证说，要拯救国民党的事业，美国的直接干涉看来是必不可少的。^②相反，桑顿对蒋政权政治和经济的缺陷不予重视，他争辩说，蒋政权在1946年夏秋享有军事上的优势，仅仅由于8月开始的美国军火禁运才使这种优势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47和1948年美国的军事援助仍然是最低限度的，结果国民党指挥官只能采取军事上的防御战略，以致使我们听任共产党的摆布。^③

桑顿的观点比邹的论点更接近于50年代马歇尔批评者们的流行看法，但他和邹都不同意杜鲁门政府用以自卫的典型说法，亦即艾奇逊国务卿在1949年发表有名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时给杜鲁门的信中所说的：“中国内战的不幸结局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其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已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局。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结局也没有影响。”^④

① 如见安东尼·库贝克：《远东是怎样丢失的：美国政策与共产党中国的诞生，1941—1949年》，芝加哥，亨利·雷格纳利出版社，1963年版，第323—326，386—394诸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62—404页；约瑟夫·艾尔瑟普：《为什么我们失去中国》第3部分，载《星期六晚邮报》第222期（1950年1月21日），第114版。

②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349—400页。

③ 理查德·桑顿：《中国的夺权斗争，1917—1972年》，印第安那州布鲁明顿，本书最新增补版名为《中国政治史，1917—1980年》，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方观点出版社，1982年版。

④ 《白皮书》，艾奇逊致总统的信第16页。

在越南战争后的时期，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冒险的反感盛行，人们也意识到了美国在国外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邹和桑顿就鲜有机会在学术界找到同情。实际上，关于二次大战后美中两国关系的著作多如雨后春笋，这些著作已把他们的许多论点批得体无完肤。学者们承认，马歇尔认为国共两党可以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中，这种想法无疑是天真的，产生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总以为自由民主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① 美国和别处的档案资料表明，美国决策者与邹和桑顿的共同之处比这两位作者自己所认为的更多。举例来说，决策者们承认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仅仅是“土地改革者”。如果说1945年底许多美国观察家对于延安与莫斯科的关系尚觉捉摸不定，那末第二年底，他们已经把两者间的亲密关系作为一种事实接受了。不论1945年有哪些捉摸不定的情况，美国政策的基本倾向永远是反共的。今天美国学者更多研究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错过了与中共达成和解的机会，而不是美国是否向国民政府提了足够的援助。^②

由越南战争促成的知识界气候导致了三项主要的进展，从而结束了旧日的争辩，而开始了新的讨论。这些进展是：第一、对中共外交进行仔细考察的结果起码表明，在整个二次大战中，甚至直到1946年，中共对美国的态度看来都是灵活性的；^③ 第二、对国民政府的研究表明，早在二次大战前很久，甚至在日本人1937年进军华北以前，国民政府的政治基础就是极端狭窄的，而且未必能扩大，因此它统一和统治中国的前景从来就不是很有希

① 莱文：《美国调处中国内战新探》，第363—364页；斯图克：《通向对抗之路》，第17页。

② 多萝西·博格与沃尔多·海因里希合编的《未定之秋：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载有韩德与斯蒂芬·戈德斯坦的不同意见。

③ 这种观点最早表达于巴巴拉·塔克曼的文章《假如毛来到华盛顿》，载《外交事务》第51期（1972年10月号），第44—64页；较近和较全面的分析见于里尔登—安德森的《延安与大国》。

望的；^①第三、对美国政治和公众舆论的仔细研究表明，美国在打败日本后直接长期干涉中国事态的作法在国内几乎或根本得不到支持。把美国军队用于中国内战，那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是意识到事情的这种真相的。^②魏德迈在1947年所设想的那种规模的卷入，可能是一个类似越南战争逐步升级那样的过程的开端，它只能引起国内的混乱，最终导致在国外屈辱的战败。^③

考虑到美国领导人遇到的种种压力以及后来在越南多灾多难的经历，并考虑到中苏的分裂和中美的和解，现在有些学者对于马歇尔有关中国的方针给予一定程度的好评。举例来说，史蒂芬·莱文论证说，1945年底和1946年全年美国在中国的有限存在对于遏制苏联在那里的扩张是有作用的，而这正是美国的根本目的。^④如果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的继续卷入给了蒋介石以虚幻的安全感，并使美国疏远了中共，那末，这对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促使其撤出满洲则是有帮助的

不论中共对美国的卷入曾经作何考虑，事实终究是，美国的有限存在使大陆上的外国力量达到一种平衡，而这增进了出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的前景。由于相当规模的美军部队留驻中国，苏联人在扎根满洲方面就得小心谨慎。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经常依靠当地部队即共产党人去阻止国民党接收，这对中共是很有利的。它既便于他们去和国内敌人作战，又使他们能在一个对中国的将来十分要紧的地区驻扎下来以对抗外国势力。这样，外国人在互相遏制，国内的竞争者们才得以在一个多世纪中第一

① 这一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易劳逸的两本书：《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和《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年》。

② 彻恩：《中国的困境》；约翰·汉森·费弗：《杜鲁门政府与中国，1945—1950年：有限干涉的政策》，俄克拉荷马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

③ 斯图克：《魏德迈使团》，第7章；欧内斯特·梅：《杜鲁门政府与中国，1945—1949年》，费城，利平科特出版社，1975年版，第34—49页。

④ 莱文：《美国调处中国内战新探》，第349，372—374页。

次自由地决定他们国家的命运。

中共执行统治中国这一非凡任务的惊人能力终于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美国过去正是寻求以这样一个国家取代日本作为在亚洲抗衡苏联势力的力量。美国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承认并利用这个事实，这部分归因于马歇尔留下的遗产，但也归因于他的继任者们作出的实际选择，归因于麦卡锡之流所施加的压力，也归因于中国大陆的最后统治者的言论和行动。

译自威廉·斯图克提交给“中美关系史讨论会
(1945—1955)”(北京,1986年10月)论文修改稿

陶文钊 译

国务院与白宫：一项 没有实现的决定^①

南希·塔克

美国是否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事顾问。报刊编辑和评论员，院外援华集团的游说者，甚至国会议员，除非向总统施加影响，否则便一事无成。如果商人想在中国经商，传教士想在中国传教，他们必须使白宫和国务院意识到他们的关注。于是，在1949年和1950年初，各个集团都力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决策者，希望加快作出一项促进各自利益的决定。

然而在这一时期，对华政策问题得和一大堆内政和外交问题争夺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注意力。总统必须挫败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对付中东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他还为南美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而困扰。1949年9月，他不得不告诉美国人民，莫斯科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美国科学家和军事专家曾预言苏联要再过若干年才能取得突破，因此看来是间谍活动破坏了国家的安全。而确实，在美国以及加拿大、英国的间谍案件加重了人们的不安。欧洲和国内经济的失调更使公众感到惊恐。美国的金钱仍然在支持欧洲被战争摧垮的经济，并维持日本免于崩溃。美国1949年上半年的衰退和经济萧条的威胁使人们集中精力更多地考虑西方，而不是中国事态的发展。有限的资源必须用于能为美国最重要的目

① 这是《尘埃中的模式》（南希·塔克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的第10章。由于篇幅的原因，并考虑到读者的实际需要，译文对注解作了删节。——译者

标服务的地区。①

在1949年1月到1950年6月这个动荡不定的时期，美国官员还出于个人的好恶把中国放在次要地位。国务院和白宫都认定重视大西洋的方针。无论杜鲁门还是艾奇逊，对于中国都没有任何特别的知识和了解，随着时间流逝，他们都感到这个亚洲国家对他们提出了过份的要求。在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的18个月之中，当贸易和承认问题提上日程时，他们都寻求服务于美国的最大利益。他们对待中国事务都没有早先导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那种活力和创造力。②

总统在制订和实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他的施政总是几乎仅仅根据国内政治来定调的，作为行政首脑，他使国务院享有指导国家外交关系的相当大的自由。他尊重和依赖马歇尔和艾奇逊这两位国务卿的判断和情报。尤其关于中国，杜鲁门得知的情况极为有限，而他也很少加以干预。③在他进行干预的场合，他的动机中有维护美国的威信、保卫国家以防共产主义的侵犯、以及捍卫政府计划免遭党派对手攻击的成份。1947年春杜鲁门同意他的军事顾问的意见结束了武器禁运，这种禁运的目的是为了使蒋介石比较顺从于同中国共产党妥协。1949年他被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遭受拘留一事激怒了，要不是国务院把他制止住了，他真会把封锁中国海岸线的威胁付诸实施。司徒雷登大使1949年春曾建议赴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否决这一建议的

① 戈德曼：《紧要的十年及其后》，第91—132页。1949年1月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34/1号文件称，“与那些美国花费的资源能立即转化为对美国安全的相应好处的地区相比”，美国应当“把有关中国的努力视作较为次要的”。转引自入江昭：《在亚洲有一场冷战吗？》，第10页。

② 在高层政府和军事领袖中只有麦克阿瑟一个人坚持认为，远东是与欧洲同样重要的一条反对共产主义的战线。副国务卿腊斯克和无任所大使杰塞普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见盖迪斯：《战略观点：“防御圈”概念的兴衰》，载博格与海因里希斯合编：《未定之秋》，第75页。

③ 在杜鲁门文件中关于中国的信息不多。这表明总统是不大费心去考虑这些问题的。有一些重要的电报从中国发回给克拉克·克利福德供杜鲁门参考。

可能也是杜鲁门。杜鲁门已经决定使其政府逐渐同国民党拉开距离，但他反对任何可能使人认为美国急于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行动。作为总统，他担心与国会中亲蒋议员对抗会妨碍至关重要的关于欧洲的立法。司徒雷登仍然是派驻国民党政府的使节，他不能名正言顺地与北京的官员讨论关系问题。实际上，杜鲁门希望大使在回美国之前在广州停一下，与国民党当局重建联系。这时，又是国务院的官员们提出了不同意见，以免此行进一步疏远中共，而给国民党以虚幻的希望。^①

总统使他的政府具有反共的形象，他为此而洋洋自得。他兴高采烈地向人描述他1945年春天与莫洛托夫会晤的情景，以及他就俄国行为对苏联外长提出的严厉警告。他决心在他的任期之内扩张美国的世界权力，这使他反对苏联在国外扩展其影响的任何努力。他断言：“是苏联使美国卷入了一场权力之争，或‘冷战’，这是一场关系我们国家安危的斗争，我们不能撤出这场斗争，不然就是最后的自杀。”杜鲁门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出于他的个性和爱国主义，而且还出于他哗众取宠的愿望。罗斯福的一个合格继承人必须提供强有力的领导，而杜鲁门感到高唱反共的冷战论调是他影响民众的合适途径。譬如说，总统在竭力兜售杜鲁门主义时夸大了面临的威胁，并建议打一场从贪得无厌的苏联共产主义觊觎下拯救世界的战役。^②

实际上，杜鲁门在对华政策方面所持的态度是较有灵活性的。总统以艾奇逊提供的国务院的分析作指导，拒绝摒弃美国与中共之间和解的可能性。^③ 与他发表的论调不同的是，他并不认

① 这里又是艾奇逊说服总统维持一种自由的政策。政府担心会在下列问题上失去国会的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第四点计划，经济合作署，援助朝鲜的立法和美国在国际贸易组织中的席位问题。

② 总统首席政治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在1946年9月24日题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报告中，强调了苏联的威胁（报告的实际作者是乔治·埃尔西），见入江昭：前引书，第5页。

③ 据杰塞普说，虽然艾奇逊和杜鲁门对东亚都没有任何兴趣，但当中国问题产生时，是艾奇逊影响了杜鲁门，而不是相反。

为共产党世界是铁板一块，对于莫斯科控制中国共产党的程度抱有怀疑。1949年间，他向范登堡指出，“俄国人终将在中国被证明是‘洋鬼子’，形势将导致成立一个我们可以承认和支持的政府。”^①杜鲁门的一个老朋友、前议员莫利·马佛里克曾写信建议，美国政府应当找到一个途径与中国政权谈判并加以承认，杜鲁门在对这封信发表意见时，说它“是我所看到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最切合实际的信”。杜鲁门同样表示，他对在落到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地区保持美国的存在感到兴趣。他并不喜欢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这种前景，但他接受了这种可能性：这也许势在必行。^②在1949年10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拒绝讨论美国会在什么情况下考虑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清楚表明他是不愿这样做的，他声言，“我希望我们不必承认它。”然而，他并不排除承认的可能性。总统在1949年11月与中国问题智囊团商谈后告诉国务卿，他对中国的纠葛有了新的了解和更清楚的认识。事实上，他觉得这样一种建议是可取的：华盛顿通过与中国保持经济和政治关系来利用中苏之间的摩擦，如同它对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样。^③

杜鲁门期待将来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愿望——尽管是十分勉强的——也是由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引起的。他曾经力图与蒋介石政权合作并支持它，但由于它的腐败无能，他只好眼睁睁看着它土崩瓦解。他曾选派了他最钦佩的人之一去中国，企图在中国达成和解，但他只得看着马歇尔不断遭到挫折，直至最终失

① 盖迪斯：《遏制的起源》，第201—202页。

② 《时代》杂志（它不是没有偏见的）争辩说，据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透露，艾奇逊“坚持不懈地与杜鲁门辩论，主张早日承认共产党中国。就在杜鲁门动身去基韦斯特之前，艾奇逊使他认可了，早日承认共产党中国是符合逻辑的。杜鲁门说，艾奇逊作了有力的论证。现在的麻烦不在于杜鲁门了，而在于说服他顶住来自国会和其他集团要求不予承认的压力。”见《时代》周刊，1951年10月15日，第22—23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7卷，第1210—1214页；1977年11月9日采访埃弗雷特·凯斯教授记。凯斯教授回忆说，他原以为杜鲁门有很强烈的反共偏见，其实不是这样。

败。杜鲁门认为，“委员长的态度和行为是一个旧式军阀的所作所为，如同对军阀一样，人民对他是不爱戴的。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只要蒋介石稍微迁就些，本来是可以达成一项谅解的。”^① 1949年初总统确曾考虑结束对国民党援助的可能性，只是由于国会议员们的反对才使他没有这样做。即便如此，他下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要加速运送物资。紧接着，他批准了编制《白皮书》来向美国人民阐明中国事态的发展，以此推卸他的政府对这场灾难应负的责任，削弱华盛顿与国民政府的联系。^② 当国会拨款7500万美元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时，总统决定这笔款项用于亚洲别的地方，从而使亲蒋派受挫。^③ 1949年12月，他作为国务院的后盾在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设想时运用权势，拒绝了向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提供紧急军事援助的主张。

虽然杜鲁门作为总统把最后决策权留给自己，国务院对于制订美国对华政策仍然负有首要责任。军事机构提供观察报告，并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施加影响，但它最终不能否决来自外交官的建议。国务院在考虑问题时，主要的困难不是来自军方的干涉——虽然有时这种干涉是很麻烦的，而是来自他本身队伍中缺少关于中国的专门知识。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寥若晨星，赫尔利1945年的清洗使得这种人才益见贫乏。在华盛顿搞中国问题的人和驻华外交官都有很深的外交背景和重欧倾向。当时的远东司司长、后来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只在中国不受欢迎地呆过一个短时间，前此曾在西班牙工作。尽管他是一个杰出的行政管理人員和十分能干的外交官，他对中国却只有皮毛的了解。杰塞普于1949年夏受命负责逐渐确定一种新的对华政策，他虽与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90页。

② 杰塞普断言，正是杜鲁门的直接压力才克服了国务院和驻华外交人员中不愿发表《白皮书》的情绪。曾经提出这样严肃的问题：公布机密文件是否合适，这看来是对国民党落井下石。普林斯顿讨论会，1953年7月22—23日，杜鲁门图书馆艾奇逊文件。杜鲁门还保证给艾奇逊一切可能的支持，不让军方这股洪水把《白皮书》冲垮。

③ 只有很少的钱用于在中国搞情报活动。

太平洋学会有联系，但从未特别注意过亚洲事务。他感兴趣的专门领域是国际法，确切地说，这是指西方世界的法律。而如驻上海总领事卡博特，驻南京的新闻官员、后来《白皮书》的编者之一梅尔比等人，他们既不懂中文，对中国历史又一无所知，就贸然陷入了这个国家变化不定的形势之中。直到1949年改组之前，国务院中国处实际上是在主管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领导下进行工作的。^①

用欧洲观点看待中国这种倾向显然加强了美国先前关于承认苏联的决定与悬而未决的中国问题两者间的对比。美国在16年之中一直拒绝承认在俄国存在着一个共产党政府。在此期间美国公司也同苏联人做生意，美国商业界对由于没有外交关系给扩大贸易带来的种种限制变得不满。最后，1933年，罗斯福在取得莫斯科的代表的几项保证以后，扭转了政府的政策。^②杜鲁门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俄国人后来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这不但表明苏联人口是心非，而且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表里不一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争辩说，对苏联的承认并未使美国得到多少实际利益。另一些人反驳说，旷日持久的不予承认除了使美国显得愚蠢外别无所得。没有华盛顿的合作苏联也过得很好。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断言，立即给予承认可能使美国人得以影响俄国的事态发展，或者最起码也能让他们使美国人民和政府对在俄国共产主义体制下发展着的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有所准备。大使指出，无论如何，利用久久推迟承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并没有使苏联人在1933年比1917年更愿意遵守他们的保证。他主张，应当把承认作为一个技术问题，应当承认共产党中国，以便使美国如同对俄国的巴

① 卡博特以前的工作经历是在南美和欧洲，他本来已被任命为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上海的任命使他震惊不已。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不想成为“一个老中国通”，他希望他的下一任职务将在拉丁美洲。

② 杜鲁门相信，罗斯福在1933年给苏联以外交承认这一点是正确的。见《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73页。

尔于卫星国和拉丁美洲那样施展影响。①

国务院官员试图对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外交联系对美国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估计。华盛顿希望结成一个西方大国的联合阵线，希望在一些起码的行为规范得以坚持之前，各国不要承认中国共产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出于经济和其他原因要求推进与中共的关系的愿望瓦解了联合。②国务院的分析家认为，美国看来是愈来愈固执地拒绝接受一项为其盟国所赞成的政策，而坚持推行一项在对苏关系中被证明为徒劳无益的政策，不仅欧洲观察家把华盛顿看作是不理智的和不现实的，③而且美国在亚洲也开始被视为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尽管亚洲各国政府担心地注视着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仍为一个亚洲邻国的成功而感到骄傲。在一个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时代，把外国人驱赶出去的觉醒的中国形象，在整个亚洲赢得了同情。④美国为了保卫这些国家反对共产主义而遏制中国的种种努力，有可能使美国自己陷于孤立。⑤

不仅如此，美国不承认中共还使日本战后的恢复受到危害。美国担心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影响，处于经济、政治和心理危机中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67—68、107页，1950年第6卷，第268页注9。

② 事实证明经济联合阵线是比较容易取得和维持的。1949年6月中旬，国际贸易政策处处长爱德温·马丁出访欧洲，以取得关于限制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如燃料油、飞机零件等）的一致意见；在对苏联和中东的贸易中是实行类似的控制的。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关心的是防止这些物资转运到苏联，而不是禁止向中国正常的国内消费提供物资。

③ 英国官员指称，美国神经过敏的感觉正在影响对承认问题进行合乎理性的思考。英国外交副大臣助理在新加坡的英联邦会议上说，《白皮书》提供了承认的最好机会。《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249页。

④ 艾奇逊承认这一点。他告诫说，把美国和蒋介石拴在一起的努力将“把无数亚洲人全都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地反对美国，而且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亚洲失去一个友好的大国，并丧失与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的可能性。”

⑤ 杰塞普大使担心，美国将使自己陷于孤立。早在1919年5月卡博特就警告说，其它国家“不会遥遥无期地等待我们登上游行彩车，他们现在已经在装点这辆彩车了”。

的日本看来是很容易颠覆或受到威胁的。与此同时，如果允许日本与中国大陆的传统联系得到恢复，那将加速日本的复兴，还能大大减轻美国人民身上的财政负担。然而为了促进这种联系。华盛顿不能迟延太久，不然英国商人将把美国人和日本人都关在中国市场门外。

美国官员也考虑了承认中共对共产党集团的影响。承认一个俄国的卫星国并与之进行贸易，美国要冒加强苏联阵营的危险。如果美国商界满足了中国的巨大需求，莫斯科就得以将其资源用于别处。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不卖东西给中国，俄国经济实力的消耗将会减缓俄国经济的发展，而一个削弱了的苏联将在欧洲变得不太危险。西乐斯·苏尔兹贝格在对政策设计处的戴维斯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后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华盛顿相信，“苏联没有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它正对一个充满苦难的地区大感兴趣，在那里发生饥荒是经常的事。”据苏尔兹贝格说，美国政府认为，俄国人一旦同“毛先生”建立了“真正的亲密关系”，他们就会发现不能“提供中国人所必需的干部和援助”，于是他们“就会象蒋委员长似的……消耗得精疲力尽”。

但在国务院官员们的想象中，毛泽东有可能变成另一个铁托，这种可能性使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变得有吸引力了。如果中国人将走一条独立的路，那末，他们的不忠将使苏联集团感到困惑，并会减轻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的威胁。要使中苏之间的关系更快、更引人注目地紧张起来，美国必须减轻北京对苏联的依赖程度。在建立外交联系的同时，提供美国的商品和技术便是至关重要的。再说，如果美国人居留在中国，在那里直接观察事态的发展，他们就能最好地利用共产党联盟的裂痕。1949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杜鲁门总统批准，采纳了国务院的如下建议：美国奉行一种自由的贸易政策，以便引诱中国脱离莫斯科的怀抱。^①

① 卡波特致函巴特沃思说，总领事卡波特、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麦金特、商务参赞亨克、和总领事麦康瑞希都支持这项政策。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对苏联的统治保持一些自由并同美国实现和解的猜测，对承认问题上的争论很有影响。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有时看来是调和性的，有时是挑衅性的，这就产生了许多令人捉摸不定的情况。驻广州公使衔参赞刘易斯·克拉克觉得，中国共产党人是肆无忌惮的，他相信他们唯克里姆林宫之命是从。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则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热情要多得多，他争辩说，该党为中国利益服务的决心将会导致对莫斯科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这是美国能够加以利用的。司徒雷登大使的看法摇摆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傀儡和爱国者这两种形象之间。^①

国务院分析家意识到，对中共的这些不同的估价是由该党内部的不统一引起的。一个有影响的派别使中国和苏联紧密地结盟，但也存在着一个比较温和的派别，他们寻求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观察家希望，美国能通过满足中国的经济需要来加强温和派。既然苏联不能向中国提供同样数量、同等质量或同样多的品种的货物，亲莫斯科的强硬派就会相形见绌。于是，国务院在落入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仍然留驻美国外交代表，以便中国共产党的温和分子与他们进行接触。

然而一再发生的反美事件令人失去信心。中共拒绝承认美国在华外交人员的地位，因为美国还没有承认他们的政权，留驻的美国代表是派往国民党政府的。不管这种态度被看作傲慢，或者没有经验，或者是对中国主权的极端敏感，它使美国官员感到愤怒，感到受了挫伤。随后发生的暴力、禁闭领事人员、不给出境签证等事件都促使人们相信，尽管中国共产党担保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美国人处在危险之中。

^① 司徒雷登是一位传教士教育家，燕京大学的创办者。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是在中国服务中度过的。他的思想方法几乎更象是中国人的。他十分急切地希望结束中国的内战，使中国人民得到和平和稳定。虽然他是蒋介石的老朋友了，但到1949年他已经意识到，委员长再也不是这个国家的将来的同义语了。当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成员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时候，司徒雷登就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希望利用这种友谊来保持美中两国间的对话渠道。见梅尔比：《天命》，第138页。

在华非公职人员中的担心也与日俱增。商人、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拒绝撤离中国，继续逗留在落入中共军队的地区。他们期望与新政权建立关系，这个政权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是需要技术和物资的。共产党的宣传担保说，他们的生命财产将安全无恙，他们的技能在以后的岁月中将得到施展。但是工人的暴力、有关旅行的禁令和新闻的限制使他们的不安变成了担忧。

尽管如此，政府内外的许多美国人仍然争辩说，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将使情况得到改善。观察家们指出，对于中国这场规模胜过几十年的战争的群众革命来说，反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如此之少是出乎意料的。并没有发生现实的或想象中的对过去剥削性条约的大规模报复行为。中国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为恐怖所笼罩。^①歧视和威胁的事例对一切外国人都有发生，美国人遭受的更多些，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在继续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如果停止对中国内战毫无意义的干涉，如同在华美国人士所敦促的那样，那末反美情绪的首要原因便将消失。传教士吁请国务院和总统承认中共政权，以此给他们以在中国工作的机会。商人们告诉美国官员，只要华盛顿能提供外交关系的保障，他们期待着扩大贸易往来。远东司司长认为，一些基于中国共产党不承认美国外交人员的地位而产生的令人讨厌的冲突，毫无疑问是由华盛顿自己的态度惹起的。官员们所关心的正是不要过早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他们指示驻华代表在与中共当局打交道时不要使用正式的官衔，不要发挥官方的职能。

国务院官员自己远离危险地区，他们对该对中国的动乱作出的恰当反应犹豫不决。他们一再向尚未处于中共控制之下的美国人提出警告，并向希望离开中共地区的人提供撤离的工具。^②他们减少了一些领事馆的人员，并决定关闭另外一些。国务院也担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891—892页。

② 这些警告只是建议，那些没有十分必要理由留下的美国人考虑撤离是适宜的，国务院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建议商业、工业、宗教和慈善事业的关键人物应当离开。见《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1212页。

心间谍活动固有的潜在的麻烦，并试图控制这些活动。然而，虽然官员们急于要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但从1949年到1950年他们却一直鼓励商人留在中国，并且谈到传教士在使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渠道保持畅通中所作出的贡献。他们欢迎美国人在中国保留企业的愿望，并寻求也在那里保持美国的外交前哨。^①

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国务院在对华关系方面宁愿缓慢前进。如果美国直等到尘埃落定，事态也许使美国没有必要再作决定。杜鲁门和艾奇逊都不想为共产党巩固对中国人民的控制提供方便。与此同时，他们反对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这个政权为个人私利掠夺国家，它大概无论如何是要输给共产党人的。他们选择与国民党脱离关系，并朝与共产党建立关系的方向前进，而在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宣告成立，对中共的大规模抵抗停止之前，暂缓采取任何果断行动。

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割断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格外困难的。虽然一些国务院官员出于现实的原因愿意这样做，他们可能期待着承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种与他们的反共原则的妥协引起相当的担心。美国人意识到，中国亟需新的领导，这导致了在一个短时期内接受一种把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土地的叛逆者和土地改革者的神话。当着这种幻想破灭时，美国人就必须在支持中国共产党人与继续维持蒋介石统治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在李宗仁对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的挑战中对李的支持，以及鼓动孙立人发动一场政变的努力，表明了华盛顿对蒋介石的政策的厌恶程度。然而委员长的权力是那样牢固，李宗仁和孙立人的权力是那样脆弱，选择的余地是没有的。美国分析家还担心，台湾的一个新政府不会在国际上赢得外交承认，而会被视为美国的傀儡政权。于是，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而不愿因为把唯一能抵抗中共攻势的人物搞掉受到指责。

^① 据国务卿1950年3月1日说，当时还有2700名美国人在中国。见《纽约时报》，1950年3月2日第20版。

国内的政治动乱也妨碍了民主党政府采取更带冒险性的政策。由于国家的福利取决于共和党人在国会对援欧计划和防务计划的投票情况，杜鲁门总统寻求尽量缩小在中国问题上的冲突。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在1948年总统竞选中遭到挫折以后，竭力寻找使民主党人作难的争端。共和党在回顾那场最终使杜鲁门获胜的竞选时，认为问题主要在于两党一致。二次大战以来，“大老党”一再将其政治利益从属于支持以国家安全相标榜的政府的外交政策。即便对于与中国事态发展有关的政策，他们也放低了批评的调门，期待着杜威的胜利，而不想预先确定他们的候选人的政策。然而，既然杜威输了，共和党人不再审慎从事，掀起了攻击对华政策的高潮。

确实，中国争端与共和党人的下述指责是完全适合的：民主党人在白宫中的16年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尽管是杜鲁门本人通过公开提出杜鲁门主义促使了美国恐红症的增长，民主党政府仍然成了发展之中的反共歇斯底里的牺牲品。共和党人争辩说，美国可能在中国失掉的不仅是二次大战中的一个可靠的盟国，而且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当总统允许苏联人在亚洲自由行动时，他怎么可能指望国会拨款数十亿用来在欧洲阻止俄国？更糟的是，有些共和党人竟至声言，国务院中的那些颠覆分子实际上鼓励了共产党人接管中国。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企图向中共提供武器，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他们试图迫使蒋介石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这些共和党人断言，十分清楚，不是南京，而是华盛顿输掉了中国的内战。^①

设计一种政策以扭转这种趋势并拯救国民党的企图，1949年秋天是来自军方的。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总统通过提供金钱和军事

① 国务院官员们认为共和党人的攻击与其说是对政策的实质性攻击，不如说是党派斗争。事实上，许多国务院成员对议员们有些不屑一顾。凯南认为国会使得对外政策失去了灵活性。中国问题顾问埃弗雷特·凯斯拒绝陪伴他的老朋友亚历山大·史密斯1949年秋作远东之行，因为他预料，这只是一次为达到纯粹宣传目的的公费旅游。事实确实如此。

指导来帮助蒋介石，制止共产主义。国防部长约翰逊一边助长总统的野心，一边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是至关重要的。他争辩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拒绝建议派遣一个调查事实的使团去台湾岛，这是屈从于没有根据的政治压力的结果，它并不代表一种对形势的严格的军事上的估价。^① 参谋长联席会议过去在中国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表明，在他们的不干涉政策背后缺少坚定的信念。从1945年起，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再主张美国在中国实行积极的军事卷入。他们1945年所建议的实际是一种保护国关系：美国取得特别的经济和军事权益作为提供援助的交换。^② 1947到1948年，他们力图把缩小的援助计划强加给总统，声称，甚至只要小规模援助也能增强国民政府的士气，并使中共感到气馁。参谋长们拒绝任何认为中共可能采取的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姿态的设想，他们称这个党是“听命于莫斯科的”，其成员是“苏联政策的工具”。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12月警告说，一旦中国大陆完全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不让克里姆林宫直接利用台湾，对于保卫西太平洋的海路是至关重要的。^③

1949年，美国军事力量与全球目标之间的不相适应益发明显，这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中国抵抗苏联的热情大减。不仅由于苏联爆炸了自制的核装置而使美国从长远来说易受攻击，而且美军方1950年财政年度的最高预算只有144亿美元，1951年财政年度的计划最高预算只有130亿美元。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要求得

① 据顾维钧说，约翰逊对蒋介石十分友好。艾奇逊国务卿意识到约翰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施加压力，在1949年7月25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建议，起草一个文件，使之在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能帮助引导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问题。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90—598页。贝尔纳斯国务卿1946年（原文误作1945年——译者）1月5日致函国务院、陆、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反对承担大规模义务，见同上，1946年第10卷，第810—811页。杜鲁门赞同派一个较小的顾问团，见《美中关系白皮书》第339—340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7卷，第838—848页；1948年第8卷，第118—122页；1949年第9卷，第262页。

到210至230亿美元的拨款，并称169亿美元是为保卫国家所必须的最最起码的预算。参谋长们对在与俄国发生战争时能否保住西欧与中东感到担心，因此也就不能再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亚洲边缘地区的冒险。^①1947年他们在一份列举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的表上把远东置于末位，在一份列举对美国安全有重要意义的表上把中国置于第13位（倒数第3）。^②到1949年时，参谋长们勉强承认，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占领或军事干涉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③

实际上行政机构愈来愈把台湾的陷落作为解决承认问题的办法，一旦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破了，共和党人和院外援华分子也就不能再对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提出异议了。到那时，接受共产党政权便不再带有放弃一个盟友的耻辱。外交承认将又一次成为一个政府得到认可、以继续国家之间正常交往的现实手段。杜鲁门政府在静悄悄地准备着国民党抵抗的结束，并准备与中国即将诞生的政权恢复关系。

杜鲁门和艾奇逊都敏锐地意识到，决不能让人感到国民党的垮台是美国可以预防的事情。这使政府的每一个行动都需极端谨慎。尽管政府希望切断与蒋介石的关系，它却一再同意延长援助计划。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2月3日建议，鉴于中共近来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倡议，美国的援助应当停止。杜鲁门、艾奇逊在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却选择了暗中拖延运送武器的办法。范登堡参议员告诫说，这就不会使美国有对中

① 甚至在苏联爆炸原子弹以前，1943年5月编写的哈蒙报告就断言，在与苏联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计划中的针对俄国城市的空中核攻击，并不能防止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落入苏联之手。另一方面，杜鲁门不高的国防预算迫使军事部门依靠核武器，并使国防部长约翰逊向总统隐瞒了哈蒙报告。作为对俄国爆炸原子弹的反应，美国虽然对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没有立即修改战争计划。情报部门估计的结论是，事实上美国在1951年前不会受到威胁，因为苏联在此之前不会有适当的投掷系统。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7年第1卷，第735—750页。1948年中国下降到第17位。同上，1949年第1卷，第262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285、307—308、337页。

国人落井下石之嫌。^① 1949年7月，国务院重新考虑了它不为国民政府要求援助作为《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的一部分的决定，以便不给中国问题的“争论火上浇油”。相反，国务院官员们却弄到了一笔钱，总统可酌情将之用于中国地区，这样，政府既没有承担将款项用于为蒋的利益服务的义务，又可避免指责其对此事采取否定的态度的批评。与此相似的是，政府在是否告诉美国人民蒋政府是腐败无能的这一点上也犹豫不定。当1949年2月51名共和党人写信要求重新审查美国政策时，艾奇逊极想发表一个关于中国真实情况的公开声明以为回答。早在1948年11月，国务院就考虑发布一个指责国民党施政不善的文件。1949年4月，它终于开始了编制《白皮书》的工作，并于8月公布。即便那时，艾奇逊国务卿也选择强调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争执是超出美国的控制能力的。不管国内的批评者还是国外的盟友都不能认为，美国没有履行其义务。

艾奇逊尽管仍然必须掩饰，他竭力推行一种同国民党脱离关系的政策。如果不能采取断然的行动，国务院便将实行逐渐分离的办法。在1949年2月找到了减缓运送武器的办法后，艾奇逊在3月对参议员麦克卡兰关于向国民党提供15亿^②美元军援的建议又采取了强硬的反对立场。国务卿在4月对美国外交大臣贝文说，他希望6月初将停止拨付《援华法》的款项，然后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更为现实的立场。事实上，艾奇逊随后几次驳回了国民党的援助要求。^③

美国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对国民党未来的估计加强了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势头。几乎所有国民党军队的迅速瓦解使观察家们深信不疑，国民党干脆不会再打仗了。不仅大陆上的前途是暗淡的，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485—487页；范登堡：《范登堡参议员的私人文件》，第530—531页。当1948年《援华法案》第404款规定的款项于1949年4月2日有效满期后，国务院也赞成停止军事援助。

② 原文误作150万。——译者

③ 《未定之秋》，第22—23页；史密斯：《迪安·艾奇逊》，第116—117页。

而且早在1949年8月国务卿就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即便华盛顿给予政治和经济支持,国民党甚至也不能守住台湾。^①中央情报局1949年10月的一份报告认为,只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能够防止台湾在1950年底以前被征服;国务院,陆、海、空军部都同意这种估计;中央情报局在1950年3月和4月又重申了这一看法。^②保卫台湾——不是指望蒋的士兵,而是因为中共没有两栖作战能力——的微弱希望随着1950年的海南岛战役消失了。在海南岛这个第二大沿海岛屿,国民党军队在中共部队面前土崩瓦解。台湾的士气直线下降。美国驻台北领事馆人员预料,夏天某个时候末日就即将来临。^③

艾奇逊国务卿提请他的驻外官员和国会注意这些可怕的警告。他于1949年12月发出一封通电,电报预料台湾国民党政权即将被除掉,要求美国外交人员降低这一事态发展的重要性。^④他在1950年1月参院外交委员会内部会议上又一次断言,国民党中国的垮台是不能防止的事。3月,在国民党以极高代价对上海进行空袭之后,艾奇逊对参议员们说,“如果中共不尽快结束这种事情”,那末他相信他们“简直是愚蠢之极了”。^⑤事实上,艾奇逊本人对国民党这一行动和国民党政府对美国抗议的挑战性回答也非常恼怒,以致他曾考虑断然中止以后的一切援助。但既然问题的最后解决已经指日可待,国务院决定不采取任何可能对杜

① 《美国外交文件》, 1949年第9卷, 第370页。

② 同上, 1950年第6卷, 第330、340页。

③ 同上, 第335—339页。

④ 同上, 1949年第9卷, 第431—433页。这份题为《政策情报文件: 台湾》的通电(特别指导文件第28号, 1949年12月23日)载于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听证会:《远东的军事形势》, 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 1951年, 第3部分, 第1667—1669页。

⑤ 艾奇逊在1950年1月13日和3月29日参院外交委员会内部会议上的证词, 见《世界形势评论: 1949—1950》, 第184, 275页。中国处处长石博思后来断言, 艾奇逊在国会议员的会议上“显然在为”在中共接管台湾、国民政府不再存在以后“最终认真考虑承认问题铺平道路”。见《外交史》, 第2期(1978年春季刊), 第215页。

鲁门政府带来国内政治报应的任何行动。^①

自从1949年12月国民党的抵抗在大陆最终崩溃以来，政府就几乎处于共和党人和院外援华集团的能言善辩的同盟的不断攻击之中。参议员诺兰、塔夫脱和前总统胡佛接连提出尖锐要求：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保卫台湾。国防部长约翰逊与麦克阿瑟将军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转变立场、提出对国民党军事需要作一次调查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顺应他们的要求，加之在《军事援助法》项下又有了新的款子，在人们想象中台湾状况有了改善，便建议实施一项“有节制的”、并加以“严格监督的”军援计划。^②

国务院早在1948年10月就排除了运用美国武力保卫台湾的可能性，此时也反对通过直接干涉去拯救国民党的事业。^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充其量只能使台湾陷落推迟一年，而美国的威信却将招致相当大的损失，同时还将在中国及亚洲其余地方的人民中激起反对殖民主义的仇恨。艾奇逊争辩说，不能证明付出这样的政治代价是正当的。实际上，国务院已经建议，《军事援助法》项下的款子用于在华的情报工作，只在南亚才用于军事目的。在艾奇逊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援助国民党人的政治上的不利因素可能超过了军事上的好处。

杜鲁门总统同意他的国务卿所持的立场，决定听任国民党中国垮台。不论他以前对于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有过多少疑虑，这些疑虑在1949年秋都已烟消云散。在《白皮书》里，在国务院的报告中，在中国问题顾问团的言词之间，关于国民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破产的证据已占压倒之势。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其中规定给国民党人以政治和经济支持，但没有提到军事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6卷，第313页注4。

② 同上，1949年第9卷，第460—461页；《未定之秋》，第82—83页，这是1949年9月28日国会批准的1949年《共同防御援助法》第303款项下的款项。该款规定，总统可酌情将7500万美元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

③ 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527页。

援助。而这种根据现行法规拨付款项的经济援助也将在1950年2月满期。^①杜鲁门相信，随后不久共产党就将征服台湾。^②

总统既然决定不防止台湾指日可待的陷落，便发表公开声明宣告政府的脱身政策。1950年1月5日，他宣称，美国政府不打算在台湾取得特别的让与权，也不会从中调停以防止其被接管。军援项下尚未花费的900万美元仍将为国民党所得，但将不再有新的军事援助。7天之后，国务卿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又把台湾置于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圈之外。国务卿说，美国不想惹起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这种情绪是应当正确地针对苏联在满洲和蒙古的行为的。政府的参院发言人汤姆·康纳利还声称，美国人民不想被投入一场战争，尤其不想为拯救台湾而打仗。^③

可以想见，国民党的同情者是不会把这种政策作为确定无疑的政策加以接受的。在国会中，中国帮以援朝法案作为抵押品，使经援剩余款项拨付的最后期限延长到6月。^④国防部长约翰逊对于他认为在错误引导下放弃美国一个盟国的行为坚持加以阻挠。若干个月以来，他一直在与国务院斗争，不让国务院得知国防部的情报，接触国防部的人。他反对发表《白皮书》，并拒绝为它提供文件。他甚至对派遣一艘美国船去撤离在上海的外国人一事制造障碍，理由是中共可能截获这艘船。他在1950年的头几个月中主张军事援台和为蒋的利益进行干涉，并将美国军事机构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570—576，463—467页。在国家安全委员会37/5号文件《有关福摩萨的补充措施》（1949年3月1日，见《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291—292页）中指出，国务院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11/12和37/1号文件中一贯反对在台湾驻扎美军，认为这“不仅在外交上没有好处”，而且“对我们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不能阻止共产党人的渗入和煽动，而且很可能使台湾成为中国一个收复领土的问题。总统支持国务院。

② 总统确信，中共可以随心所欲接管台湾。

③ 艾奇逊：《亚洲的危机》，第111—118；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532—536页。

④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对中国和朝鲜的经济援助，1949—1950》，第193—227页；《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537—538页。这是二次大战以来政府外交政策在国会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内部政策发展情况继续告知国民党官员。参谋长们也再次提出军事援台的建议，尽管他们仍然一致反对在当时情况下进行直接干涉，他们却在秘密制订一旦爆发战争不让台湾落入苏联人之手的计划。退休海军上将库克和麦克阿瑟将军则从国外吁请总统改变立场。^①

艾奇逊国务卿在国务院内部也遇到反对意见。国务卿确信，一个不处于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只有在中共统治下才可能存在。他在1949年初曾表示对台湾自治运动感到兴趣，但当他的特使麦金特和经济合作署观察员证实了蒋介石对该岛的铁腕统治后，这种兴趣消失了。^② 1949年10月国务院中国政策高级顾问的两次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无论从外交上或军事上，美国都不要采取措施去阻止国民党政权的无情衰亡。^③ 尽管如此，在1950年头几个月，这些官员中的某些人却再次提出了使台湾既摆脱蒋，也不受共产主义控制的计划。政策设计处顾问、前负责人乔治·凯南提出了一个老罗斯福式的冒险计划：派遣美国士兵赶走委员长，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④ 迪安·腊斯克重新提出了他早先关于把台湾变成联合国托管地的想法。他建议，美国应当把海军插入台

① 《世界形势评论：1949—1950》，第239—245页；《未定之秋》，第77—89页；《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7卷，第161—165页；第6卷，第333—335页。中国是弱的，这表明它对美国不构成军事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关心的是不使台湾落入苏联控制之中。见《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261—262，265页。1950年6月24日，约翰逊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德雷结束远东之行返回后说，他们从麦克阿瑟和其他军事指挥官那里获知了关于远东形势的全部事实。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281—282，319—320，324—326，337—341页。

③ 同上，第160—161页。

④ 同上，第356—359页。另一方面，巴特沃思和政策设计处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提出警告，反对派遣美国军队，以免激起台湾人民的愤怒和促进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见《未定之秋》，第26页。

湾海峡，直到联合国得以巩固其对该岛的控制。^①刚到国务院就任对日和约特别顾问的杜勒斯同意腊斯克关于一个中立化的台湾的设想。^②但是艾奇逊国务卿拒绝了这些办法，如同他先前拒绝救援国民党的种种计划一样。蒋介石带来的灾祸总算能见到头了，艾奇逊无意影响这种期待已久的事态发展。1950年6月23日他告诉新闻界，美国将继续奉行其不干涉政策。

国务卿厌恶国民党，这同他要使美国与国民党割断关系的愿望起了很大作用。艾奇逊是在对亚洲事务既无先前的经验、又无兴趣的情况下面临中国危机的。在注定倒霉的马歇尔使华期间他在华盛顿服务；当他接任国务卿时就下定决心，他的结局要比马歇尔将军和马歇尔国务卿好些才是。国民党人设想，马歇尔在1949年仍然在指导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但实际上，艾奇逊对他如此尊崇的人的希望破灭所产生的影响远比此人本身更大。艾奇逊就任之初，又一再遇到国民党言行不一和懦弱无能的事例。艾奇逊于是深信，这个党在财政上进行欺诈，它没有能力进行统治，甚至不能为着追求一个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艾奇逊渐渐告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6卷，第347—351页。腊斯克说，他正在调查研究这样一种可能性：让退休将军弗兰克·梅里尔去台湾和孙立人会谈，拟定拯救该岛的计划。国务院其他关于联合国托管计划的考虑包括：巴特沃思给腊斯克备忘录（《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346—350页），他在其中提出，吁请在台湾举行一次联合国公民投票“在道义上是无可指摘的”；麦金特发自南京的第640号报告（同上书，第302—303页）；负责与国会关系的助理国务卿麦克福尔的谈话备忘录（同上书，第207页），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在这次谈话中承认，这种行动大概是不现实的。来自美国驻台北领事埃德加的信息表明，“大部分台湾人恨国民党，怕共产党，欢迎美国的军事占领”。他们把联合国托管这种安排作为可供选择的办法，见《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451—455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1卷，第314—316页。1950年5月23日，共和党参院领袖同意，在他们发动猛攻以前，先让杜勒斯去和艾奇逊继续争辩台湾问题。见《未定之秋》，第86—87页。正如台湾中立化的计划要由朝鲜战争来加以实现，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也是这样，历史学家把这个文件作为1950年头几个月里政府内部强硬路线发展的证据。其实，这个政策反映了保罗·尼茨的思想和政策设计处以及一些国防部代表的想法，总统在1950年4月拒绝批准这种政策。

诉美国人民，降临到国民党人头上的厄运是他们罪有应得的。毕竟不能指望美国去提供国民党军队缺少的决心，提供人民决定给予与之对立的共产党军队的忠诚。^①

艾奇逊相信，美国的责任不在于支持一个威信扫地的政权，而在于找到途径去调和美国与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利益。据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说，国务院在好几个场合都向中共示意，华盛顿“期待着与他们建立正式的、正常化的关系；虽非亲密、但是适当的关系”。早在1949年，国务院就接受了官员的建议，美国不关闭在共产党区域的领事馆，即便在国民党政权从南京撤离后，美国使馆仍然留在南京。^②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大使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接触，试图消除误解，改善关系。^③国务院在经国务卿批准后明确告诉美国实业家，与中共的商业往来并不违反政府政策，相反，在华有重要利益的实业家和传教士应当留在那里。^④当在华的美国人与中共之间发生摩擦时，国务卿也试图缩小事态。甚至当中共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没收北京美国领馆的财产时，国务卿也不认为这是停止走向正常化的进程的理由。美国确实撤离了尚留在中国的外交代表，但这与其说是为了割断关系，不如说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摩擦。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撤离前接到训令，命他与共产党政府进行接触，再作一次解决中美之间分歧问题的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206—207页。1949年12月29日，艾奇逊在与参谋长们的会议上争辩说，台湾的陷落与其说是由于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不如说是由于内部的衰败，他说：“居民是敌对的，加之难民充斥；政府是腐败的，尽管吴国楨像道具似地被推上了前台；既然如此，我们大概将会见到那个丧失大陆过程的延续。”同上书，第466页。

② 司徒雷登大使对中共南京外办主任黄华指出，在中共接管南京以后西方国家大使仍然留在这里，这可以被中共看作是“意味深长的”，见《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8卷，第752页。

③ 同上书，第8卷，第173—177页，第9卷，第230—231页。

④ 同上书，第9卷，第161页。

尝试。^①华盛顿继续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取得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一再向秘书长保证，将不对此行施否决权。艾奇逊对赖依说：“整个北京政权是一个即兴作品。它简直不知道，它在作些什么，不知道它的行为在国际上的反应。”国务卿希望，当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使它意识到与美国打交道的好处时，它就会比较清楚地明白它的境遇了。^②

国务卿在决定朝着正常化前进而不制造中国为收复领土台湾而斗争的问题时，他所选择的行动方针得到外交机构中多数人的支持。国务院关于承认政策的研究和有关废除条约的先例表明，美国可以维护其利益并与中共妥协。无任所大使杰塞普、埃佛雷特·凯斯、调入国务院专门从事中国事务的雷蒙德·佛斯迪克这些顾问们都赞成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承认中共。无任所大使杰塞普建议，在他1950年初的远东之行中他应当与毛泽东进行探索性的谈话。回国休假的经济合作署中国使团的成员继续鼓吹承认的好处。国务院的官员们，其中包括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他的帮办麦金特、中国处处长石博思、《白皮书》编者之一的梅尔比以不同的热情主张承认。在10月的国务院会议上人们一致认为，不“急于”建交，但采取“现实”的态度是恰当的。北京的柯乐博和上海的卡博特等驻外的官员同样关注打开关系的问题，并补充说，关系与贸易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其结论是，承认是比不承认高明得多的政策。驻台湾代办罗伯特·斯特朗强烈要求国务院不要忽视“大陆及其潜力”，卡博特的继任者麦康纳希论证说，中共

① 同上书，1950年第6卷，第321—322页。举例说，无任所大使杰塞普很长时间来就对让美国人留在中国表示担心，因为那就可能发生一些事件，这些事会影响国会和公众舆论，导致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压力，而美国不然是不会采取这种行动的。实际上，美国人没有在4月以前最后离开，原因是中共采取拖延的策略。中国人否认这一点，他们推测说，“美国政府将来总会有一天又要请求我国政府准许那些今天请准离开中国的官员们返回中国，因而将要损失面子”，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集，第97页。

② 艾奇逊1950年1月21日与赖伊的谈话，见赖依：《为了和平的事业》，第255页。

三不想把所有美国人都撵出去。他主张，为了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存在，华盛顿应当增强美国的实业家和传教士的地位。^①

共和党人和院外援华集团分子经常不断的压力使国务院厌烦，这也使它产生与国民党脱离关系的积极性。亲国民党的文章、信件和访问的一再重复，使国务院官员对这类材料大多置之不理。有时，这种材料会引起一种对企图用胜利的色彩来描绘国民党事业的人的令人难堪的同情，中国大使顾维钧就觉得这种反应是让人很不自在的。在其他时候批评和请求遭致厌烦。^②关于国民党达官贵人，尤其是宋氏家族用美援中的大笔款项在美国购置不动产的传闻不一而足。腊斯克发起了一次国务院的调查，希望有关国民党财政方面舞弊陋习的证据能用来有助于捍卫国务院的对华政策。尽管这一调查没有取得任何可供利用的具体结果，国务院官员们对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仍持怀疑态度。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指出，国民党军队1949年12月23日提出的要求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极其相似。^③甚至主张继续援助国民党的人也反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的态度。譬如说，杜勒斯曾就国民党所表现出来的缺乏信心和丧失斗志对国民党发言人进行指责。他宣称，企图以在台湾的临时性抵抗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求得美国最终作出援助的承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谣传蒋介石与其他领导人已经制定了逃跑计划，这在美国

① 无任所大使杰塞普1949年至1950年间的特别助理查尔士·约斯特说，国务院里总的看法是，承认是切实可行的，并且将会发生。1977年12月1日采访约斯特记。柯乐博同样认为，大多数驻外官员赞同承认，见《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1251—1252，112，124，97—98各页；1950年第6卷，第334页注3，第353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8卷，第304页。顾维钧大使发觉，巴特沃思、洛维特和国务院其他人员对国民党的事业是持敌对态度的。艾奇逊国务卿在内阁会议上指出，陈纳德将军关于援助国民党人的提议是从对统治中国的几个家庭的错误忠诚出发的，导致这种错误的是一个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军人的的人。

③ 同上，1949年第9卷，第457—462页。人们同样明白，在中国关键地区的那些军事领袖们的行为是不忠诚的。

对国民党的事业更是不会有帮助的。①

政府的新方针在国会中也得到了支持。参议员诺兰和史密斯曾要求美国干涉台湾，甚至占领该岛，但这在他们的国会同事中没有激起任何热情。与此相反，民主党议员对共和党人要求艾奇逊辞职的刺耳声音已经厌倦，也听腻了后者在中国问题上的讽刺漫骂，他们秘密集会，并且实际上一致批准了杜鲁门对台湾的不干涉政策。②

政府也从重要的教会和实业界人士、有影响的新闻部门、最引人注目的是从学术界人士那里听到反对援助国民党、赞成与中国大陆有一个新的开端的意见。1949年在国务院举行的圆桌会议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赞成承认；外交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消息灵通人士进行民意测验时，投票的结果也是倾向于承认的。虽然普遍性的民意测验并不赞成承认，但其结果明白表示了对蒋介石普遍的厌恶以及停止援助其军队的愿望。在国务院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对由报刊编辑、评论员以及各方面知名人士参加的关于对华政策的全国性大讨论的分析，表明了一种把承认作为不可避免的事加以接受的倾向。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外交关系也许不是一种特别称心的政策，但愈来愈多的人——国务院认为这部分人是“最有发言权的”——认为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现实的政策。③

于是，艾奇逊认为在国内对他的对华政策没有大的阻力，而有相当的——说得留有余地些——支持；而总统所依赖的正是艾奇逊的建议。艾奇逊急于同国民党切断关系，他发觉这是一种普遍一致的意见：国民党是不可救药的，美国在任何情况下也不

① 这位国民党要人是中宣部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董显光。见《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6卷，第343—344页。

② 这是1950年1月17日的事，见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532—533、536—537页。

③ 中国处的杰拉尔德·斯特赖柯在一份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总结了圆桌会议的结果、无任所大使杰塞普对30位远东问题专家的意见征询以及报刊舆论，见《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155—160页。

应当去试图拯救它。他希望与中国共产党人关系正常化，但又发现尚处在对前景难以逆料、政策举棋不定的状况；同时他又感到，愈来愈多的人承认，他所希望的事态发展是必定会到来的。一个公开的反对派别无疑仍然存在，有时还是慷慨激昂的，但艾奇逊认为它人数不多，而且是那个一贯反对杜鲁门政府政策的集团的一部分。至于说到民意，艾奇逊对它没有多加注意，他认为一旦时机到来，他能够说服人民默认政府认为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行动。^①

英国的态度无疑也对艾奇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英国人诉诸艾奇逊在外交事务上的现实感和理智。艾奇逊无论如何是一个出名的亲英派，他认为伦敦对于共产党人接管中国的反应，比他的同胞们常常是感情用事的反应更切合实际。国务卿同样欣赏英国在中国的卷入程度，并尊重伦敦保护其在香港的投资和地位的需要。艾奇逊就任国务卿后不久，便开始与英国驻美大使奥列佛·弗兰克斯爵士举行经常性的秘密会晤，商讨“我们看到正在产生的任何国际问题”。因此，艾奇逊与英国对华政策的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熟知伦敦为承认中共所提出的种种理由。^②

艾奇逊本人把承认政策看作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措施，而不是借以表达道德批评的办法。在政策设计处、远东司、中国处的支持下，艾奇逊断言，不应把承认看作是一种政治武器。1949年9月，就在期待中的北京共产党政权建立前几天，艾奇逊在纽约在泛美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他的表示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于西半球经常发生的事件的，但其中对中国含蓄的示意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艾奇逊强调说，给予承认在实质上是表示承认事实，并坚持认为：“我们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首先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星球上，相互间必须做生

① 《未定之秋》，第50—51页。

② 艾奇逊：《参与创世》，第323页。关于英国对美国态度的看法，英国驻华盛顿公使米勒爵士对艾伦·格利芬指出，“英国人已经抛弃了条约口岸时代的想法，而且比从未占有条约口岸的人〔美国人〕更加通情达理。”

意。我们在一个外国建立使馆并不表示赞同该国的政府。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得到一个渠道，借以处理必要的政府关系，并保护美国的合法利益。”^①

既然承认只被看作一种促进国际对话的工具，美国官员便认为没有必要匆忙采取行动。国务卿明白，共和党反对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总统对此也踌躇不决，因此，他宁愿推迟与北京进行实质性的接触。国务院认为，一旦产生麻烦，国会和公众是可以被骂馭的，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挑起对抗。只要台湾的流亡政府在中共攻击下垮台了。共和党人和院外援华分子也就不能再提出异议了。当民主党人在未来大选中可能遭到政治毁灭这种威胁不复存在时，有的是给予承认的时间。

不仅如此，中国的状况仍然是动荡不定的，国务院对于共产党人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能妥协到什么程度依然心中无底。官员们在9月断定，“暂不予以承认将〔不〕是一件会产生如此严重后果的事，以致明显影响新的共产党政府的稳定，或者能为达到比较广泛的目标提供一个有效的槓杆。”尽管如此，美国仍应试图“尽可能取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于是，华盛顿在10月宣布了三项标准，他期望中共达到这些标准，以便有资格得到承认。这个政权应当（1）对它声称治理的领土实行有效的控制，（2）承认其国际义务，（3）其统治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意。官员们指望，共产党欲得到美国承认的愿望将足以使他们去符合上述要求，即便党的领袖已经宣布，鉴于存在中美条约中的不平等规定，他们打算废除这些条约。1950年8月，国务院发现，中共不但取得了广泛的合作和彻底的控制，而且继续毫不动摇地宣布废除其国际义务。国务院意识到，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的商务和政治协定在所必变，于是降低了它的承认标准。艾奇逊在旧金山公

^① 《纽约时报》，1949年9月20日第18版。艾奇逊9月讲话后不久，丘吉尔以十分相似的语言对议会说：“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不是为了表达敬意，而是为了得到便利。”不出两个月，英国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福利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声称，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完全取决于中共对待美国在华代表和民间人士的态度。在国务院出版物上刊登的英国驻印度大使4月的一次讲话中，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否认推迟承认与北京政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任何关系，并且用中共有可能比较容易接受的语言，对美国提出的中共国际义务的定义作了重新解释。华盛顿希望中国人“以经过一百年国际交往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国际惯例所规定的方式对待美国侨民”。这样，随着台湾陷落的临近，国务院在向排除承认的其他障碍前进。既然援助国民党人这一使中共和美国政府敌对的根源即将消失，美国人在中共统治下得到更好对待的前景看来是大有希望的。^①

国务院希望，与中共关系正常化将促进中共与苏联之间的摩擦，这种希望同样允许有一个逐渐朝承认发展的时间。中苏分裂不会在最近的将来发生，然而艾奇逊相信，它必将发生，而美国应当对此有所准备。于是国务院调配力量用于对中国共产党和铁托主义进行比较，甚至把卡博特从贝尔格莱德调往上海，以便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观察家在实地考察。当毛泽东1950年2月与斯大林进行谈判时，国务院在报刊上编造了一些故事，借以强调苏联是帝国主义。美国官员在讲话中一再把中共称作傀儡，指望他们会因感到羞愧而表现出反俄的民族主义。^②

与此同时，艾奇逊设法避免使中美紧张关系升级。他赞同让美国的实业和宗教事业留在中国，因为他们提供了与中国共产党人

① 艾奇逊1950年3月15日在加利福尼亚公共福利俱乐部的讲话稿，见《美国对亚洲的政策》，第56—60页；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的讲话，见1950年4月10日《国务院公报》，第565—566页。其实，早在1949年9月，中国处和远东司就断言，承认的唯一基本条件是确定外国在华侨民的权利并弄清外人在华财产的状况。“承认上届政府的国际义务”应“在可能范围内”加以寻求。在11月与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重新讨论前的政策回顾中这一观点又被提出，见《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168页。

② 关于把中国共产党人称作傀儡，雷蒙德·佛斯迪克指出：“根据所有的报告，中国人对于说他们从属于俄国这个问题是敏感的。我们就要运用我们掌握的一切办法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进行交往的非正式渠道。它们也在一个小范围内表明，与美国的关系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国务卿还拒绝了这样一种诱惑，即把中共违反国际上接受的行为方式视为结束与他们的一切交往的日实。当院外援华分子和批评政府政策的共和党人要求美国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人时，艾奇逊坚决反对这种对内战的干涉。正如国务卿告诫参院外交委员会时说的：“福摩萨岛本身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不是个大问题，但如果由于我们试图要对中国做的事把这个问题搞乱了，使之发生了变化，受到了干扰，那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换句话说，艾奇逊不允许由于在台湾的某些愚蠢的冒险行为，把“中国历来就有的仇外倾向”从针对俄国转移到针对美国。更为重要的是，当着与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尚有可能达成妥协时，他没有建议美国与蒋介石一起到中国沿海的那个小岛上去吃败仗。

中国不会像前些时期的美国人所寻求的那样成为盟国，然而艾奇逊认为，避免使中华民族成为美国毫不含糊的敌人还是有可能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华盛顿必须把自己从蒋介石的包围中解脱出来，并且——如艾奇逊对参议员们所说的——“尽其所能把〔中共〕同莫斯科分开”。因为，艾奇逊评述道，“不论是谁管理中国，即便是魔鬼本人管理中国，只要他是一个独立的魔鬼，就比他是一个莫斯科的傀儡不知要强多少。”^①

于是，通过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可望达到一系列目标。它将使华盛顿改善其在亚洲的形象，并使英美之间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可以促使中国铁托主义的发展，或者至少可以增强中国共产党内的温和分子。承认意味着正常的相互交往，从而萌发人们对扩大贸易和美国实业家在中国市场上不断发展的作用的期待。传教士们也预见，一旦正常关系消除了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紧张状态，他们的继续活动是有可能的。而首要的是，承认意味着美国将不会同中国人民失去联系

^①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世界形势评论》，第273页。

而与人类的1/4相隔绝。

然而要实现上述目标是不容易的，杜鲁门政府因此谨慎从事。无论总统还是国务卿都不想把承认问题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总的说来，中国对于美国是不重要的，因而没有理由去损害对欧洲的援助或政府的国内计划。只要在美国还有一个反对派——它可以选择蒋介石政权来替代北京——存在，杜鲁门和艾奇逊就会等待下去。当台湾陷落、尘埃最终落定的时候，他们会有充裕的时间来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并说服美国人民面对现实。

译自南希·塔克：《尘埃中的模式》（Nancy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纽约，1983年版，第173—194、305—318页。

任凡译

-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1950年6月25日朝鲜三八线上的枪炮声，不仅打破了黎明的寂静，而且也使美国与共产党中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任何现实的前景突然间统统烟消云散了。——译者

辛亥革命前夕和辛亥革命 期间的俄中革命联系和布尔什维克 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Е·И·恰普凯维奇

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1911—1913年)爆发已经过去70年了。辛亥革命和20世纪初的其他亚洲革命一样，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强权势力和封建压迫。尽管出于种种原因，这些任务未能完成，但辛亥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这场革命，中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辛亥革命意味着“中国旧式骚乱”的结束，国内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新的阶段的开始。1925—1927年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显著高涨，而辛亥革命则是这次革命的特殊准备阶段。

杰出的中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在表彰他的活动在革新中国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时写道：“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①

孙中山真诚相信，土地收归国有以后，中国人民必将走向社会主义，这一信念促使他在反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向国际社

① 《列宁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424—425页。

会主义运动寻求援助。基于这一点，他力图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建立联系。孙中山还密切注视第一次俄国革命事件，并通过他在日本创办的《民报》加以报道，号召自己的同志学习俄国革命者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经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也非常关注辛亥革命前夕和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国形势，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前景。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仅帮助中国革命者，且在俄国和国际舞台上动员社会舆论支持辛亥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反革命政策。

资产阶级史学界极力抹煞、歪曲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形成的俄中两国人民的革命联系的历史和内容。L·斯佩克特、M·伯纳尔、H·史扶邻虽然承认孙中山同俄国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曾有过接触，却丝毫不谈布尔什维克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只字不提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支持。^①D·普赖斯声称，在共产国际成立以前，俄中两国人民之间从未有过任何革命联系。^②

苏联史学界对俄中革命联系问题的某些方面已作出一定程度的阐述，其中包括：分析了1905—1907年革命对“中国的觉醒”的影响，阐明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者世界观的形成所起的作用，^③详细介绍了孙中山与民粹派Ф·В·沃尔霍夫斯

-
- ① 斯佩克特 (I. Spector)：《第一次俄国革命及其对亚洲的冲击》（纽约1962年版）；伯纳尔 (M. Bernal)：《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中国的革命第一阶段（1900—1913）》，（纽黑文1968年版）；史扶邻 (H. Schiffrin)：《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伯克利-洛杉矶1968年版）。
- ② 普赖斯 (D. Price)：《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2—5页。
- ③ 赫费茨 (А. Н. Хевфец)：《20世纪初叶俄中两国人民的革命联系》，载《历史问题》1956年第12期；丘扎江 (Л. С. Кюзаджан)：《论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年）对中国民主主义者的影响》，载《世界文化史通报》1959年第6期；图塔耶夫 (М. У. Тутасев)：《俄中革命联系的起源》（喀山1961年版）；克雷莫夫 (А. Г. Крымов)：《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1900—1917年）》，（莫斯科1972年版）；沃斯克列森斯基 (Л.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20世纪初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载《中国的社会发展探索》（莫斯科1979年版）；卡柳日娜 (Н. М. Калужная)：《〈明报〉——“同盟会”机关报》，载前引书。

基、Н·К·鲁塞尔-苏济洛夫斯基接触的情况。^①然而，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问题，只是在А·Н·赫费茨和М·З·图塔耶夫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因此，需要拿出新的材料，作补充研究。同时，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首先是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就辛亥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的评价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而Ю·М·加鲁什杨茨首先研究了这一问题。^②为弄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动员社会舆论支持中国革命方面的活动，就需要进一步研究旅居长崎、上海、巴黎的俄国侨民同中国革命阵营的代表人物的联系。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第一次俄国革命促使俄国无产阶级同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之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同俄国革命侨民之间建立了联系。中国工人参加了1905至1907年的中东路革命事件，上了一堂政治斗争课。М·К·维托什金根据赤塔委员会的指示于1905年11月组织的哈尔滨布尔什维克地下小组，不仅竭力把俄国人，而且还把在机车修理厂、林场、矿山、食品工业部门工作的中国人，吸引到罢工运动中来。^③К·В·苏霍姆林领导的满洲里车站党组织也很重视吸收中国工人参加革命斗争。^④哈尔滨党组织领导人之一Б·З·舒米亚茨基在回忆布尔什维克在中东路上的活动时写道：“我们不只是偶尔同中国工人进行联系，不是的，

① 齐赫文斯基 (С.Л.Тихвинский)：《孙中山的外交观点和实践》（莫斯科1964年版）；约西科 (М.И.ИОСЬКО)：《尼古拉·苏济洛夫斯基-鲁塞尔的生活、革命活动和世界观》（明斯克1976年版）；鲍罗赫 (Л.Н.Борох)：《孙中山的社会经济纲领的传统根源》，见《中国：国家和社会》（莫斯科1977年版）；尼基福罗夫 (В.Н.Никифоров)：《中国首批革命家》（莫斯科1980年版）。

② 加鲁什杨茨 (Ю.М.Гарущанц)：《列宁论人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载《亚非人民》1966年第3期。

③ 参看拉弗林 (В.А.Лаврин)：《米哈依尔·库齐米奇·维托什金》，载《苏联史》1967年第4期第106页；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24，目录1，卷宗346，第10页。

④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71，目录15，卷宗443，第11页。

我们是比较有计划地、经常地做他们的工作，不但努力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而且培养他们，使他们成为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王朝、争取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

中国人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领导的、为纪念1月9日彼得堡遇难工人而举行的1906年、1907年哈尔滨市大罢工。舒米亚茨基回忆说，中国阶级兄弟积极响应号召，支持俄国工人的行动。他写道：“占工厂工人近1/4的中国工人很快理解了我们的建议的意图，为了作出响应，他们高喊：俄国沙皇杀害俄国工人，我们不下活了。他们团结一致地扔下工作，成群结队地离开工厂，从而保证了我们罢工的胜利。”^①1907年11月24日，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委员会组织罢工，抗议第二届国家杜马审判社会民主党人代表时，俄中两国铁路工人又一次表现了团结合作精神。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帮助布尔什维克散发传单，把党的秘密出版物经大连港运往哈尔滨。^②中国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事件的影响下投身于阶级斗争，参加了斯基杰利斯基兄弟的木材加工厂以及面粉厂、啤酒厂和印刷厂的罢工。

后来，中国工人把中东路罢工期间所取得的经验应用于辛亥革命。舒米亚茨基说，1906至1907年间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受过政治教育并经过阶级斗争锤炼的、被中国政府强行调离中东路的中国熟练工人，领导了1911年湖北、四川两省的铁路工人运动。^③

1908年春，哈尔滨党组织遇到大搜捕，损失惨重。舒米亚茨基被迫离开哈尔滨，迁居西伯利亚。早些时候，维托什金也已离开那里。1911年春，即辛亥革命爆发前不久，在尼科尔斯科-乌苏

① 舒米亚茨基（Б.З.Шумицкий）：《在西伯利亚从事地下工作》（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161—162页。

② 苏联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323，目录1，卷宗889，第37、50页；俄罗斯联邦远东中央国家档案馆，全宗542，目录1，卷宗689，第79页。

③ 舒米亚茨基：《1905年和东方》（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第50页。

里斯克，布尔什维克党人再次遭到搜捕。^①布尔什维克同中国革命者的直接联系被破坏。然而，俄国和中国革命者却各自都在设法建立新的联系。1912—1913年间，加拉罕曾多次携带秘密印刷品，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潜往哈尔滨。^②可以推想，这位党的工作者，曾就读于东方学院的中国通，在辛亥革命期间来到满洲，这不仅仅是作为信使，而且还为了研究革命事件，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1913年夏，曾留学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孙洁^③从中国南方来到哈尔滨，设法与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联系。据俄国警方称，他同未被捕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进行了晤谈，并建议俄中两国社会主义者采取联合行动。他把北京大学教授王松里^④的接头地址交给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后，即返回南方。^⑤

辛亥革命前夕，俄中两国革命者在上海也建立了联系，在那里有将近30名俄国政治侨民。阿尔乔姆（即Ф·А·谢尔盖耶夫）就是其中之一。但据В·纳谢特金证实，除他本人和阿尔乔姆外，旅居上海的政治侨民中再也没有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了。^⑥从阿尔乔姆跟他的老朋友Е·Ф·梅奇尼科娃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同中国革命者有过交往。^⑦

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中俄两国革命者之间在日本建立了最广泛的联系，因为在那里有12500至14000名中国青年，^⑧其中许多人是仇视满清制度的革命者。很自然，他们与鲁塞尔-苏济洛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70，目录3，卷宗361，第62—63页。

②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1915年和1914年存档。

③④ 音译。

⑤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1913年存档。

⑥ 纳谢特金（В·Наседкин），《回忆阿尔乔姆同志》，载《革命之路》杂志（哈尔科夫）1925年第1期第89页。

⑦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9，目录1，卷宗12，第14—15页。可惜，我们从信中难以看出，阿尔乔姆到底同哪位中国革命者有过联系。

⑧ 波兹德尼耶夫（Дж.Позднев），《中国革命运动史片断》，载《新东方》杂志1922年第2期，第331页。

夫斯基博士所领导的长崎俄国侨民团的代表人物经常来往。这个侨民团的多数成员是社会革命党人，但其中有B·K·库尔纳托夫斯基^①和帮助布尔什维克的B·П·克拉尔克（在国内战争年代牺牲于外贝加尔）。孙中山和鲁塞尔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鲁塞尔以金钱、武器及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帮助中国革命者。^②这个老民粹党人十分赞赏孙中山的观点，对中国解放运动的任务也很理解和关切。他们建立了通信联系，并于1906年12月亲切会晤。^③

孙中山研究了鲁塞尔于日本用英文发表的《中国问题》一文，对作者天真地期望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能帮助中国新生这一点，进行了批评，同时，对他愿帮助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真诚愿望，则表示欢迎。1906年11月8日，孙中山给他写信说，“在西方代表人物中，我很少见到象您这样能为中国复兴和实际保证中国千百万受苦受难居民生存条件的思想主持正义的人。”^④而在中国推翻满清王朝，确立共和政体后，鲁塞尔于1912年3月1日致函孙中山，建议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加强同人民的联系，从政治上启发人民，建立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因为只有依靠群众，才能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写道，“亚洲各民族的未来取决于你们的成就，”因为他认为“中华帝国”的觉醒势必会动员东方其他各族人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⑤。

1906年俄国侨民在长崎创办了《意志报》。中国革命者也在该报上发表文章。它刊登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吴老南^⑥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了中国即将爆发的革命的任务，并对第一次俄

① 职业革命家，列宁的学生和战友。——译者

② 詹森（M. Jansen）：《日本人与孙中山》（坎布里奇1954年版），第24页。

③ 约西科：《尼古拉·苏济洛夫斯基—鲁塞尔的生活、革命活动和世界观》（明斯克1976年版），第254页。

④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318页。——译者

⑤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5825，目录1，卷宗199—A，第6、10页。

⑥ 这大概是中国著名女诗人、革命家秋瑾留日时的化名。1907年浙江省准备起义，结果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她被杀害。

国革命的意义作了评价。吴老南写道：“你们的革命不仅是民族的事业，而且具有国际意义。我们不得不各自在本国开创自己的工作，但愿我们的思想传遍全世界。正义必将取得胜利。”^①而《民报》也刊登了俄国作者Л·Г·杰伊奇、С·М·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П·А·克鲁泡特金的文章。^②

欧洲各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侨民团体也跟中国革命者建立了联系。据孙中山秘书陈友仁讲，同盟会的创始人1905年在巴黎结识了契切林，并就俄国革命问题彼此交换了意见。^③列宁总是千方百计地扩大收集中国情报的渠道。191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驻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情报局的代表И·Ф·波波夫向他报告说，驻布鲁塞尔的中国使馆为布鲁塞尔各报编辑部和一些热心的记者出版一份报导近东新闻的《每日通讯》，这是用打字机打印的发行量极有限的刊物。列宁便指示波波夫订阅这份通讯，并利用它所报导的事实为《真理报》撰写文章。^④

党的著名政论家М·П·帕夫洛维奇（韦尔特曼）^⑤跟中国

① 《意志报》1906年7月5日。

② 沃斯克列森斯基：《20世纪初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见《中国的社会发展探索》（莫斯科1979年版），第40—41页。

③ 丘扎江：《论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对中国民主主义者的影响》，载《世界文化史通报》1959年第6期第38页。

④ 波波夫：（И. Попов）：《列宁在布鲁塞尔》，见《回忆列宁》（莫斯科1960年版）第8卷，第108—109页。

⑤ 帕夫洛维奇（М. П. Павлович）于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回忆说：“党分裂时期，我仍跟孟什维克站在一起。不过，我对党内的意见分歧不感兴趣，除研究与国际政治和东方相关的事情外，其他概不过问。”（参见《格朗那特百科全书》第41卷第2册第106页）。库兹涅佐娃（Н. А. Кузнецова）和库拉吉娜（Л. М. Кулагина）列举一系列事实证明，他与孟什维克领袖关系并不密切（参见帕夫洛维奇：《为独立而斗争的东方》（莫斯科1980年版）第53页）。俄国警务厅国外侦探机关对此十分注意，报告称：“在孟什维克阵营中正开始出现对孟什维克主义（取消主义）领袖费多尔·古尔维奇、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德表示不满的分子，其中有普列汉诺夫和帕夫洛维奇，而帕夫洛维奇比其余的孟什维克分子革命情绪更高”（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1909年存档）。由于帕夫洛维奇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深，最后他终于倒向布尔什维克主义。

革命民主主义者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他是早期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关心中国的解放运动。他在自传里写道：“我在巴黎时，拜访过所有的东方革命者：青年土耳其派、波斯立宪党人、印度侨民、中国军官等等。我家里经常宾客盈门，有印度、波斯和中国革命者，经常跟他们讨论革命工作的计划，还帮助他们编写传单，为他们的报刊撰稿。”^①在辛亥革命期间，帕夫洛维奇同中国革命者始终保持联系。他一得到有关中国事件的消息，即转告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小组。《中国大革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篇专题报告提纲一直保存到现在。帕夫洛维奇在这一提纲中，向国外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阐述了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动力，介绍了中国革命阵营的阶级成分和党内的成分。他曾打算在南锡、列日和布鲁塞尔宣读这篇报告。^②

国外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还通过跟一些旅欧的中国解放运动代表人物的交往，了解中国事件。1911年11月22日，即辛亥革命正激烈进行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小组中央局成员契切林向列日发信，信中说：“敬爱的同志！请告诉我，中国人何时举办讲座？也许，他还将去其他城市讲演？他的讲演对谁有利？他会不会在巴黎举行专题报告？他同意到各小组走走吗？能听到中国人讲中国革命的情况……那是非常有趣的。当然，你跟他很熟，他持什么观点，值得为他组织专题报告吗？”^③

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秘密和公开的报刊上发表的大批文章，足以证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关注。布尔什维克作者所论述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背景、性质、动力和前景。据统计，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1至1913年间就这些问题共写了42篇文章和短评。其中首推列宁发表在《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上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

① 《格朗那特百科辞典》，第41卷第2册第106—107页。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276，目录2，卷宗348，第27页。

③ 同上：卷宗39，第90页。

的巨大胜利》、《中国的党派纷争》、《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在公开的弗拉基高加索进步报纸《捷列克报》上，基洛夫^①发表了12篇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署名C·斯米尔诺夫）。A·C·布勃诺夫在尼日戈罗德的布尔什维克公开的《伏尔加往事报》（笔名“艾科”和“埃”）上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章。在《一只自由的麻雀的随笔》和《国际纠纷》^②这两篇文章中，他号召支持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

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辟了“中国革命”专栏，专栏中刊登了B·Д·邦奇-勃鲁耶维奇的文章《觉醒了的巨龙》^③，C·M·纳希姆逊（П·萨林）的文章《社会主义的新胜利》^④，Л·M·米哈伊洛夫（波利季库斯）的文章《在中国皇帝的帝国里》^⑤，这些文章描述的是革命的背景和进程。布尔什维克的《启蒙》杂志刊登了米哈伊洛夫的长篇文章《建立在文明中心的大中华民国》^⑥。《真理报》也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材料——见之于列宁学派政论家H·H·巴图林、M·C·奥尔明斯基、Л·M·米哈依洛夫的国际评论文章。布尔什维克介绍辛亥革命的文章还见之于国外报刊。纽约的侨民社会民主党小组出版的《新世界报》登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H·H·纳科里亚科夫（笔名埃列尔特）的几篇文章，德国社会民主派的《新时代》杂志刊载了Φ·A·罗施坦的《国际金融资本与中国的政治》一文^⑦。

布尔什维克作者所发表的文章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政论性和

① 1911年6月至1912年4月间，基洛夫遭监禁，被迫停止活动。因此，他的政论文未能涉及辛亥革命的爆发。

② 《伏尔加往事报》1912年4月12、29日。

③ 《明星报》1911年10月29日（公历11月5日）。

④ 同上，1912年1月21日（公历2月3日）。

⑤ 《明星报》1911年10月28日（公历11月5日）。

⑥ 《启蒙》杂志，1912年第5—7期。

⑦ 《新时代》杂志，1912—1913年第1期，第627—639页。

宣传性，极力揭示中国所发生的事件的实质，阐明辛亥革命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布尔什维克把中国革命看作东方各国由于国内社会经济和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影响而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和诸如伊朗、土耳其当时所发生的运动一样，削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因此，布尔什维克政论家从中看到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力，把辛亥革命以及亚洲其他民族解放运动的表现，看作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一部分。列宁写道，“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已经走上一个新的、比以前高得无可比拟的阶段”^①。

列宁关于两股反帝斗争洪流相汇合的思想，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亚洲觉醒”过程的错误看法，是针锋相对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O·鲍威尔在阐述其观点时硬说：“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就其出发点和目的而论，与欧洲无产阶级的运动毫无共同之处。”^②他还否定说，20世纪初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其内容和客观任务来说，都是按这些国家以前的整个内部发展进程搞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列宁则指出，东方各国在“亚洲觉醒”时期所发生的革命，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欧洲所进行的那种资产阶级革命。列宁对辛亥革命的内容所作的分析表明“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③

列宁密切注视中国解放运动的发展，1908年就能指出它不同于义和团起义的新性质。他的结论是，第一次俄国革命后，中国解放运动势必会超越中国旧式的骚乱的框框，带有自觉的民主运

① 《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68页，第15卷第156页。

② 鲍威尔（O. Bayop）：《近东和远东的革命》，载《知识通报》1912年第2期，第143页。

③ 《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卷第153页。

动性质^①。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性意义，因为鲍威尔、海德曼及其他一些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没有看到辛亥革命与中国以前的反帝运动的本质区别，认为这些全是中国传统的排外思想的产物。鲍威尔断定，中国的革命都“带有民族传统，发泄中国人对满族外来统治的世代仇恨，表露出各省的离心倾向以及对洋人的仇恨”^②。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只注意辛亥革命的这一方面，而没有抓住其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方面。布尔什维克则把1911—1913年革命视为社会革命，且对其根本的社会经济前提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论界认为，满清王朝专制制度的存在是中国民族运动的根源。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专制制度理解为超阶级的现象，试图只从分析国家制度入手来解释辛亥革命的起因。研究中国历史的昔日民意派人物波波夫写道：“中华帝国的国家制度孕育着腐败的种子，为革命、变革、推翻王朝创造了适宜的土壤。在实行这种国体的国家里，君主、统治阶级同平民百姓之间必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③持这种观点的有Н·С·鲁萨诺夫（库德林）、Л·加利倍尔施塔德、К·魏德缪勒^④，他们虽然承认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加剧了满清王朝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但仍然没有弄清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第二国际的许多活动家对此也一无所知。鲍威尔声称，“当前东方的革命运动”——也指辛亥革命，“是两股完全相反的潮流的汇合，即受欧洲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运动同仇视欧洲新事物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9页。

② 鲍威尔：《近东和远东的革命》，载《知识通报》1912年第2期第147页。

③ 波波夫：《从天朝帝国走向中华民国》（莫斯科1921年版），第26页。

④ 库德林（Н.С.Кудрин）：《中国的觉醒》，载《俄国财富》杂志1909年第10期；库德林：《国外生活评论》，载《俄国财富》杂志1911年第10期；库德林：《国外生活评论》，载《俄国财富》1912年第9期；加利倍尔施塔德（Л.Гальберштадт）：《中国革命》，载《俄国思想》1911年第11期；魏德缪勒（К.Вейдемюллер）：《长城的崩溃》，载《现代世界》杂志1909年第1期；魏德缪勒：《伟大的中国革命》，载《现代世界》杂志第11期。

的群众的反动运动的汇合。”^①海德曼和帕尔乌斯也没有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就把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归于中国人对外国强权势力和满清王朝压迫的不满。^②同时，他们过于夸大日俄战争中俄军失败的意义，而没有弄清第一次俄国革命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列宁则与他们不同，认为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既反对整个封建关系体系，又反对作为专制制度社会支柱（包括汉族地主和满族地主）的整个地主阶级。他指出：“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③有鉴于此，列宁认为辛亥革命的基本原因，就是千百万农民群众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④

邦奇-布鲁耶维奇、米哈伊洛夫、纳科里亚科夫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纷纷发表文章论述辛亥革命的起因，赞同列宁的观点。1912年3月17日《工人报》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中国革命》，着重指出皇帝专制制度是国家前进的阻力。文章认为，“亚洲的专制主义阻止了发展国家生产力的一切可能性，阻断了一切事物前进的道路，那怕是微小的进步。官僚的横行霸道，贪污受贿，横征暴敛，这一切不仅压迫、激怒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阻碍了国家的一切经济发展。”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经济整个发展进程所激发的辛亥革命，将不仅摧毁满清王朝，而且摧毁其支柱——封建制度。

① 鲍威尔：《近东和远东的革命》，载《知识通报》1912年第2期第143—144页。

② 海德曼：（H.M.Hyndman）：《亚洲的觉醒》（伦敦1919年版），第82—85页；帕尔乌斯（Parvus）：《一则中国新闻》，载《新时代》杂志1908年第1期，第872—877页，第923—930页。

③ 《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卷第154页。

④ 同上，第156页。

布尔什维克政论家指出，满清政府接受国际资本的贷款，为国际资本提供铁路租让权及其他租让权，实质上是在推行损害中国主权的反民族的卖国政策。早在1905年，卢那恰尔斯基在谈到外国在华资本的地位日渐强化这一问题时就指出，列强的对华政策势必会导致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①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成革命，布尔什维克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掠夺政策。罗特施坦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国际财团的形成，列强的对华奴役手段，即对华的殖民掠夺方式，日臻完善。^②

阿尔乔姆亲眼目睹外国在华资本主宰一切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他从上海写信给梅奇尼科娃指出，外国资本的入侵导致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促使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外国资本一面为在落后的中国发展大工业和增强民族资产阶级创造条件，一面却在遏制力图在本国占据经济和政治统治地位的民族资本的确立。阿尔乔姆写道：“中国已经有自己的资产阶级……自廉价的欧洲商品破坏中国工业之日起，无固定职业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已成为一支经济上暂时还在受中国资产阶级剥削的俯首听命的大军。不过，只有在社会生活发生冲突、资产阶级利用它时，这支大军才对资产阶级表示顺从……。中国人民难以安分守己，因此他们经济地位不稳定。摧毁旧事物，要比在其废墟上建立新事物快得多。”^③因此，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的另一原因是，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同勾结满清王朝剥削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之间的矛盾。考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论是，辛亥革命客观上不仅是反封建的，而且是反帝国主义的。

.....

① 卢那恰尔斯基 (А. Луначарский)：《日本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民主制》，载《无产者报》1905年8月3日（公历16日）。

② 《新时代》杂志1912—1913年第1期，第627—639页。

③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9，目录1，卷宗12，第9—10页。

尽管资产阶级史学家否认布尔什维克对辛亥革命的支持，然而历史事实却彻底驳倒了这一看法。布尔什维克对辛亥革命所采取的这一态度，有助于俄中两国人民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紧密的革命联系。

译自《历史问题》1982年第10期第31—46页。

吴永清 译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对新疆的影响

(20年代至30年代初)

A·A·哈基姆巴耶夫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土耳其斯坦有许多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和东干回人，他们主要是来中亚细亚谋生的贫民。那些年，他们去那里的人数超过20万。^① 新疆贫民在家乡备受中国当局的压迫，维吾尔人和东干回人迫于贫穷与饥饿，离乡背井，到土耳其斯坦谋生。在土耳其斯坦，他们大多是在煤矿、矿场、轧棉厂、榨油厂里干粗活，或者当摘棉收稻的季节工。

来自新疆的人同土耳其斯坦的劳动人民经常交往，这有助于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理解俄国的革命运动。在土耳其斯坦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维吾尔人和东干回人同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根据土耳其斯坦共产党的倡议，1918年在塔什干成立了外国侨民委员会，匈牙利、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战俘的代表，移居土耳其斯坦苏维埃共和国的阿富汗人、印度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维吾尔人、东干回人等亚洲各国侨民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② 遵照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地方党组织在外国人中间进行了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把他们团结到阶级组织中来。由于先进的维吾尔人和东干回人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其中的

① 据某些文件记载：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移居中亚细亚的维吾尔侨民有70万（见《贫民呼声报》，阿拉木图，1922年8月17日）。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乌兹别克分院党务档案馆，全宗617，目录34，第7页。

许多人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1919年在塔什干建立了“维吾尔人同盟会”，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对新疆侨民开展了广泛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

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央十分关心中国侨民的组织。土耳其斯坦党中央在给地方党组织的信中指出，移居土耳其斯坦的喀什地区和准噶尔地区^①的被压迫人民是愚昧、落后、无组织的群众，需要组织起来。^②。为此，建议在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广泛开展工作，成立新疆劳动侨民的联合组织。1919年，在安集延、马尔格兰、布哈拉、浩罕、贾尔肯特、阿拉木图、阿什哈巴德等地，成立了“维吾尔人同盟会”区、州、县的组织，它们的任务是团结来自新疆的工人、手艺人、手工业者，在他们中间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

“维吾尔人同盟会”的成立，对劳动侨民的无产阶级觉悟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后来，同盟会内部建立了党组织。1921年4月，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5个州内共有648名维吾尔人和东干回人共产党员。“维吾尔人同盟会”中央的党小组在非党劳动侨民中做了大量政治教育工作，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他们出版维吾尔文的书籍和报纸。

1921年6月，在塔什干召开了“维吾尔人同盟会”第一次全土耳其斯坦代表大会。^③大会听取了关于同盟会的纲领和机构的报告，确定了同盟会的任务，选举了由9人组成的同盟会中央委员会，还推选A·罗泽巴基耶夫（维吾尔人）和马桑奇（东干回人）为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大会决定在“维吾尔人同盟会”的组织中普遍建立共产党支部，并提出如下任务：团结来自喀什地区和准噶尔地区的全体劳动人民，在他们

① 喀什地区即新疆南部，准噶尔地区即新疆西北部。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乌兹别克分院党务档案馆，全宗617，目录5，卷宗255，第6页。

③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乌兹别克分院党务档案馆，全宗6，目录5，卷宗50，第5页。

中间进行政治启蒙工作，培养维吾尔人和东干回人的宣传干部和组织干部。在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指出，“同盟会的宗旨是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

“维吾尔人同盟会”各级组织所建立的喀什-准噶尔党小组，相当于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央少数民族分局的党小组。^①各个党小组还建立了外围共青团组织。对青年的教育和学习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维吾尔人同盟会”中央的党小组制定了关于在共产党员和非党喀什人与准噶尔人中展开工作的计划。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同吸引劳动侨民参加社会活动、参加苏维埃经济建设，即同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活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根据一些返回家乡的“维吾尔人同盟会”会员的倡议，在新疆也建立了这个同盟会的分会。然而，由于警察告密，这些分会被中国当局勒令解散，领导人惨遭杀害。因此，正象土耳其斯坦一家报纸所指出的，“1000万中国籍南疆维吾尔人对革命运动不得不袖手旁观”。^②

苏维埃政府对移居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维吾尔人和东干回人做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同时又严格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下面的事实就是这方面的例证。1921年，应新疆地方当局的请求，一支红军部队为肃清白匪军开进新疆境内。当时，一些地方势力的代表，产生了在新疆建立独立的喀什-准噶尔共和国的想法。他们征询莫斯科的意见，请求全俄中央执委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外交事务人民委员Г·В·契切林在1921年6月17日给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Я·Э·鲁祖塔克的回电中指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赞成上述想法，认为它不符合苏维埃俄国和中国革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乌兹别克分院党务档案馆，全宗6，目录5，卷宗50，第30—33页。

② 《援助报》，阿拉木图，1919年4月29日。

命运动的利益。回电指出：“鉴于我们对中国实行一般友好的政策，以及我们期望中国实现民主，我们应当努力同中国当局保持睦邻关系。”^① 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不侵犯中国的领土，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遵循的对华关系的两项最重要原则。

20年代初期，莫斯科的华人组织和中亚细亚的维吾尔人组织之间进行了接触，并就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宗旨问题交换了意见。1921年春，俄共（布）中央所附中国共产主义者莫斯科中央组织局写信给移居塔什干的新疆维吾尔侨民，信中强调指出：

“同志们，我们应当联合我们的力量……矛头对准一切资产者，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拿起武器，把他们从可爱的祖国驱逐出去。”^② 稍晚些时候，移居塔什干的新疆侨民共产主义者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组，内称：“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是移居土耳其斯坦的喀什和准噶尔的共产主义者，代表数百万被压迫的新疆人民，欢迎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为目的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全世界凶恶的敌人都反对这一运动。我们喀什和准噶尔的共产主义者声明：我们准备为解放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而斗争，并将与中国的革命者并肩战斗。”^③

苏联共产党人不赞成单独组织中亚细亚维吾尔侨民的共产主义运动，不赞成这一运动摆脱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尝试曾经有过，如1922年4月，一些维吾尔族的党员干部都曾通过“维吾尔人同盟会”的党支部建议，在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央领导下建立中国（实际上是维吾尔族人）党小组的中央执行局，这实质上意味着以维吾尔侨民为主成立一个特别的中心机构。但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没有接受这一建

① 赫费茨（А.Н.Хефetz）：《1921—1927年苏联外交和东方各族人民》（莫斯科1968年版），第129页。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乌兹别克分院党务档案馆，全宗60，目录5，卷宗50，第2页。

③ 同上，目录1，卷宗6，第55页。

议。^① 这些干部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坚持这样做，特别以推动新疆的革命运动为由，强调这样做的必要性。然而，这项建议始终未被采纳，因为它有悖于统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苏联共产党人通过专为中亚细亚维吾尔人出版的报纸，宣传了中国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宣传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为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压迫下解放国土而共同奋斗的必要性，并指出，离开中国共产党，单独组织新疆当地民族和中亚细亚新疆侨民的解放运动，是不妥当的，况且新疆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很低，单独开展新疆民主革命运动是有困难的。苏联共产党人还揭露了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反动性，阐明了这些思想对穆斯林国家民族运动的危害性。

1925—1927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这种宣传大大加强。维吾尔族及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渴望民族解放，这是与全国范围内革命的胜利密不可分的。有一篇文章写道：“假如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政权，并将由中华民国宪法加以巩固，那么，维吾尔地区就会开创一个新的、光辉的时代。维吾尔地区的解放无疑是与45000万中国人民的解放密切相关的。维吾尔地区的弟兄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并为自己得出相应的结论。”^② 在另一文章中强调指出：“只有中国的工农革命才能帮助维吾尔人。当中国工农掌握政权的时候，维吾尔人就会象俄国东部民族那样得到解放。”^③ 这样一来，20年代中亚细亚维吾尔侨民争取新疆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斗争，就同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了。苏联共产党人和苏维埃政府坚持了这一国际主义路线。

新疆侨民亲眼目睹并参与了伟大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东方各共和国的变革。他们返回故乡的时候，带走的是解放的思想，谈

① 《贫民呼声报》，1922年8月17日。

② 《贫民呼声报》，1925年3月27日。

③ 同上，1927年5月23日。

论的是以前受压迫的各民族劳动人民在苏维埃国家里怎样生活的情形。新疆人民看到，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各族人民摆脱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之后，走上了自由生活的道路，建立了自己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给流落苏联境内的维吾尔族和东干回族劳动人民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政治斗争课。这一切在30年代至40年代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得到了反映。

译自《历史问题》1982年第10期，第173—175页。

韩世滋 译

赤色职工国际与全苏 工会中央理事会的 第一个访华代表团

О·Б·戈罗多维科娃

1925年，掀起群众性反帝运动高潮的上海五卅事件，在整个进步人类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支援中国人民的强大运动的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国际工人救济会曾给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以巨大的援助。当前的一些著作完全足以说明积极帮助中国工会运动组织的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活动。这些著作指出，赤色职工国际自1921年成立时起，就通过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形成给予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从1925年5月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时候起，就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在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的一些会议上及其支部里，定期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问题。赤色职工国际及其最大的支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曾不止一次地向国际无产阶级呼吁，号召对中国革命给以最大的支持。此外，为了直接了解工人运动的状况并同它建立友好的联系，赤色职工国际向中国派遣了一系列代表团。1925年7—9月，赤色职工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曾到中国访问；1927年，由赤色职工国际发起，国际工人代表团在中国逗留5个月，了解了工人、农民和工会运动的状况。在制定中国工会的经济罢工总纲领及其斗争策略方面给予帮助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1927年6月）的工作。

本文对赤色职工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第一个代表团

于1925年7—9月访问中国进行了研究。许多研究著作^①发表和使用了代表团的报告^②，在上海事件最严重的关头，代表团的行动，显然值得重视。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与中国工会建立直接接触的第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代表团给予中国工会领导的具体帮助，以及它对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分析，无疑是重要的。

1925年6月初，中国工会向英国工联呼吁，要求其政府撤退参加上海五卅屠杀的英军，要求英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英国工人代表团访华。

对屠杀上海五卅游行示威群众表示抗议的苏联工会，也受到同样的邀请。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接受了邀请，并把这次访问看作是苏中两国工会运动实际接近的重要步骤。^③为了使中国年轻的工人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相互接近，代表团负有建立苏联工人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联系，以及使中国工人运动加入各国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使命。因此，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在6月底的会议上，决定让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兼作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有工会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和全俄金属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И·И·列普谢、远东地区工会委员会主席М·А·布里斯金、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主席Ю·Д·斯穆尔吉斯。

代表团于1925年7月11日离开莫斯科，迄至9月17日均在中国。^④在代表团快到达的时候（7月底），中国出现了反帝运动的低潮，尤其是上海的反帝运动低落了。6月19日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省港大罢工

① 见尤里耶夫：《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莫斯科1968年版；奥谢特罗夫：《苏联人民与革命的中国（1924—1927年）》，莫斯科1967年版，等等。

② 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的预备报告：《关于中国、日本工人阶级的地位及其工人运动的状况》，莫斯科1926年版；第一个苏联工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报告：《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工人中国》，莫斯科1927年版。

③ 见1925年7月12日《劳动报》。

④ 见1925年9月17日《劳动报》。苏联代表团应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的邀请，随后访问了日本。

对上海的援助实际上只表现在精神上的声援。上海工人仍继续进行几乎没有同盟者的斗争，在这以前，支持他们的只有学生。

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北京，代表团仅作到了同在非常严重局势下工作的某些工会领导人建立接触，根本谈不到访问北京的基层组织。

在上海，代表团给了中国工会以最实际的帮助。代表团的成员目睹了上海总工会精力充沛的工作，它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政治上领导了工人的斗争。代表团访问许多工会，参加了一些会议和集会，还考察了发放罢工津贴的委员会。

到总罢工的第二个月月底以前，罢工浪潮开始低落。商人于6月25日停止罢市。被孤立的危险威胁着上海的工人阶级。最初支助罢工经费的爱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久拒绝了给罢工者以物质援助。在罢工的7个星期内，由总工会所募集的180万元（大洋）经费中，据代表团的材料，资产阶级的捐款额不过10%，每个罢工工人平均只得1元左右。^①

8月初以前出现的局势迫使上海总工会逐渐后退。8月10日，在加入总工会的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上，详细研究了各项条件（主要是文件中作为“九项最低条件”的著名的经济要求），由于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上海总工会才同意复工。代表团认为，在这种局势下，主要的任务是保存实力，不使运动夭折，显然，代表团的建议对复工的决定起了作用。

上海工人兴高采烈地欢迎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第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的到达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有力表现。中国工人真正感到了全世界工人，首先是苏联工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力量。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在欢迎代表团时，表达了中国工人的共同的心情，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工人运动所给予我们的支持，使我们增加了新的力量，在

^① 见前引《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工人中国》，第31页。

艰苦的斗争中使我们更加坚定”。^①

赤色职工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向中国工人通报了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和国际工人救济会为支援中国工人的民族解放斗争所采取的措施。6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及少共国际的领导号召世界无产阶级支援中国工人的斗争，并发起与中国工人团结的国际运动。^②

6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向第二国际及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提议，“……组织起来给中国工人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合援助”，^③一致举行募款运动及援助中国工人之集会，并建议召开援助中国人民之国际会议，以讨论援助之办法。此外，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还以国际工人救济会中央的名义向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发出了信件，正式建议参加支援中国的运动，并成立支援总委员会。^④

然而，国际革命组织的这个倡议遭到了来自改良主义者方面的误解和公开的抵制。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领导人拒绝援助中华全国总工会，推说“对中国局势认识不清，消息闭塞，财政状况不稳”。^⑤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之所以拒绝向中国派遣代表团，是基于“工会运动只对政治安定的国家蓬勃发展的建设性运动感兴趣，目前中国还没有这种安定的局面，因此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不准备派代表团去中国”。^⑥中国工人确信，不仅“本国的”资产阶级而且改良主义工会的领袖们也拒绝了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

中国工人向转交支援罢工工人大笔捐款的苏联工会表示感

① 见前引《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工人中国》，第30页。

② 见《劳动者在同反动势力进攻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1925—1927年）》，莫斯科1959年版，第68页。

③ 《国际工人运动》，1925年6月25日第14期，第23页。

④ 见1925年6月21日《真理报》。

⑤ 见1925年7月11日《劳动报》。

⑥ 转引自阿季别科夫：《赤色职工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史纲要）》，莫斯科1971年版，第83页。

谢，这一大笔捐款是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总开支的1/5。^①

代表团离开上海到广州。那里从6月^②19日起，开始举行支援上海战斗无产阶级的团结大罢工。在广州，代表团已有可能参观铁路工厂、罢工工人宿舍和食堂，以及访问从广州通往新设计的黄埔港的筑路工地（在那里干活的约有3000名罢工工人）；代表团出席了20多个不同派别工人组织的一些会议。代表团以特殊的兴趣了解了罢工委员会的活动。

中国工人对待赤色职工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极其热情，亲如兄弟。他们对苏联与国际工人运动很有兴趣。罢工委员会为欢迎代表团的到达，举行了工人自卫队检阅式，召开了特别会议。在会议上，代表团团长列普谢发表演说，他谈到了各国劳动者对中国革命的支援以及俄国工会运动的一些教训和经验。在会议上发表演说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③代表广州工人热烈欢迎代表团，他着重指出，在反帝斗争的严重关头，苏联工人的代表来到中国的事实本身“证明，国际工人的团结不仅仅存在于书本和宣言，而且也存在于实际”。^④苏兆征请代表团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赤色职工国际转达罢工工人兄弟般的敬意，他说，“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赤色职工国际和我们在一起。其他各国的工人都知道，我们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由于他们的支援，对我们来说，包围我们的危险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在消失。我们深信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国家的团结，这个信念正在推动着我们前进。”^⑤

代表团在广州逗留之后返回北京。代表团在离开中国前，向中华全国总工会递交了一封信，对兄弟般的接待和所给予的协助深表感谢。信中还谈到，“代表团由于亲眼所见，所以确信年

① 见前引《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工人中国》，第41页。

② 原文为7月。——译者

③ 代表团称委员长刘少奇，但未见其他史料证实这一点。

④ 1925年10月30日《劳动报》。

⑤ 同上。

轻的中国工人运动巨大的成就。中国无产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而奋斗。”^①

1925年10月16日，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听取了代表团的报告。^②代表团成员向执行局汇报了关于中国工人的经济和法律地位、上海及中国其他城市罢工运动的发展、中国工会的工作。代表团在报告中援引了中国工会运动蓬勃发展和政治上成熟的大量事实。

从五月事件开始，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证明了其阶级意识的增强以及工人阶级巨大的组织能力。例如，上海工会人数的增长证明了这一点。1925年初，工会人数计有七、八万人，^③6月总罢工开始，计有28万人，甚至在9月下半月上海总工会停止活动以后，各工会还联合了大约20万人。^④

代表团在指出年轻的中国工会运动的这些积极的方面时，对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所作的估价与中共当时领导人的估价不同，他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已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及“核心”。

代表团认为，“工人阶级已成为政治上的一个团体”，^⑤在反帝运动中未来的前途“预示着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⑥尽管如此，但代表团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只是“正在逐渐地成为先锋队”。^⑦代表团同时指出，由于许多情况（工人运动的年轻以及某些主观上的原因），中国工会运动当时还处于“形成时期”。^⑧工会组织掌握很少一部分最有觉悟的工人；中国工人运动“在组

① 1925年9月22日《劳动报》。

② 见《国际工人运动》，1925年9月5日第33期，第14—15页。

③ 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1979年版，第130—134页。

④ 见前引《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工人中国》，第83页。

⑤ 《国际工人运动》，1925年9月5日第33期，第14—15页。

⑥ 同注④，第151页。

⑦ 《国际工人运动》，1925年9月5日第33期，第15页。

⑧ 见前引《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工人中国》，第87页。

织方面还没有形成正规的和系统的工会”。^①

虽然中国有完整的工业部门（如采矿），但在这些部门中工人们实际上没有联合为工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缺乏按产业原则联合起来的工会联合会。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如代表团所指出的，工人群众还远远没有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按代表团的意见，纺织工人、搬运工人以及缺乏熟练技术的其他各类工人为罢工工人的主力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代表团指出，中国的革命工会运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缺点是，存在着大量未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会。仅在广州一地就有93个这样的联合会。^②

在吸收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显然也搞得不大好。1925年2月，上海总工会总共只有100来个党员，到5月底以前，总共才有200多个党员，6月底以前（如前所述，在大约有28万工人罢工的时候），党员总共只有800人。省港大罢工开始以前，在各工会里工作的中共党员不过10人，而在8月底，党员不过50人。在代表团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实际上有可能更顺利地进行工作，但是，“党故步自封到这种地步，搞成了类似一个宗派……”^③

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在听取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同意代表团的工作，同时指出，代表团的工作有助于同中国工会运动建立直接接触，并使中国无产阶级参加国际工人运动。^④

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在关于中国工会的任务的宣言和决议中，对工人阶级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坚定性和顽强性给予应有的评价，同时强调指出，对工人和工会运动问题必须更加详细地研究。执行局指出，工会应当捍卫中国工人阶级

① 见前引《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工人中国》，第87、149页。

② 同上，第80页。

③ 1925年10月17日《劳动报》。

④ 见《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关于中国与日本工会任务的决议》，载《国际工人运动》，1925年11月12日第34期，第21—23页。

日常的经济利益和正当的利益。决议指出，虽然五卅运动使中国工人的最广大的群众行动起来了，但是，工会“整个说来，没有达到其迫切的经济要求……”^① 执行局认为，由于工人严重的物质状况，最近时期将是中国无产阶级大批发动的时期，因此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要领导这些发动并帮助工人提出这些要求。

执行局认为斗争能否胜利，取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为此指出必须加强工人的政治组织，以及中国工会运动的统一。执行局还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慎重对待按行会、同业工会和同乡会特点建立起来的一些小组织（即在形式或思想方面落后的工人联合会）。按执行局的意见，为了及时防止国内建立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并行的工会运动中心（这个中心无疑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具），^②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建议中华全国总工会要在进一步扩大工会队伍方面进行工作。执行局着重指出，工会运动无论在其熟练或非熟练的工人队伍中都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建议中华全国总工会详细制定为某些团体以及各类工人所接受的口号和要求。

赤色职工国际在1925年10月23日的呼吁书中，向中国工人转达了兄弟的敬礼，同时号召所有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组织都要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生直接的联系，并“使各国的无产阶级对于年轻的中国工会运动的积极支援在思想上有准备”。^③

中国的工会组织高度评价赤色职工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给予的支援。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在一些函电中，对代

① 见《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关于中国与日本工会任务的决议》，载《国际工人运动》，1925年11月12日第34期，第22页。

② 同上。

③ 《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各工会组织呼吁书》，载《国际工人运动》，1925年11月5日第33期，第17页。

代表团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①后来，中华全国总工会又一次强调了苏联工人阶级给予中国工人运动精神上和物质上援助的意义：“以列普谢同志为首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无疑给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当时，列普谢同志率领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有助于加强国际工人运动同中国工会运动的联系”。^②

译自苏联《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杂志，1985年第2期。

曾宪权译

① 见《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1925年8月20日致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的信》，载《国际工人运动》，1925年10月22日第31期，第19—21页；《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1925年8月30日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信》，见《劳动者在同反动势力进攻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1925—1927年）》，莫斯科1959年版，第125—127页；《中华全国总工会致赤色职工国际的信》，载1925年9月19日《劳动报》。

② 《赤色职工国际》，1929年第10期，第773页。

蒋介石寻求苏联参战

约翰·高沃^①

关于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问题已有若干研究论文。然而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无法避免的缺陷：作者们未能获得中国的外交档案或战时中国外交官和决策者们所写的回忆录。这些研究所依靠的主要是当时的报刊杂志和英国、美国以及苏联的档案材料。这种局限性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缺点就是，这些研究基本把中国当成一个任凭其他大国玩弄策略的对象，而未能深入探讨中国外交的目的与内容。

现在，这种受材料局限的状况已有所改善。近十年来，一大批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方面的意图和战略的文献资料已被公诸于世。对于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来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80年代都带来了新的开放。由于蒋介石掌握着战时中国的外交大权，所以台湾公布的日渐增多的材料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党史委员会从蒋介石档案中选编的多卷文集出版之后，^② 详尽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已成为可能。

蒋介石的谋略和他的苏联问题顾问

1937年7月7日，蒋介石领导中国进入抗日战争。当时，他并不相信中国的武装力量能够单独战胜日本。他关于如何赢得这

① 约翰·高沃 (John Garver)，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译文略有删节。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此后简称《战时外交》。）

场战争的整个战略构想包括三个方面：通过持久的军事抵抗阻止日军速胜；寻求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干涉以反对日本；找出可以接受的对日妥协方案。在蒋介石看来，这三个方面便构成了中国取得最终胜利的基础。

在1937—1938年期间，无论英国或美国都不太可能认真地考虑采取反对日本的军事行动。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蒋介石曾这样设想过。当英国徘徊于要么抚慰日本，要么追随美国的领导这两者之间的时候，美国正是个强烈的孤立主义者。那时，这两个国家都深陷在国内危机的困扰之中，因而削弱了它们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对于英美两国，蒋介石至多希望它们能一起对日本实行严厉而有效的经济制裁。

在1937—1938年间，恰恰是苏联而不是美国或英国给了蒋介石以外国军事力量直接干涉中日战争的希望。蒋介石的设想是：当中国军队与日本拼死纠缠的时候，英、美、荷的经济制裁能够切断日本的贸易，而苏联则出兵参战。这里有几个因素使这种希望看来是有可能实现的。俄国在争夺对满洲的影响方面历来就是日本的敌手。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关系日趋恶化，两国间的战争时有一触即发之势。30年代，苏联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有了迅速的增长，其中也包括远东地区的军事发展。当英美在日本周围的军事力量显得十分薄弱的时候，与日本隔海相望的苏联却在满洲边境和朝鲜边境拥有强大的陆军和空军。蒋介石希望，一旦日本军队陷身于中国内陆而不得不抽出它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队，苏联即可挥师出击，使其腹背受敌。中苏合作将可置日本于死地。

在战争最初的18个月里，中苏两国的利益和外交政策大体上是互相平行的。中国坚决支持莫斯科的倡议，赞同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订立集体安全协议；而莫斯科则全力支持中国为动员西方各国对日本实行制裁所做的努力。斯大林和蒋介石都乐于看到一个包括中华民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兰西帝国在内的“反侵略和平阵营”。蒋介石相信，一旦建立起这个“和平阵营”就可以保

证苏联欧洲边界的安全，从而允许、甚至促使苏联加入中日战争。蒋介石完全能够理解苏联两面受敌的严重性；因此，他把促成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反侵略阵营看作是稳定欧洲局势，促使莫斯科在远东地区采取积极政策的一种手段。

在1937—1938年期间，蒋介石有三个处理对苏关系的重要顾问。这三个人是1936年10月至1937年11月出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立法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和1935年至1937年间担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此后又出任驻苏大使的杨杰。这三个人的性格与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对战时的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三个人之中，蒋廷黻对苏联参战的问题抱着十分悲观的看法。1931年日军占领满洲时，蒋廷黻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中俄外交史的权威。此后，他作为中国反战观点的领袖人物之一而崭露头角。为了减轻日本对中国的压力，蒋廷黻赞成发展对苏关系。但在整个30年代，他一直认为莫斯科决不愿为了中国的缘故而与日本作战。^①按照蒋廷黻的看法，中国抱着苏联会介入中日冲突的幻想是极为有害的。它会怂恿中国贸然从事一场十有八九会失掉的战争。而比失掉一场战争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可能就此落到比现在还要可怜的地步。他坚持认为，在中国的力量没有超过日本之前，最好还是继续原先的态度。一个国家没有获得胜利的现实把握就不应从事战争，这似乎就是蒋廷黻的基本观点。^②中苏关系权威和突出的主和派活动家的声誉使蒋廷黻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从1935年起，蒋介石就起用他来考虑对苏关系问题。

杨杰和孙科与蒋廷黻一样也是发展对苏关系的早期鼓吹者。不过，他们在苏联是否会加入中日战争的问题上与蒋廷黻的意见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与蒋廷黻的通信。

② 蒋廷黻在1938年回国后写成的一本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中雄辩地发展了自己的论点。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启明书局，台北。

大相径庭。杨杰与蒋介石一样是个军人，也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他从北伐战争时起就和蒋介石有了联系。30年代中期，杨杰开始强烈地相信苏联将会参加中日战争。1933—1934年，他赴欧洲和苏联进行军事考察，回国后写了一本书，鼓吹中苏集团最终将战胜日本。作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陆军大学教育长和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杨杰处于有利的地位。他能够接近蒋介石，并使他的意见得到倾听。1937年末，蒋介石派遣杨杰去莫斯科，表面上是为了考察苏联的军事工业，实际是为了劝斯大林增加对华军事援助。^①1938年5月12日，杨杰正式取代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此后，直到1940年4月18日他才离任。在1937—1938年期间，杨杰不断地告诉蒋介石，苏联出兵已指日可待。他本人甚至还想设计挑起日苏间的冲突。

孙科是蒋介石的第三位苏联问题专家，他作为蒋的顾问历时最长。孙科领导着国民党的一个左倾派别，倾向于一种带着几分浪漫主义色彩的观点：苏联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苏联很快就会站在中国一方参战。1937年11月，蒋介石派遣孙科率领一个特殊的秘密使团到苏联去请求援助。孙科一行于1938年1月抵达莫斯科。^②从1938年至1940年，孙科逐渐抛弃了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许多幻想。但直至战争结束，他依然相信亲苏的方向是与中国自身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

中苏联盟的形成

1937年8月签署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中苏两国在1937—1939年间的结盟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早在1932年，当中苏两国政府尚在讨论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双方的代表就开始

^① 参见吴相湘：《杨杰与国防新论》，载《传记文学》第8卷，第6册，1966年6月，第28至30页。与杨杰同行的有神秘人物张冲、王叔铭。

^② 夏晋麟：《我五度参加外交工作的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5、51页。

商讨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或安全互助条约的问题。那时，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真诚地赞同缔结这样的条约。1933年4月，他甚至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①

1935年，陈立夫在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会谈时，又重新提出了1932年罗文干关于安全互助条约的倡议。但鲍格莫洛夫认为，这样一个条约“太危险了”。据陈立夫解释，鲍格莫洛夫的意思是，尽管这个条约对日本人反对苏联扩大在华影响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中国太弱，万一苏战争爆发，中国并不能给苏联多少真正的帮助。1936年2月，陈立夫秘密出使莫斯科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继续就这一问题举行会谈。莫斯科仍旧十分谨慎。尽管在这次谈判中双方还未能达成协议，但已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若干进展。^②

1936年末，蒋介石试图巩固苏联的潜在支持，以便筹划到底是与日本妥协还是准备同它开战。这年10月，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他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进行有关中苏条约的谈判。^③在莫斯科的第一年，蒋廷黻与苏联官员讨论了缔结安全互助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不愿订立安全互助条约。因为他担心，卷入远东冲突将使苏联在西部陷于不利境地，而且还会因此增加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疑虑，并减少它们对中国的同情。按照李维诺夫的观点，在支持中国的问题上，苏联应该和英、美两国保持同步，既不应走在他们前面，也不应落在他们之后太远。^④

尽管李维诺夫拒绝订立安全互助条约，但他还是愿意与中国

① 有关1937年条约的资料，台北，国史档案馆，档案号：外02·1·12。

② 查理斯·凯兹：《国民党内幕，1926—1949年的陈立夫》，博士论文，第65页。（Charles R. Kitts, *An Inside View of the Kuomintang, Chen Li-fu, 1926—1949*, Ph.D. diss., St Johns University, 1978, 65）凯兹于1977年访问了陈立夫。他特别注意了1935—1936年陈立夫与苏联官员的会谈。

③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社译印，台北，1978年，第12卷，第76页。

④ 蒋廷黻口述：《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第196页。

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这项条约可以为向中国贷款用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提供一个政治基础。不过，李维诺夫说明，这样一项条约必须在南京而不是在莫斯科签字。蒋廷黻认为，这种安排无疑削弱了该条约的意义。显然，蒋廷黻与李维诺夫两人都看出，对条约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苏联来说，这个条约象征着它所承担的义务的界限，它或许是表明条约仅具有地区性而非全球性意义。蒋廷黻向蒋介石报告说，缔结安全互助条约是不可能的，甚至他认为苏联提出的附加条件已使得互不侵犯条约也变得无关紧要。他向蒋介石建议，组成一个不仅包括中苏两国，而且包括其他大国在内的多边同盟来取代这项条约。^①

李维诺夫小心翼翼的探索显然受到了来自斯大林的压力。在芦沟桥事变前一个月，苏联事实上主动向中国政府建议，缔结一项安全互助条约。1937年6月5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通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中苏两国在远东寻求相同的国际环境，苏联政府乐于看到一个团结与强盛的中国。中国没有侵略野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可作为远东和平的捍卫者，而一个衰弱的中国将会成为引起战争的导火线。有鉴于此，鲍格莫洛夫说，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由中国政府出面向英、美、法、荷、日、苏等国政府发出倡议，召集一个国际会议，以便起草一项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条约。鲍格莫洛夫还说，倘若中国政府发出这样的倡议，苏联保证予以支持并将积极动员其他国家共同参加；倘若证明无法达成一项区域性的集体安全条约，苏联准备与中国单独签订一项措词强硬的安全互助条约。^②他随即将一份草案递给了王宠惠。在鲍格莫洛夫看来，在签订双边条约之前召集一个国际安全会议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个会议能产生积极的成果，那么双边条约便不再需要了。作为答复，王宠惠提出，苏联为什么

① 《蒋廷黻回忆录》，第196—197页。

② 维金斯基主编：《外交史》，1956年俄文版的中译本，第3卷，大连外语学院，1979年，第896页；《战时外交》，第325页。

不亲自提议召开太平洋地区会议。鲍格莫洛夫解释道，如果苏联出面召集这样一个会议将会引起许多怀疑。^①

令人惊讶的是王宠惠竟然没有立即把这个重要的建议通知蒋介石，而一直拖到7月8日，即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才告诉他。据当时中国外交部苏联司司长周西材回忆，王宠惠对苏联让中国出面召集太平洋地区国家会议的用心十分怀疑。王宠惠感到，这样一个国际性会议不宜由中国单独召集，而应由美、英、法和中國共同召集。周西材还说，直到芦沟桥事变爆发时，王宠惠还在与鲍格莫洛夫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②

7月7日发生的战斗使蒋介石不能再顾及王宠惠的谨慎。7月8日，他在庐山召见立法院院长孙科和王宠惠。尽管蒋介石还无法判断芦沟桥事变是否可以平息，但他已感到必须做好准备以应付事态扩大。他说，如果冲突继续蔓延，那将演变成全面抗战。在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由苏方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中苏安全互助条约。在王宠惠向蒋介石报告了鲍格莫洛夫6月5日的建议之后，蒋介石当即命令王宠惠和孙科一起去上海，按照鲍格莫洛夫一个月前倡议的调子与他签订一项协议。^③

然而，当王宠惠和孙科到上海与鲍格莫洛夫重开谈判时，苏联大使却坚持认为，现在订立安全互助条约为时已晚。他指出，缔结这项条约的目的在于防止战争爆发，但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他说，如果在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之后不久就签订了这样的条约，那么，它或许能防止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如今已太迟了。他解释道：倘若苏联现在与中国订立这项条约，那么苏联也可能遭到日本的进攻；可是苏联还没做好与日本开战的准备，因此现在刺激日本人显然是不明智的。鲍格莫洛夫的结论是，目前

① 《战时外交》，第327页。

② 周西材：《中苏关系内幕》，时代出版社，台北，第55页。

③ 同上，第56页；，《战时外交》，第325页。

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缔结一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①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表示同意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这个退一步的方案。8月22日，王宠惠外长和鲍格莫洛夫大使终于在南京签署了这项条约。8月29日条约对外公布，8月31日经国防会议批准。^②然而十分奇怪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国防会议一直拖到1938年4月26日才把这个条约送交立法院批准并交付行政院执行。^③这种拖延也许反映了某些由于考虑到与苏联为伍将会给西方国家所要采取的行动带来不良影响而产生的犹豫不决。1938年5月16日，立法院最终通过了这个条约。

1937年的中苏条约有两个重要作用：第一，它为苏联大规模地援助中华民国和向其销售军事装备提供了政治基础；第二，它保证了中苏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战时都不得与日本进行交易。有关后一点的条款规定，如果签约国一方遭到日本进攻，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援助日本，并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有利于日本的行动或签订任何可能有利于日本的协议。5月16日，当条约获得批准时，立法院宣称，它认为条约中的这个条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蒋介石也认为，第二点，即条约的否定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对苏联有可能玩弄的两面手法是一种约束。^④不过，蒋介石对这个条约最终能否有效地防止这种两面手法则抱有怀疑。8月1日，也就是蒋介石批准这项条约之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苏联希望利用这项协议对日本施加压力；此后，再与日本签订一个

① 同上。

② 《中国手册，1937—1944，中国七年战争期间主要发展概述》，(China Handbook, 1937—1944,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ajor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 seven years of war), 诚文出版社, 台北, 1971年再版, 第109—110页。

③ 参见有关1937年条约的档案, 台北, 国史馆。

④ 黄国文:《抗战时期我国对日外交谋略, 1937—1945年》, 硕士论文, 台湾, 政战学院, 1977年, 第99—100页。

类似的协议来保障苏联自身的中立。^①这种对苏联和日本可能“瓜分”中国的恐惧是蒋介石思想的核心部分，在整个战争期间一次又一次地困扰着他。正如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指出的，与莫斯科所允诺的不与日本进行交易相对应的，是中国向苏联允诺，决不加入日本、德国或意大利的任何反共条约。^②

探求反侵略战线

南京希望中苏条约能成为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内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安全合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芦沟桥事变后的头几个月，中国官员希望西方列强能采取反对日本的有力步骤。7月16日，中国政府向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德国和苏联送交备忘录，谴责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是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明显违反了《九国公约》、《巴黎非战公约》和《国联盟约》的条款与精神。^③随后，南京开始动员各国向日本施加压力。从7月21日至27日，蒋介石会见了英、美、意、德、法等国大使，要求这些国家支持中国的斗争。^④

南京最初努力将西方列强引向积极与苏联合作的轨道是在1937年11月3日至24日召开的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美国、苏联等19个国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日本与德国没有出席。据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驻比利时大使钱泰说，会议开幕时，中国代表曾寄予极大的希望。特别是，他们希望会议能决定

①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第4卷，台北，1978年，第1142页。

② 邵力子：《山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到中苏商约》，载于《中苏文化》第4期，1939年8月，第2页。

③ 钱泰：《中国和1937年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纽约，圣约翰大学，1964年，第1页。（Tsien Tai, China and the Nine Power Conference at Brussels in 1937）

④ 《总统蒋公大事长篇编初稿》，第4卷，第1139页；《蒋总统秘录》，第11卷，第68页。

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军火和信贷；由此还可能促成苏军在满洲边境显示实力，同时，美英法三国在太平洋上举行海军演习。^①至少，他们希望列强能同意对日本实行经济和金融制裁。

在南京的中国官员对西方能否采取军事行动则不那么乐观。大约在布鲁塞尔会议开幕前一周，王宠惠向中国代表团发出绝密指示，告诉他们如何应付会议。王宠惠指出，会议企图调解中日争端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中国对所有参加国的态度须极度和缓，而不使它们感到难堪。代表团必须表示，中国希望会议能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解决中日冲突。中国的目的是在会议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之后，促使列强采取制裁日本的办法。在布鲁塞尔的中国代表团甚至“应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②

南京促使西方与苏联合作，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本的计划与莫斯科所主张的集体安全战略是相互吻合的。1937年9月13日，《真理报》刊登的一篇文章阐述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广泛的集体安全协议之间的显著联系。据《真理报》说，中苏条约表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在远东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到欧洲，而和平必须得到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共同支持。中苏条约就是达到普遍和平与集体安全的一个新工具。^③10月20日，《真理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说得更为明确。在回顾了欧洲和远东最近的事态发展之后，这篇文章的结论是：日本和德国是反对现存势力的均衡的两股力量，它们妄图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最为害怕的呢？文章指出，那就是英、美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④

① 前引钱泰文，第8—10页。

② 外交学院编：《中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37—1945）》，第3册，1958年，第132、133页。

③ 转引自褚玉坤：《动荡中的中苏关系》，大公报出版社，汉口，1938年，第128页。

④ 《中苏文化》第1期，1937年12月，第29—31页。

莫斯科和南京一样，希望布鲁塞尔会议成为通向全球反侵略战线的一个步骤。莫斯科对布鲁塞尔会议极为重视，由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亲自率团参加便是证明。李维诺夫坚决支持中国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所发出的呼吁：共同实行对日制裁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他向大会指出，企图调解中日冲突的尝试已经失败了，苏联感到有必要采取共同的措施以便有效地遏制日本，并且苏联已经做好了参加的准备。^①

对于重庆（它于11月20日成为中国战时的首都）来说，十分不幸的是，美国当时仍旧希望安抚日本，而不是与苏联合作一起反对它。因此，美国首席代表建议把苏联从大会建立的考虑行动计划的小组委员会中排除出去。西方国家希望，把莫斯科排除在外将使东京有可能参加。李维诺夫被这个行动激怒了。他以苏联受到歧视为理由退出了会议。

这对重庆的外交是个沉重的打击。据钱泰说，自从苏联退出后，大会就再未讨论过支持中国的积极步骤。^②象蒋廷黻那样的中国外交官们都对英美在考虑解决远东问题的方案时“固执地”把苏联排除在外感到迷惑不解。似乎在蒋廷黻看来，苏联在国联或布鲁塞尔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被华盛顿和伦敦当作不受欢迎的——这种做法，蒋廷黻相信是毫无远见的^③

布鲁塞尔会议最终通过了一项解决办法，鼓励中日两国利用其他国家提供的帮助尽早结束冲突。中国代表团对会议的这种微不足道的结果深表失望。^④获取西方支持的失败把中华民国推向进一步依靠苏联。

当九国公约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莫斯科继续暗示它可能加入中日战争。据蒋介石说，会议期间，斯大林召见了中国驻苏使馆参赞。斯大林赞扬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并告诉中国参赞，

① 钱泰：《中国和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第6页。

② 同上，第17页。

③ 《蒋廷黻回忆录》，第198—200页。

④ 《中国手册，1937—1944》，第85页。

· 如果中国的形势恶化，苏联有可能对日宣战。^①

关于苏联参战问题

许多中国人希望，1937年条约以及英美对这个条约表示支持的态度能为苏联参战的行动提供一个基础。对此，蒋廷黻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不少记述。蒋廷黻相信，莫斯科一直操纵着中国人的这种希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目的是：第一，推动中国同日本对抗；第二，一旦战争爆发就使它继续下去。1937年6月，莫斯科提出一份安全互助条约草案可能就是为了鼓动中国加剧同日本的紧张关系而做出的一种努力。据蒋廷黻回忆，鲍格莫洛夫不断以巧妙的手法在中国煽起战争狂热。特别是当他私下会见一些中国人，通常是政治领袖和记者时，他总是示意，如果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准备给予中国一切必要的援助。蒋廷黻说，鲍格莫洛夫对政府官员说话还算比较谨慎，但至少有一次他告诉蒋廷黻本人，苏联愿意订立安全互助条约，并在中日战争中给中国实际的军事援助。很可能，鲍格莫洛夫的讲话越出了莫斯科授权的范围。蒋廷黻怀疑，鲍格莫洛夫把日苏战争看作是颠覆斯大林的一条道路。^②

在战争最初的18个月中，蒋介石试图说服斯大林命令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则小心谨慎地拒绝了这些请求，他担心直截了当的拒绝会使蒋介石转向对日求和。

蒋介石接连不断地从他的顾问们那里得到有关苏联出兵问题的意见相反的报告。蒋廷黻回忆说：“1937年冬是我最感困难的一个冬天。因为杨将军呈给委员长的电文中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而我的电文却表示非常失望。”^③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之后，

① 《蒋总统秘录》，第12卷，第92页。

② 《蒋廷黻回忆录》，第191、192页。鲍格莫洛夫被召回苏联后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处死。

③ 同上，第20页。

蒋廷黻呈给蒋介石一份极其悲观的报告。他断定：除非日本先对苏方下手，苏联不会对日作战。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国防最高会议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宣读了这份电报，孙科当即谴责了蒋廷黻在莫斯科的“失败”和他对苏联意图的“误解”。蒋廷黻写道：“也许还有其他理由，我被调回。”

1937年末，杨杰却通过与斯大林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讨论得出了苏联即将参战的结论。11月12日，杨杰打给蒋介石两封有关苏联参战问题的电报。在第一封电报中，杨杰报告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斯大林说，苏联立即参战反会促使日本民众团结在日本政府周围，不利于日本反战运动的发展。“因此”，斯大林的结论是，“苏联对日本之开战（必须）等待时机之到来”。^①杨杰在第二封电报里概述了他与伏罗希洛夫讨论的情况。据杨杰报告：伏罗希洛夫同意蒋介石的看法，即苏联参战可以一举奠定远东和平的基础。不过，他又表示莫斯科有很多顾虑，“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因此苏联现在还得继续做准备。伏罗希洛夫要杨杰转告蒋介石：“其时期固难定，但……准备已快了。”^②这又是一次微妙的暗示，以使中国不致过于失望。

12月6日，杨杰电告蒋介石他与伏罗希洛夫进一步探讨苏联“出兵”问题的情况。杨杰报告，斯大林担心这种行动会使全世界都与苏联作对，因此，苏联只能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斯大林了解，中国抗战非常困苦，但他深信：“最后胜利在华，务望坚决抗战到底。”在这封电报的末尾，杨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已默察苏联于参战问题顾虑虽多，亦非绝对不可能者。”杨杰建议，中国政府应努力促使英、美、法三国向苏联提供“相当之保证”，造成环境演变，使苏联自动出兵。^③

① 《战时外交》，第335、336页。

② 同上，第336、337页。

③ 同上，第470页。

就在12月，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还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解释苏联在参战问题上的困难。斯大林说，苏联如不因日方挑衅而对日出兵，那么“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是将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马上改善”。而这对于中国和苏联都是不利的。斯大林提出，只有当九国公约国家，至少是其中的主要国家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能立即出兵。“因为在该时，世界舆论要认为苏联行动是保护法律及正义之当然的行动”。这位独裁者还说，苏联不受日方直接挑衅便不出兵的政策只有最高苏维埃会议才能改变，而该会议在一个半月内不会召开。在此期间，苏联将尽可能地增加对中国的援助。^①在这封电报里，斯大林再次说明“不能即刻出兵”，同时也再次为出兵参战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斯大林是在告诉蒋介石，使苏联出兵的办法就是中国出面说服英美加入苏联所倡导的“和平阵营”。

1937年12月，蒋介石把一份由德国出面调解的和平方案送给了斯大林。显然，这是向斯大林暗示，假使中国不能从苏联那里得到充分的支持，蒋介石不妨与日本人做笔交易，而这笔交易意味着中国将与反共轴心国合作。然而诱使蒋介石摊牌的斯大林却认定，蒋介石完全懂得他不可能从日本人那里接受一个屈辱的和平而又不致在政治上垮台。关于日本人在和平方案中提出的条件斯大林在打给蒋介石的复电中说，只有日本同意从华北撤军并同意恢复1937年7月以前的状态，中国才可以与日本和谈。不过，日本将撕毁它所签署的任何停战协议，因为它签署这些协议只不过是到了在德国的帮助下争取时间而已。最后，斯大林告诫说：“中国政府之任务，是以伟大民族的政府之资格来讲话，而不屈服于威胁。”^②蒋介石随即答复斯大林说，苏联领导人对德国调停的评价与他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希望苏联最高苏维埃能向中国提供“实力援助”，以便给远东和平打下基础。^③剥去外交

① 同上，第339、340页。

② 同上，第340页。

③ 同上。

辞令，蒋介石对斯大林的回答实际就是：我们愿意恪守不与德意日结盟的协议，但希望你们赶快出兵参战。

苏联大使在武汉与孔祥熙会谈时又重申了斯大林12月26日电报的意见。他说，苏联十分同情中国，并尽可能地给予中国物质援助。但无论如何，苏联不能单方面直接出兵援助中国。^①

12月13日，南京陷落了，随之而来的是日军对南京居民残酷的大屠杀。据蒋廷黻说，杨杰将军在与伏罗希洛夫会谈时曾得到过一个印象：一旦日本占领了南京，苏联就会参战。杨杰还把这个“情报”电告给蒋介石。^②虽然杨杰并未把这封电报送给蒋廷黻过目，但蒋廷黻闻讯后立即另给蒋介石打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不要相信杨杰的话。可是，南京陷落后，蒋介石还是打电报给斯大林，引用杨杰的电报作根据，要求苏联出兵。对此，李维诺夫向蒋廷黻转达了斯大林的否定答复：他不认为杨将军给蒋介石的报告是可信的。

另据蒋廷黻回忆，杨杰曾想设计逼迫苏联出兵。1937年年中，当蒋廷黻随同孔祥熙等中国官员将要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时，杨杰怂恿他在伦敦向路透社记者宣布，苏联将在两周内参加对日作战。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可是杨杰认为，日本一旦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这样就可把苏联拖入战争。蒋廷黻拒绝了杨杰的计划。^③

由于南京陷落后苏联并未出兵干涉，杨杰在1938年1月5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自己的工作。在信中，他列举了苏联不能立即出兵参战的三个原因：第一，英美舆论在中日战争中同情中国，但在日俄战争中将采取观望态度。（在此，斯大林通过杨杰再次间接表明了他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即这场战争是吸引美国 and 英国加入他所倡议的反侵略阵营的一个途径。）第二，苏联希

① 蒋永敬：《抗战初期外交与国联及德使之调停》，载《中国现代史论集》，第9册，台北，第378页。

② 《蒋廷黻回忆录》，第200页。

③ 同上。

望建立包括美、英、法在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在这个战线建成之前，苏联必须竭力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第三，斯大林对英国的政策极为怀疑。他认为英国不愿见到中国战胜日本，并希望日苏之间也爆发战争。英国在战争中将帮助较弱的一方。接着，杨杰又在信中进一步阐明了他关于如何诱使苏联出兵的意见，暗示要使用他曾向蒋廷黻建议过的那种计谋。杨杰写道：

职曾提出意见，苏联认为对日作战，既有种种顾虑，可否另用一种有效方法刺激日本或联合有利害相同之国家，出面干涉以利中国之抗战……总之，欲使苏联参战，职见必须造成使苏联不能不参战之环境。其制造之法，第一想法使英美为其后援，或使有西欧安全之保障。第二，中苏关系益密，日方感觉不利，对苏联挑衅，则苏联不能忍受，彼必起而与之周旋矣。^①

1937年11月，蒋介石还曾派遣孙科到莫斯科去请求增加军事援助。孙科于1938年初抵达莫斯科。2月4日第一次见到斯大林。这次会面俩人边喝酒边谈话，直至深夜。斯大林劝中国要有耐心，同时仍旧保留着苏联最终实行干涉的可能。2月7日，孙科电告蒋介石会谈的内容：斯大林说，目前的国际局势尚不宜于苏联出兵干涉，还需等待时机成熟。如果美、英、法改变态度，愿意与苏联一道采取行动，那么苏联就可以派兵到中国去了。斯大林接着说，若苏联现在单独出兵，那不仅会促使德意去援助日本，甚至会助长那种认为苏联打算赤化中国的误解。所有这些都有违中国抗战的利益。因此，苏联政府已经决定，继续奉行现在的不直接介入的政策。苏联将继续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并鼓励美、英、法支持中国。然后，斯大林又加上一句，苏联的远东部队同时“亦在积极演习中，待机可动”。^②显然，这是为了给蒋

① 《战时外交》，第473、474页。

② 同上，第407页。

介石打气。

3月间,当日本人准备从山东向江苏北部的徐州发动进攻的时候,蒋介石再次催促苏联参战。徐州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为了夺取徐州,日军需要调遣先前部署在满洲的储备力量,这就削弱了日本人对抗苏军的能力。发动徐州战役是日本在华野战部队的指挥官们旨在破坏东京总参谋部想要阻止继续扩大对华战争所采取的一项行动。一般说来,蒋介石相当了解日本内部的矛盾冲突。他或许知道徐州战役迫在眉睫并懂得它的幕后涵义。日本情报科科长王芑生早就告诉他日本人在对华政策上有所分歧。^①1938年2月,蒋介石曾派外交部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去日本与日本官员举行秘密会谈。董道宁在日本呆了两个星期,会见了一些“反对扩大在华战争”派的领导人,并给国家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和军事部长何应钦带回了一些他们的日本老朋友的信件。董道宁的出使导致了其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日本领事在香港的秘密谈判。这个谈判从1938年4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到5月份。^②当中、日、苏三方关系互相纠缠而日本内部又存在着激烈的派别冲突的情况下,苏联不要说出兵参战,那怕仅仅举行演习或集结兵力作出即将参战的姿态,都足以大大加强日本国内反苏分子的论据。这些人主张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做出更充分的准备,俟机攻占东西伯利亚。1938年初,蒋介石与日本人的谈判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苏联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争取苏联更多的支持又是为了加强东京主和派的力量。

3月10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在莫斯科的杨杰,命令他求见伏罗希洛夫,敦促苏联进攻满洲。蒋介石说,日本已向中国内地抽调了8至12个师团,它在北满的防御力量已经空虚。杨杰应告诉伏罗希洛夫,此时进攻满洲或朝鲜将十分有利。蒋介石还提及斯

① 吴相湘:《日本通王芑生》,载《传记文学》,第8卷,第5册,1966年5月,第30—33,39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11卷,第174—175页。

大林2月4日在与孙科会谈时曾讲过的苏军调动问题。他指示杨杰，如果苏联现在还不可能直接参战，那就应要求伏罗希洛夫在满洲及朝鲜边境集结兵力，以阻止日本抽调更多的师团到南方去与中国军队作战。蒋介石强调说，即使是这样的行动也“大有裨益”。^①

5月21日，日军攻克徐州，武汉战役随即开始。武汉是尚未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最后一个中国工业城市。这个城市处在长江的东西轴线上，是富饶的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中心，并是中国南北铁路的衔接点。武汉的失陷将是、实际也正是中国的抗战努力所遭受的一个重大挫折。武汉战役标志着已经持续了15个月的中日战争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日本人的补给线一直在延长，它的军队因分散已显得单薄而疲惫。相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国共两党的合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日本的进攻有可能被遏制的话，那就应该是在武汉；如果苏联打算出兵的话，那武汉战役即是其参战的最有利时机。

6月，当日军向武汉进军时，蒋介石继续敦促苏联进一步卷入中日战争。此时，恰逢德国上层人物之间的一场激烈辩论刚刚结束。里宾特洛甫的亲日派观点占了上风。希特勒最后同意，放弃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转而寻求与日本结盟。这个重要决定立即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德国召回了那时仍在中国任职的军事顾问，其中包括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干练的最高顾问法根豪森将军。6月2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已接替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的杨杰，指示他请求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派一个得力的、象加伦将军那样的人，到武汉担任蒋介石的“总顾问”。^②加伦将军是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特别远东军区司令。如果他能接替法根豪森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总顾问，那将是苏联支持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同时，也会被日本人视为一个带有挑衅性的行动。6月28日，蒋

^① 《战时外交》，第479—481页。

^② 同上，第341页。

介石又打电报给杨杰，询问苏联召回其在武汉的大使是否意味着对华政策有所改变，蒋介石注意到近来德国政策的转变，据他个人分析判断：“倭德对俄不久必有特殊举动。”^①事实上，蒋介石是在向斯大林表示：中国一向完全站在苏联这边，而不是站在它的轴心国敌人那边；目前苏联的敌人正在互相靠拢，因此斯大林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趁德、日两国尚未采取联合行动之前，与他的中国盟友一起战斗，迅速击败日本。

1938年7月和8月，苏朝边界爆发的战斗大大激发了中国对苏联参战所抱有的希望。这次张鼓峰战斗成了7月中旬蒋介石与他的幕僚们共进晚餐时的话题。据那时刚离任回国的蒋廷黻说，在那次晚餐会上，许多人都非常坚定地相信，张鼓峰事件便是日俄战争开始的信号。^②有人乐观到如此地步，甚至断言日本财政到9月份就会崩溃。蒋廷黻当时则争辩说，苏联是不会参战的。这次战斗可能仅是两国边境指挥官的擅自决定，而不是执行两国政府命令的结果。加伦将军对张鼓峰的进攻甚至可能违背了苏联政府的意愿。在蒋廷黻看来，许多人所发表的乐观言论乃是为了迎合与讨好蒋介石。在晚餐即将结束时，蒋介石表示同意蒋廷黻的见解，并说中国将一如既往，就好象张鼓峰事件没发生过一样。蒋廷黻认为，蒋介石虽然在以前可能对苏联直接出兵抱有幻想，但十分清楚，他此时业已抛弃了这种幻想。^③

其实，蒋介石当时可能并不象蒋廷黻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抛弃了对苏联出兵的幻想。蒋介石只是意识到，即使他本人再希望获得外国的干预也不宜于在这种场合流露出来；对此期望过高就会削弱自己的力量。例如，早在1938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告诫他的参谋人员：战争初期中国犯了四个错误，其中第一个便是错误地相信其他大国会采取反日行动，因此中国只需搞好

① 《战时外交》，第342页。

② 《蒋廷黻回忆录》，第311页。

③ 同上，第211页。

自身防卫。^①由此可见，无论蒋介石本人在1938年年中对苏联出兵抱着多么强烈的愿望，他也不愿在他的下属中不适当地助长这种情绪。

7月27日，蒋介石打电报询问杨杰，苏联将对张鼓峰事件作出何种反应。为了劝说苏联官员，蒋介石向杨杰亲授机宜。他指出：日本很可能建议成立一个边境委员会来消除日苏间的危机，同时调动全部军队向南进攻，以使在华战事“告一段落”。此后，日本将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对付苏联。日本的意图如此明显，苏联政府不应被日本所迷惑。接着，蒋介石要杨杰问清楚，苏联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到底有多坚决；苏联大使奉召回国后将于何时返回中国；杨杰是否已见过大使。所有这些问题蒋介石都要求尽快作出答复。^②这表明了他的急切心情和他对杨杰的工作可能不甚满意。在8月2日的电报中，蒋介石重复了上述问题，并要求核实有关张鼓峰事件的报导：苏方是否伤亡200余人并有5架飞机被击落。^③

8月1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一致同意和平解决张鼓峰地区的边境争端。蒋介石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在此后不久所写的一篇日记里，蒋介石流露了自己的辛酸，道出了他对张鼓峰事件和平解决的失望。蒋介石写道，如果日本真诚地倡议与中国合作反对共产主义，那么，当它在张鼓峰被苏军击败之后就不必表现得如此屈辱而温顺了。^④

8月7日，在李维诺夫与重光葵达成协议前夕，孙科从巴黎拍给蒋介石一封长电，概述苏联在加入中日战争的问题上踌躇不前的原因。孙科报告说：苏联政府担心，一旦苏联参战，中国就

① 迪克·威尔逊：《虎之战，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Dick Wilson, When Tigers Fight, The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2年）第87页。

② 《战时外交》，第341、342页。

③ 同上，第342页。

④ 《蒋总统秘录》，第12卷，第9页。

会与日本单独媾和；苏联政府还担心，德、意会趁日苏战争爆发之机从西线发动进攻。孙科认为，现在欧洲局势已有所改善，英法合作的势头抑制了德意，因此亚洲局势的变化不致在欧洲引起动乱。孙科说，中国应设法解除苏方疑虑，以实现与苏联精诚合作。中国应该强调，中苏合作不仅限于战时，而且将延续到战后。中苏两国宜缔永久盟好，政治、军事、外交均一致行动。甚至孙科还提出，莫斯科担心中国战后会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对此，中国应通过实行土改平均地权、实行民生发展工业和停止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歧视政策来加以消除。^①孙科观点的第一部分——关于日蒋妥协的危险，欧洲局势的变化以及中苏之间的团结——可能忠实地反映了他的苏联主人对他所讲的话。这种观点的结果是把苏联未能参战的责任转移到中国肩上，并使中国继续抱着苏联最终还是要干涉的希望。不甚清楚的是，孙科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观点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苏联官员借他的口表达的。

9月下旬，日军分三路进攻武汉，武汉战役已进入最后阶段。9月30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使，强烈要求苏联采取行动遏制日本。两天之后，蒋介石将他自己与苏联大使会谈的情况电告杨杰，并命令他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探询，苏联是否已做好对日实行“军事制裁”的准备。蒋介石说，中苏两国也应该订立安全互助协定，就象苏法条约与苏捷条约一样。蒋介石无疑也记得最近在慕尼黑签署的《四国协议》，他让杨杰转告斯大林：

我方认为，此时苏联应对远东之侵略者作最有效之制裁，而对我作进一步之接近……目前欧局既可暂望安定，不必有西顾之忧，趁此时机亟宜予远东侵略者之日本以教训。使他日德国亦无能为患。并告以中国人民一般心理均认苏联向以帮助被压迫国家为国策，实为中国最真实的患难之友。现在我抗战已将15个月，抵御侵

^① 《战时外交》，第408、409页。

略已达最艰苦之严重关头，中国本身力量已完全发动使用殆尽，苏联必不愿中国功败垂成，使远东侵略之狂焰高涨，世界祸患更难收拾。①

蒋介石指示杨杰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详尽地解释这些理由，说明中国的真诚愿望，并向苏联外交部活动，尽一切努力促使苏联采取积极的政策。蒋介石还嘱咐杨杰及时复电。② 10月9日，蒋介石再次会见了苏联大使。③

当然，苏联于1938年并未参加中日战争。10月19日，蒋介石命令从武汉撤退。10月21日，武汉陷落。当蒋介石在1937年7月引导中国与日本开战时，他曾希望苏联会出兵参战。莫斯科也鼓励了这种希望。所以人们不难想像，1938年秋，当蒋介石终于认清了苏联根本不会出兵之后的苦恼：在中国与日本进行一场残酷持久的消耗战时，苏联只打算袖手旁观。

一旦看清苏联不会参战，蒋介石的政策即开始发生变化。武汉陷落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直至1941年6月苏联还在继续支持中国抗战，但援助的规模缩小了。双方仍在口头上挂着为了友谊与共同利益的口号，但棘手的问题开始出现了。更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都开始寻找新的可靠的外国伙伴。斯大找到柏林，蒋介石找到华盛顿。正是这种全球方向的分离最终扯断了中苏两国在中日战争最初的18个月里所结下的联盟。

结 论

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一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和斯大林对于对方国家的政策各有其成功与失败的一面。蒋介石未能诱使斯大林

① 《战时外交》，第343页。

② 同上。

③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第1297页。

参加对日作战，但他的确获得了苏联巨大的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援助。从斯大林的立场来看，对中国的支持是同一时期对西班牙的支持的补充。斯大林想把这两个地区的冲突作为苏联和西方国家针对德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催化剂。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政策在中国和西班牙都失败了。然而，苏联在中国和西班牙还有第二个目标：牵制、束缚和消耗日本和德国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战略至少在中国是成功了。蒋介石领悟到他在苏联达到这一目标时所扮演的角色，并为此而感到凄苦。自然，他要为中国的服务索取市场所能容忍的最高价格。

当苏联开始从中国脱身而与纳粹结盟之时，美国又开始把中国作为它对付日本的一个工具而一步一步地增加了对华援助。在研究者眼中，罗斯福和斯大林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即出钱给中国，让中国的士兵缠住日本。在后来与美国人的来往中，蒋介石无疑受到了他早先与苏联打交道时的经验的影响。蒋介石决不是担心列强玩弄被后来的政治分析家们称之为“中国牌”的最后一位中国领导人。

译自美国《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7年夏季号。

谷世宁章百家译

• 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研究 •

鸦片战争研究

佐佐木正哉

英军进攻内河

义律在1841年2月13日结束了与琦善的第二次会谈后，将条约拟出送往琦善处，要求在2月20日（正月二十九日）以前签署。而在这之后，义律也并非只是静候签约之日。他对琦善是否同意签约没有把握，因而密切注视着中方的动静，广泛搜集情报。

实际上在琦善要求延期签约的照会发出之前，英方就已发现中方正急速加强虎门、横档一带的防备，显然是在加紧进行开战准备。义律起草条约尚未完成之时，已不断有情报从澳门传来，说中方正在内河大规模布置防御；于是几名陆海军军官赴虎门侦察，结果证实：大规模军事工事正在修筑，高地上集结着军队，内河两岸构筑起围以堑壕的阵地，北横档岛上布满大炮。这些准备决不能被认为是服务于签订议和条约的。据说英海军司令伯麦这时已对琦善抱彻底不信任态度了。^①

但义律还是信任琦善，2月13日将条约送交琦善，又于2月16日告知英军从舟山撤退，要求2月20日以前签约。英舰“复仇神”号在虎门将条约送交中方后，为等琦善答复而一直停留到18日。这期间，该舰全面侦察了横档、虎门及虎门以南安臣湾一带，更详细地掌握了中方增强防备的情况。^② 2月20日傍晚，琦善要求

① W. H. Hall & W. D.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45, pp144-5. O.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ill April 1842, London 1842, p.274.

② ibid., P.146.

延期签约的照会送到澳门义律处，此时，皇帝降谕琦善命令开战的消息也已传到澳门，并且，还有情报说广州城墙上贴出了对义律与伯麦的首级各悬赏5万元的布告。^①因而情况已很明朗，虽说琦善是要求延期签约，但这只不过是施延时间的借口，他已下决心拒绝签约而要开战了。

尽管如此，义律对琦善还抱着一线希望，他于21日赴虎门附近，期待琦善作出一些表示，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这期间，义律和几名军官一起偷偷登上横档岛，侦察了炮台，摸清该处在旧设大炮之外又新设置了17门大炮。^②结果，琦善未作出任何表示。

义律对琦善加以恫吓，把他逼到了即将签约的地步，却没料到琦善会在这当口试图逃脱。想到琦善拒绝签约的原因，义律不由得更为忧郁。这是因为：据他判断，琦善之所以拒绝签约，倒不一定是他的本意，而显然是奉皇帝严令的结果。这样一来，即使在广东进一步逼迫琦善，也不能指望会有什么效果。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再次远征北方，向北京施加压力，迫使皇帝本人屈服。但是如果再次远征北方，则因上琦善的当而撤出舟山、目下正移驻香港的陆军主力，又得要开往舟山。并且，重新占领舟山，肯定又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困难并不只限于上述这些。1840年7月在舟山登陆的英国陆军兵力为：白人兵约2300名，印度兵约650名。以后8个月中，因传染病白人兵中病死了将近600名，印度兵也有将近四分之一病死。此外，约有700名染上病，一部分去印度，约380名被转移到南方。结果，英军撤出舟山时，能承担军务的上兵只剩下1200名了。^③即使准备再次远征北方，兵力也是不足的。另一方面，广东贸易已停顿两年时间，因而有必要迅速恢复。如果和议能够成立自然没有问题，但这种希望已不存在，因而只有以武力促使通商的恢复。为此，必须以广东现有的兵力

① *ibid.*, P.145.

② *ibid.*, P.148.

③ Copy of a Letter from Captain Elliot to the Earl of Aberdeen, 53, Cadogan Place, January 25, 1842. (F.O.17/61).

向内河进攻，迫使琦善为首的省城高级官员屈服。

由于琦善拒绝签约，义律也陷入困境，结局是他只得下决心进攻内河。但在22日，他只命令率领由4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停泊于横档河面的舰长，阻止目前正加紧构筑的防御工事继续施工。^①

接受这道命令后，1艘军舰（“复仇神”号）与数只舢板于23日侵入三门口（亚娘鞋岛东南端），追逐正在水路上安放障碍物的中国师船，并炮击三门口，破坏、焚烧兵营、民舍多间，而后占领了这里正在修建的炮台，破坏或掳获大炮80门（旧设大炮20门，刚运到尚未安设好的大炮60门）打死守军约20名，然后撤离。^②据说在这次作战中，义律始终在舰上观战。

同一天，有情报说，奕山被任命为靖逆将军，受北京派遣赴粤剿英。大概直到这时，义律才对议和完全死心。24日，他在停泊于横档河面的“加略普”号上发出布告，首次正式声明琦善拒绝签约。^③与此同时，海军司令伯麦向在虎门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劝其投降：

照得两国争论诸事，未能说明，现将交战。本统帅爱惜存心，不忍以将弁兵卒多人致毙其命，务请贵提督即将横档以上，大虎以下中流左右各处炮台，俱行让给本统帅暂为据守，则所有将弁官兵均得将身带兵械，携同行李，安自别去。迨至诸事善定安后，再将炮台与同内载枪炮器物统行如初缴还。倘贵提督果能依照本统帅此次公文情节办理，毫无更改，即各炮台城上插竖白旗为号可也。^④

① W.H.Hall & W.D.Bernard, Op.cit, P.151.

② ibid., PP.151-2.

③ Circular to Her Majesty's Subjects, February 24, 1841, Inclosure No. 2 in Elliot's Despatch No.10 of 10 March, 1841. (F.O.17/47) Chinese Repository, Vol.X, 1841, P.116.

④ 《资料篇》，第85页，伯麦照会，1841年2月24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不知这件照会是否送到了关天培手里。即令送到了，关天培也是不可能不战而降的。

英军舰队中有5艘小战舰（共载炮112门）和1艘轮船已经驶至虎门，但其他5艘大战舰（载炮278至282门）和2艘轮船却因无风而行动迟缓，25日才集结于虎门。从次日起，对横档、虎门各炮台的进攻开始了。

第一个目标是北横档炮台。由于它南面的南横档完全没有设防，英军于25日在这里秘密架设了3门臼炮，埋伏下炮兵。26日早晨，南横档的炮兵首先开始炮击，接着军舰亦开炮箝制各炮台，下午1点半左右，陆军登岸，迅速占领了北横档。据英方估计，中方的损失是：约250人战死，约100人负伤，约1千人被俘。^①一说约300人战死，约1300人被俘。^②俘虏很快就释放了。

对虎门各炮台的进攻似乎倒比横档容易。因这天无风，军舰行驶缓慢，夜里1点左右才接近虎门，从正午起开始炮击。山上一带清军群集，炮击开始不一会儿，他们就乱了阵脚逃跑。于是约300名英军登陆，几乎未遇抵抗，到下午1点半就完成了对虎门炮台的占领。尽管英军炮击猛烈，但中方死者却出人意外地少，据说只不过20人。^③一说只有12人。^④但战死者中有水师提督关天培，游击麦廷章等。^⑤据说关天培是右胸中弹而死，^⑥一说是被英军以刺刀刺杀^⑦享年60岁。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178.

② J.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London, 1843, Vol. II P. 64.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177.

④ J. E. Bingham, op. cit, P. 60.

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四，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壬午，已革大学士琦善、广州将军阿精阿、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怡良、汉军副都统英隆奏。

⑥ J. E. Bingham, op. Cit, P. 61.

⑦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177. W. H. Hall & W. D. Bernard, op. Cit, 160.

中方的报告说：关天培“胸受炮伤，头面臂腿均受刀伤，殁于行阵”。（《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六，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戊申，杨芳又奏。）

北横档为江河中小岛，无处可逃，因而清军约有300人战死、1000多人被俘。而虎门则十分宽阔，有处可逃，因而遇难者极少。然而，为数不多的战死者中却有最高指挥官和高级军官，这是由于在英军开始炮击不久兵卒就作鸟兽散，留在炮台上的只有关天培跟前的二三十人。副将刘大忠一时传闻战死，一个月后才弄清，他实际上是率先逃跑、躲藏起来了。^① 仅此一事，即可窥见当时清军官兵是何等缺乏斗志。

关天培的尸体，因无法确认，而被英军连同其他战死者一起掩埋了。次日，一个自称是关天培亲戚的人打着白旗来辨认关天培的尸体，然后将其运走了。当时英军通过军舰“伯兰汉”号鸣放礼炮，向这位勇敢的老军人致哀。^②

最后一个目标是横档西面位于南沙山东岸的巩固炮台。进攻从下午4点开始。这里有守军1500至2000人，但他们在英军刚开始进攻时就马上溃逃了，英军顺利地占领、破坏了这个炮台。^③

仅一天当中，英军掳获或破坏的大炮就达380门（或405门），其中有虎门的177门（《中国丛报》说是205门）^④，横档的190余门，巩固炮台的约40门。^⑤ 如再加上23日在三门口破坏的大炮80门，则总数为460门至480门以上。由此可见，虽然琦善说配置于虎门的大炮数达400余门，但实际上要多得多。梁廷枏说虎门一带的大炮有省城运去的300余门、林则徐买来的洋炮200余门，它们均归英军所获。^⑥ 很可能在虎门等六处炮台配置了500门左右的大炮。只有一点，即梁廷枏说林则徐购入、配置了200余门洋炮，但据英方记载，虎门炮台的大炮中只有1627年葡萄牙造超大型大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1959年版）第57页。
据怡良等报告，刘大忠落海遇救后，约有一个月不见行踪。（《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壬辰，怡良、阿精阿又奏。）

② J.E.Bingham, op.cit, P.67.

③ ibid., p.65.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178.

⑤ W.H.Hall & W.D.Bernard, op.cit, p.161.

⑥ 《夷氛闻记》，第57页。

炮4门、英国造铁制大炮3门，而其他都是中国造大炮。^①不管怎么说，配置于虎门一带的500门左右的大炮，仅在两天当中，就几乎全被英军掳获或损坏了。

关于中方兵员的损失，英方的记载说死伤者在500人以上，被俘者为1300人。中方记载未见。比较起来，英军的损失过于轻微，不过是几艘军舰受了点伤，5名士兵负了轻伤。^②胜败之差是太悬殊了。而这种差距，在后来的战斗中也完全没有缩小。

突破虎门、横档防线的英军，为了乘中方因虎门陷落而发生恐慌之机一举进击，在27日早晨就派5艘小军舰和2艘轮船溯河而上。这些舰船途中未遇到什么抵抗，当天正午刚过，就到达了黄埔下游不远（距虎门约20里）的珠江北岸乌涌炮台前面。该炮台周围江中及对面航道上设置了坚固的木筏，木筏上游不远停泊着林则徐从英国买来的军舰“甘米力治”号（载英国造大炮34门）和1只载炮10门的师船，在上游更远处，可以看到停泊着40多只师船。^③

守卫乌涌炮台的是湖南提督祥福指挥的湖南兵1000名和督标兵500名^④（一说湖南兵900名，本省兵700余名）^⑤。其中湖南兵是2月21、22日抵达广州后被火速派来的，刚投入守备。

英军舰队中最先接近该炮台的是轮船“复仇神”号，下午1点半过后，双方开始炮击，2点左右，又一艘轮船参加炮击。中方守军十分善战，但当3点左右其他5艘军舰到达，炮台遭受到猛烈炮火时，广东兵先溃，接着湖南兵也开始溃逃。英军陆战队不失时机地在3点半登陆，到4点完成了对炮台的占领。炮台上60门大炮被破坏，军舰“甘米力治”号被烧毁。^⑥

① W. H. Hall & W. D. Bernard, op. cit, P. 161.

② ibid., P. 160.

③ ibid., P. 167. J. F. Bingham, op. cit, PP. 68-69.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四，道光二十一年二月戊寅，琦善等又奏。

⑤ 同上，卷二十四，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壬午，已革大学士琦善，广州将军阿精阿、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怡良、汉军副都统英隆奏。

⑥ W. H. Hall & W. D. Bernard, op. cit, p. 170.

关于中方的死伤者，英方的记载说有死者200名，^①或曰死伤者有300名，^②或曰死者约有500名。^③而中方的报告（杨芳的上奏）提到乌涌之战中湖南兵的损失，说“阵亡镇将备弁31员，兵丁415名，回营兵丁456名”。^④仅湖南兵中就有31名军官，415名士兵战死，若将广东兵算进去，中方战死者的数字会更大。

据梁廷枬记述，乌涌炮台与珠江北岸之间隔着水路，以桥连接。因英舰炮击，广东兵溃逃，接着湖南兵亦溃。此时管理乌涌小粮台的候补知县瑞宝也一同逃出，因恐落后被弃而不顾，急呼仆役撤去桥板，于是来到河岸的兵勇被后至者推挤，相继坠入河中，死了不少。^⑤此外，为逃往北岸而跳河被溺死、或被英军开枪打死的人也有上百。^⑥

率湖南兵远征的提督祥福、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达科等在炮台上作战勇敢，但据说在逃走途中坠河溺毙。

关于这次战斗中英方的损失，后来参赞大臣杨芳在奏报中，为赞扬湖南官兵的奋战，讲道：“除炮击沉溺之外，短兵相接，砍毙逆夷，多于官兵”。^⑦杨芳2月1日领命任参赞大臣，他的原职湖南提督未动，因而自然要大力宣扬湖南兵的骁勇。但他的话完全是假的，真实情况是：“复仇神”号等船挨了几发炮弹，但并未受到可以影响以后参战的损伤。至于官兵伤亡，也只不过是1人战死，8至9人负伤。^⑧义律在这次战斗中，也始终在“复仇神”号上观战。

在乌涌上游，如前所述，设置着长约550码（约500米）横断河面的坚固木筏。据说为此所需的巨额经费是命令行商分摊的。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179.

② W. H. Hall & W. D. Bernard, op. cit, p. 170.

③ J. E. Bingham, op. cit, P. 70.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道光二十一年三月辛卯，杨芳又奏。

⑤ 《夷氛闻记》，第58页。

⑥ W. H. Hall & W. D. Bernard, op. cit, P.

⑦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道光二十一年三月辛卯，杨芳又奏。

⑧ W. H. Hall & W. D. Bernard, op. cit, p. 170.

28日一整天，英军都在拆散木筏。过了这里，河面变宽，就到了所谓黄埔停泊区。这里是来自外洋的西方船只等的抛锚处。在停泊区西面，细长的黄埔岛朝西横卧。从黄埔停泊区到省城约有30公里。到了连接黄埔西面的琵琶洲西端，离省城就只有约20公里，从船上可以遥望城墙。

3月1日，轮船“复仇神”号沿黄埔北岸溯河而上，探寻水路，在侦察了琵琶洲西端的琶洲炮台（Howqua's Folly，或Howqua's Fort）之后返航。次日，英舰“硫磺”号与运载陆战队的舢板数只一起进攻琶洲炮台，在驶至该炮台附近时，突然受到河岸上隐蔽得很巧妙的炮台的打击。英军马上反击，陆战队登陆，占领了炮台，驱逐了守军，破坏大炮23门。清军约有20人战死，英军1人战死，几人负伤。^①（关于这个炮台的陷落，中方没有任何记载，因而其名称不详。从英方记载来看，该炮台的位置相当于后来修筑定功炮台一带地方。）

制服了这个炮台后，3艘英舰和2只运输船开始进攻琶洲炮台。但由于炮台守军看到英舰开来而迅速逃跑，英军得以轻易地占领这个有30门大炮的炮台。^②

在琶洲炮台上游不远，江中的中洲（二沙）尾部设有二沙炮台，它北面的对岸上设有猎德炮台。

琦善在英军进攻乌涌时，考虑到如果乌涌陷落，则二沙尾最为紧要，就在已经配备抚标兵300名的基础上，将2月27日刚到广州的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所率2000名官军迅速派往二沙尾驻防。^③当乌涌陷落、英军由黄埔闯到二沙尾前面时，琦善与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汉军副都统英隆联名上奏，表示了坚决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179, J. E. Bingham, op. cit, P. 74.

② W. H. Hall & W. D. Bernard, op. cit, P. 172. 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实考》（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75页云：英军于3月1日攻陷琶洲炮台，3月2日占领猎德炮台。这大概是依据《光绪广州府志》卷八十一〈前事略〉、《同治番禺县志》卷二十二〈前事志〉等的记载而得出的结论，其实是错的。琶洲炮台陷落是在3月2日，而猎德炮台陷落，如后述是在3月6日。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四，道光二十一年二月戊寅，琦善等又奏。

抗战的决心：

自是之后，逆夷猖獗愈甚，竟将兵船火轮船联络（结）多只，乘潮驶至距省不过三十里之二沙尾地方。虽飭沿途将弁竭力抵御，惟逆焰正极凶狠，恐即近逼省城。臣等愤激之下，誓不与此逆同生，惟有会同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督率文武，戮力同心，坚拒固守。闻参赞臣杨芳已入粤境，即委员飞往迎催，即日至省，妥商剿办。①

这件上奏是琦善在广东发出的最后一次上奏。文中称英舰已驶至二沙尾地方，这实际上是指英舰在二沙尾对岸的琶洲炮台附近活动。所以此奏似是3月1日或2日发出的。

2月28日（二月初八日），琦善还与广东巡抚怡良联名向省城内外居民出示，叙述了英逆现在正向内河进攻的情况，然后说：

现在各处险隘均已布置稠密，凡进省各隘无不派兵把守。倘该逆尚敢肆扰，本部堂院自当亲统兵前往，实力扫除，以舒众心。况各省大兵不日云集，钦授靖逆将军、参赞大臣即可到粤，协同剿灭。为此示谕尔等各安生业，不必张皇，勿为传言摇惑也。②

从这个告示和前引上奏来看，至少在2月28日至3月1日或2日，琦善大体上是持坚决抗战态度的。但是到3月3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英军虽然在3月2日攻陷了琶洲炮台，但在琶洲炮台上游不远，即二沙尾、猎德两炮台和琶洲炮台之间，打着两排木桩，这些木桩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四，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壬午，已革大学士琦善、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汉军副都统英隆奏。

② 《资料篇》，第266页，琦善·怡良告示（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颇为牢固，并且水流也很急，因此拔去木桩的作业进展缓慢，英军的进攻也暂时停顿下来。于是，3月3日下午，中国通事来到英舰，带来了此时仍在广州的美国代理领事多利那（W. Delano）给义律的信。^①多利那领事的信的日期是3月2日，信中说：“广州知府余保纯要求我转达：他有意在明天派一名或数名官吏拜访阁下。他们准备在明天上午10点持白旗从广州出发，因此恳请贵军在他们到达之前停止作战行动”。^②据说此信送到后过了一小时，余保纯也赶到了。

据义律的报告说，余保纯是代表琦善来舰的，其目的在于以琦善已被剥夺一切权力，不能调解纷争为由，要求义律停战。英方的其他记载说，余保纯说明了“琦善被解除钦差大臣之职，而继任者尚未到任”的情况。^③

仅两三天前还与将军、巡抚、副都统联名向上下表示坚决抗敌决心的琦善，至此为何来个大转弯向义律提出休战呢？有些令人费解。并且，余保纯作为要求休战的理由而提出的所谓“琦善被剥夺了调停纷争的一切权力”，又是怎么回事呢？要解开这个疑团，有必要略为回顾一下大角、沙角陷落后琦善与道光帝之间的交涉经过。

据林则徐日记说，在琦善提出休战之前三天，即3月1日（二月初九），令革去琦善的大学士的上谕传到广州。^④这道上谕，是道光帝对琦善在与义律的第一次会谈后，经过与广东高级官员反复商议而向道光帝提出改变对英政策的建议所给的回答。

① 据义律的报告说，信由一名通事送来。（Elliot to Palmerston, No. 10, Macao, 10 March 1841）而宾汉（J. E. Bingham）书，第75页上说，行商伍浩官（伍绍荣）和卢茂官（卢继光）偕通事一人，和美国领事及一个西班牙人一起来了。伍绍荣和卢继光当时是总商，因而同来倒有可能，但说美国领事亲自来则令人怀疑，多半是误记。

② Delano, etc, to Elliot, Canton, 2 March, 1841, Inclosure No. 5 in Elliot's No. 10 of 10 March, 1841. (F.O. 17/47)

③ W. H. Hall & W. D. Bernard, op. cit., P. 173.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83页。

在这以前,即1841年1月6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道光帝接到琦善上奏,得知义律要求赔偿烟价,割让一岛,增设通商口岸,“览奏愤恨之至!”他认为“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并说不许接受义律的任何要求,今后逆夷来投递文书也不许收受,不许琦善派人与义律交涉。他打定主意武力讨伐,因而命令琦善整饬兵威,严整纪律,若逆夷接近口岸,即当见机剿办。^①

发出这道上谕的时间是英军进攻大角、沙角的前一天;而这道上谕传到广州的时间是1月20日。这期间,琦善受义律逼迫,已经同意英人在香港寄居贸易,义律就在这道上谕传来的同一天,发表了宣布达成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初步协定的声明。

至此,是遵照上谕中断一切交涉、准备开战,还是继续与义律交涉?琦善自然要为此问题大伤脑筋。结果,他不得不作出结论:内河的防备态势还很不严密,在这种状态下中断交涉、立即开战,是绝不能行的。他无视道光帝的严谕,于1月27日赴莲花城,出席与义律的会谈,进行条约交涉。并且,在会谈结束后,他马上向道光帝报告了会谈情况,并详述内河防备单薄,无法抵挡英军的攻击的情况,说与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以及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会商,皆称“藩篱难恃,交锋实无把握”,总之是力言目前不可开战,而应暂示羁縻,备剿讨于将来。^②

直到此时的琦善的行动,是象后来道光帝责骂的那样视之为“无能不堪之至”呢,还是视之为基于自己信念的勇敢行动呢?这很难下一断语。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皇帝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为臣者只能遵守而决不能抗命。然而琦善竟完全无视上谕,独断专行,而且明确反对皇帝拟定的方针,促其改变,这在当时是舍命的行为,决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十八，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庚午，谕军机大臣等。

② 同上，卷二十二，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辛亥，钦差大臣大学士兼署两广总督琦善奏。

从琦善入仕途后一再破例升迁的经历也可看出，他是满族官员中的佼佼者。^① 他为道光帝所信赖，1831年后任直隶总督，1836年协办大学士，1838年又任文渊阁大学士，在当时的清廷内是仅次于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实力派。所以，琦善即使在赴粤之后，也还是自信道光帝和廷臣会充分倾听他的意见。凭着作为清朝柱石的自觉，他似乎有很强的责任感，认为在关系国家安危的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信念。这种自信心与责任感，使琦善敢于无视上谕、独断专行，始终坚持议和的主张。

但是，琦善犯颜直谏不仅毫无效果，反倒只是激怒了道光帝。

琦善的上奏到京时间是2月16日（正月二十五日）。道光帝见琦善竟胆敢无视上谕，继续与义律交涉，而且把不许收受逆夷文书的严令也不当回事，甚至故意将义律的信附来，代为奏请，大为恼怒，马上挥笔写下朱批：

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②

最后所谓“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是指琦善逐条详述防备态势薄弱的情况，总结之后力言“交锋实无把握”。

当天一道上谕发出，其中述及琦善因英夷归还大角、沙角、

① 琦善是满洲正黄旗出身，为清初功臣恩格德尔第8代后裔，世袭侯爵。生年不详。义律1840年8月在白河口与琦善会见，说琦善当时有54岁。由此推算，他的生年在1786年，也就是说与林则徐同岁，或小一岁。

琦善1808年起为官，以刑部员外郎为起点，1814年任河南按察使，1819年迁河南巡抚，1825年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1827年因河工失败被免去两江总督，经过内阁学士、山东巡抚，1829年又被任命为四川总督，1831年调直隶总督。而林则徐初任巡抚（江苏）还是在1832年。（A.W.Hummel, Eminent China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1943, PP.126-7, 511.）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二，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辛亥，钦差大臣两大学士署广总督琦善奏。

保证从定海撤军而奏请许其所请、暂示羁縻之事，说“览奏曷胜愤懣，不料琦善怯懦无能一至于此”；接着又说英逆在浙江、广东肆虐覆载难容，命令奕山、隆文速赴广东一扫丑类，督抚严加防备，如英军来攻就加以剿灭。然后，上谕斥责了琦善之过：

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申明大意，拒绝妄求，竟甘受逆夷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屡奉谕旨，不准收受夷书，此次胆敢附折呈递，并代为恳求，是诚何心？^①

上谕还说，琦善既奏称与同城之将军、副都统、巡抚、学政及司道府县会商，却为何将军阿精阿、巡抚怡良未同时在上奏上署名？可见琦善所奏显然不实。上谕最后说：

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②

以上的说明嫌长了一些，现在话归正题。这道上谕于3月1日传到广州。

不过，这道上谕只不过是在最后说革去琦善大学士职务，却未动他的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职务。所以在此阶段，琦善只被解除了大学士职务，而仍有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地位。但是，如前所述，义律报告说，3月3日代表琦善来见义律的广州知府余保纯，称“琦善已被剥夺一切权力，不能调停纷争”，要求停战。按照前面的说法，则余保纯所称“琦善已被剥夺一切权力”就有些可疑了。当时余保纯究竟是个什么讲法，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具体情况，这一点我们不清楚。我想余保纯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以前的上谕命令琦善不准收受夷书，亦不准派人与义律交涉，而琦善却违抗上谕进行了交涉，为此在这次上谕中受到斥责，从而已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二，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辛亥，谕内阁。

② 同上，谕军机大臣等。

经完全不可能再与义律交涉了。这就等于琦善被剥夺了与义律交涉的一切权力。因此，余保纯直截了当地告诉义律：“琦善被剥夺了调停纷争的一切权力。”

尽管如此，以琦善被剥夺一切权力为由，突然向义律要求停战，还是很不好理解。因为琦善被禁止与义律进行任何交涉虽是事实，但同时琦善也不断接到命令全力剿英的上谕。3月1日传来的上谕对琦善没有直接重复这些命令，但却督促奕山、隆文迅速驰赴广东，一扫丑类，同时要“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尤当加意严防，来即攻击，务令片帆不返。在与这道上谕同一天发出的另一道上谕中，对琦善委以严加防守之责，说：

现已明降谕旨，痛加攻剿，并命奕山等兼程前进，声罪致讨。惟大兵未集以前，难保该夷不复肆猖獗，著即责成琦善设法堵御调兵防守。倘仍执迷不悟，以致再有挫失，朕惟琦善是问，国法具在，决不稍为宽贷也。

这样一来，琦善自应全力堵御了。可是琦善却在接旨两天后，派遣余保纯向义律乞求停战，这显然是他对上谕的违抗。那么，他为何到这个地步还敢抗旨不遵呢？

如前所述，琦善于2月28日与广东巡抚怡良联名向省城内外居民出示，在3月1日或2日还发出了与广州将军、广东巡抚、汉军副都统的联名上奏（将此奏发出的时间推断为3月1日或2日，根据是其中提到英舰驶至二沙尾地方，以及英舰于3月1日开始在黄埔西端活动，于2日攻陷二沙尾下游的琶洲炮台。但是，这件上奏不是在2月16日发出的上谕3月1日传至广州后写的。如果这件上奏写于接奉3月1日传来的上谕之后，那么在上奏的开头就会写出此谕，但实际是没有写。因而这件上奏很可能是在3月1日接到上述上谕之前发出的），其中表示了坚决抗战的决心。然而到第二天，琦善就态度大变，决定派余保纯请求义律停战，还请美国

领事多利那居间斡旋。琦善的方针，为何变化如此急遽呢？

在3月1日、2日两天当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3月1日传来革去琦善大学士的上谕，一件是2日琶洲炮台陷落。这两件事都是对琦善的巨大打击，而上谕的打击大概要沉重得多。

如前所述，琦善在结束与义律的第一次会谈后，力言目前不可开战，应暂示羁縻，备剿讨于将来，奏请改变政策。而上述上谕就是对他的回答。琦善也许曾怀着极大的不安和期待，盼望着朝廷回音。自然，从在此以前道光帝的激昂的调子看，他本人也不会认为自己的主张会顺利地被采纳。尤其是通过与义律的第二次会谈，义律坚持主张割让香港全岛、绝不退让的情况明朗了，在会谈结束的第二天，又接到派遣奕山等三大臣的上谕，由此似乎琦善也丧失了自信。因而在报告与义律的第二次会谈的上奏中，已不见主张言和的言词，却称：

此后该夷再来投文，自应遵旨拒绝。所有备剿事宜，亟须加紧筹办。^①

这就是说他将断绝与义律的交涉，加紧备战了（实际上此后一直到2月20日还与义律有文书往复）。可是在第一次会谈后发出的上奏中，琦善是极尽委曲，陈述敌我力量对比的实情，豁出他的政治生命建议改变政策，由此看来，他对这次上奏的结果似乎是抱有一线希望的。他在发出请求义律延期签约的照会时，让鲍鹏请求再延期10天，这也许只是为了赢得备战时间；但也可以作这种解释：他预计对他的上奏的答复在2月底或3月初就会传来，因而要求把签约之期延缓至那个时候。（当时北京、广州之间传递信件，急件通常需15天，特急件需13天。琦善的上奏似是2月1日或2日发出的，因而预计对它的答复最早在2月28日或3月1日送到。）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三，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乙丑，已革大学士琦善奏。

正如预计的那样，道光帝的答复3月1日送到琦善手里。由此，琦善所抱的那一点期待完全破灭了。与义律交涉的余地完全没有了，攻剿之事委诸奕山等三大臣，琦善已是无用之人。然而同一天发出的另一道上谕又命令琦善在奕山等到达之前极力防守，如果“再有挫失，朕惟琦善是问”，把守卫城的全部责任委诸琦善一人。对琦善来说，这真是残酷的命令。这道上谕发出时，英军尚未开始进攻；而琦善接奉这道上谕时，英军已经攻陷虎门、乌涌，即将兵临城下，因而琦善的“挫失”之罪已是在所难免了。如果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英军两三天内就会打到省城，最坏的结局就是琦善被问以省城失陷之罪。琦善完全陷入困境，焦灼不安。他终于向义律请求休战以作为救急之策了。

上述上谕委诸琦善的守城之责一直持续到奕山等到达。奕山与隆文从北京赴任抵达广东还不是近期的事，但参赞大臣湖南提督杨芳，是在从湖南赴京觐见途中，在安庆领命赴粤的，^①由此折往广东，已入广东省内，预计不日即可到达。关于杨芳的使命，起初的上谕（2月8日，正月初八发）是说“著迅即驰驿前往，会同琦善，相度机宜，和衷剿办。”^②然而，与3月1日传到广州的上谕同一天发出的给杨芳的上谕却说：

该大臣到粤在奕山、隆文之前，如有可乘之机，即迅速进剿，总当一鼓作气，不必候奕山等到粤始行攻击，^③（译者按：此谕发出时间为1月31日即正月初八日，而3月1日传到广州的上谕发出时间为2月16日即正月二十五日。作者所述时间有误。）

这里没有命令他与琦善协同进剿。从而琦善在杨芳到达后，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十，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己亥，参赞大臣杨芳奏。

② 同上，卷二十，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甲午，又谕。

③ 同上，卷二十二，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辛亥，又谕（寄谕参赞大臣杨芳）。

可将军事委诸杨芳专办，而无与之协同的必要，同时也就解除了与防守相伴随的责任。因此，琦善想在杨芳到达前的几天内使英军停止进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于是琦善派余保纯赴义律处，力言“琦善已被剥夺了调停纷争的一切权力”，因而即使继续进攻，向琦善施加压力也是无用的，恳求停战。琦善的想法是：义律进攻广州，目的在于对琦善施加压力，签订条约。既然琦善已被禁止与义律进行任何交涉，那么不管义律怎样以武力威逼，他也难以有所作为，因而义律动用武力实际上是徒劳的。如果把这种情况讲明，义律也许会理解而答应休战的。

义律在余保纯恳请休战后，同意停战，直到3月5日上午11点。但这时义律所提出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他将由三条组成的《约议戡兵条款》交给余保纯，告知：“如果琦善阁下在上述期限之前不与义律会见，订此条款，英军将再次开始进攻”。^①《约议戡兵条款》全文如下：

一 偿还英国军师使费，暨商人亏失诸项，准以洋银1200万元赔缴。其一半为洋银600万元。于3日内即行先缴。下余600万元，准于明年同月同日缴清。尚未清缴以先，英国军师现已占据各地仍行据守，俟经清缴后，只将香港等处金岛，及崎对之尖沙嘴一地仍为据守，其余诸地，概行缴还。

一 前日约议善定事宜章程，仍如所议大同小异办理。惟有给予香港等处一条，须加以尖沙嘴地名，并应改写在九龙设关，验明挂号。又有中须加书章程，如偿还洋银1200万元一条；行欠准于3年之内清还，3年清还之后，不再限于洋行买卖，统准众商与英商交易一条；倘有格外施恩、免宽别国人民之处，允准一同施恩英国人

^① Elliot to Palmerston, No. 10. Macao, 10 March, 1841. (F.O. 17/47)

民一条；暨尔后约文中间遇有争论难解之处，即照英文解释为准一条。〔以上共改书一条，加写四条。其余章程，俱同前日所议施行，今准予3日以内，即行盖付公印为据。〕

一 准予3日之内即行开港贸易，议以来粤各船本春即在黄埔贸易可也。

大清钦差大臣与大英公使大臣于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午时，共同当面盖付公印。①

上文中第二条加括号部分为英文所无，只见于给余保纯的汉文本。英文中的中国方面盖印者只写作钦差大臣 (Imperial High Commissioner of the Chinese Court)，没有特别列出姓名。而汉文中则列出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及邓廷桢的名字，作为中方盖印者。这是由于听信了余保纯关于琦善已被剥夺一切权力的说明，而要求上述四人代琦善联名盖印。

看过上述条款即可明了：义律所提出的休战条件，在以前他与琦善协商的条约的基础上，增加了支付军费1200万元、除香港之外割让尖沙嘴、废除行商对贸易的垄断、给予英国以最惠国待遇、条约解释以英文为准等条款，这些条款连同以前所议各条，都要予以承认。较之以前逼迫琦善签订的条约，《约议戢兵条款》要苛刻得多，因而琦善也绝无可能承认这些条件。

不过，这些休战条件是由琦善独自掌握着，还是也让怡良等得知并与他们商议过呢？这一点中方的公文中全然未提。只是钞录了鸦片战争中的上谕、上奏、布告以及主要是浙江一带的冗杂的情报的《入寇志》（钞本，编者不详）所收录的《广东事略》中，有以下有趣的记载：

其中先说：

① Inclosure No. 3 in Elliot's No. 10 of 10 March, 1841. (F.O. 17/47)。《资料篇》86-87页，《约议戢兵条款》。

(二月)初十日(3月2日) 噶夷义律差人请广州府当面讲话,多有要事。

接着又说:

十一日(3月3日) 琦侯暨各宪再令广州府一往,亦颇有成议。噶夷兵船暂退数里,此时各宪束手无策,大家未能主张。^①

《广东事略》简单地叙述了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进攻沙角炮台,到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进攻内河的经过。从现在印出来的文字看,只有两页另三行,算是极短的记载了。据文章末尾的附记,这是一个叫郭声云的人从广东带回的文书。记载虽极简单,但全部内容却相当真实。特别是上述两条记载,完全不见于他书,是颇为宝贵的。

上述3月2日(二月初十)的记载,说义律要求交涉,这是违反事实的;另外3月3日的记载说琦侯及各宪“再令广州府……亦颇有成议”,何故言“再”、“亦”,不得而知。但两条记载的日期是准确的。

这些记载中重要的,是3月3日条所述“琦侯(琦善)暨各宪”命广州知府余保纯赴义律处,及“各宪”对余保纯带回的成议“束手无策”。由此可知,为向义律要求休战而派遣余保纯决不是琦善个人的决定,而是与高级官员协商后进行的;对于义律提出的休战条件,琦善也没有秘而不宣,而是拿到高级官员中讨论,可“各宪”亦“束手无策”,即拿不出相应的对策,其他人也没能提出什么意见。

如前所述,《广东事略》中也有些含混不清之处,但仅就3月3日的记载来看,应该说基本上是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事实。

除此之外,《同治番禺县志》卷二十二〈前事志〉(三)中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3月4日)条也记曰: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14—315页。

广州府余保纯，往黄埔议款，未成。

这里日期是错的，而且内容空洞。林则徐日记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记载，其他各书也没有记载。

上述休战要求，大概是琦善与极少几个高级官员协商提出的。但这一计划不外是对义律屈服，因而他们对外要极力隐瞒。这是没有疑义的。结局是琦善为首的高级官员面对义律提出的休战条件，束手无策。于是无须说，3月5日停战之期过了，也不见余保纯对义律作出任何答复，条约最终没有订立。

这样一来，停战只维持3天就告终了。不过，这次停战对中方还是有些好处的。其一，参赞大臣杨芳于3月5日（二月十三日）到达。^①杨芳是71岁的老将，因身经百战而深孚众望，所以他的到来大大振作了广东官民的士气。梁廷枏记载说，杨芳到达后，“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②

其二，这期间多少可以加强一些防备。3月4日义律照会二沙尾炮台指挥官，从目前停战，正在交涉停战条约，要求停止军事工程，并称若不停止，英军将重新进攻。^③炮台指挥官应允，但在英军视线不及之处仍抓紧加强工事。^④据林则徐日记说，他自己于3月1日赴二沙尾视察河道，下午赴福潮会馆，商议招募泉州、漳州乡勇；3月3日、4日亦赴福潮会馆募集壮勇，得560人，将他们布置于广州永清门内东西侧。^⑤此外，各方面都在加强。

但是，英军也同样在有效地利用这次谈判。停战期间，英军探查了通往广州的水路。

从黄埔去省城，通过黄埔东侧，穿过二沙尾与猎德之间溯水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四，道光二十一年二月甲申，参赞大臣 杨 芳奏。

② 《夷氛闻记》，第58页。

③ 《资料篇》，第87页，义律照会，1841年8月4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④ 同上，第88页，张永芳照覆，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⑤ 《林则徐集·日记》，第383—384页。

而上，是最近的。但二沙尾猎德上游一带水浅，大船航行困难。因此只有从黄埔向西南，走绕过河南南侧的水路。但在以前，西方船只没有走过这条水路，还不知道从这条水路是否能够到达省城。因此出100元酬金雇来中国引水，由轮船“复仇神”号从黄埔进入绕过河南南侧的水路，行至大黄滗。调查结果证实：军舰可以航行，而且途中没有设置水中障碍。^①

还在停战之前，3月2日，郭富将军就从马德拉斯到达，担任了陆军总指挥官。并且，2月24日撤出舟山的5艘军舰和陆军也到达黄埔，因此英军的兵力也大大加强。

停战期一过，3月6日英军就恢复了进攻。二沙尾炮台前面的木桩拔去后，英舰逼近炮台，守军马上遁逃，因此英军毫不费力地将二沙尾炮台连同35门大炮一起占领了。猎德炮台也是同样，守军丢下44门大炮逃走，英军轻而易举地占领。由于两个炮台守军逃跑都很快，因此几乎没有死伤者。^②

关于二沙尾、猎德的防备，李德庵记述说：

猎德、二沙尾虽沉船塞石，但无兵无炮，夷船至拔之可除。

① W. H. Hall & W. D. Bernard, op. cit, p. 174.

② 关于二沙尾及猎德炮台的失陷，杨芳和其他人的上奏全未提及。只有《同治番禺县志》卷二十二《前事志》三、《光绪广州府志》卷八十一《前事略》中记载了。但时间有若干混乱。《同治番禺县志》记曰：

初九日（8月1日）夷人陷琶洲炮台。

初十日陷猎德炮台。（采访册）

十四日夷人陷二沙尾炮台。（采访册）

《光绪广州府志》的记载也大致相同。说猎德炮台8月2日失陷是错的。

《林则徐日记》（第384页）二月十六日（8月8日）条记曰：

闻英逆炮攻猎德、二沙尾炮台。

这里记述猎德、二沙尾炮台于同一天失陷是正确的，但日期迟了2天。

《英夷入粤纪略》（《鸦片战争》第8册第4—5页）记曰：

初十日（8月2日）又失琶洲土台卡座。

十三日又失猎德炮台。十四日又失二沙尾炮台。诸守炮台官兵皆闻风先遁。这段记载最接近史实。

前面说过，这两个炮台前面的河中钉着两排坚固的木桩。但是，当英军将木桩拔除时，炮台守军袖手旁观，这是事实。二沙尾驻有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所率清军1000名，决不是象李德庵所说的“无兵无炮”。只因为士兵毫无斗志，所以结果等于“无兵无炮”。

如果英军继续进攻下去，广州也许在一两天就会燃起战火。但义律这时一下子停止了进攻，而与中方进行恢复贸易的交涉。

英军停止进攻与杨芳的对策

二沙尾炮台陷落后不久，义律发出布告，声明英军就此停止进攻，把广州府城从战火中拯救出来。布告全文如下：

致广州市民布告

本公使大臣等奉大英国国主恩旨，与善良市民相处以仁爱为怀，欲使广州城免遭战火。惟中国上宪若于现驻据守处之英军稍加妨碍，则英军必以武力应之，加害广州。至若阻碍华商与英国及他国商人自由买卖，则立刻停止广州全部通商。本公使大臣等出于诚心，全力防止战火。事态至此地步，责任全在中国皇帝侧近之奸臣。制止事态更加恶化，惟待在省上宪作出明智、稳健之判断。

英国全权公使查理·义律

1841年3月6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于二沙尾炮台河面^①

关于这一布告的发出，义律只作了这样的说明：“英国政府也不认为必须使这个大城市燃起战火，因此为使居民对其安全放

^① No. 6 in Inclosure No. 2 in Elliot's No. 10 of 10 March, 1841. (F O. 17/47)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180.

心，在征得陆海军各司令官同意后，决定发出这个声明”。^①但是，这一声明决不是只以安抚广州市民为目的，这是毫无疑义的。读过声明会立刻发现，它的内容实际上是以间接的方式向省城当局提出两点：英军就此停止进攻，因而中方也要停战；不得阻止中国商人与英商及其他外商交易，即全面恢复广州对外贸易。义律鉴于头一天休战条约交涉的失败，认为琦善已被剥夺一切权力，其继任者又未任命，在此状况下即使进一步进行条约交涉也没有意义，因而当前应采取的方法是以不使广州燃起战火显示恩惠，由此防止市民发生慌乱，同时向省城当局施加压力以恢复贸易。这样，义律此后的目标就只是尽早恢复中外贸易。

据义律报告说，在攻陷二沙尾炮台，发出上述声明后不久，与广州知府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至于余保纯为何这时马上来见义律，则未作任何说明。或许他是为与义律就休战条约进行交涉而来，偶然碰上声明发表。

在这次会谈中，义律对余保纯说：

我很清楚，钦差大臣已被剥夺了处置由北京邪恶的廷臣酿成的极端困难的事态的权力。但是，我必须要求通过他排除进行贸易的障碍。如不恢复通商，我们就只得封锁广州，禁止其通商，并在外国商馆前派驻大量军队。

对此，余保纯答称：

公使阁下看到了中国民众的状况，因此一定会充分了解省城当局也盼望马上恢复通商。但这不得皇帝批准是不可能的。可是英方似乎相信积极进行贸易不会受到任何妨碍。^②

余保纯一方面迎合义律关于恢复贸易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又

^① Elliot to Palmerston, No 10, Macao, 10 March 1841 (F.O.17/47.)

^② 同上。

以未得皇帝许可为由，说明难以接受义律的要求。义律本人认为以武力迫使广东当局恢复贸易是轻而易举的，但那样一来，商人和货物就会从广州离散，毫无意义。怎样才能让商人与货物都留在广州以待贸易恢复呢？义律为此煞费苦心。这一情况，义律在记述了上述会议情况后写的一段话中讲得很清楚：

我作为广州的实际支配者，不能不认为在这一点（即恢复贸易）上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强制广东当局。但看到人心极端不稳的现状，我痛感我们的头等大事，就是使携带财产正陆续离开城市的居民中的商人们放下心来。^①

据英方记载，在休战期过后的3月6日，“中国当局表现出的态度颇为险恶，他们发出严令，禁止居民向英军提供食物。因此以前无所畏惧地来到英舰船舷边的小船突然完全匿迹。并且，还有情报说广州土著商人们奉命将所有茶叶和生丝转移到市外。因发现这种动向，义律便向广州居民发出布告，声明不会使广州遭受战火”。^②根据这样的记载，可知在广州，商人与货物向市外转移实际上已经开始，义律为此感到忧虑而马上决定停止进攻。为了明确显示英军确实停止了进攻，让陆军撤至北横档，让军舰退至黄埔。除此之外，3月7日又向琦善发出以下照会，告知英军停止进攻，同时要求中方也停止敌对行为：

现因恭奉国主恩旨，虽在交战之间，尚应以仁爱存心，怀柔良民。是以本公使大臣等欲饒省会，拟定止军不再前进。惟恐省内复有出示赏格，吓呼杀死英官，须应先行照会贵大臣爵阁部堂。倘或本公使大臣等访问上宪

① Elliot to Palmerston, No.10, Macao, 10 March 1841. (F.O.17/47)

② W.H.Hall & W.D.Bernard, op.cit, p.175.

再行如此无羞妄为出示，抑或查知有自省会以下四面地方作成武工，以为相敌，则英军必不得已，即应前进对敌。且念此时已大皇帝驳诘不准秉公施义，未肯赔偿于给，反以猛强之语吓为剿灭英军，故不能再延，应即勉力交战，必向沿海各省及京师御城就行攻敌，以肃国威、以彰大公之义也。^①

这件照会只是表示：在广州只要中方没有敌对行为，英军就不再进攻；英军的进攻今后将转向北方各省。而对最要紧的恢复贸易问题，则一字未提。不过，恢复贸易之事在前引《致广州市民布告》中已经提出了强硬要求，并且对余保纯也提出过，因而义律的意向自然是完全传达给中方了。所以，尽管义律在这个照会中只告知英军停止在广州的进攻，一字未提恢复贸易之事，但他最关心的仍然是中方将对恢复贸易的要求作出什么反应，这是没有问题的。有一种说法，说英方与为义律和余保纯会谈而斡旋的美国代理领事多利那等联系，期待他就恢复贸易问题与中国当局交涉。

但中方的公私记载，无论是对义律提出休战之事，还是对恢复贸易之请，都全然未提。

从3月6日英军攻陷二沙尾炮台，义律发出《致广州市民布告》，到3月18日（二月二十六日）英军重新进攻凤凰冈炮台，这期间参赞大臣杨芳于3月6日（二月十四日）、12日（二月二十日）^② 16日（或17日），署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怡良和广州将军阿精阿联名于3月13日分别从广东发出上奏。（琦善没有一件上奏）这些上奏都没有报告英军主动停止进攻、要求恢复贸易的情况。但是，他们却把英军停止进攻当作他们加强防备的结果来

① 《资料篇》，第88—89页，义律照会，1841年3月7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此照会英文见于Inclosure No. 4 in Elliot's No. 10 of 10 March 1841 (F.O.17/47)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丙申，参赞大臣杨芳奏。

报告，由此使道光帝狂喜起来，虽然只是一时的。

首先是杨芳3月6日发出的上奏（3月21日，二月二十九日到京）。这似乎是他抵广州的第二天发出的。杨芳在奏中专门讲了广州周围的防务，报告说：为了加强广州东西北三方面的防务，分别布置了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所率江西兵1500名，琦善派往虎门背后的太平墟、后又调回的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所率贵州兵1000名，还有前在乌涌战死的湖南提督祥福所率湖南兵中生还的500余名，如此等等。^①但此奏未提直到5日的休战。

接着是3月12日发出的上奏（3月28日，三月初六到京），其中对二沙尾炮台的失陷和义律的停战布告还是只字未提，只提到了英军的动静：

英夷兵船，游奕于省河正东通海之二沙尾内外，东南通海之大黄滘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20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

接着又报告说：为加强省城防务，将总兵段永福率领的贵州兵1000名布置于省城以东10余里的东盛寺；省城东南的大黄滘炮台孤立河中而难守，因此撤除此处守备退至5里后的凤凰冈炮台，派总兵长春率领江西兵1000名在此驻守，其他江西兵1000名则布置于广州对岸河南一带。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使英夷断不能接近省垣的态势，因而“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虞”。如此等等。^②

前面的3月6日上奏，提到省城内居民动向，说“近日两城（指广州旧城与新城）居民多携眷迁避”，而12日的上奏就说以后没有英军进攻，“民心大定”了。在不知这实际上是义律的停止进攻布告所致的人看来，这正是由于杨芳指挥得宜的结果。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四，道光二十一年二月甲申，参赞大臣杨芳奏。

^② 同上，卷二十五，道光二十一年三月辛卯，参赞大臣杨芳奏。

杨芳在发出此奏的同一天还发出了另外两件上奏，其中一件谎称湖南官兵英勇奋战，将弁31员、兵丁415名战死，但以炮击和白刃战使逆夷遭受了更大的损失。然后，该奏说：

（英夷）今知现在守城尚有贵州、湖南、江西官兵，并赶办火船火排，是以未敢深入，兼为暗通汉奸销货，故辗转游奕。^①

这就较前奏更明显地宣扬英军是因为了解到中方防务坚固而不敢攻击。

可怜的道光帝完全被杨芳的捏造欺瞒，狂喜起来。他在上述上奏中朱批道：

二十日拜折后，必有续到之兵，如能相机攻剿，先行痛杀方好，朕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

而后再加上“又批”：

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佇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

同一天发出的上谕，称杨芳措置得宜，“逆英不敢近逼”，赞其功“深堪嘉悦”，^②又说“可嘉之至！朕心甚为欣悦”，如此等等，在连用了最高赞语之后，令“将杨芳先行交部从优议叙”。^③

广东巡抚怡良和广州将军阿精阿也联名上奏，时间较杨芳的上奏晚一天。这件上奏与杨芳上奏十分吻合。其中先说英军的动静：

① 同上，杨芳又奏。

② 同上，谕内阁。

③ 同上，谕军机大臣等。

该逆夷于十三日，将军船火轮船，联结多只，乘潮驶至二沙尾地方，因该处水势较外洋稍浅，臣等先于此处凿船沉石，密钉暗桩，设立木排，严为防堵，该夷船未敢即时驶进。

接着又详述了省城内外的防务情况。但是，只字未提3月6日二沙尾及猎德炮台的陷落，也未提义律停止进攻的声明。关于居民动向，奏中说：

惟附城绅民富户，从未经识兵火，骤闻逆夷闯入内河，不免纷纷迁避，臣等会同出示劝阻，臣杨芳到省后，居民见兵力渐增，少为安帖。①

杨芳在3月16日或17日又发出上奏，报告说：16日英军以军舰2只、火轮船1只以及杉板船10数只来攻凤凰冈炮台，总兵长春指挥的守军炮击英船，击沉杉板船2只，杀毙夷匪多名。②

杨芳在此奏中所说的英军来攻其实是假的，真相是：这天英军的一只小船为送交义律致琦善（琦善此时已被逮捕，正被押往北京，但义律尚不知此事）要求与诸上宪面谈的照会，打着白旗接近凤凰冈炮台，这时受到炮台炮击，因而英军为救出小船也予以反击。不过如此而已。③杨芳报告的击沉杉板船2只，杀毙夷匪多名，当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可是，杨芳的这些虚报却使“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的道光帝又狂喜起来。他在同一天的上谕中说：

自英逆犯顺以来，从未受创，此次击沉夷船二只，歼毙夷匪多名，洵足伸天威而寒贼胆。参赞大杨芳调度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壬辰，兼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怡良、广州将军阿精阿奏。

② 同上，卷二十五，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丙申，参赞大臣杨芳奏。

③ W.H. Hall & W.D. Bernard, op. cit, p.193.

有方，出奇制胜，朕心实深嘉悦，著交部从优议叙。^①

道光帝是十分心满意足了。

如上所述，杨芳等将英军主动停止进攻、义律要求恢复通商等情况全部隐瞒起来，欺骗道光帝。此外，他们还打出了有趣的一手，即允许美船通商。

关于这件事，义律是这样讲的：

据今天（3月10日）得到的确切情报。广东当局对美国船只发出了到黄埔通商的许可证。这显然是广东当局以美国人因英国而吃亏不妥为由采取的措施，目的在于找到看来恰当的借口向朝廷提出恢复通商。但是我认为，英国对英军占领下的内河全域拥有权力，而且通商只有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才可以允许，应该就这些问题向有关各方提出警告。因此，我发出了如另纸之通告。

广东当局为实现自由通商将采取何种策略难以预计，但官民对这事的结果都是关心的，确信计划会很快实施。^②

义律针对广东当局允许美船通商而发出的通告，附录于义律的报告上，但所加的标题是“Public Notice”，而《中国丛报》转载时所加的标题是“Circular”。^③内容自然是完全相同的。全文如下：

通告

本英国公使大臣接到报告，广东当局允许除英国船以外的船舶驶向黄埔。但广东港自河口至省河末端为英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丙申，谕内阁。

② Elliot to Palmerston, No. 10, Macao, 10 March 1841. (F.O. 17/47)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180.

军占领，在目前形势下，没有任何根据相信英国海军司令官会承认中国当局所发通行证的有效性。因此本公使大臣虽不忍使人失望，但仍认为提出以下警告是妥当的，即在英国海军司令官之外，任何人无权允许船舶驶入内河。

兹声明：只要所有中外贸易不是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近日将对广州市区及通商实行严密封锁。

查理·义律

1841年3月10日于澳门^①

这样一来，广东当局允许美船通商事实上归于无效。

可是，广东当局允许美船通商之事，无论是上述杨芳的上奏，还是怡良、阿精阿的上奏，都根本没有报告。从而他们只许美船通商的真意何在，就不清楚。但这一定是他们针对义律恢复贸易要求而苦心想出的答复。他们的想法大概是：允许处于敌对关系的英国贸易虽是不可能的，但允许美国贸易就不担心会受皇帝怪罪。因此可以先允许与美船通商，以此为全面恢复通商开路。或者是在允许美船通商的名义下进行贸易，让英船混入其中，由此在事实上实现贸易的全面恢复。不管怎样，从义律所说的中国官民均确信恢复贸易的工作“会很快实施”来看，中方肯定是有意设法恢复贸易，由此避免遭到英军的进一步攻击。

允许美船通商，大概是琦善与余保纯同美国领事多利那协商后采取的措施，而杨芳与怡良等也一定参与了这一协商。因为在前引杨芳3月12日所发上奏中，有夷船“未敢深入，兼为暗通汉奸销货，故辗转游奕”之语，这显然是以含混的方式叙述义律停止进攻、要求恢复通商之事。杨芳在上文之后又说，现在兵力尚单，若趋小利而进攻反会贻误大局，“是以暂为羁縻稍待奕山、隆文赶到”，再发起攻势。他的意思是：暂时避免武力较量，专以交

^① Inclosure No. 6, in Elliot's No. 10 of Macao, 10 March 1841. (F.O. 17/47)

涉牵制英军的进攻为上策。这就可以证明：杨芳是欢迎义律停止进攻、要求恢复贸易的，而且他也参与了关于对之采取“羁縻”方法的协商。道光帝即使看了这个上奏，也不可能正确了解实情。他在杨芳那些话的旁边硃批道：“如能设法羁縻，不令遁去，方合机宜，未知能否？卿其善筹之”。在蒙骗道光帝方面，杨芳是做得够巧妙了。

后来，杨芳在可认为是附于前述之3月16日或17日发出的上奏中的“留中密奏”里，以表面上很随意的口气，讲出了恢复通商的意图。

在这件密奏里，他原原本本地报告了今后与英军交战极端困难的状况，列举“八难”详述对中方的不利之处，然后如同密谋一般讲了下面这段话：

奴才恨不灭此朝食，而反覆筹思，恐有欲速不达之患，则莫若先设一计，以退其船，查从前该夷求偿烟价，求给地方，皆无可许之理。今俱不敢妄图，而惟希冀照常贸易一事，虽其居心叵测，真伪难知，然夷人图利，是其恒情，彼若以诈来，奴才亦即以诈应之，将计就计，冀有坠入术中，于剿办或稍有把握。^①

杨芳此奏的中心意思，是以慎重而隐晦的方式说明义律恢复贸易的要求或许是欺诈，尽管如此，还是以接受其要求以使英军退出内河为好。

杨芳是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专家，他得知大角、沙角之战乃至虎门、乌涌之战的实情，冷静地研究了敌我武力的实际状况之

^①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35期《清道光朝留中密奏·杨芳·片一》，（《鸦片战争》第3册第483—484页）。

这个附片没有日期，但文中说“如日前凤凰冈接仗，江西南赣营兵尚能击退夷船，”这显然是指3月16日的事件。因此，这个附片一定是附在前述之3月16日或17日的上奏上的。

后，只要不是相当迟钝，一定会很快感觉到以当时清军实力决不能抵挡英军的攻击。因而他理所当然会考虑不如找个借口恢复贸易，以此迴避英军的进攻。但他在把这种想法向道光帝表述时，还是十分小心谨慎的。

如前所述，杨芳在3月16日或17日发出的上奏中，谎称英军军舰2只、火轮船1只以及杉板船10余只来攻凤凰冈炮台，炮台守军反击，击沉杉板船2只，杀毙夷匪多名，击退逆夷，如此等等，使道光帝狂喜。但在附于此奏的附片“留中密奏”里，则如上述列举在英军优势下，中方的“八难”，暗示不可能抗战。其中不仅涉及军事上的缺陷，而且提到居民的动静：

粤东本富庶之地，省垣尤繁会之区，绅士商民，似皆能自守，乃有一种积习，寇尚未来，业已纷纷迁徙，虽经大小官吏剴切示谕，仍无固守之心，十室九虚，焚烧可虑。

此前的3月12日发出的杨芳上奏，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虞”，而这件密奏则称城内民家“十室九虚”。虽然表达上很夸张，一度逃出但又返回的居民也有若干，但我们还是可以得知广州一半类似空城。既然如此，所谓“军民鼓勇”投入防守云云也就必定是空话了。

观林则徐日记，在乌涌炮台陷落后过了两天，即3月1日，（二月初九）记曰：

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①

在杨芳进入广州城的3月5日（二月十三日）记曰：

连日居民纷纷迁避，至是日稍定。^②

林则徐在3月1日就早早让眷属疏散到上游，这是由于他自己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83页。

② 同上，第384页。

熟知中方的防备近乎无效。既然被称作主战论者的林则徐都这样做，那么其他官员让家属疏散的也不会少，上行下效是世之常情。这样一来，在杨芳入城时，广州已经半似空城了。

前面说了，杨芳在对廷臣公开的正规上奏中，捏造了纯属子虚的清军英勇奋战、击退英军等情况，欺骗道光帝和廷臣，使之幻想奕山等到达后就会一举击退英军；而在留于皇帝手边、不向廷臣公开的“留中密奏”中又列举在英军优势下的“八难”，详述对中方的不利，总括起来说明恢复贸易使英军撤退为上策。并且，他本来知道义律只在广东停止进攻、要求恢复贸易，但声明“为实现正义和维护英国的威信，今后将向中国其他各省及朝廷进攻”，尽管如此，他却说现在英夷完全放弃了赔偿烟价、予给地方等要求，只希望照常贸易一事。谁都明白，义律上述声明关系到中国全体，内容至为重要，然而杨芳却把这完全掩盖起来，报告说现在英夷放弃了恢复贸易以外的一切要求。这样做虽说是服务于他的主张，但的确是罪孽深重的欺瞒。

杨芳还说义律关于恢复贸易的要求有欺诈夹杂其中。其实将恢复贸易的要求与再次远征北方的计划一并加以考察，便可知义律并非另有欺诈。杨芳在奏中掩盖英军将远征北方之事，而称义律有诈，这不外是杨芳为诳骗道光帝而用的诈术。前引义律报告的后一段说“广东当局为实现自由贸易将采取何种策略难以预计”云云，这里所谓“策略”，恐怕是指设法得到皇帝承认的策略。它已由杨芳秘密而慎重地加以施展。

杨芳的这种做法，与琦善形成鲜明对比。琦善是朝中重臣，以此自负，将与义律交涉的内容作出详尽的报告，该向道光帝进言之事大胆坦率地进言，哪怕是对道光帝的严令，在自己认为不可能实行或不适当时，就违背命令，独断专行，而且对此也不想隐瞒。这些反映出琦善诚实的人品。反之，杨芳一到任就捏造胜利，把义律主动停止进攻作为自己的功绩报告，如此等等，确实太虚伪了。不仅如此，他还隐瞒重要事实，以含混的手法巧妙掩

盖真相，诳骗皇帝，不实、狡狴至极。可是这些不实、狡狴的做法却把道光帝完全糊弄了，以致每次接到杨芳上奏，道光帝都狂喜激动，连书赞辞，真是可怜。

琦善在与义律进行第一次会谈后，曾列举数点，说明开战不利，力言应暂示羁縻，被道光帝骂为“无能不堪之至”，并受到“摘举数端，恐吓于朕”的斥责，被免去大学士职务，交部议处。杨芳也奉命对英夷速行攻剿，但与琦善同样列举“八难”说明开战不利，奏请暂示羁縻。可是道光帝对此朱批“未知能否，卿其善筹之”，批准了杨芳的方针。虽说不能要求对事情的处置必须前后一致，但还是应该说，杨芳巧妙地混淆虚实，把真相搞得模糊不清，终于使道光帝听任自己摆布了。他的手法是相当高超的。

但杨芳本不过是一介武夫，不能想像他自己有玩弄上述手法、随心所欲地摆弄道光帝的才能。也许他只不过是广东高级官员及其侧近者意见的代言人吧？现在看看林则徐日记，3月8日（二月十六日）条记曰：

杨参赞来。……闻英逆炮攻猎德、二沙尾炮台，又分小兵船数只，在大黄滗游奕。

3月9日条记曰：

午后杨参赞来晤，闻英逆兵船将退出。

3月10日条又记曰：

闻英逆兵船已陆续退出。①

至于英军为何突然停止进攻、让军舰后退，其原因一字未写。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84页。

但林则徐一定是完全知悉的。因为据林则徐日记说，杨芳到任后连日赴林则徐住处与之会晤，后来在3月12日、14日、15、16、17、18、19日，不是杨芳来林则徐处，就是林则徐赴杨芳处会谈，其间怡良也参与的时候不少。^①杨芳与怡良如此频繁地与林则徐会谈，一定是为了征询他的意见。而林则徐一定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所有情报，提出了种种建议。甚至可以说杨芳与怡良是在按照林则徐提出的办法行事。根据如下。

距此时约一个月之后，奕山到达，他向杨芳和林则徐諮问战略。林则徐“举六事”答之，其中第一项说，英夷兵船停泊于省河，因而无法可施，应密飭与英夷往来交涉委员，督同洋商，先以好言将夷船诱出猎德及大黄滘下游，然后迅速堵塞猎德及大黄滘水路^②

这个办法，与前面介绍的杨芳“留中密奏”中所说“则莫若先设一计，以退其船”，是完全相同的。从而杨芳的办法也许是出自林则徐的建议。即使不是这样，杨芳到任后与林则徐和怡良连日举行会议、协商对策也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而杨芳上奏中所见到的那种狡狴也是由这些协商中产生这一点，大致是不错的。杨芳在这以后不久就恢复了贸易，实现了休战。导致这种结果的内情是应该搞清楚的。

与杨芳相反，对道光帝过于直率地一再进言、自取咎戾的琦善，已被3月12日（二月二十日）传到广州的上谕罢免了所有官职，锁逮进京，接受审问。

促使琦善垮台的直接原因，是义律1月29日（正月初五）发出占领香港宣言，1月30日海军司令官伯麦照会香港对岸九龙寨的大鹏协副将赖恩爵，要求中国官兵从香港撤退，以及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这一事实。其中经过是很有趣的，我将在另一章详加探讨。

译自日本《近代中国》杂志第6卷

李少军译

① 同上，第384—385页。

② 《夷氛闻记》，第65—66页。

19世纪西方对鸦片贸易的评论

梅 森

引起西方尤其是英国注意的又一个问题是鸦片贸易。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废除后，这个问题及其种种危害激起人们热烈争论。鸦片贸易对19世纪整个英中关系具有重大影响，政治家、商人、教士、道德家及慈善家都能在其中找到阐述深刻思想的素材。^①在名义上（如果不是实际上）的禁令下，英国在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到第一次英中战争爆发前已开展了差不多40年，然而在1836——1837年前后，这一贸易却遭到有力的抵制。中国人在1836年底断然压制了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并在1837年和1838年对这一贸易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整个形势日益险恶，但直到1838年12月12日，中国才对外国人采取实际行动。那天，中国人在广州洋馆前的场地上设置刑场，准备绞死一个本地鸦片贩子，^②这一事件导致商务暂时停顿，深深触犯了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施行禁令。^③他禁止鸦片贸易的激烈措施，被英国政府大多数人视为发动对华战争的当然理由。许许多多误会随之而来，在约2万箱英国商人的鸦片被没收后，所谓“鸦片战争”就在1840年爆发了。

尽管最后决裂是由中国政府对英国商人在地方当局默许下的

① 《对华鸦片贸易》，见《外国评论季刊》第24期，第114页。

② 《汉萨议会辩论集》（1840年），第53卷，第66页及以下有关各页；《殖民地学会东印度委员会关于对华战争的原因及后果的报告》，伦敦1843年第2版。

③ 沃伦（S. Warren）《鸦片问题》，伦敦1840年版，第1页及以有关各页；《汉萨议会辩论集》（1840），第53卷，第711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走私采取断然措施造成的，许多作者仍然认为把这一战争描述为
一场鸦片战争并不妥当。^① 结束鸦片贸易的企图不过是一系列事
件中的一个插曲。吨位税、进出口税、其他种种商业税费以及对
贸易的专横限制使英国人大为恼怒。从18世纪中期起，中国人把
贸易完全置于一批垄断商人——行商的控制下。在英国方面，东
印度公司掌握了全部英国对华贸易，但在1834年公司特权废除后，
英帝国官员开始负责保护英国商务。两个政府的观点截然不同，
冲突势不可免。当时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拒绝在平等基础上
接受外国代表，引起许多怨恨，这也是战争的部分原因。^②

强调鸦片问题是战争的重要根源的评论家指出，中国政府企
图制止他们认为不利于其经济的金银输出。中国人颁布一道道敕
令禁止白银“漏卮”。^③ 英国人认为，中国皇帝担心鸦片危害人
民健康是假，借以掩盖上述目的是真。对因购买大量主要由英商
运自印度的鸦片而造成的银元外流，中国人大为不安，通过制止
鸦片贸易，他们拼命要改变这种局面。欧洲人指责中国人这种做
法十分荒唐，他们认为中国丰富的银矿足以提供几乎是永不枯竭
的金属来源。^④

强调中英误解的作者则认为，如果英国政府在冲突之前采取
明智的措施来处理中英交往，一切纷争都可以解决。战争的原因
在于英国对中国的制度无知，对战争的爆发漫不经心，而且未能

① 《关于中国及最近战争的新著作》，见《威斯敏斯特评论》，伦敦1843年版，第40卷第123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② 戴维斯(J.F.Davis)：《中国》，伦敦1857年新版，第1卷，第146页；密迪乐(T.T.Meadows)：《中国人及其叛乱》，伦敦1856年版，前言，第6页；亚当斯(J.Q.Adams)：《关于对华战争的演讲，1841年11月22日发表于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见《会议录》1910年，第43卷，第295—325页；参见《中国丛报》，广州，1842年，第11卷，第274页及以下有关各页；C.F.亚当斯(C.F.Adams)编《J.Q.亚当斯回忆录》，费城，1876年版，第11卷，第30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③ 宾厄姆(J.E.Bingham)《对华远征记》，伦敦1842年版，第1卷，第33页；前引沃伦书，第73页；《汉萨议会辩论集》，1840年，第53卷，第716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④ 前引沃伦书，第68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除后将其政策的变化告知中国政府。随着这一政策的变化，熟悉中国人而且有权对英国船运进行必要管理的东印度公司官员撤出了东方；每个英国商人在1834年以后都得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买卖。原来受到束缚的鸦片贸易在1840年后急剧增长。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恐慌。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却指示律劳卑要求撇开官方礼节与皇帝直接通信。没有使馆或舰队作后盾，这一要求却如此专横，它被中国官员视为一种侮辱。^①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持这样一种极端观点，即中国人无可指责，错全在英国。^②

其他各种人，主要是商人，把战争归咎于中国人的傲慢和愚蠢。他们争辩说，英国人在中国总是有节制的、正直的和光明磊落的。林赛，这个来自广州洋馆，以后又参加在华商行的人自然同情英国商人。他承认，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的权力是无可非议的，尽管它以前曾鼓励甚至支持这一贸易。然而，他却严厉抨击中国采取的手段，认为如果中国人捕获沿岸所有鸦片船只并没收其货物，外国政府将无话可说。但是他们却不加区别地扣留在广州和澳门的所有外国人，其中包括许多与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的人，并限制其自由，剥夺其财产。林赛写道，这种高压措施已经超出中国人的权力范围。^③

在一本1840年发表的小册子里，作者弗赖伊坚决反对鸦片贸易并敦促政府结束这一贸易。为了表明这种方针的必要性，他力图证明：

1. 鸦片输入中国过去和现在都直接违反那个帝国的法律，是对中国政府的公然蔑视，这个政府从来不乏诚意，但却没有能力禁止这一贸易。

① 前引《关于中国及最近战争的新著作》。

② 莫格里奇 (G. Mogridge) 《天朝帝国》，伦敦1844年版，第4页及以下有关各页；前引《J.Q. 亚当斯回忆录》。

③ 林赛 (H. H. Lindsay)：《对华战争是正义战争吗？》，伦敦1840年第2版，第16页。

2. 垄断东印度领地鸦片生产的英属印度政府专为中国市场种植、制作和出售鸦片，完全无视中国的法律和禁令。

3. 在英属印度政府的同意下，英国臣民坚持把鸦片运入中国并在那里出售，罪恶与暴行随之俱增。

4. 作为一种奢侈的刺激品，鸦片对身心健康极为有害。

5. 在英国东印度领地，鸦片的种植和垄断伴随着深重的压迫和灾难。

6. 这一贸易过去和现在都严重危害英国的合法贸易，对我们这部分极为重要的收入是一大威胁。

7. ……〔鸦片〕贸易实质上与东方的进步相抵触。①

在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的支配下，公众舆论强烈反对鸦片贸易。伦敦会教士麦都思谴责鸦片贸易是当代最大的罪恶之一，它使中国人道德沦落并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障碍。由于被沙夫茨伯里伯爵及其他鸦片贸易的反对者广泛引用，麦都思的著作甚至在1840年以前就促进了一个明确的反鸦片运动在英国形成。②

在著名人道主义者、“解除鸦片走私对英中关系之致命影响委员会”主席沙夫茨伯里伯爵1855年向政府呈递的请愿书中，反鸦片宣传达到高潮。这一文件强调鸦片贸易的英国独占性。其他西方国家或者禁止鸦片贸易，或者敌视其活动，致使它们的臣民只得在英国的旗帜下从事这一贸易。③ 请愿书断言，“为了少数人发财，为了解除印度政府为获取收入另寻合法途径的困难”，每年至少有100万人要作出牺牲。请愿书还谴责鸦片贸易破坏传教士

① 弗赖伊 (W.S.Fry) 《关于对华鸦片贸易的事实和证据》，伦敦1840年版，第5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② 《汉萨议会辩论集》，1843年，第362页及以下有关各页；亚历山大 (R.Alexander)：《英国鸦片走私的兴起与发展》，伦敦1856年第3版，第59页；郭施拉 (C.Gutzlaff)：《1831, 1832, 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伦敦1840年第8版，第57页；卫廉士 (S.W.Williams)：《中国总论》，纽约1848年版，第2卷，第496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③ 《关于对华鸦片贸易的文件，1842—1856年》，见《议会文件，账目和票据》，1857年，第43卷，第77—80页。

所作的努力，阻碍基督教的传播。^①最后，请愿书抨击这一贸易对英国对华贸易有恶劣影响。鸦片持久输入耗尽了中国的贵金属，使中国人民日益贫困，国际交流因而不能发展下去。^②

包令爵士在致克拉林敦伯爵的一封信中，对请愿者予以反驳，声称鸦片贸易不是一种英国垄断，美国人也在大规模地经营这一贸易。走私的责任应由整个商人社会承担。请愿者关于鸦片吸食者及因吸鸦片造成死亡的统计分别夸大了3倍和100倍。包令爵士指出，商业数字是模糊含混的。他说，没有证据表明，请愿者所假定的中国方面的300万英镑贸易余额如果不用于鸦片贸易就会用来购买英国制造品。英国对华贸易的商人特别强调请愿书的经济观点不可靠。他们认为，对华输入的减少应该归咎于其他因素，而不是鸦片贸易。^③

早在1842年7月，英国235个商人和制造商联名向罗伯特·皮尔爵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表明了以商业利益为重的国内商人的态度。除了道德上的原因外，他们反对鸦片贸易还有经济上的理由。他们力图证明，只要鸦片走私继续下去，他们的商业就不能在一个安全的基础上进行，甚至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它也不可避免地会损害英国对华商业。中国的制造品主要用于交换鸦片，后者的价值到1842年已大大超过了英国购自中国的以茶丝为主的商品价值。约在1840年以后，中国人就不再大量进口制造品。请愿者以统计材料为根据，指出，中国人在1834—1839年对全部英国产品的平均需求比他们在1803—1809年单对羊毛制品的需求还要少近15万镑；而在1834—1839年期间，鸦片输入则从3000箱增加到30000箱。^④

① 《关于对华鸦片贸易的文件，1842—1856年》，《洪萨议会辩论集》，1869年，第198卷，第1104页及以下有关各页；艾伦：《关于鸦片贸易的论文》，波士顿1850年，第61页。

② 格罗泽（W. Groser）《能做什么来禁止鸦片贸易？》，伦敦1840年版；亚历山大：《印度的鸦片收入》，伦敦1857年版，第6页。

③ 前引《国会文件》，第66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④ 《事件记》，见《中国丛报》，1843年，第12卷，第162页；《对华鸦片贸易的现状》，引自《苏格兰评论》，1860年1月，第10页。

由于各个反鸦片集团的推动，鸦片问题在1840年以后仍然是英国公众的热门话题。印度政府、英国政府、鸦片商以及其他与鸦片贸易有关的人则对反对意见十分警觉。关于这个问题发表了大量材料，许多小册子在公众中流传。^①一般有关中国的著作往往用一章或至少几页描写吸食鸦片的危害，叙述这一贸易的罪恶。^②西尔的《中国与中国人》也许是关于鸦片问题最广泛的叙述。出于对鸦片贸易的强烈反对，西尔写道：“不管这一贸易能给英国商人多少显而易见的利润，它的罪恶是如此深重，以致英国一旦批准、鼓励或允许其继续进行，英国就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了。”^③乔斯林勋爵则强调鸦片贸易对印度政府的财政意义，并反对抑制这一贸易，因为这会使印度沿岸的走私加剧。^④另一个作者福钧站在中间立场上指出，吸食及走私鸦片的规模被人们大大地夸大了。他认为，在许多作者笔下几乎等同于海盗的商人，实际上是一些有大量资本的可尊敬的生意人。鸦片贸易虽然违禁，但与通常所说的“走私”大不相同，不熟悉这一贸易的人对其性质是完全不了解的。福钧声称，在导致1840年战争的争执发生之前，中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认真制止这一贸易的意图。^⑤

1840年4月，英国议会就政府的对华政策展开辩论，辩论报告表明了政界要人们关于鸦片问题及这场战争的观点。掀起辩论的是格雷厄姆爵士的下述动议：

- ① 《关于中国的小册子》，《中国丛报》，1840年，第9卷，第156页及以下有关各页；泰勒（H.W.Tyler）《今日的问题》，伦敦1857年，第10页。
- ② 前引宾厄姆书，第1卷，第29页及以下有关各页；前引卫廉士书，第2卷，第38页及以下有关各页；四美（G.Smith），《中国各设领事馆城市调查访问记》，纽约1847年版，第382页及以下有关各页；西尔（H.C.Sirr），《中国与中国人》，伦敦1849年版，第1卷，第251页及以下有关各页；第2卷，第282页及以下有关各页；贝尔纳德（W.D.Bernard），《复仇女神号远征记》，伦敦1844年版，第1卷，第174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 ③ 前引西尔书，第1卷，第251页。
- ④ 乔斯林（Lord Jocelyn），《远征中国的六个月》，伦敦1841年第2版，第142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 ⑤ 福钧（R.Fortune），《两访中国茶乡》，伦敦1853年第3版，第1卷，第171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根据遵从女王陛下旨意递交给议会的有关中国的文件，议会认为，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商业往来及友好关系的中断，主要应归咎于女王陛下现任官员在英中关系上缺乏远见和不够谨慎，尤其应归咎于他们忽略了给予广州商务监督指示和权力，使他能够反对因鸦片走私而日增的罪恶并适应所面临的新的困难形势。”^①

谴责鸦片贸易和战争成为几个议员发言的主题。格拉斯顿指出，驻中国的英国当局实际上不是与中国人合作禁止鸦片贸易，而是鼓励和保护这一贸易。他认为，只要阻止鸦片船只航行，不必动用任何缉私部队就能制止中国沿岸的鸦片贸易。如果禁止从孟加拉出口鸦片，禁止在马尔瓦种植鸦片，并采取措施使从事鸦片贸易成为一种体面的商人不愿介入的耻辱，那么鸦片贸易即使不能绝迹，也会大受掣肘。^②对鸦片战争，格拉斯顿说：“我不知道还有比它在起因上更不道义，在进程中更会给这个国家蒙上永久耻辱的战争。”^③

维护政府政策的议员指出，中国官员准许鸦片贸易进行。^④他们对鸦片贸易的默许显然足以替英国走私者开脱责任。^⑤赞同当局政策的议员把经济方面的考虑作为其论点的基础。鸦片贸易虽然违犯中国法律，却未被英国人放弃，这是因为它有利可图。^⑥墨尔本勋爵甚至说，由于英国人有许多地区特别适合生产鸦片，他不能担保一定放弃这一贸易，不过，他衷心希望政府不要直接卷进鸦片经营中去。^⑦

一些议员提出了道德问题，他们否认英国有权为自己的商业利益去扶植鼓励一种导致千万人毁灭的贸易。^⑧一个发言者反驳

① 《汉萨议会辩论集》1840年，第53卷，第704页。

② 同上，第812页。

③ 同上，第818页。

④ 同上，第741页。

⑤ 同上，第753页。

⑥ 同上，第752，781，782，824页。

⑦ 前引卫廉士书，第2卷，第526页。

⑧ 《汉萨议会辩论集》，1840年，第53卷，第856页。

说，鸦片的毒性被大大夸大了，如果使用得当，它并没有什么危害。和卖酒所得相比，很难说这一贸易的收入会遭致更多的非议。^①

帕麦斯顿勋爵攻击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的动机。照他所说，中国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维护道德。问题在于保护其农业利益。在中国，罂粟的种植变得日益重要，印度鸦片的竞争会限制其发展。帕麦斯顿还提到，中国经济学家希望阻止贵金属从中国输出。^②

根据1842年结束英中战争的南京条约，英国得到一笔被中国人缴获的鸦片的赔款，但条约除此却再没有提及鸦片争执^③。在议会，或一般地说在英国，关于鸦片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因1842年和约而结束。^④。1843年阿什利勋爵和沙夫茨伯里伯爵先后把这个问题直接摆到下院面前。他们递上美以美教会、浸礼会和伦敦会的三份请愿书，要求下院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终止印度与中国间的鸦片贸易。^⑤阿什利勋爵在发言中力图证明，只要鸦片贸易继续进行，英国的一切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就会处于一种难以料定的危险中。这种危险破坏对华商务，甚至会导致第二次对华战争。鸦片贸易用致命的毒药取代英国制造品，对英国贸易极为有害。^⑥阿什利勋爵认为，在禁止鸦片贸易后，中国人就会用他们的产品交换英国商品。^⑦英国商业的扩大和新市场向英国制造商的开放对英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都大为有利。^⑧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阿什利勋爵对禁止鸦片贸易会造成财政损失这一重要论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除了向中国下层人民销售外，无法从鸦片这种物品中获利，这种获利手段绝不能因其有任何财政意义而变得

① 同上，第824页。

② 同上，第940页。

③ 同上，（1843）第58卷，第368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362页。

⑥ 同上，第363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⑦ 同上，第370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⑧ 同上，第375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正当。^①

在力陈鸦片对道德对人体的可怕影响后，阿什利断言，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激起了东方人的深刻仇恨，对罪恶的鸦片贸易的鼓励延迟了基督教的传播，阻碍了中国人的文明化进程。^②由于中国人对英国的敌意，浸礼会在1843年不得不决定通过美国教士进行工作。^③在结束发言时，阿什利勋爵提出以下动议：

“议会认为，鸦片贸易的继续以及对英属印度领地鸦片生产的垄断，对整个英中友好关系起着破坏作用，它使合法贸易严重缩减、危害了英国制造业的利益，完全违背了一个基督教王国的职责并玷污其荣誉。议会认为，在适当考虑政府及个人权利的条件下，应尽快采取措施终止这一罪恶。”^④

罗伯特·皮尔爵士代表政府发言，对阿什利的提议表示担心，怕照此办理会妨碍中英政府间正在进行的谈判。阿什利勋爵于是撤回了自己的动议。^⑤1843年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议会第一次对鸦片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通过支持及反对鸦片贸易的种种发言及报界对这些发言的评论，这个问题被直接摆到了英国公众面前。

在南京条约后，鸦片贸易尽管仍然被中国人禁止，却继续兴旺发展。中国船只为装运鸦片甚至注册挂上英国国旗。1856年1月8日，三桅帆船亚罗号及12名船员在珠江被中国当局抓获。这艘船属于一个中国人，以前曾在香港注册并得以悬挂英国国旗，其注册期限在9月27日已终止。然而，驻广州的英国领事却要求中国当局放回船员并就侮辱英国国旗一事道歉。中国当局交出了上述12人，但并未道歉。英国领事于是拒绝接受放回的人。尽管

① 《汉萨议会辩论集》，第403页。

② 同上，第377页；（1857）第114卷，第2028页；（1875），第225卷，第581页，及其他各页。

③ 同上，（1840）第53卷，第391页；（1870），201卷，第487页。

④ 同上，（1840）第53卷，第405页；（1857）144卷，第2027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⑤ 同上，（1840），第53卷，第469页。

这一争执无疑只是英中矛盾的一个因素，却直接导致了第二次英中战争。许多人严厉地批判这一战争，因为它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毫无道理。北京条约的签字最后结束了敌对行动，1860年，天津条约（1858）的批准书在礼部交换。天津条约是鸦片贸易史的一个里程碑。这一条约不顾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准许鸦片纳一定税后输入中国。^① 1860年以后，鸦片贸易在立法方面的问题已部分确定，但道德方面的争论却依然存在^②。

在1870年和1875年的议会辩论中，^③政府方面的发言人着重指出鸦片贸易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曾在1843年猛烈抨击政府政策、谴责第一次英中战争的不义根源的格拉斯顿在1870年的辩论中却说，在中国政府准许鸦片纳税输入，视鸦片为商品后，造成1840年和1857年战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鸦片从此不再与政治有关而变成了纯粹的财政问题。^④ 与此相应，鸦片贸易不再“对整个英中友好关系起着破坏作用。”^⑤ 格拉斯顿把鸦片的危害说得微不足道，^⑥ 强调鸦片贸易对印度政府的收入举足轻重。^⑦ 在道德问题上，支持政府政策的议员声称，要求英国对中国人的健康和道德比中国人自己更操心，这种国际职责的观念过于崇高，不能强使英国付诸实行。英国从鸦片贸易中得到一大笔收入，印度这时的形势不允许英国为一种观念去冒巨大的财政风险。^⑧

1870年，威尔弗雷德·劳森爵士提出了一个动议，谴责把鸦片作为印度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制度。预料到反对者们会强调鸦片贸易对印度具有重要意义，他着重指出鸦片收入的不稳定性，

① 马士，麦克奈尔（H.B.Morse, H.F.MacNair）：《远东国际关系史》，波士顿1931年版，第10、13章。

② 《汉萨议会辩论集》（1870），第201卷，第480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③ 同上，第479页及以下有关各页；（1875），第225卷，第571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④ 同上，第516页。

⑤ 同上，（1840）第53卷，第405页。

⑥ 同上，（1870）第201卷，第517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⑦ 同上，第520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⑧ 同上，（1875）第225卷，第602页。

并提出三个理由加强自己的论述。首先，某种政治形势可能使中国重新禁止鸦片输入。其次，别的国家可能参与这一贸易，从而破坏英国的垄断。最后，中国正在开始广泛种植罂粟。劳森还从道德方面抨击这一贸易，声称，所谓鸦片贸易的危害并不大于酒的买卖的老生常谈，并不真实。^①

在议会辩论中，站在反对派方面的政治家们，特别是阿什利勋爵和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对当时有关中国的著作十分熟悉。威尔弗雷德爵士在评述鸦片贸易的危害时，引用了传教士古伯察、麦都思、伟烈亚力、英国政府在中国的代表李明良、蒙哥马利·马丁的著作。在阿什利勋爵1843年的著名演讲中，所用资料取自当时在伦敦展出中国收集品的邓恩、传教士郭施拉、伦敦会在中国的杰出代表麦都思、传教会教士司快尔、美国在华传教士马尔科姆，以及在东方经商的林赛等人的著作和谈话。至于格拉斯顿及其他支持政府的人，在其演讲中除与英国东方政策直接有关的事情外，对中国的一般状况却没有表现出有什么普遍兴趣。

由于人数在1843年至1860年间两倍于英国人的新教传教士的宣传报告，美国的公众舆论当时坚决反对鸦片贸易。至于美国在华商人，虽然其中一些人参加了鸦片贸易，却有一大批人反对这一贸易，并支持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谴责。^②

法国和德国的作者并不象美国人那样看重道德问题，他们对英国的东方外交和一般的鸦片问题感兴趣。他们认为，第一次英中战争是英国为印度的鸦片收入而进行的对中国人的非正义和不光彩的战争。^③ 南京条约是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法国作者在《两个世界的评论》中，对鸦片问题作了某种客观的评述，比英国人的有关著作更多地强调了中国人的观点。出于对中国人的

① 《汉萨议会辩论集》，（1870），第201卷，第479页及以下有关各页；（1875），第225卷，第589页。

② 前引马士、麦克纳尔书，第205页。

③ 赫维—圣—丹尼斯（M. J. L. Hervey—Saint—Denys）：《中国面对欧洲》，巴黎1859年版，第74页。

深切同情，作者认为他们禁止鸦片贸易的行动是正义的。^①引他用了大量中国文件，文件证明英国关于中国政府容忍鸦片贸易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一些地方官员可能与走私者合谋并从这一贸易中分取利润，但是这些官员的违禁并不说明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在法国沿海走私的走私者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政府一样。^②

加略利和伊万的著作为法国人熟知并已译成英文。^③他们一方面承认法国人总的说来是同情中国人的，一方面却又力图替英国政策辩护。^④他们不否认英国人在中国海岸从事一种违禁贸易，其性质与法国海岸的走私贸易极其相似。但是，法国人却不敢借口在法国港口的外国船只载有违禁品而抓捕在自己控制下的全部外国人，并用死刑来威胁他们。^⑤

德国人感兴趣的是中英之间的外交斗争，而不是危害中国人的鸦片问题。不过，诺曼在其《英中战争史》一书中，仍然对鸦片的来源与使用、鸦片在中国销售的逐增、这一贸易的巨额利润、禁止鸦片输入中国的法令以及走私者的违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⑥在其关于“鸦片战争”的详细叙述中，诺曼象其他许多作者一样，对英国人并无好感，认为英国把战争强加给了中国。^⑦

与英国和美国的著述相似，法国和德国的一般著作也有一定篇幅讨论鸦片问题。^⑧每个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西方作者几乎都

① 《英中问题》，见《两个世界评论》（1842），第29卷，第670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② 同上，第662页。

③ 《当代法国文献》，见《威斯敏斯特评论》，伦敦（1853），第60卷，第631页。

④ 加略利和伊万（J.M.Callery, M.Yvan）：《中国的叛乱》，纽约1853年版，第16页；麦克法伦（C.Macfarlane）：《中国革命》，伦敦1853年版，第24页。

⑤ 前引卡纳利和伊万书，第16页。

⑥ 诺曼（K.F.Neuman）：《东亚历史》，来比锡1861年版，第7页及以下有关各页；《英中战争史》，来比锡1855年第2版，第22页及以下有关各页；武尔费尔特（A.Wulfert）：《鸦片战争》，载《家谱杂志》第8卷，第344—348页。

⑦ 《东亚历史》，第18页及以下有关各页；《英中战争史》，第45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⑧ 维尔纳（R.Werner）：《普鲁士人对中国的远征，1860、1861和1862年》，来比锡1873年第2版，第235页；黎力基（R.Lechler）：《中国论集》，巴塞尔1861年版，第159页及以下有关各页。

要描述鸦片的吸食方法及其对人们的道德和身体的影响。结果，中国人在其笔下成了一个吸食鸦片的民族。由于鸦片主要来自英属印度，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都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对中国的这种情况负主要责任，他们对鸦片贸易的谴责可以说是普遍的。

译自梅森 (Mary Gertrude Mason) : 《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 1840—1876》, 纽约1939年版, 1973年康涅狄格再版, 第6章, 第100—114页。

郭曦晓 译

1910年前后日本对华走私 鸦片吗啡的秘密组织的形成

山田豪一

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下同。——译注）、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在不断扩大发动的这些侵略战争中，日本推行鸦片政策所起的作用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了。^①如若考究日本依靠贩卖鸦片资助侵略战争的肇始，则应追溯到日本把台湾作为殖民地统治之际采取了鸦片专卖制度之日算起。^②假如这可以算是第一阶段的话，那么，经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0~1920年代形成的日本向中国走私鸦片吗啡机构的建立就该算是第二阶段了。假若这两个阶段算是准备时期的话，那么满洲事变后的第三阶段就该算是日本对中国建立鸦片走私网的全面铺开的时期了。我这份报告的课题就是要阐明在满洲事变以前这段时期内，日本对中国的鸦片政策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并揭露经过台湾鸦片贩卖的实验期之后，日本于1910年代建立向中国走私鸦片吗啡组织的奥秘所在。

后藤新平和台湾鸦片专卖制度

大家都知道，一个现代化日本的出现，是学习了在鸦片战争

①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记录》，检察官方面的证据文件，第63—64卷，DOC.No. 9501—9575。

② 刘明修：《台湾统治和鸦片问题》（山川出版社，1983年）。

中遭到失败的中国经验这部反面教材之后才开始的。^①这种学习的积极成果表现在：日本在开国之初就把严禁输入鸦片的条款写进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②；明治维新政府一经成立，就以大政官布告的形式严厉禁止吸食鸦片^③；当明治10年发生英国商人偷运鸦片事件之际，日本立即发动了一场废除治外法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成功地避免了一场鸦片灾难。

严禁鸦片可以说是明治政府的一项既定国策，这个政策的改变是在经过日清战争占领了台湾以后发生的。日本政府开始统治台湾时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对付反抗日本占领的武装斗争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当地人吸食鸦片的习惯问题。^④倘若采取断然禁烟的办法则会招致当地人对日本统治的长期不顺从，而一旦采取放纵的办法又势必会使吸食鸦片的恶习很快地蔓延到日本本国。^⑤

就在这时，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平提出的《关于台湾

① 关于鸦片战争的传闻，指的是1840年7月荷兰人口述成的《鸦片风传书》，其中提到（一）1838—1840年“唐国欲废鸦片商法而发生的著名事件的记录”；据说这本《风传书》还逐条的记下了（二）1841—1842年及（三）1842—1843年的鸦片战争的经过。《甲子夜话三篇》第75卷和第78卷里收有中国到长崎从事贸易的商人留下的闻书。根据这些情报，佐佐间象山写了《为海防事上书藩主》。1844年又有斋藤馨著有《鸦片始末》、《夷匪犯境录》，1848年有盐谷岩阴的《阿芙蓉汇闻》、《筹海私议》，佐藤信渊的《海陆战防录》、《在华挫狄论》，1850年有岭田枫江的《海外新话》，早野惠的《清英近世谭》，长山贯的《清英战记》等书刊出。早在美国海军军人裴利（Matthew—Calbraith—Perry，美国海军军人，1853年6月，为促使日本开放港口，率领东印度舰队访问日本，向日本幕府提交美国总统亲笔信件，并缔结《亲善条约》，回国后著有《日本远征集》三卷。——译者）率舰队访日之前就有了这许多著作发表。

② 见外务省条约局：《旧条约汇纂》第1卷，第1部（昭和9年）。

③ 继1867年的大政官布告之后，于明治3年（1870年）9月，又发布了《贩卖鸦片烟律》和《生鸦片管理规则》布告。

④ 水野遵：《台湾鸦片之处理》（明治31年）。

⑤ 断禁论的代表加藤尚志于1895年（明治28年），向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水野遵递交了《台湾岛取缔鸦片之议案》。民间则有田口印吉撰写《大国民的度量》（载《东京经济杂志》第790号）一文发表。渐禁论者有军医总监石黑忠惠提出的《对于新领地台湾的鸦片贸易意见》提案（收入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台湾资料》）。

岛鸦片制度的意见》被采纳了。^①不久，后藤就以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身分赴台上任，他自己声称，他将要付诸实施的是一个“禁烟制度”，^②然而在他的方案上写着的却是另一些内容：第一，他将往年能收入相当于80万日圆税收的鸦片，^③以禁烟税的名义抬高3倍的价格从事贩卖，保证每年给日本中央政府上缴240万日圆的财政收入^④；鉴于一旦提高烟价，难免会有密运、私贩的情况发生，于是又作了第二条规定，鸦片统由总督府实行专卖，鸦片原料的输入，鸦片烟膏的制作，统归总督府直接经营，凡在这里制作的烟膏，只限于由“身分可靠”、经警察署“选定”和“特许”的经销商，或者经警察保证“身分可靠”又发给特许证的承包商才可以贩卖；第三，购买烟膏者只限于持有医生诊断书和由当地警察作保发给特许证的人。

① 鹤见祐辅著：《后藤新平》第1卷（昭和12年刊）第880—884页。

② 后藤新平进一步又把这政策具体化，写成了《关于在台湾岛施行鸦片制度的意见书》（收入同上书第885—894页），于1896年3月提交台湾总督府。

③ 日本占领之前的台湾鸦片收入：

年 度	鸦 片 收 入			岁收总额	(a) / (b)
	关 税	厘金税	合 计 (a)	(b)	×100%
1881	139,842		139,842	538,865	26
1882	114,154		114,154	572,283	20
1883	94,669		94,668	491,828	19
1884	89,283		89,282	508,095	18
1885	90,655		90,654	525,095	17
1886	126,339		126,338	536,241	24
1887	126,983	299,289	426,273	872,100	49
1888	139,339	371,566	510,906	1002,590	51
1889	142,017	378,713	520,730	990,148	53
1890	151,452	403,804	555,258	1045,247	53
1891	167,497	446,640	614,138	1111,570	55
1892	154,522	412,061	566,585	1079,101	53

④ 另外，后藤新平还在《关于施工的意见书》中，计划从代销商、经销商、吸烟人身上收取特别费100万元。

实施的结果已在下列统计表①中显示清楚了。专卖制度实施

①台湾特别会计帐上的鸦片收入：

年 度	鸦 片 收 入		年收入 (c)	补充金
	金 额 (a)	$(a)/(c) \times 100\%$		
1897(明治 30)	1,610,210	30.9	5,315,879	5,959,013
1898(31)	3,467,339	40.3	2,491,690	3,984,510
1899(32)	4,249,577	41.8	10,153,651	3,000,000
1900(33)	4,234,979	32.4	13,062,920	2,598,611
1901(34)	2,801,894	23.9	11,714,647	2,336,689
1902(35)	3,009,483	25.3	11,876,853	2,459,763
1903(36)	3,620,335	29.2	12,396,007	2,459,762
1904(37)	3,714,012	23.0	16,170,335	
1905(38)	4,205,830	19.4	21,699,928	
1906(39)	4,433,862	17.3	25,656,672	
1907(40)	4,468,514	15.5	28,850,117	
1908(41)	4,611,913	17.2	26,832,437	
1909(42)	4,667,399	15.2	30,606,087	
1910(43)	4,674,343	11.3	41,364,163	
1911(44)	5,501,648	13.0	42,393,795	
1912(45)	5,262,685	12.4	42,530,920	
1913(大正 2)	5,289,595	13.8	38,330,994	
1914(3)	5,226,495	13.4	39,007,619	
1915(4)	5,870,405	15.3	38,347,436	
1916(5)	7,132,520	15.4	46,220,937	
1917(6)	7,970,107	15.8	50,335,536	
1918(7)	8,105,278	14.8	54,700,182	
1919(8)	7,641,054	11.5	66,630,150	
1920(9)	7,847,739	9.5	82,263,551	
1921(10)	7,533,625	10.7	70,438,196	
1922(11)	6,440,441	7.9	81,832,456	
1923(12)	5,873,518	6.8	86,124,027	
1924(13)	5,575,020	6.5	85,255,818	
1925(14)	4,120,954	4.5	92,052,322	
1926(15)	4,252,699	4.4	96,288,353	
1927(昭和 2)	4,377,444	4.7	93,215,763	
1928(3)	4,411,567	4.2	104,399,526	

四年后到了1901年，虽然明文规定在发给特许证时要提交医生的诊断书，但实际执行上为了增加吸食者的数量，只要年龄够20岁以上的申请者都发给了特许证，以致持有特许证的人数达到了17万人，占台湾中国人人口的6.3%。在台湾整个土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鸦片贩卖网，这一年里的鸦片专卖收入是425万日圆，竟占总督府常年岁收的42%。台湾的鸦片收入使日本中央政府免掉了7个年度的对台湾财政拨款，因而给准备打日俄战争、进行扩军备战的日本财政提供了重要财源，后藤新平也因此建立了功勋，获得了勋章，①并约定以后由他出任“满铁”第一任总裁。

后藤搞起来的这个专卖制度，若仅就增加殖民地统治机关的财政收入这一个方面来说，他是仿效了当时欧洲各国在东南亚各地的殖民统治机关的办法办的，当时东南亚那些殖民统治机关的财政收入有30%~60%②是靠贩卖鸦片得到的。台湾鸦片专卖制

续表

年 度	鸦 片 收 入		年收入 (a)	补 充 金
	金 额 (a)	(a)/(c) × 100%		
1929(4)	4,027,936	3.7	107,581,500	
1930(5)	4,349,813	4.4	98,516,544	
1931(6)	4,483,138	4.3	103,499,069	
1932(7)	3,460,008	3.6	96,583,189	
1933(8)	2,895,264	2.9	100,644,080	
1934(9)	2,558,371	2.3	110,614,520	
1935(10)	2,567,588	2.1	123,407,834	
1936(11)	2,161,203	1.6	138,144,215	
1937(12)	2,752,389	1.8	153,455,476	
1938(13)	2,613,053	1.5	176,713,772	
1939(14)	2,878,636	1.3	216,356,142	
1940(15)	2,278,542	0.9	245,853,437	
1941(16)	1,841,522	0.7	265,864,601	

① 《后藤新平》第2卷第261页。

② 波野静雄：《国际鸦片问题》（平凡社，大正14年版），第178~195页。

的特点是：从鸦片原料的输入到烟膏的制作、流通以至消费的全过程，统统都归总督府掌握，其中包括经销商、承包商乃至吸烟的特许，所有这一切的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都由警察机关控制起来，把鸦片专卖制度建立在治安警察体制之中，其政策的实质已远远地超越了“寓禁于征”的界限了。

当日本政府在台湾实行这种鸦片政策的时候，还特意公开发布了两个法令，一是对日本国内发布了进一步实行彻底禁烟政策的“鸦片法”，一是对台湾发布了一个“台湾鸦片令”，对内搞的是断然禁止，对外搞的是鼓励吸食，日本实行的两面性的鸦片政策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走私吗啡及其贩卖网

“以毒攻毒”，^①借助鸦片取得了统治台湾的初步成效因而忘乎所以的日本，又经过日俄战争进一步地跨上了中国大陆，到了1910年代的中期，又开始构思以全中国为对象的鸦片政策了。

1916年9月，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局长加来佐贺太郎，在向大隈首相提出的《支那鸦片制度意见》^②中就陈述了他的设想。他说：“作为东洋文明主国的日本帝国，在对友邦支那的鸦片政策方面，应不惜以文明进步之手段给予援助。应当发奋进取……使中国政府仿照我帝国根据渐禁政策所建立的专卖制度以确立他们的政策，并在实行中把它置于我最有管理经验的帝国的指导之下……”。

在这份“意见书”中加来作了详细的计算：中国人口以4.2亿人计算，假定其中有5%的人口即2000万人吸食鸦片，若沿袭台湾的办法办理，就能赚取5.54亿日圆的利润。他甚至对北京、汉

^① 后藤新平在《关于在台湾岛施行鸦片制度的意见书》中评论鸦片政策时使用的语言。

^② 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局长加来佐贺太郎的《支那鸦片制度意见》的原件，由大隈伯爵府邸捐赠给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

口等11个主要城市里设立烟膏工场所需要的器材、机械设备、建筑经费、烟膏用量、11个地区的吸烟人数、工场的位置、成品的搬运路线也都作了周密筹划，因此，这就不单单是一个设想，而是一份具体的实施计划了。那么，提出这样一种计划的主观条件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时期的日本到底又受到了什么客观条件的影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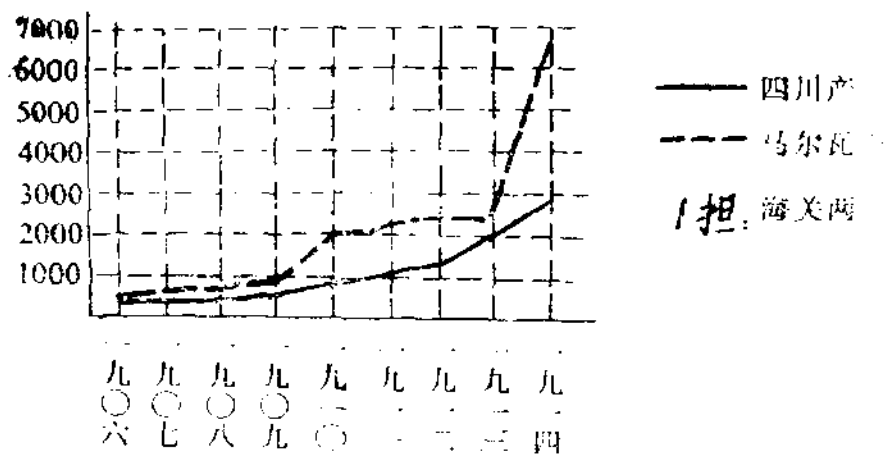
大家都知道，到了光绪末年，围绕着中国进行的国际性鸦片交易碰上了一个重大转折期。1906年，清政府下达谕旨，准备不惜一切地加强禁烟措施，计划用10年时间禁绝鸦片。在道光年间进行的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第一次禁烟运动，据于恩德在《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一书中说，这是受到了那些后来发动第二次禁烟运动的具有民族自觉性的中国各界人士的支持的结果。^①在唤起国际舆论方面，住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起了很大作用。美国还倡导了召开上海国际禁烟会议，英国也应承在中国国土内削减种烟销烟的数量，答应逐渐减少鸦片的输入量。

对于这种禁烟运动的兴起，日本方面的态度是相当冷淡的。1911年9月，东三省、山西、四川发布了禁种禁销鸦片的声明。辛亥革命以后，从1913年到1915年，有10个省发布了禁绝鸦片成功的声明。在这些声势的影响下，虽然英国从1912年起每年削减了从印度输华的鸦片5100箱，但日本当局所持的不赞成态度依旧没有一点点的改变。足见191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禁烟运动还是收到了成效的。下图所揭示的是1906年以后到1914年为止的上海鸦片市场的行情，从中可以看出：从1906年就开始少量涨价，到英国削减输出量之前又陡然暴涨的鸦片价格，到1914年竟上涨了10倍，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烟瘾是一个最难对付的问题，有那么一些人靠自己戒烟是非常困难的。鸦片的涨价就给市场上供应鸦片代用品——吗啡提供了良好条件。

^① 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民国23年版）第242页。

1907—1917年上海鸦片价格



(马尔瓦——印度中央邦Malwa。——注译)

当时制造吗啡的主要国家是英国和美国,1910年代的前半期英国的平均年产量有39.7万磅,到了后半期进一步有所增加,年平均要输入42.2万磅的鸦片用来制造吗啡^①。据本页脚注^②所示的英国贸易统计年报记载,英国吗啡的主要输出国是德国和日本,而且从1912年以后,由德国转手向日本输出的数量又不断地增加,到了

① 加藤祐三在《英吉利与亚细亚》(岩波新书,1981年版)中说,进入1910年代印度生产的鸦片亦成为进口货,所增加的纯进口量均被国内所吸食,因而扩大了英国国内的鸦片吸食习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② 英国统计年报所载吗啡的输往地和输出量(单位:盎司):

国 别	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德 国	94215	105811	81944	85094	—
法 国	12518	24159	24052	12408	35303
日 本 (包括台湾、“关东州”)	58852	124307	252110	352130	204742
总 计	208546	276572	406154	504020	295572

1914年英国就几乎全都是输出给日本的了。^① 英国把制药业发达的德国作为输出对象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国把日本作为吗啡输出国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有一件令人费解的怪事，日本大藏省的关税统计表上的输入数量，^② 与英国方面对日输出数量的差额悬殊很大，以1914年为例，英国对日输出了35万盎司，而日本只不过收进了18万盎司，那么其差额17万盎司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当时（1917年），大内丑之助在《支那 鸦片问题解决意见》^③ 的调查报告中对这些吗啡的去向作了说明。原来，那17万盎司吗啡从伦敦发出，或者经过西伯利亚铁路，或者打成邮包，都送到了关东租借地的大连，再从大连输往满洲、华北一带，这当然就无需进入日本本国了。只有那18万盎司，或经船运或用邮包送到

① 1914年从英国向德国输出的8.5万盎司之中，有7.6万盎司是转手向日本再输出的。

② 日本大藏省税关统计的主要输入国和输入量（单位：盎司）：

年 次	英 国	德 国	美 国	合 计
1907	11,380	14,753	—	26,133
1908	31,440	9,595	—	41,035
1909	7,200	10,539	—	17,739
1910	13,620	8,257	—	21,877
1911	21,305	4,314	—	25,619
1912	21,386	9,857	—	31,243
1913	73,303	17,327	—	90,630
1914	97,927	76,493	1,660	176,080
1915	295,958	20,791	38,772	355,521

③ 大内丑之助秘件：《支那鸦片问题解决意见》（大正6年）第116页。大内丑之助是明治30年（1897）后藤新平赴台湾时带去的调查员。大内是野波静雄的笔名。大正14年（1925）他出版《国际鸦片问题》一书（平凡社版），其中关于吗啡问题一项被删去了。

神户港，在交过了进口税之后卸下船，然后装船输出到上海，为使送到上海的吗啡免遭英国人税吏的麻烦，在卸船之后，有必要由神户、大阪的商人把这些吗啡混进出口的杂货之中进行再包装。

当时很多经营杂货的神户、大阪商人以及在大连经商的几乎所有日本商人都是兼营吗啡业的。日本国内用于医疗方面的吗啡消费量每年只有50——200磅就够用了，最大限度也不超过3200盎司，而从英国输入日本吗啡数量却有这个数量的100倍，这都是运到中国去的。据说，一个鸦片中毒者每天平均需要注射0.3克吗啡，鸦片吸食者通过吸食鸦片吸收到体内的吗啡成分是有限度的，然而倘若注射吗啡则能全部被吸收，由于毒性过大，不要几个月的时间即可致死。由此可见，大量走私吗啡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危害。这就是70年前有人在日中两国人民中间制造的不友好的历史。

虽说早在1906年中国政府和各国政府之间，在关于禁止在中国国内制造和运输医疗用以外的吗啡和注射器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协议，但由于吗啡携带运输方便，又因为它没有气味难以查获，因而成了走私的最好商品。在世界上奸商虽然各国都有，但为什么唯独日本会出现这么多呢？这是因为日本贸易商人有他们独特的方便条件。

刚才提到的大内就在他的报告书中接着写了如下一段话：“我‘邦人’在中国居住者达10万人（关东州除外），其天资不及欧美人者虽然为数颇多，然欧美人之中无赖汉者流亦不乏其人。至肯去承担土匪行为，经营下流行业，乃至对支那人进行讹诈者，屈指算来——实属遗憾，不得不首推‘邦人’为第一位也……此种情况之出现，虽然与我帝国在国外之势力给予扶植有其不小的影响……此外，也与‘邦人’敢于冒险，肯深入腹地，熟悉当地情况的有利条件亦不无关系。据以往经验，先驱人物也几乎大部都从此等‘邦人’中出现。……所谓下流行业经营者多数属卖药行商，他们几乎无一不是吗啡和‘可卡因’的零售者。此等违禁品由于利润极大，操此业者又多善于伪装成姿态坦然，又能潜入满洲内地

神出鬼没，因此中国当局很难查获。”^①

从事这种土匪性的下流行业的经营者们，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中国方面是无法取缔他们的。就在这个时期内，日本盛行一种叫作“土匪之歌”的流行歌曲，其中唱道：“4亿支那人在等待，狭窄的日本住腻啦”，于是从此以后就把进入中国的日本人称为“大陆浪人”，也有叫他们是“住在中国的恶棍”的，大内在报告中所说的正是这种“恶棍”的生活方式。

这一些“住在中国的恶棍”、下流行业的经营者们，成群结队涌向中国腹地，在由他们编织成的吗啡走私网里，也正是大连、神户、大阪的吗啡走私商们赖以获取财源的希望所在。^②因此，大内在报告中还添加了一句：即使把日本方面的吗啡输出策源地——日本本土和大连的走私者们都取缔了，欧美那些经营者也会出来取而代之，并不见得会收到什么预期的效果。对1910年代前半期高涨起来的中国禁烟运动进行暗中破坏，并给以致命打击的也正是这些日本吗啡走私贩们。

日本国产吗啡的制造与台湾总督府

从英国进口吗啡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吸引了处于勃兴时期的日本制药资本家们极大的兴趣，然而在日本国内由于鸦片法的存在，鸦片输入已被政府垄断，根本就不准民间有插手的余地，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目光盯上了台湾总督府输入的鸦片原料上了。而且总督府当局也已经有一套生产吗啡的计划，^③在后藤新平的支持下，由专卖局局长加来佐贺太郎签发了由“星制药”独家收买，

① 《支那鸦片问题解决意见》第200—203页。

② 星新一：《弱小的人民，强大的官吏》，载《角川文库》，昭和46年（1971）版，第24页以下。

③ 第41届帝国议会众议院决算委员会第5分科会议录第4回，大正8年（1919年）3月10日。

由总督府当作处理品官卖的粗制吗啡命令书，这是发生在1915年4月里的事。早在未签发命令书之前，由总督府高级官员夫人们组织的台湾妇女慈善会就把“星制药”的股票买走了；这种私分利润的密谋是人们以后才弄清楚的。

从1915年到1918年的4年当中，由总督府处理给“星制药”的粗制吗啡就有9200磅，以后又有约1万磅即16万盎司的日本国产精制吗啡由“星制药”生产出来，被送上了运往中国的走私线路，“星制药”因为这一批吗啡所获得的利润，据估计至少超过了280万日圆。^①

这样一种靠买废品赚大钱的生意，其他各制药资本家也绝不会轻易放过，相继有大日本制药、三共制药，内国制药等商社向内务省、台湾总督府提出了收买被当作废品处理的粗制吗啡的申请。然而，由于当时曾先后出任过寺内内阁的内务大臣和外务大臣的后藤新平，与台湾总督府以及“星制药”之间都有很深的勾结，内务省只好另外答应修改民间输入鸦片法条文，准许包括“星制药”在内的4个商社每年可以输入为数不超过4.7万磅的原料鸦片，据估算，这些鸦片若把它制成10%的精制吗啡，那么每年又会有7.25万盎司的日本国产吗啡，从1917年开始被推上走私市场。

自1915年日本开始生产国产吗啡以来，其产量当然年年都有增加；而且日本每年从国外进口吗啡的数量也年年有增无已，由1915年的35万盎司，增加到1916年的55万盎司，到1917年又增加到60万盎司。

国际舆论对于中国国内遍遭吗啡祸害的惨状，纷纷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的谴责。对此，在1918年2月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内务大臣后藤新平答复说：“大概列强因为战争关系顾不上走私，所以日本人的走私才多了起来的吧……因此受到的谴责也就多起

① 在上述分科会上，由众议院议员寺田，根据台湾总督府提出的4年里处理掉的粗制吗啡数量计算出来的星制药所获纯利。

来了……日本对于生产吗啡和进口吗啡……取缔是严格的”，^①看来，日本政府决心要装糊涂到底了。日本政府的这些谎言是受到日本国内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支持的。

鸦片走私基地的扩大

大连是吗啡走私的中心，同时又是鸦片走私的基地，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就在这里，在日本殖民地官厅的指挥监督之下，有组织地干出了鸦片走私的勾当。关东都督府开始曾把贩卖权交给关东州内持有特许证的人，官方只征收特许费，以后也就在1915年，把鸦片输入改成了由都督府直接经营的专卖制，这与台湾总督府在同一年里已实行了粗制吗啡官卖制相较，关东都督府虽有失之东隅之感，但关东都督府所占有的地利之便也使台湾总督府感到望尘莫及。

在中国国内禁烟体制不断强化而使关东州以外的中国各地区的鸦片烟价格直线飞涨的情况下，关东都督府若以日趋低廉的国际价格一手买进鸦片再倒卖给关东州内的走私商人，就会有大量的赚头到手，为此关东都督府在一个叫宏济善堂的慈善团体里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戒烟部”，由关东都督府派进职员，在大连民政署长的指挥监督之下，从事鸦片贩卖的活动，并规定所得收益一律以特许费的名义全部上交给关东都督府。

本页脚注^②列举的是关东都督府1907年到1920年各年特许费的收入，由于设立了“戒烟部”而使1915年的特许费一跃上升到头一年的11倍，两年后的1917年则超过了500万日圆。这一年台湾总督府的鸦片专卖收入的总额是800万日圆，获纯利若按30%计算，可得240万日圆，对比之下，关东都督府的鸦片收益是台湾总

① 贵族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事速记第2号第25页，大正7年（1918）2月15日对贵族院议员阪谷芳郎所提质讯的答辨。

② 关东都督府（关东局）地方费会计帐：

督府的两倍多。

按规定，关东都督府（1919年改称为关东厅）的地方财政是无需向帝国会议报帐的，因此这笔巨额的特许费收入就变成了殖民地官厅的一笔“黑财源”。在汇总关东都督府最初10年业绩而刊行的《关东都督府施政志》的地方会计栏目里列上了特许费的收入数字，但是《二十年志》却把它删去了，到了出《三十年志》的时候却连会计数字表也撤去了。很明显，他们对于公布特许费收入的数字是很有顾忌的。

本文上页脚注②所记录的1916—1920年特许费收入的数字，是1921年戒烟局贩卖走私鸦片的丑闻遭到揭发的当时由政府于议会上第一次公布出来的数字。在这桩《关东厅鸦片案》中，据因渎职罪被起诉的大连民政署长中野有光和戒烟局理事补——小

年 份	经常收入 (千元)	其中鸦片特许费 (千元)
1907	428	31
1908	745	73
1909	800	83
1910	842	86
1911	854	89
1912	866	102
1913	908	132
1914	970	204
1915	3105	2288
1916	3500	2521
1917	6392	5314
1918	6394	4638
1919	4144	1948
1920	6552	2138

嶋贞次郎等供称，一切走私活动都是根据拓殖局长官——古贺廉造的指示进行的，因而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注意。拓殖局长官是处在一种监督日本所有海外殖民地官厅（除台湾和朝鲜之外）的地位上，就是这样一个长官居然也是一个走私鸦片的指挥者和受贿者^①。

另外一个与大连齐名的鸦片走私基地是青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领了青岛的日本陆军赖在那里长期不肯撤退，作为占领地区行政机关的军政署的主要财政来源就是靠贩卖鸦片。刚开始是从贩卖一部分台湾总督府制造的烟膏中取得财源^②，不久，青岛军政署就直接参预了生鸦片的输入活动，仿照关东都督府的作法，在日本占领军的庇护之下，以不断麇集于山东一带各个城市中的日本下流行业的经营者们为帮手，进行了大批量的贩卖活动，其结果使青岛军政署的鸦片收益每年都超过了300万日圆^③。

从北向南——大连、青岛、上海，在这一连串的鸦片吗啡走私基地的最南端，还有一个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从这里通向中国内地去的鸦片贩卖路线则是由具有日本国籍的所谓“台湾籍民”开发的。据1926年厦门领事井上庚二郎编写的报告说：在居住厦门的6,831个“台湾籍民”当中，依靠贩卖鸦片为生的就有2,051人，在“台湾籍民”当中竟有30%是鸦片贩卖者^④。于是，到了1910年代的后半期，即逐渐地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走私机构，这个机构是：（一）以沿海地区受日本影响最大的主要城市

① 原一郎编：《原敬日记》第5卷（1965年福村版）第385页；大井静雄：《鸦片事件的真相》（大正12年）第3页以下。

② 台湾总督府向青岛输出自制烟膏的收入额：1915年为5万日圆，1916年为22万日圆，1917年为21万日圆，1918年为21万日圆。1916年1月，大阪商船平安丸持青岛军政署的输入许可证输送鸦片途中，被上海海关扣押。由此可见，青岛军政署从这时开始已经直接输入鸦片了。

③ 野波静雄：《国际鸦片问题》第428页。

④ 厦门领事井上庚二郎：《厦门台湾籍民问题》（大正15年9月），载于《台湾近现代史研究》第3号（1980年）。

为据点，由大批的日本人或具有日本国籍的居民组成一群下流行业经营者的团伙，建立了伸向中国腹地的鸦片贩卖网，构成了这个金字塔形机构的底边；（二）由大连、神户、大阪的杂货商兼营的鸦片吗啡走私贩构成了这个金字塔的第二层；（三）上面还有大日本制药、三共制药、内国制药、星制药等一些制药资本家高踞于金字塔的第三层；（四）立在金字塔尖上的还有台湾总督府、关东厅等殖民地官厅的高级官僚，对鸦片吗啡的走私进行着指挥和监督；在这个机构的背后还有后藤新平、古贺廉造等在日本国内充当政治代理人的角色，这样的一种机构的形成，是加来佐贺太郎在他的《支那鸦片制度意见》中首先提出来的。

同日本陆军之间的关系

可是到了1918年，当日本的鸦片吗啡走私活动达到了最高潮的时候，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受到的谴责也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①至此，日本政府也只好改变应付的手法。接替寺内的原敬首相在1919年2月的帝国议会上，亲自声明说：“政府已在上月的18日决定采取严厉禁止的方针”^②关于发表这个“断然禁止的”声明的意图，据21日这一天的《原敬日记》记载：“对‘支’外交上有此声明之必要也”。在凡尔赛媾和会议的记录上人们还能看到，要把日中两国之间的最大悬案——归还山东问题和走私鸦片吗啡问题两者区分开来的谈判目标，但是，事情仅仅过了3个月，当新任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去任所上任之际，政府向他发出了“关东州财政来源缺乏，加上由于严禁鸦片的结果，岁收亦感不足……不列入计划”的内部训示。由此可见，原敬首相对于在关东州实行

① 天津发行的《字林周报》1918年11月21日以《谴责日本人走私鸦片》的报告为题，揭露了日本官民互相勾结搞走私。1919年2月14日《纽约时报》也作了转载。

② 第41届帝国议会贵族院预算委员会议事速记第9号，大正8年2月20日，第83页。

禁烟是采取了坐视不理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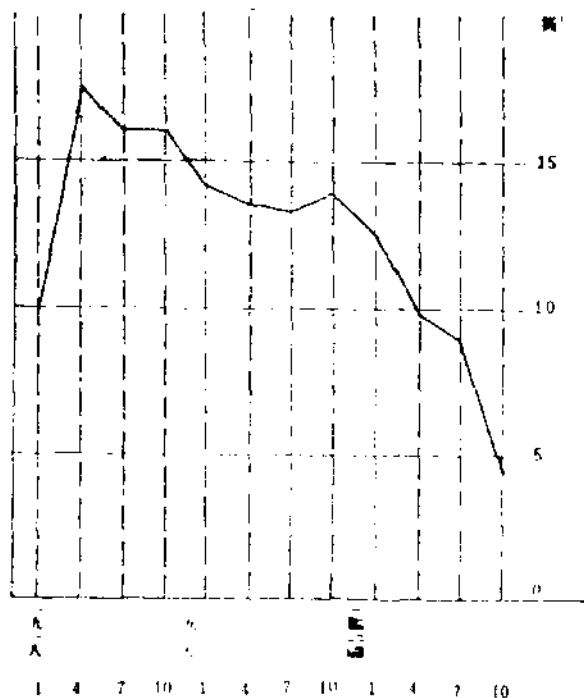
过了两年之后，从“关东州鸦片案”中公开出来的鸦片特许费的收入也确实有了大幅度的缩减，不过，这种缩减正如本页脚注①所显示的那样，是由于市场上的鸦片价格下跌，迫使官卖鸦片价格也跟着下跌的结果。但由戒烟部购卖进来的进口鸦片的数量却比头一年增加了20%。由于库存积压过多，就在这一年的7月，戒烟部又指派了50多个专搞走私的“特卖人”来充实加强这个走私体制。指挥这个活动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拓殖局长官——古贺廉造。在内务省工作多年的古贺，因长年协助原敬统治内务省有功，才被提拔为拓殖局长官的。在走私利润蛊惑下发展起来的这种走私机构，甚至连权势大到如内阁总理大臣原敬一类大人物也拿它无可奈何。

最后参加的，但过后不久就站到这个金字塔尖端上的帝国陆军所扮演的角色，对以后走私活动的发展，越来越显现出它的重大影响。1917年，日本陆军的宠儿——田中义一在中国进行了视察旅行之后，也对鸦片走私的后果表示担心，并对这种走私活动发表了否定的见解，他说：“日本的好商在日本法权的庇护之下从事欺骗奸诈行业者为数不少……因而构成中国对日本感情恶化的

① 关东厅（都督府）鸦片经办数量（单位：贯——日本的计量单位，一贯相当于3.75公斤。——译者）：

	采购量A	没收量B	A + B	卖出量
1916年	4777.6	378.921	5156.521	7550
1917年	2864.0	553.870	3417.870	9973
1918年	4437.6	373.101	5170.701	7971
1919年	5864.0	607.870	6472.011	4189
1920年		135.970	135.970	2758

1918—1920年大连鸦片行情



(单位：匁——日本记量单位，等于3.75克。——译注)

因素亦甚大”^①。关于青岛军政署的鸦片走私活动，本文在前面已略有涉及，从转过年的1918年起到1922年止，日本陆军向西伯利亚出兵，日本陆军在此期间，正如《第11师团驻屯区域鸦片栽培事业报告书》（尼港特务机关，1922）中所写的那样，它把鸦片产区沿海州控制在自己手中，强行征购此地出产的鸦片，用军用船只运进青岛^②。过去，后藤新平虽曾在日本内地鼓励栽种鸦片原料^③，由于进行不顺利，给日本鸦片吗啡走私机构带来原料供应上的最大难题。控制沿海州的鸦片产地虽说是暂时的，但却使陆军的多年梦想得以实现。而且把在这里积累下来的大量栽种和征购鸦片的经验一直利用到满洲事变以后的“伪满”时期。西伯利亚派遣军和青岛军政署所获得的鸦片收益中剩余的一部分钱，由担任原敬内阁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以机密费的名目，用大臣官房主计官的名义存进银行，后来听说其中有一部分被担任政友会总裁的田中当作“资助费”带走了300万日圆。

① 田中义一秘件《对华经营私见》，（大正6年9月）第6页。

② 二反长半：《战争与日本鸦片史——鸦片王二反长音藏的生涯》，（昂书房1917年）第221页。

③ 同上，第1页。

（日本陆军）鸦片专卖收益款额之巨，一方面靠的是横征暴敛（在发动满洲事变之前的1930年9月里，由关东军参谋部编写的《关于如何统治满蒙古领地的研究》中写道：“中央行政费的来源依靠征收间接税：关税、官营、专卖……”）^①。另一方面陆军参加走私机构的另一层意思也表明了是由陆军与走私贩的秘密组织直接的建立了联系。随着禁烟体制的不断加强，鸦片价格也日趋高昂，到了这时越是敢于冒大风险的人，所赚得的利润也就越大。

进入19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处于军阀混战中，禁烟体制遭到破坏，致使鸦片的走私量大增，随即出现了象本文第267页脚注^①所显示的那种大连烟价行情的暴跌，这样一来，烟贩子们就没有那么多的“甜头”可赚了。不过，这种情况一到1920年代的后半期——即于恩德所说的民众自发的第三次禁烟运动的高涨时期——又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们又遇上了一个走私的大好时机。与此同时，高涨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废除治外法权的口号，又直接威胁着他们自身的存在。当1928年北伐军逼近北京时，田中义一内阁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强行出兵山东，这里所说的侨民究竟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职业者呢？他们这些人无非是日本陆军打进中国腹地的奸细和密探就是了，在他们的身后紧跟着就是日本陆军的进攻。在满洲事变以及侵略华北等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在每一件这种由陆军密探所策划的阴谋当中，没有哪一件没有他们的密谋参与在其中，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穆传金 译

^① 《关于如何统治满蒙古领地的研究》、《关于上述问题石原中佐之所见》，载《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篇第95页。

拯亡会修女在中国

艾赛沃

一

1867年12月5日早晨，天气晴朗，寒风袭面。圣心姆姆（La Mère du Sacré-Coeur）^①和保禄姆姆（La Mère Saint-Paul）乘坐的船驶进黄浦江，在上海靠岸。她们上岸后，找不到栖身之所。当时的上海不像现在：马路、公园、高楼大厦、俱乐部、银行，几乎都还没有。经过残酷的长毛之乱的战争，古老的中国无可奈何地向从混乱和毁灭中救助了她的欧洲人开放门户。法租界、英租界、美租界已划定，但居民还稀少。领事馆和中西商行，寥寥无几。矗立着的是环绕古城的百年高墙。

法国领事白来尼（Brenier de Montmorand）及其家属非常亲切地接待了两位修女。她们在领事馆歇了几天后，来到了王家堂。这是龙华大庙附近一个翠竹满院的小村庄。1864年，那里造了一间供避难在董家渡的贞女住的中式房子。这房子至今尚在。村子的东北角有一教徒和贞女共用的小教堂。贞女有近百人，由一位叫四姑的老贞女领导，其中约有20人立志献身于传教工作和给一些来就学的学生讲些教义和教一些书。两位拯亡会修女住进王家堂一个月之后，又来了另外四位。第一年，她们除学习中国语言和生活习惯外，别无所事。

^① 江南一带天主教内一般称“拯亡会”、“仁爱会”等女修会的修女为“姆姆”。“拯亡会”、“仁爱会”等修会的修女都有一“会名”。“圣心”即是这个修女的“会名”。

她们到中国来做什么？回答这问题，须从拯亡会的创建说起。拯亡会的创建人是欧仁·斯梅（Eugénie Smet）。她们来中国时，这位拯亡会的创建人还活着。欧仁·斯梅1825年生于里尔。1856年，她怀着为建立一个拯救炼灵的修会^①的目的，来到巴黎。但是，在何处，怎样，用什么方法，需要什么条件建立这个修会？她还胸无成竹。她独自一人，除了对天主上智的极大信赖和毫不动摇的依靠外，其他一无所有。以后，她怎样于同年7月2日成功地在巴鲁伊埃尔路定居，怎样集合同伴，怎样在那里和她们共同生活，怎样受到几位虔诚司铎和许多修士的支援，以及怎样于1859年3月21日受到莫尔洛枢机主教（Cardinal Morlot）的认可和祝福，这个小团体又怎样逐渐发展，等等，等等，
《尊敬的玛利亚上智姆姆（Mere Marie de la Providence）^②欧仁·斯梅小姐传》一书记述甚详，本文不赘述。上智姆姆殁于1871年2月7日。

当时法国有一位活着的圣人，叫维雅内（Vianney），是阿尔斯的本堂司铎。上智姆姆没有见到过他，但曾函请这位圣人為自己释疑解难。1858年，圣维雅内神父回复她：“请为拯救炼灵而办慈善事业吧！这样，你将完全实现耶稣基督的精神，在解救他在世上的肢体^③的痛苦的同时，又拯救他在炼狱中的肢体的痛苦。”后来，圣维雅内神父得知拯亡会修女用圣依纳爵的会规^④作为她们修会的基础时，大声说道：“可怜的孩子，她们得

① 即“拯亡会”。天主教称人有“肉身”和“灵魂”。人死亡后，亡者的“灵魂不死”；如有“大罪”，“灵魂”下“地狱受永苦”，如无“大罪”但有“小罪”，则下“炼狱受暂苦”，待“受苦炼净”后再上“天堂”。又称活着的教徒为在“炼狱”中“受暂苦”的“灵魂”行“祈祷”和其他“善功”，可使之“早日升天”。“拯救炼灵”即是为在“炼狱”中“受暂苦”的“灵魂”行使的“早日升天”的“祈祷”和其他“善功”。

② 欧仁·斯梅的会名。

③ 天主教有所谓“基督奥体”的教义。按照这一教义，天主教的信仰对象“耶稣基督”是“奥体”的“头”，天主教徒是“奥体的‘肢体’”。

④ 即耶稣会会规。“圣依纳爵”即耶稣会的创始人依纳爵·劳耀拉。他去世后，罗马教皇封之为“圣人”。

救了。”

1867年8月4日，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Languillat）由耶稣会省会长德蓬尔瓦（de Ponlevoy）陪同，来到了巴鲁伊埃尔路拯亡会会院。他向在场的二三十位修女讲话说：“孩子们，你们中有愿意到中国去的，请起立！”大多数修女自愿地站了起来。同年10月10日，郎主教又写信给她们说：“请来中国吧！请到江南来建立你们第三个会院！我请你们来，不是到大巴尔山^①，而是到你们所喜欢的，也是你们作为座右铭的加尔瓦略山^②来，到中国来，到教会托付给我们的传教区来祈祷，受苦，工作吧！”她们到中国来了，重新遇到了耶稣会士苏念澄神父（Basuiau）^③。由于天主上智的安排，苏神父从拯亡会创办伊始就是上智姆姆的支持者。在7年的时间里，他出主意并用自己的经验帮助了这个修会的组织工作。

如今苏念澄神父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再度为拯亡会修女出力，约20年之久，一直到1886年去世为止。

二

圣母院

1869年，王家堂的房屋让给了郎怀仁主教请来的圣衣院^④修女，拯亡会修女搬进了在徐家汇新盖的房屋。它的名称叫“圣母院”。

这个大有发展前途的圣母院和耶稣会住院相隔一条可通马车的道路和一条可航小船的河浜。这条路和河浜在中国等于是我们欧洲的交通大道。走进小天井，左边就是现已放大的教堂，右边是会客室，中间是正门。往前，在成长方形的大园子周围，左边

① 〈圣经〉故事中耶稣“显圣容”的地方。

② 〈圣经〉故事中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地方。

③ 1865年来中国。

④ 女隐修院。入该修院的修女与外界隔离，无特殊原因不外出。

是孤儿院，右边是拯亡会修女的住所。再往前，是住宿生和献堂会修女的两排房子。

从欧洲来的拯亡会修女在圣母院创办的这一切事业，倏忽已50年了。徐家汇圣母院是她们的总院。但当1869年她们搬进来时，仅有10个修女。

圣心姆姆是徐家汇圣母院第一任院长，后回法国继承上智姆姆做拯亡会会长。4年后，与世长辞。

搬进圣母院后，即收孤儿和学生等。1年之后，院内已有220人，不久又增加到400人、500人。到现在1913年11月已不下1660人，其中半数是在院外的学生或工人。

今天回顾一下过去，看一看半个世纪以来圣母院所做的善举，人们不能不感到惊讶，赞赏，并感谢天主。

这些善举有摸得到的，有看得见的，有可以计数的。人们可以用数字和图表加以表达。因此，只须遍阅一下江南教区每年公布的关于这些事业的统计材料，对这些善举就可以一目了然。例如从1869年至1913年教了多少学生，收了多少婴孩？可以得到如下的数字：

教内住宿生：2275人；

教外住宿生：551人。

育婴堂收进婴孩：11130个。

下面逐一介绍圣母院的各个主要事业：

1 育婴堂：

当拯亡会修女刚搬进还未完全竣工的圣母院房屋时，上峰已决定把分散在附近堂口和寄养在教徒家的孤儿完全集中在圣母院育婴堂。到了指定的日子，许多小船摇到圣母院门前，从船中抱出10、15或20个婴孩，放进育婴堂。这一天，共送来了150个小孩。

从1869年到1913年，总共收了和付洗了11130个婴儿。其中许多婴儿在送来时已奄奄一息，送进来后即飞向天堂。较健康的

婴儿则托给徐家汇及其附近的奶娘抚养。每月一次奶娘抱婴儿到育婴堂来，由管理育婴堂的姆姆检查婴儿的身体状况，并发给奶娘预先讲定的工资（约合4个法郎）和婴儿的衣着。

1871年，一位相当有名的旅行家于勃南（Hubner）男爵旅行到上海，参观了育婴堂。请听听他是怎样讲的，他说：“我们被领进育婴堂，参观了婴儿室。里面的婴儿有的是家里人送来的，有的是从马路上拾来的，都是女婴。送进来时皮包骨头，呼吸困难，而且患有严重疾病，满身疮斑。送进来后，人们给她们付洗，还给她们洗澡、包扎，抚养她们。如果她们能继续活下去，将来就同教内人结婚。”“变化仅发生在几小时之内！……”

“这些小东西昨天还处在死亡的边缘，今天她们找到了为救她们而从地球另一端来到中国的母亲。”

自从1871年以来，育婴堂发展很快，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小婴儿间：凡是被丢弃在圣母院门口，或是由女教徒甚至外教徒抱来的婴儿都放在这一间内，受照顾和受洗礼。（二）大婴儿间：刚断奶的2岁或3岁的婴儿都生活在这一间。（三）小班：有40至60个女孩。她们开始读一些书和按照她们的年龄做些工作。（四）大班：近13岁进大班。在大班内，她们学习干活，如纺纱、织布、裁剪、洗衣、烧饭、种花、除草，等等。有的也学刺绣、做花边等。她们结婚后，仍可回到圣母院的工场间做工，俾能增加一些家庭收入。

这些孤女受到这样好的抚养，又有谋生的手艺，故很容易嫁出去。土山湾的孤儿和徐家汇附近的一些年轻农民和工人很喜欢娶她们为妻。这些青年夫妇现已成为徐家汇村庄和附近农村天主教徒中的大部分。圣婴会^①事业的目的，就是要不仅给教外婴孩付洗，而且要通过这些婴儿长大成人，如果她们能长成人的话，在外教地方繁衍教徒后代。

^① 19世纪40年代耶稣会士重来中国之际，法国成立了“圣婴会”，从事募捐活动，提供经费给耶稣会士开办孤儿院，收中国婴孩，予以付洗。

还有病弱和残废者：她们人数很多，年年不缺。瞎子，跛脚，呆子，半疯瘫者，等等。她们终生留在圣母院内，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 教徒寄宿学校：

起初是为年轻的贞女办的，是一种培养传教人员的学校。拯亡会和献堂会^①的第一批本地修女都来自这个学校。

后来中国妇女教育初见端倪，这个学校里也来了几个学生。不过她们都是18至20岁的青年女子，不大可能对这些大年龄学生按步就班地施以德、智教育。之后有了12至14岁的女孩，最后有了6至8岁的学童。她们在学校里受到拯亡会修女的培育。

课程方面：教徒寄宿学校的课程遵照中国一般女子学校，但基础更深，纪律更严，知识领域更加广泛。尤其是宗教课程是一个耶稣会神父教的，中国语文是两个举人先生和本校毕业的女教师教的，还有初级课程和手工课（如绣花，裁剪，缝纫，做纸花等）。也教绘图和声、器乐。学生选读法文课的很多。

拯亡会修女尤其注重德育，用全部力量培养学生的品德。因为，这些学生将对她们周围的人起传教的影响。她们中有的虽然不做修女，但将献身于教育事业；有的矢志度修女生活，将至远地甚至走出自己的省份去宣传信仰；还有的，在成立家庭之后，将把天主教的真精神传给她们的子女和孙子孙女。

3 外学堂^②：

拯亡会修女一到徐家汇，就为那里的孩子开办了外学堂。起初，学生人数至多是50至60。这些年来，孤女们结婚，成立了许多家庭。她们都住在圣母院工场间附近，因此学生人数有了可喜的增加。这个学校现有学生250名。

4 聋哑学校：

① 上海教区创办的中国籍女修会。该会修女不称姆姆，称先生。一般在天主堂内从事传教辅助工作。

② 教会小学。因开设在“圣母院”的外面，故有“外学堂”之称。

讲圣母院各主要事业，不可对聋哑学校只字不提。

有个拯亡会修女，由于一位慷慨的、并热心于传教的著名女教师的帮助，来到巴黎。在后者亲切指导下，她进修对聋哑人进行教育的独特而又艰巨的课程。这位修女于1893年来到中国后，孜孜不倦地教育聋哑人和培养一个中国修女做她的助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仅仅一年之后，这位如此热诚于这一事业，这一事业也正需要着她的工人，被天主叫去接受赏报了。

聋哑小孩靠了她开始学会生活。她们为失去了自己可爱的亲人而失声恸哭。

在天主上智的眷顾下，这位中国修女胜任地把聋哑学校办下去。一些官员在参观时，这学校特别引起他们的注意。

5 启明女中：

这所专收教外家庭富裕的女学生的寄宿学校，创办于1904年。在我们的教育事业中，它开办得比较晚，历史短，但有前程。创办这所学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意识到在教育事业的一切方面都落后了，决心在学校中采用欧洲人的教学方法。在革命时期当上了上海知县的吴先生为首的几个有钱的文人开办了一些新式学校。不久，他们注意到，要传授新知识，需有外国教师，但他们开办的学校中还没有。政府，各省，还有私人，不惜化大笔金钱，派青年去日本、美国和欧洲留学。但要派女青年出去，谈何容易。吴先生捐私囊，在上海城西，开办了一所高等女校。他请拯亡会修女给学生上几门特殊课程。修女们应请，每星期去上二、三节外语、钢琴、刺绣、算学课等。吴先生看到效果很好，进一步请求修女们说：“你们能不能选择几个高材生住到你们那里去学习，以后回来当教师？”启明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迄今还不到10年。它有点像同肇家浜旁边的震旦学院^①配对

^① 原上海天主教会大学——震旦大学于1903年初创办时，设在徐家汇老天文台内。

似的。自创办以来，在这学校中读过书的教外女生已有582人。目前有寄宿生132人。

入校的学生应是良家出身，年龄至少8岁，最大不超过18岁，须由住在上海及其附近的家长或保人送至学校。按当地的风俗，大部分学生已订婚，甚至有60名已经结婚。

学生中也有未婚夫或年轻丈夫就读于震旦学院的。所有学生在入学时都是外教人^①，离校时则有三、四人以上领洗入教。除了一般的课程外，每星期有一节教理问答课。讲课的是一位中国籍耶稣会神父。经过家长同意的学生才来听课。目前经常来听课的学生有50人左右。

启明主要读英语。旁边的有266个学生的教徒住宿学校，主要读法语。绘画和音乐等课较受欢迎。

课程很广泛。中文课，从学习识字到研究文学。科学方面有自然、物理、地理、算学、代数、几何等。手工课包括剪裁、中西刺绣、做花边、做纸花等。体操课有棍棒操和哑铃操。专门课程有英、法文。英文课从预备班开始到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课程。去年有一个学生考取了这个大学。

教师中有7位修女、5位女先生、2位教中文的文人。

学生毕业时，经过考试，成绩及格，发给证书。证书分预科、初级、高级三种。按照不同的课系和在规定的学习年限中所获得的知识程度，分别发给中文、科学、数学、外语、色画、墨画毕业证书。

毕业生拿到文凭，很容易在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教外学校受聘当教师。她们也愿意当教师。有十来个毕业生则自己开办了学校，很有进展。有三、四个学生考进了北京的师范学校或高等学校。

启明的学生，尤其是她们的家庭，一般都十分重视学校的教

^① 天主教自称“真”教，称基督教其他教派为“裂教”、“拆教”，称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为“异教”、“邪教”，称不信宗教者为“外教人”。

育和校规。每年的年终考试，特别是毕业考试，十分严格，以比其他学校更认真而享有盛名。

关于圣母院的事业就写到这里。最后，再提供几个数字。自1869年以来，听教理课的人次有多少？有2218421人次，其中今年是109849人次。

6 施诊所：

拯亡会修女住进圣母院后，就开办了一个诊所，来免费就诊的病人十分众多。

早上五点钟，病人就从远处来了，在河边坐着或躺着，等待诊所开门。

一位学过中医并有治病经验的中国修女给他们逐一诊治，并免费发给他们需要的药品。除了常用的中药外，西药用得最多的是奎宁、驱虫药和眼药水。

接待病人的候诊室的墙上挂着许多表明天主教主要教义的彩色画像。一位中国修女指着画像向病人讲解。她也倾听这些穷人的诉苦。这样就开了一条使人信教的路。

有些不能到诊所来的病人，往往请修女医生出诊。有一次来请的人是一位有钱人。他的儿子病了，请过许多医生，又到庙里化了许多钱，但都没有用。他听人讲起施诊所，就打发轿子来请修女医生。

修女出诊，惯常坐独轮车，由一个教徒寡妇伴同。

这种出诊经常收到奇妙的效果。

从1869年至1913年，共出诊64660次；在同一时期里，施诊所施诊926473次。令人欣慰的是：有25601个婴儿和112个成人在临终前受了洗礼。

7 工场间：

圣母院成立后，出于各堂口传教士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使大的孤女和住在院内的其他人有工作可做，开办了一个刺绣工场间。开始只简单地做些教堂装饰用品，后来按照客户的要求，做

些其他物品。

不久，外教人开办的纺织厂和城里的工场招进了许多男工和女工。这对徐家汇孤女出身的教徒是一个危险的场所。为了使她们能避免危险和养活自己的家庭，有必要在圣母院旁边开办一些工场间。

天主特别降福了这个计划。近500名妇女和青年女子每天来到各工场间干活。有30名妇女在洗衣间干活。其他有烫衣的，有缝纫的，有修补的，有绣花的，有做室内装饰品的，有做爱尔兰式、布鲁塞尔式等各式各样的花边的。

工场间已很闻名。途经上海的外国人没有不来参观的，参观时赞赏不已。

大部分女工是孤儿院嫁出去的孤儿。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她们做工时，孩子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办了一个托儿所和一个幼儿园。在一位西洋修女的监督下，几个忠实的妇女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内看管、照顾和逗乐孩子。看到来做工的年轻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手里还携着一个或二个孩子，她们把孩子放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内，稍提早一些下班，把孩子领回，到家后，为在上海或在土山湾工场间做工的丈夫及时准备晚饭，这景象确是动人而有趣的。

三

洋泾浜若瑟院

拯亡会修女为达到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办教育初非拯亡会的计划。拯亡会创始人曾向阿尔斯本堂司铎谘询过，后者回答说：“为富家子弟办的学校有的是。正如你们所说的，听天主上智的安排，你们将有你们每天做的事。”

事实果然如此。目前拯亡会已在全世界建立了33所生气勃勃的会院：法国有12所，比利时有2所，英国有4所，意大利有4

所，美国有3所，其余在西班牙、瑞士、奥地利等。所做的事情，主要是照顾穷困的病人，办施诊所，设立善会^①，教导无人照管的儿童、愿意入教者、外来人和做避静^②的人等。但在传教区，拯亡会修女懂得她们更要“为一切人做一切的事，以达到使一切人归于耶稣基督”。

所以第一批来上海的修女就要做一切事情，包括办教育。天主也降福这件事。起初，像办这类事常遇到的一样，困难重重。1871年3月1日，被指定来建立会院的两修女从徐家汇搬进了孟托班路^③的一长排中式房子。这排房子是1860年在法国军官领导下，为远征北京的法国军队用作医院而建造的。部队离开后，改成了马厩、仓库、车库等。拯亡会修女就在这地方为西洋青年女子开办了“圣若瑟院”。马厩改成了会客室、教堂和教室等。头几天来的是3个葡萄牙女孩和几个法国天主教女青年，以后来了几个耶稣教女青年，再后又来了一些无家可归、应予收养的孩子。2年后有了40个学生。由于人数增加，1873年，孤女被单独分开，完全由修女负责。收养孤女的这部分称“上智院”，她们除了上必要的语文课外，还学习缝纫和其他有用的课程。

“圣若瑟院”用开音乐会、演讲会进行募捐，来支持“上智院”。上海的贵妇人们每次来参观时，都会捐一些钱。以经济资助“上智院”的，还有法国领事如葛笃先生（Gaudeaux）、和恺自迹先生（Kraetze）等。

拯亡会修女的事业，从此一帆风顺。

① 一般取一宗教名称，如“圣母会”等。参加的教徒须多行宗教“善功”。

② 天主教的一种宗教活动。这种宗教活动的特点是：教徒在一天或三天时间内“避开俗务”、“静修灵魂”，参加教堂内为“避静”而安排的如望弥撒、向神父告“罪”、听“道理”、念“玫瑰经”、拜“苦路”、“默想”、望“圣体降福”等一系列宗教活动。

③ 上海洋泾浜天主堂门前的一段路，中文称“天主堂街”，法文称“孟托班路”。孟托班（Montauban）于1860年任法国侵华军中将司令，3月12日到上海。他来后不久，洋泾浜天主堂举行奠基礼。孟托班被推为该教堂的“保护人”。解放后，此段路名改为四川南路。

目前的教育内容是用英、法文教学的完整的欧洲课程，如读、写、文法、文学、古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天文学、哲学、速记、打字、声乐、器乐、柔软体操、绘画、德文、针线活、刺绣，等等。

学生分成各种不同的班级。还有准备报考剑桥大学的初级、中级、高级3个预备班。

10年以来，在报考剑桥的74名学生中，被录取的有63名。

一共有7个班级，其中1个是7岁以下男孩子的班级，也是最低的班级。

29名女教师中仅5名不是修女。她们分担着各班级的讲课和管理工作。

上述数字已够说明取得的成就，但还可以加上同样有价值的数字。例如从圣若瑟院中出了24个拯亡会修女、4个仁爱会修女和3个圣衣院修女等，还有出自上智院的修女，一共出了61个修女（包括辅理修女）。可见天主教精神笼罩着这两个地方。

上智院自创办至今所收养的学生和孤女，不在千人以下。须知，几乎所有这些可怜的孩子来时才只有五、六岁，或更小一些，她们在这里一直生活到20岁。这一慈善事业办得如此出色，连毫无教会色彩的英法租界工部局也认为对公益有利，第一次作为年贴给了1000两银子，第二次给了1500两银子，以资鼓励。

在洋泾浜还办了一所天主堂小学。现有80个学生。

1890年开办的施诊所施诊201728人次，给47769个垂死婴儿付洗，出诊40761次，施药279728次，给305个成年人付洗。

四

虹口圣家院

上海在发展着。租界上盖满了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和越来越豪华的房子，租界的地皮不够用了，舒适的居宅和富丽的别墅造

到了租界附近，并开辟了以后在“越界筑路”中成为林荫大道和马路的道路。上海成了一座美丽的大城市。

肩负着创办和发展妇女天主教事业的拯亡会修女，有能力在这大城市中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上海的中外居民几乎增加了10倍。在1873年时只有10个修女和40个学生的拯亡会也理所当然地扩充了土地，放大了围墙，造了教堂和几幢4层楼房，划定了院子，并作了建立新会院的打算。

于是在虹口的旧美租界建立了与圣若瑟院相媲美的圣家院。

1892年8月17日，5个拯亡会修女满腔热情地为耕芸这传教的新园地来到了虹口。她们住在原为西班牙领事馆造的一所房子内，四周是稻田，十分寒冷，并且几乎没有一条通路。这一切现在都改变了！美国势力侵入了这整个区域。上述原西班牙领事馆房子，虽然经过改建、扩建，还是不够用，必须另造。1906年1月8日，高大、宽敞、光线充足的圣家院新大楼落成了。它靠近沪宁铁路的上海站，十分引人注目。所以在上次革命中，由于担心叛乱分子会占领它用作司令部，采取了军事保护措施。

20年来圣家院所做的事，可用以下数字来说明：培养的学生总共有1978人，其中圣家院本部的为845人，圣亚纳学校147人，“迈尔西”学校91人，婴孩耶稣学校326人，中国学校569人。施诊所的统计数字是：付洗30520次，出诊14415次，门诊100197次，施药113411次。参加为传教事业而工作的妇女们的集会的人次：玫瑰会13012人次，堂口工作5907人次，校友会1377人次。

五

以上所述就是拯亡会修女来中国所做的事情。她们不辜负郎怀仁主教的厚望，忠实地实践自己修会的格言：“祈祷，受苦，工作。”她们从欧洲来了97人：63个法国人，7个比利时人，16个英国和美国人，3个德国人，2个意大利人，2个奥地利人和

1个罗马尼亚人。这97人中28人已去世，9人被调回欧洲，其中有几人担任了修会的重要职务。中国修女也有了30人，辅理修女有18人，一共48人，其中17人已去世。还有33人是欧洲各国籍的辅理修士。

上智姆姆撒下的种籽茁壮成长。拯亡会已发展至欧洲各国以及美洲和亚洲。虽然遭到种种不幸，但凡尔赛、泽西岛和徐家汇的三个初学院，新修女源源不断，足以巩固原有的事业和发展新的事业。

为拯救炼灵，她们祈祷，受苦，工作，同时用一切方法抚慰在世上受苦的耶稣基督的肢体。如果说对她们在中国如何用祈祷和受苦来尽她们的职责较难作出评价的话，那至少从以上所讲的情况中可以看到她们如何在以行动尽她们的职责。“行动”这个字，目前在法国和各公教国家，似乎概括着所有致力于传教工作和愿为教会做些事情的人的任务。例如修会行动，公教行动，民众行动，社会行动，等等。在中国也同样如此，看来这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对拯亡会修女在上海的事业作一回顾，看到她们的行动所取得的效果，怎能不感到安慰和受到鼓舞呢！

圣母院、圣若瑟院、圣家院三会所做的善事加起来是：付洗100391次，出诊114278次，门诊794310次，施药887225次，讲要理3922209次。

到1913年11月为止，学生的人数是：圣母院693人，圣若瑟院495人，圣家院340人。在这些学生中，1162人是天主教徒，182人是耶稣教徒，33人是犹太人，5人是东正教徒，210人是外教人。

教师共105人，72人是修女，33人是世俗人。

这些数字岂不说明在扬子江边我们修女的行动是什么吗？她们这许多事业的影响之远，她们传教工作的广度之广、深度之深，有谁能说得出来呢？

拯亡会修女在上海已生活了将近50年。她们默默无闻地做着善事，报纸很少讲到他们。这真是为善不求名。半个世纪来上海的善事中有着她们的-份。她们办教育，施仁爱于家庭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扩大了巨大的宗教影响。她们在会内 祷 祈，受苦，工作，不但在会院范围内产生影响，而且影响到会院以外。在会院外影响多远，这较难断定，但在会院外也起着传教影响，看来是不可否认的。

在上海有着做了不说、不写成文字、不为人所知的、将在末日受到显扬的、十分令人安慰的、值得赞叹的好事。这些好事是在人世间做的，但做这些好事的人只等待着那个说过“我就是你的赏报”的人的赏报。

译自《中国通讯》1914年4月号

顾裕禄 译

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大学

刘广京 ①

自从赖德烈 (K.S.Latourette) 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② 问世30年以来, 在这个广阔的领域里很快地出版了许多资料, 同时, 不断增加的教会档案资料也向研究工作开放, 但是这类研究工作却一直很少有人问津。虽然赖德烈教授的著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却很少有人就这个课题的某个方面作出过透彻的专题研究。

从事专题研究通常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们的事情。然而, 如果那些关心历史的传教士们愿意发掘原始文献, 并把他们最清楚的教会工作的各个方面再现出来, 这项工作将会特别有用, 因为他们有亲身的经历, 因而与这个研究课题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 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人们应感谢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 (即以前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联合会), 正是它组织以前的传教士撰写了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③。虽然基督教高等教育仅仅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一个方面, 但是它对于美国基督

① 作者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译者

② 纽约, 1929年版。

③ 科贝特:《广文大学(齐鲁)》(纽约, 1955), 281页; 队克勋:《之江大学》(1955), 133页; 艾德敷:《燕京大学》(1959), 468页; 蓝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955), 261页; 文乃史:《东吴大学》(1956), 163页; 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1954), 138页; 德本康夫人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55), 171页; 华莱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56), 164页; 第9本为《华中大学》, 正在出版。关于这套书的学术上的缺点, 可参见卢茨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第18卷(1958年11月), 第133—134页的简要书评。

教会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它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和世俗教育的进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对于自1882年至1911年清朝灭亡这30年的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某些突出事实作一些考察，作为进行这种专题研究的一个例子，对中国人来说，这30年中，基督教会在华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基础；同时，基督教大学也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学校，开设种种现代课程，以满足这个刚刚才开始觉醒的国家的需要。在1882年至1912年期间，基督教会在华建立的大学不少于12所，而且几乎这些学校都是由美国教会开办的。

下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华早期的基督教大学的目标与影响这两个问题，特别是1890年以前建立的4所大学：由长老会的狄考文（Calvin Mateer）于1882年建立的山东广文大学；由福勒主教（Bishop C.H.Fowler）与李安德（L.W.Pilch）牧师于1886年创办的北京汇文大学；由美国公理会谢卫楼（D.Z.Sherfield）1889年在通州创设的华北协和学院；以及最初由施约瑟（S.I.J.Schereschewsky）主教于1879年创建，事实上直到1890年才开设大学课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1882—1912年中国基督教大学一览表^①

校 名	校 址	建立大学时间	创设差会
登州书院（后为山			
东广文大学）	登州	1882年	北长老会（1）
汇文大学	北京	1886年	美以美会
华北协和学院	通州	1889年	美国公理会（2）
圣约翰大学	上海	约1890年	圣公会
广州格致书院			
（后为岭南大学）	广州	1893年	北长老会
之江文理学院	杭州	1897年	北长老会（3）

① 见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447—451页和第626—634页；葛德基：《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1925—1926年的研究》（上海，1928），第26—27页。

东吴大学	苏州	1901年	南监理会
文华大学	武昌	1903年	圣公会、美国公理会、伦敦会
华北女子 协和大学	北京	1905年	北长老会
上海浸礼会学院	上海	1907年	南、北浸礼会
金陵大学	南京	约1909年	美以美会、基督会、北长老会
华西协合大学	成都	1910年	美以美会、北浸礼会、加拿大监理会、英国公谊会

(1) 1902年后，英国浸礼会参加，1909年后，外国传教组织参加。

(2) 1904年后，北长老会和伦敦会参加。

(3) 1908年后，南长老会参加。

一

在讨论这些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目标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些大学是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一些差会开办的中学发展而来的。传教士们自己就是从教派大学里出来的，很自然地，他们回国后就主张在中国建立教派大学，作为现有的中学水平的学校的扩展。但是当我们研究中国这4所最早的基督教大学的真实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4所大学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是传教士在华教育事业的一项新扩展，而且也是一个新起点。所有这4所教会学校的创建人都有明确的目标与政策。

他们都持有这样一个基本信念：为了促进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让中国的基督教工作人员（即牧师和教师）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这本来是一个很明显的主张。但在当时却没有被人们认识到。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许多教会学校虽然已经开始传授简单的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但这种教学属于

初等教育的水平。很少传教士有眼光和见识能够看到，要使中国的皈依者有效地改变其宗教信仰，有必要对他们的教育予以极大的注意，并像培养传教士本人那样全力以赴地教导他们，认识到充分受教育的本地牧师的重要性是狄考文和施约瑟等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贡献。他们确信现代科学与基督教的灵性不但不会冲突，而且还会加强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因为科学知识将有助于中国人破除迷信。此外，这些教会教育的先驱人物认为，只有当中国的基督教工作人员受过完全教育时，他们才会摆脱对西方传教士的依赖性。用华北协和学院创办人谢卫楼的话来说，“一个有文化和理想的人不愿做别人的奴仆，只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自治的能力，相信要发展，只有发展，然后才会有自立的教会。”^①

所有这4所大学的创办人，不只是狄考文和谢卫楼，还有施约瑟和汇文大学的创办人，都有这种观点。但是后两者却有更远大的眼光和目标。他们认为中国基督教大学应为两个目的服务：首先为中国的基督教工作人员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次，帮助基督教圈子以外的中国人获得西学的好处和接受基督教的影响。早在1877年，施约瑟主教就宣称：“如果在西方基督教的建立过程中教育曾是一个起着十分重要的因素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东方建立基督教的过程中教育是一个作用要小得多的力量呢？”^②1886年建立汇文大学时，美以美会的教育者也认为，除了培养基督教工作人员外，大学将尽可能地使更多的中国人受益于科学和基督教。福勒主教特别强调当时中国政府对现代教育所能提供的机会是十分贫乏的这样一个事实。他指出，由丁韪良（W. A. P. Martin）领导的京师同文馆只能容纳100名学生，李鸿章总督所计划的学校最多招收500名学生。福勒问道：“在追

① 谢卫楼致史密斯的信，1889年4月8日，公理会外国差会代表档案，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科贝特：《广文大学》第21页。

② 前引赖德烈书第5页。

求现代教育的几百万名中国学生中，这些学校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①

(二)

这些情况表明在教育目标这个问题上，美以美会和圣公会比长老会和公理会的视野要宽广得多。因为在中国基督教大学教育目标方面存在着两派不同的见解，因此这些大学应采用什么课程也自然有两派不同的态度。

两类大学所采用的基本课程事实上是完全相同的。在我们所回顾的这30年间，所有这4所大学都规定学生要读完6年课程，相当于读完美国的预备学校和大学的头两年。以山东广文大学为例，19世纪80年代开设的课程有如下几科：（一）中学，包括中国经书和写作（主要是用古文体，但也相当多的用方言体）；

（二）西学，包括6年数学课程，其中有代数、几何、圆锥曲线、三角、测量、解析几何、微积分；2年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理学和地质学各学1年。此外还有世界史和政治经济学。

（三）宗教和伦理学，包括圣经选读以及《天路历程》和丁韪良著《天道溯源》。其它3所大学的课程大体上也是同样的安排。这4所大学每所都设神学科，招收大学毕业生再读一年研究生课程。山东广文、北京汇文和上海圣约翰都有医科。华北协和学院的毕业生在1904年以后可以入华北协和医学院学习医学，因为公理会是该医学院的共同创办者。约从1900年起，广文大学附设一所师范学校。

这两类学校尽管课程相类似，但在是否要教授英语这个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到18世纪80年代由于英文知识在中国已经有了很高的身价，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重要而实际的问题。一个懂得英文的中国青年有许多机会可以到海关，其它中国政府机构

^① 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2页。

和通商口岸的商行找到新的、报酬很高的工作。80年代初，监理会在福州和上海创办“英华”学堂时，他们发现让人们知道这两所学校教英文，他们就能够招收许多愿意付出高额学费的学生。因此基督教大学面临着是否应该教授英文的抉择。

山东广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持相反的意见。狄考文和谢卫楼两人都认为不应该开英语课，因为，首先，要求学习英语的学生，其主要动机是“为了钱”^①，不可能成为基督教工作人员的好料子；其次，即使是预备做牧师或是基督教的其它工作的人，有了英语知识后，也会被世俗的职业引诱去。狄考文和谢卫楼都是非常相信翻译的。狄考文本人就用中文编写了数学教科书，谢卫楼曾写过许多中文著作，其中就有一本世界史和一本政治经济学。在科学课程方面，也有许多翻译教科书，如傅兰雅（John Fryer）翻译的布洛沃姆（Blowam）的化学课本，嘉约翰（K. G. Kerr）翻译的赫胥黎（Huxley）和尤曼（Youman）的人体生理学。但是由于广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的科学教授必须用中文讲课，有些教授只好用古老的方法出版他们的讲课笔记，用作中文教科书，例如广文大学海斯（W. Hayes）的天文学，华北协和学院江戴德（L. B. Chapin）的地理学和霍尔布鲁克（M. Holbrook）的生物学^②。狄考文和谢卫楼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工作人员用中文术语学会西方科学后，必定能够更有效地在他们的同胞中传播科学知识。

可是，在1886年福勒主教与李安德牧师创建汇文大学的时候，他们决定一开始就要开设两种选修课程，一种是所有课程包括自然科学课程都用中文教学，另一种是除了中国经典之外，其他各种课程都用英文教学。美以美会的教育工作者解释他们之所以开设后一种课程是出于两种考虑：首先，中国学生学习西方自

① 科贝特：《广文大学》第77页。

② 哈佛大学中日图书馆收藏有华北协和学院教授们编写的中文课本，包括万卓志（G. D. Wilder），江戴德和霍尔布鲁克所著以及谢卫楼所写的10本书。

然科学用英文的人比不用英文的人要学得更深入，这是一件明显的事实，由于科学研究进步迅速，许多通用的中文科学书籍比较起来就用处不大。美以美会的大学也乐意开设英文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汇文大学于1866年声明：“英语知识很快就会成为中国各阶层活动人物必须掌握的知识。我们的目的是要给学生以关键的和实用的英语知识，并通过学习现代文学作品使他们与时代并肩前进，并使他们能够成为千百万不谙西学的同胞中的一员领袖。”^①

圣约翰大学于1881年正式决定教授英语，当时它还是一所高中。最初，有一些教员反对这项决定，但是，正如一位教员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上海南监理会的英华学堂已经吸引了许多学生，“为了生存，我们必须照样做。”因此学校决定“我们必须教授英语，从头来起，以适应形势的要求。”^②因此圣约翰大学的课程全部用英语教授，只有中文课程例外。不久，圣约翰大学就由于它以英语教学卓有成效而闻名遐迩。

(三)

在评价基督教大学的影响的时候，应该提醒的是，虽然直到1912年基督教大学的学生人数还比较少，但是他们代表了社会的各个成分。广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的学生几乎全都是从教会来的——或者是来自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或者是毕业于教会中学，也有的是由各地教会机构推荐深造的。这些学生许多来自小城镇或农村。1912年广文大学学生总人数505人，其中大学部320人。华北协和学院的校舍在义和团运动时全部被毁，1901年后重建时历尽艰辛。1912年仅有141名学生，其中大学部52人。汇文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不但招收有基督教背景的学生，也招收非基督教青

① 前引艾德敷书，第19—20页。

② 前引蓝伯顿书，第20页。

年。1912年汇文大学学生总数448人，其中大学部81人，医科78人。据了解，一半以上学生是来自基督教家庭。1912年圣约翰大学学生总人数约500人。其中基督教学生占1/3弱。圣约翰的大学部规模很小，1912年只有21名毕业生。^①

这些大学的影响怎么样呢？这种影响的精确的性质与范围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简单地说明这种影响所及的领域。首先，它对传教运动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些大学培养出一种新型的中国基督教工作人员，他们受过现代教育。许多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成为牧师；据一位当时的作者的看法，大约8名学生中有1名担任牧师。^②尽管回顾过去，基督教大学生没有产生任何壮观的宗教运动，然而它却培养出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基督教的领袖，无疑，正是这批人打下了20世纪中国教会的基础。至于说到这些领袖们的才能，可以著名的山东牧师丁立梅（译音）为例。他是山东广文大学物理学成绩突出的学生（1895级），后来成为一位有极深的宗教信仰的基督徒。在汇文大学的校友中出了几位极有影响的美以美会中国牧师，圣约翰大学是以培养杰出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人物和中国圣公会的主教著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领袖人物许多人从基督教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学生中工作。例如，1909年丁立梅在基督教中学和大学中举办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奋兴大会，据估计，志愿做牧师的学生不下600名，光是广文大学一校就有116名志愿者。在受到丁立梅牧师感悟的人们中间有一些以后成为中国教会中的

① 路思义：《山东教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载法思远编的《山东》（上海，1912年），第304页；《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1910年》（上海，1910年），第77—79页；《1913年》（上海，1913年），第265—266页；蓝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第76页。

② 芒森（E. H. Muhson）：《教会学校与中国牧师》，载《教务杂志》，第44卷（1913）第268页。4所大学从事牧师工作的学生的详细统计，可参阅科贝特：《广文大学》第69—70页；何德兰（I. T. Headland）：《西学给了中国什么》，载《东亚杂志》1904年6月教育专号，第40页；汇文大学《校长报告（1910）》，（教会研究图书馆的副本）；卜舛济：《中国教育工作的问题》，《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1911年》（上海，1911年）第144页。

重要人物。^①人们可能对是否有足够人数的中国教会领袖去发起一个强大的中国基督教本色运动产生怀疑。但是，毫无疑问，基督教大学给中国教会注入了新鲜血液。

然而，基督教大学所作的贡献不限于培养中国牧师。毕业生做牧师的占少数，大量的是在教会办的学校和医院里任职。据1913年估计，全部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约有一半以上担任教会的各种工作。做教员的数量特别大，因为自从19世纪最后10年以来，教会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学校。通常在每个布道所有一所小学，在中心地区有一所中学。例如，1912年山东省的几个基督教差会共有391所小学，5724名学生；34所中学，1405名学生。从几个差会的报告里我们知道他们是依靠基督教大学供给教员的。^②广文大学大多数毕业生做教师，少数的担任其它基督教大学的数学教授或中文教授。其他在政府办的中学或大学里任教。但是，大多数还是在教会学校里。^③基督教大学通过教会学校这些教员以及在教会医院和医疗单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广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大部分毕业生从事的是与教会有关

① 芒森：《教会学校与中国牧师》第268页；科贝特：《广文大学》第88页；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593页。

② 路思义：《山东教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304页；方伟廉：(W.P.Chalfant)：《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山东》，法思远编：《山东》（上海，1912年）第236—237页；山理（C.A.Stanley.）：《美国公理会华北差会在山东的工作》，同上书，第241页。

③ 科贝特：《广文大学》第72、95—97页；艾德敦：《燕京大学》第20页。广文大学1902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说，该校有“150名毕业生，都是基督徒，其中10名被任命为牧师，还有5名读神学，8名学医，许多人从事传福音，但是大多数还是教员。对我们大学毕业资格的教员的需要量是很大的，而且不断增加。省里的长老会的中学都由这所大学毕业生所掌握。在华中和华北地区，由我们教会或其他教派所设立的大學或中学几乎都由我们的毕业生任教员或校长。我们的毕业生还被北京、保定、济南、太原、南京、上海的官办大学请去担任教授。”何德兰：《西学给了中国什么》第39—40页。在1905至1909年间广文大学约有40名毕业生，这些人“几乎都是从事教学工作。”德克尔（N.M.Decker）：《广文大学的创办与发展，1864—1917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论文；教会研究图书馆副本）第96页。

系的职业，而相形之下，那些教英语的基督教大学的学生却有更广泛多样的就业机会。汇文大学的一些毕业生是在中国政府中工作，还有的在海关、京汉铁路、开滦煤矿工作^①。由于圣约翰大学许多学生出身于富有家庭，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和晋升，许多人成了商界、或政界尤其是外交界的突出人物。

虽然汇文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许多毕业生获得有钱有势的职位，但同样有很多人在中国政府办的或教会办的学校和大学中担任教员。汇文大学有些毕业生后来成为其他基督教大学的院长或教授，更多的在20世纪初开始盛行起来的英华学堂中担任英文和自然科学的教学工作。^②1904年圣约翰的13名毕业生中，2名到教会工作，2名从商，4名留在圣约翰任教，3名到官办学校当教员。^③教师职业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当时官办学校教员的薪金优厚，教英语的教会大学和学校靠提高学费也有能力付给教员充裕的薪金。^④到1906年，广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也不得不修改政策，开设英语选修课，以满足要求。10年之后，华北协和学院和汇文大学联合组成燕京大学时，它的政策已完全改变。然而，山东广文大学仍然继承狄考文和谢卫楼的传统。迟至20世纪20年代，它虽然也教英语，但仍然是以为教会机构培养教员和医务人员为主的。^⑤

① 《汇文大学》小册子，约1919年（哈佛大学副本）第24—25页；《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1910》第73—74页。

② 举几个例子，吴玉昆（译音），汇文大学早期毕业生，回乡教书。阅《汇文大学》（约1909年，但无日期的小册子；教会研究图书馆副本）。陈（T.H.Chen），1902级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回来任汇文大学数学系主任——“他是一个沉静的人，在学生团体中有很大的影响”；李天禄（译音），1908级学生，1923年任北京汇文中学校长，同年被任命为山东广文大学校长。阅《汇文大学》小册子，约1919年（哈佛大学副本）；科贝特：《广文大学》第155—156页。

③ 蓝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第52页。

④ 卜舛济：《中国教育工作的问题》第144页。

⑤ 科贝特：《广文大学》第153、160页。参阅下列的中文文章：罗滕修（译音）：《齐鲁大学生与乡村教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3期（1929年9月）第71—81页。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大学毕业生总的职业趋向，可阅葛德基《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第23章。

本文只对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大学，它们的目标与政策，它们对基督教会以及对中国的一般影响提出了一些事实。在目前的研究阶段，要获得这些大学学生生活的真实情景或正确评价他们所发挥的影响自然是困难的。但是从已知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基督教大学对中国传教运动的发展和对中国总的文化变化，是起了重大作用的。目前我们可以获得大量档案，^①同时，有许多人对于某些教会大学的历史仍有清晰的记忆，这些都将促使我们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深入一步。

译自《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0, No.1 [Nov.1960] pp.71—78)

曾鉅生 译

① 以下的美国差会组织的档案，可用以研究：公理会（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圣公会（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606Rutkervue Peace圣公会）；美以美会（纽约，美以美会外国差会委员会）；长老会（纽约，长老会外国差会）。纽约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委员会的档案馆里，有下列大学的大批手稿和印刷材料：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大学，华中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山东广文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的档案存放于哈佛大学。

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 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①

黄宇和

容闳（1828—1912）、康有为（1858—1927）以及孙中山（1867—1925）说得上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最有名的人物。他们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实现这些理想的方式，就因为这样，他们一一被放逐出国。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入侵等事件直接或间接使他们都卷入了戊戌变法，但变法失败了，于是，他们又一如既往，各人追逐各人自己梦幻般的目标。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深远。容闳、康有为和孙中山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三种不同的思潮。容闳想依靠西方教育来改造中国。康有为筹划改帝制为君主立宪制。孙中山一心一意搞共和。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前，中国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都主张改革，尽管他们不一定完全赞同容闳或康有为的观点。义和团的失败实际上迫使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正在日本留学或即将去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走向革命，最终为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以及1911年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②当时容闳已在美国

① 本文所引F.O.17/1718文件，系英国外交部第17种文件第1718卷的代号。

② 战争是1894年7月25日打响的。是日，中国政府租用之英国注册轮船“高升”号在往朝鲜运兵途中被日本军舰“浪速”号发射鱼雷击沉。事件详情见英国国家档案馆文件F.O.17/1718/，第216—219页，外交部备忘录（1896年6月25日）。随后中国于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

居住了12年，^①他写信给在张之洞^②总督府任职的友人，表示愿去伦敦筹借1,500万美元，用来购置3、4艘战舰并招募5,000名外国雇佣兵，实行牵制战术，从后方进攻日本。^③他还建议以4亿美元的价格将台湾抵押给西方列强，然后用这笔款子来组织海、陆国民军同日本作战。^④与此同时，在对日宣战后第3天，一心希望通过改革来挽救清政府的康有为得到消息，朝廷已下令销毁他所著的《新学伪经考》。^⑤这本书是他在1891年写的，目的是“扫除传统的思想障碍”^⑥，以便在中国实现改革。而孙中山当时已经确信清政府是病入膏肓了。1894年11月24日，他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立志要推翻满清政权。^⑦

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了中日甲午战争。^⑧当时康有为正在北京会试，条约内容公布后，他组织“公车上书”，要求拒绝签约，但失败了。^⑨一、两个月之后，容闳应张之洞^⑩之请回国。^⑪但他发现张之洞冷漠、傲慢，对他提出

① 详见容闳英文自传《西学东渐记》，该书由徐凤石、恽铁樵译成汉语，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重印了该书。（原文这里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张叔方的译本，其实张只补译了“自序”和“代跋”两部分，正文还是徐、恽的旧译本。——译者）

② 张之洞当时任两湖总督。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24页。

④ 同上，第225页。

⑤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年版）第2卷第879页。命令毁书的圣旨于1894年8月4日签发，正好是中国对日正式宣战后3日。

⑥ 肖公权：《现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改革家与乌托邦主义者（1858—1927）》，（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西雅图，1975年版）第71页。

⑦ 黄彦编：《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近年出版的孙中山传记有韦慕廷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纽约哥仑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和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及洛杉矶分校出版社，1968年版）。

⑧ 迈克尔·荷斯特编：《列强条约选编，1814—1914》（牛顿·阿波特，大卫与查尔士公司，1972年版）第2卷第670—677页。

⑨ 宋云彬：《康有为》（上海，1951年版）第46—48页。

⑩ 前引容闳书第226页。

⑪ 同上，第228页。

的按西方方式改革中国政府的建议丝毫不感兴趣^①。于是他去了上海，当了企业家。^②同年早些时候，孙中山回到中国，积极着手密谋推翻在广州的清朝省级政权。不料密谋败露，1895年10月27日，孙中山逃出广州，先至澳门，后到香港，然后亡命海外。^③

不久，康有为也走上同一道路。他所领导的所谓1898年百日维新很快就被慈禧太后扼杀。^④六君子遇难，但康有为却设法逃到香港，^⑤然后亦亡命海外。^⑥

容闳是三人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关于去国前的情况，他写过一段沉郁的文字。他说他在北京的寓所曾是变法领导人聚会的场所。变法运动被镇压，他也受牵连。但他终于逃出北京，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

即在上海组织一会，名曰中国强学会，以讨论关于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予竟被选为第一任会长。1899年，有人劝予，谓上海租界亦非乐土，不如迁地为良。予乃再迁至香港，请英人保护。居香港者2年，后遂归美国。归时幼子觐槐正毕业于耶路大学，予适见其行毕业礼也。^⑦

其实，与其说这段自传性文字披露了事实，不如说它掩盖了真相。在这里仅提一点事实就够了。1901年春，容闳旅居日本治

① 前引容闳书，第228—231页。

② 同上，第232—238页。

③ 前引史扶邻书，第45—100页。

④ 康有为的门生梁启超在他的《戊戌政变记》（上海、横滨，1899年版；香港、纽约1958年重印）里叙述了他在变法中的亲身经历。前引肖公权书对于康有为变法的深层思想有很透辟的阐释。

⑤ 英国国家档案馆F.O.17/1718/第97页，皇家海军指挥官科克伦致英国驻华舰队总司令的报告（1898年9月28日）。

⑥ 马利亚斯·詹森：《日本人与孙中山》（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6—77页。

⑦ 前引容闳书，第241—242页。

下的台湾，台湾总督告诉他，清政府要求总督逮捕并引渡容闳。^①但总督又说，他不愿意充当清廷的鹰犬。^②他不但不逮捕容闳，反而派了4名日本兵为他站岗，以防有人行刺。^③

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流亡生活也并不安全。1896年清政府驻伦敦使馆绑架孙中山事件已是人所共知。^④但后来他在日本停留的情况也许就不太为人知道了，那时日本政府派出便衣特务一直保护着他。^⑤康有为流亡到新加坡后情况也很相似，9名印度锡克族士兵和1名英国士兵分成3班，24小时轮流保护他。^⑥从中国派去的2名刺客确实混入了新加坡，但马上就被逮捕了。^⑦

二

有一点很清楚，清政府认为这3个人即使在流亡中也是危险人物。然而，他们的危险程度同缉拿他们所悬的赏格并不相称。^⑧

首先，并没有多少人认为孙中山1895年在广州搞的密谋切合实际。他的主观愿望是：先拿下这个重要城市，再以此为基地对清政府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⑨但是，从他以及他的同谋者的领

① 前引容闳书，第242页。

② 同上，第243页。

③ 同上，第245—246页。

④ 孙中山用英文将他的这段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一书（布列斯托尔，J.W. 亚罗斯密斯，1897年版），因而使这一事件永垂史册。该书后来有俄、日、汉等语种的译本。

⑤ F.O.17/1718/第352页，孙中山会见新加坡官员的记录（1900年7月10日）。

⑥ 同上，第303页，新加坡警察总监卡斯基顿致斯威特南总督的报告摘要（1900年2月13日）。

⑦ 同上，第310页，斯威特南致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兹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

⑧ 康有为、梁启超2人首级赏格总额为14.5万两银子（同上，第318页，斯威特南致张伯伦的报告，1900年3月10日）。孙中山本人承认他的首级赏格只有3.3万两。（同上，第352页，孙中山会见新加坡官员的记录，1900年7月10日）。

⑨ 这一愿望在1925年他的生命快要结束时终于实现了。但1925年中国的总形势，特别是广州的形势同1895年根本不同。1925年行得通的，倒回去30年压根儿就行不通。

导能力和由苦力和盗匪组成的队伍的素质来看，成功的机会是不多的。^①即使他能惊动总督并攻下他的衙门，人们也会怀疑，象他这样缺乏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的人，在官军反攻时能否全身而退。

一年之后在伦敦被绑架一事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天真的想法。相反，他天真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②他相信英国政府同情他的所作所为，当年正是这种想法构成他的“广州密谋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③这种对于英国政府的意图的不切实际的估计促使他公开吁请“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④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英国对绑架事件表示忿慨，基本原因是因为这一行为视英国法律如无物，而且事件发生在伦敦的中心地带，当然，也不排除公众对一个东方专制政治的受害者的关注。^⑤

正如一位史学家指出，“这个时期孙中山向英国寻求的实质性支持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许诺——允许他返回香港”，^⑥1895年广州密谋失败后他就被驱逐出这个地方。^⑦但是，沙兹勃雷勋爵一从中国使团处正式得到释放孙中山的保证之后，马上向中国公使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力依法阻止任何在英国领土上密谋策划反对清朝政府或其成员的行为”。他还保证要去函香港总督，命令他“继续严密监视任何嫌疑分子的活动，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① 史扶邻对这一密谋有细致的分析研究，见前引史扶邻书第56—97页。

② 同上，第129页。

③ 同上。

④ 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吁请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载《双周评论》（1897年3月1日）。史扶邻经过耐心的搜寻发现了这篇文章，后收入《国父全集》第5卷（台北，1981年版）第81—109页。孙中山用英文讲话或写作时称他的党为“革新党”而不是“革命党”，希望取得更广泛的外国支持。

⑤ 关于英国报刊对这一次绑架的评论的分析，见笔者发表在《孙中山研究》第1辑的文章：《分析伦敦报界对孙中山被难的报道和评论》，此文原为提交给1984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讨论会的论文。

⑥ 前引史扶邻书第132页。

⑦ 同上，第132页所引C.O.129/271号文件，罗宾逊致张伯伦第62号公牒（1896年3月11日）罗宾逊当时是香港总督。驱逐令于1896年3月4日签发，有效期5年，自该日起限期1个月离境。

尽力预测并挫败任何企图反对中国合法政权的革命行动”。^①

孙中山在1896年10月27日至1897年2月4日^②这一段冬天的日子里不断去瑞琴特公园阿尔伯特路12号^③拜访爱德文·柯林斯先生^④，并和他一道痛心疾首地草拟要求“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⑤的呼吁书，这些行动显然只从英国外交部的官老爷那里换来一顶“空想家”的帽子。^⑥就象进行广州密谋时的情况一样，他对英国抱有幻想。然而，即使英国决策人赞成他公开宣称的目标，他们也不会拿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来冒风险，将赌注押在“一匹黑马”^⑦身上。

① F.O.17/1718/第240—241页，沙兹勃雷致伦敦中国公使龚照瑗的照会草稿（1896年10月31日）。

② 《中国使团档案》，斯雷特侦探公司报告（1896年10月27日至1897年2月1日），转引自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南京，1935年第2版）第127—142页。

③ 史扶邻慨叹受雇监视孙中山的私人侦探竟连阿尔伯特路12号的住户是谁都查不出来，办事效率奇低（前引史扶邻书第134页第120注）。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又得到一些英国朋友的帮助，加上笔者的努力，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该住户是爱德文·柯林斯。

④ 寇兹先生（P.D.Coates）1980年提醒我注意凯利公司每年出版一本的《伦敦邮政指南》。我查了1896年号，但阿尔伯特路12号没有登记。1897年号登记的该地址的住户是一位名叫罗斯科太太的人。我作了许多努力，我的同事罗伊·麦克里奥德教授（Roy MacLeod）也帮过忙，但都找不到更多的关于这位罗斯科太太的资料。伦敦公共档案办公室一位有经验的档案工作人员约翰·华尔福先生（John Walford）继续往后查找，并通知我已查出爱德文·柯林斯在《伦敦邮政指南》1898年号有登记。英国法律协会秘书汤姆林先生（A.J.Tomlin）建议我同凯利公司联系。该公司（现名信息服务公司）经理利先生（D.W.Lee）复函，证实《伦敦邮政指南》系每年夏天编写，除夕出版，书名用的是第二年的年份（1983年11月23日利先生致黄宇和信）。这就是说，1898年的《指南》收入的是1897年甚至包括1896年后几个月的资料。最后，1896年与1897年间阿尔伯特路12号住户确定为爱德文·柯林斯。见下注。

⑤ 史扶邻已经证实，帮助孙中山写《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吁请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的人是爱德文·柯林斯（见前引史扶邻书第130页）。于是，整个事情就很清楚了。孙中山在1896年和1897年之间的那个冬天经常去拜访的那个人就是爱德文·柯林斯，拜访的目的是起草该文章，它后来在1897年3月1日《双周评论》发表。希望随着我的研究进展，会发现更多关于爱德文·柯林斯的资料，增加我们对孙中山所接触的人以及他所可能受的影响的认识。

⑥ F.O.17/1718/处处可见。

⑦ 前引史扶邻书，第132页。

如果说孙中山要求“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的呼吁书的发表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的话，他早些时所写的《伦敦蒙难记》^①却起了很大的作用，^②为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料想不到的活动天地——一群有影响的日本人，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为日本领导的泛亚运动效力的中国“英雄”^③。还是在伦敦的时候，孙中山就同德川赖伦的一些随员交好，特别视南方熊楠为挚友。显然，这些日本人早就从中国驻伦敦使团散发的大量有关他的绑架事件的宣传材料中听说过孙中山的名字。孙中山将《伦敦蒙难记》送给日本朋友，日本朋友则为他写介绍信，将他介绍给日本国内的高级官员^④。这些介绍信到底帮了他多大忙我们不清楚，因为孙中山完全可以不依靠它们。他的亲密助手陈少白曾经送过一册《伦敦蒙难记》给宫崎寅藏^⑤，宫崎曾是日本武士，人们一直将他比作拜伦和拉法埃特。^⑥所以，当孙中山1897年秋天由伦敦取道加拿大到达日本^⑦后不久，宫崎寅藏就去拜会他。两人作了笔谈，^⑧会见结束时宫崎寅藏已经“完全为之倾倒”。^⑨于是，他为孙中山提供了一所房子，满足他所有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马上学习日语。^⑩

① 我有充足的证据怀疑孙中山并非该书的真正作者，当我得出结论时将会公布我的发现。

②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南京，1935年版；台北，1956年重印）第21页。

③ 前引詹森书第1、2章对于日本在这方面的动机作了很有价值的分析探讨。

④ 南方熊楠：《南方熊楠全集》（东京，1975年版），《附录2·日记》。剑桥大学卡门·布列克博士建议我研究这些日记，东京大学坂野润治教授帮助我获得该书，悉尼大学小林寺彦先生帮助我读完日记的有关部分，在此向他们致谢。由于有了这些新材料，詹森教授和史扶邻教授提出的孙中山同日本人的亲密关系是他在伦敦逗留之后在日本本土上才开始的这一论点大可商榷。

⑤ 前引陈少白书，第21页。

⑥ 同上，第146页第12注所引罗刚著：罗编《国父年谱纠谬》（台北，1962年版）第64页。

⑦ 前引《孙中山年谱》第36页。孙中山于1897年3月16日抵达横滨。

⑧ 同上，第36—37页。

⑨ 前引史扶林书第143页。

⑩ 同上，第146—147页所引詹森前引书第67页。坂野润治教授告诉我，宫崎寅藏当时只是一个对日本政界无甚影响的青年人。的确，宫崎设法使孙中山得以接触这些政界人物，但其方式不一定如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而詹森教授的结论却是以宫崎的自述为根据的。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孙中山在日本注视着1898年由康有为策划的百日维新。

中国需要改革，对这一点没什么人会持异议。当康有为8年前在他创办的1份报纸上系统地宣传改革的时候，连英国公使欧格讷爵士都表示支持^①。毫无疑问，康有为后来在1898年所作的变法上书中也存在空想^②。他的建议总的来看是行不通的，但康有为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因此，戊戌政变后他逃到上海时仍然“满脑子糊涂思想”，^③以致英国领事立刻称他为“空想家”。^④尤有甚者，后来英国政府费尽心机帮助他从上海脱身到香港^⑤，反而更使他毫无根据地自以为了不起。^⑥所以当一年前已经结识了孙中山的宫崎寅藏在香港会见康有为并试图促成他们联合时，康有为马上拒绝。^⑦

① 前引史扶邻书第153—154页所引胡滨著《戊戌变法》（上海，1956年版）第36—37页。

② 简言之，他的想法可以视为明治维新在中国的翻版。见前引肖公权书第133—408页对康有为变法条陈的详细分析。

③ F.O.17/1718/第191页，班德瑞对于他同康有为的会见的评论（1898年9月26日），附于璧利南1898年9月26日给沙兹勃雷的报告之中（F.O.17/1718/第176—191页）。当时班德瑞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璧利南任代总领事。

④ 同上。

⑤ 光绪皇帝预感到即将发生政变，便命令康有为离开北京。康到天津后登上英国轮船“重庆”号，驶往上海。与此同时，上海清朝官员已接到命令逮捕康有为。有关上谕抄本及康有为的照片亦分送驻上海各国领事馆，要求协助逮捕康有为。于是，班德瑞领事乘汽艇去接“重庆”号，凭照片认出康有为，将他带上汽艇（前引梁启超书，第161—165页）。汽艇从英国军舰“爱斯基”号旁边驶过，致有所谓康有为登上英国军舰的错误报道。（前引梁启超书第165页也是这样写的。）康有为被送上停泊在附近的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的轮船“巴拉勒特”号。“爱斯基”号于1898年9月26日晚彻夜为“巴拉勒特”号警戒。9月27日凌晨，1艘中国巡洋舰和3艘中国鱼雷艇开到现场，英国军舰“凤凰”号和“邦纳文查”号亦参加警戒。（F.O.17/1718/第195—197页，1898年9月26日和28日科克伦致英国驻华舰队总司令的报告。科克伦是英国驻华海军长江舰队司令，高级军官。）后来，“邦纳文查”号一直将“巴拉勒特”号护送到香港。（同上，1898年9月29日蒙哥马利致荷兰德的报告。蒙哥马利是“邦纳文查”号舰长，舰队指挥官荷兰德是蒙哥马利在香港的上司。）

⑥ 詹森并不了解如上注所概述的英国保护康有为的详情，但仍能看出这一点，这说明他的思想是敏锐的（见詹森前引书第76—77页）。

⑦ 同上。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坂野润治教授。他向我指出，宫崎寅藏遭到白眼这件事可能不怪康有为。宫崎毕竟是个青年人，除了孙中山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

但是，这个联盟如果成功，其潜力之巨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日本的决策人正下决心“引导中国历史前进”^①。康有为最有才能的学生梁启超已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避难，后来又乘日本炮舰东渡到日本本土。^②于是日本驻香港领事接手同康有为谈判，最后说服康有为同去日本^③。但即使在日本，康有为也根本不愿见孙中山，甚至孙中山亲自提出会见他也遭到绝拒。^④

孙中山和康有为之间存在根本的意见分歧。^⑤举例来说，康有为要保皇，尽管他现在已经决心搞垮慈禧太后。而孙中山却要彻底推翻清政府。问题的关键是康有为的忠君之心，他曾将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其实这种希望肯定要落空，因为实权不在皇帝手里，而是在慈禧太后手里。的确，年青的光绪皇帝曾一厢情愿地计划打着改革的幌子向慈禧太后夺权。但一旦慈禧反击，光绪皇帝马上被软禁，康有为也只好仓皇出逃。^⑥可是康有为继续以皇帝为王牌，实际上，如果满清统治被推翻，皇帝这张牌也就一钱不值了。由此看来，一些史学家^⑦认为孙中山和康有为有推翻慈禧太后的共同愿望，因而他们“或者有可能结成联盟”^⑧的观点，实在是很牵强的。康有为始终拒绝同孙中山联系。

① 前引史扶邻书第157页。

② 前引詹森书第76页。

③ 同上，第77页。

④ 前引史扶邻书第158页。我又一次感谢坂野润治教授，他提醒我注意到支持康有为的日本人的政治观点和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的政治观点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很可能助长这位改良派人士对于革命的僵硬态度。我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当时日本的政坛风土，久保田文次教授提交给1984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讨论会的论文《孙文与日本的政治家、军人、浪人》使我得到了满足。这篇论文表明，即使在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之中也是分派别的。对于支持康有为的保守派来说，支持孙中山并想让革命派和改良派构成联盟的那一派显然是太激进了。

⑤ 前引詹森书第78—81页对这些分歧有详细的讨论。

⑥ 前引梁启超书第99—114页；肖一山：《清代通史》（台北，1963年版）第4卷第2123—2154页。

⑦ 比如詹森就持此观点，见前引书第68页。

⑧ 同上。

康有为打出他的王牌时有点考虑欠周，他声言皇帝曾赐他密旨一道，命他招兵勤王。^①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为他作证，但这个人一直掌握在康有为的随从手里。后来，还是日本人有本事，把他救出来了，他透露说，所谓密旨其实是假的。^②此后，康有为又改称圣旨已在他“逃离北京”时烧毁。^③这就使他的日本东道主更加不相信他，因为象他这样的钦犯，万一被捕后搜出圣旨也不会加重多少罪名，结果反正是一死，而圣旨一旦公诸于世，他将成为英雄，至少是一位忠君的烈士。又假如他真能逃出中国，无论招兵还是募饷，这份圣旨都是极有价值的凭据。因此，康有为烧毁圣旨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但是，普通华侨却不习惯学术思考。他们被康有为手中的御札所迷惑，狂热地响应康有为的号召，捐款给他，完全淹没了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呼声。在加拿大、新加坡和夏威夷，许多原来孙中山的追随者都跟了康有为走，连在夏威夷的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这位早些时曾慷慨解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人，也转向康有为^④。不出一年半，在1900年5月，洋洋得意的康有为私下对新加坡警察总监说，“你可以请总督大人告知沙兹勃雷勋爵，我们预料本月底中国将有大事发生。”^⑤很明显，他指的是所谓的唐才常勤王，但这一行动几经耽搁，最后在1900年8月才举事。^⑥

三

康有为肯定认为是他自己独力策划、指导并在财政上支持了

① 前引梁启超书第110页。

② 前引史扶邻书第159—160页所引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卷第49—50页以及陈少白前引书第39页。此人即前礼部主事王煦，他是光绪皇帝的密友。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83—185页。

⑤ F. O. 17/1718/第322—325页，卡斯基顿致斯威特南（1900年5月29日）。

⑥ 率先研究这次起义的是冯兆基的论文《唐才常起义》，载《远东历史论丛》第1卷（1970年3月）第71—114页。新近发表的资料，特别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的《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可以补充冯兆基文章的不足。

这次旨在拥护光绪帝当政的起义。他的一些同代人也这样看，^①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史学家也持这种观点。^②亦有人指出，孙中山也卷入了这件事，^③虽然卷入的程度如何仍有待探讨。^④而本文涉及的第三个人——容闳参与这一行动要比外界所知的积极得多。

起义领导人唐才常是湖南人，也是维新派，同梁启超和谭嗣同交厚。^⑤戊戌政变使他大为震惊，并为谭嗣同之死哀痛万分。^⑥他跟随维新派余党东渡日本，同康有为一道制订“招兵”^⑦计划，他还会见了著名日本政治家犬养毅。^⑧犬养毅是宫崎寅藏的好友。宫崎寅藏当时已经结交了孙中山。

唐才常还经人介绍^⑨认识了孙中山，孙中山的思想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听说孙中山同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有联系，这些会党都愿意听他的号令武装起来反对清政府，不由得十分高兴。象日本人一样，他看出孙中山同康有为联合将产生的巨大力量，便自告奋勇去劝说康有为回心转意。^⑩但这时康有为恰好离开日本去了加拿大，^⑪唐才常要等到第二年，即1899年，才专程去香港见远游归来的康有为。但他也象以前作过同样尝试的人一样，徒

① 见张之洞上慈禧太后奏折（1900年9月13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卷第265页。

② 斯迈思：《自立会：一些中国人及其起义》，载《中国论丛》12卷（1958年12月）第52、54页。

③ 前引冯兆基文第71、77页。

④ 笔者将作此尝试。

⑤ 前引冯兆基文第72、75页。

⑥ 同上，第76页。

⑦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载《唐才常集》第273页。作者为唐才常之弟。康有为写的《唐烈士才常墓誌铭》（载《唐才常集》第266—268页）亦证实此事。

⑧ 同上。

⑨ 前引冯兆基文第77页。介绍信是唐才常的湖南同乡毕永年写的，毕其实是长江流域秘密会党的一位极重要的首领。

⑩ 同上。

⑪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394、399、411页。康有为1899年4月离开日本往加拿大，1899年10月返香港。

费口舌。^①

唐才常从香港去了海外，后来又在日本见到孙中山。两人细致地讨论了在长江流域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这时，他们都明白，公开的合作肯定得不到康有为的同意，于是两人商定，作为权宜之计，唐才常仍同康有为保持密切联系，但将与孙中山采取“独立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②据透露，按计划孙中山及其党人将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唐才常同时在汉口举事。^③孙中山对这次秘密合作表示了极大的诚意，他介绍唐才常同一位名叫容星桥的同志联系，容星桥是汉口一家俄国公司的买办，^④他后来为汉口起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支持，^⑤起义失败后他丢掉了生意，失去了财产，差点连性命都保不住。^⑥

孙中山还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他的诚意。唐才常回国作起义准备之后，^⑦孙中山于1900年7月直接去康有为的避难地新加坡，再次试图结盟。据说在争取海外华侨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的竞争中，孙中山之所以让康有为占上风，主要动机就是为这一次旨在结盟的访问作准备。^⑧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人们就要怀疑孙中山是否突然相信谈判时实力较弱的一方反而容易达到目的。更可信的解释是，1900年春义和团进入北京城，^⑨使孙中山产生了紧迫感，觉得应该更好地协调计划中唐才常在汉口领导和他在南方领导的起义，于是他在1900年6月11日登船离开日本。^⑩

① 唐才质前引书第274页。亦见上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76页。F.O.17/1718/第273页，法磊斯致霍必兰的信（1900年8月23日）亦证实此事。当时法磊斯任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霍必兰任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

④ 同上。又见前引冯兆基文第86页。容星桥系容闳之侄。

⑤ F.O.17/1718/第372页，法磊斯致霍必兰信（1900年8月23日）。

⑥ 前引唐才质书第276页。

⑦ 《孙中山年谱》第42页。唐才常1899年11月返回中国。

⑧ 前引史扶邻书第183—188页。

⑨ 《孙中山年谱》第45页。

⑩ 同上，第46页。此行的另一目的是想顺路到香港以便考察李鸿章提出的所谓邀请孙中山共同宣布两广独立的计划是否可行（前引史扶邻书第180—181页）。李鸿章时为两广总督。孙中山如能先同康有为结成联盟，则同李鸿章打交道时就更有实力（同上，第183页）。

康有为再一次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孙中山想会见他的要求。^①常言道，事后诸葛亮好当，今天也许有人会说孙中山没有眼光，但他当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屈不挠，排除万难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孙中山在新加坡受到挫折后并不气馁，回日本作短暂停留后又秘密潜回上海，希望同唐才常约好一致行动。1900年8月28日孙中山抵上海，但唐才常的起义计划已经暴露。他又赶紧秘密离开上海。^②

四

唐才常的起义计划是怎样暴露的？康有为归咎于起义策划者之一秦力山，指责他不服从命令，在其他起义小组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③先在大通举事。^④毫无疑问，康有为是起义的总策划者。^⑤他和唐才常在日本时也讨论过一些起义的细节问题。他委任唐才常为大元帅，^⑥千方百计鼓励他，答应用华侨慷慨捐助的款项支持他。唐才常想尽办法招募兵员，主要来源是长江流域的

① 其实，除了拒绝会见之外，康有为还做了对孙中山更为不利的事情。他控告为孙中山秘密传递消息的日本人图谋行刺他，让新加坡当局将他们逮捕，其中包括宫崎寅藏，1898年康有为离开香港去日本时正是宫崎一路陪同他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的。这些日本人后来被新加坡当局驱逐出境（F.O.17/1718/第339—352页，1900年7月12日斯威特南致卢卡斯的书并附件）。至于孙中山本人，他的到访当时在新加坡并没有公开报道，原因之一是他用的是假名（王赓武：《孙中山与新加坡》，载《南洋学报》第15卷〔1959年12月〕第2册第58页），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当局封锁消息（F.O.17/1718/第338页，1900年8月2日《海峡自由报》〔摘要〕），很可能是康有为害怕他的华侨支持者会有一部分人倒向孙中山而要求新加坡当局这样做。

② 《孙中山年谱》，第38—49页。

③ 前引冯兆基文，第98页。

④ 前引康有为书，第267页。

⑤ 所有能找得到的资料，即使背景截然不同，都引出这一结论。见前引康有为书第266页；前引唐才质书第273页；张之洞1900年9月13日上慈禧太后奏折，转引自《辛亥革命》第1卷第265页。

⑥ 前引冯兆基文，第77页。

秘密会党成员。^①他把义军分成5组，在不同地点集结，定于1900年8月9日同时起义。起义的日期越来越近，但康有为应允拨给的款项仍然杳无踪影。唐才常被迫将举事日期推延至8月19日，后来又改为8月23日。起义延期的决定似乎是仓促之间作出的，没有足够的时间通知所有小组领导人。于是，秦力山按原计划于1900年8月9日在大通发动起义了。这一部分义军苦战六日，伤亡惨重，最后被镇压下去了。秦力山得以平安逃脱，但很多义军士兵被活捉，经过审讯，他们供出了关于这次起义的许多重要情况。^②张之洞根据得到的线索，于8月21日晚逮捕了唐才常及其他重要的起义首领，这时距更改后的举事时间只有48小时。被捕的起义领导者立刻被处决了。^③

假如康有为如约将这笔必要的款项送到，所有5部分义军就可以按原定日期同时发动起义。秦力山的行动就不会打草惊蛇了。因此，起义失败的责任最终落回到设想这次起义的人头上，因为他不愿意将别人捐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金钱拿出来实现这一目标。

还有人正确地指出，康有为在报刊上大肆宣传他拥光绪当政的计划，^④等于“提醒朝廷先下手为强”。^⑤康有为本人确实有文字承认他曾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及其他人，请求他们在唐才常起义时给予合作。^⑥而正是刘坤一后来镇压了秦力山的起义。^⑦康有为并不死心，3个月之后他又写信给刘坤一，请他去做起义者没能做到的事——拥光绪当政。^⑧

① 前引冯兆基文，第92—98页。

② 见1900年9月11日刘坤一等上慈禧太后奏折，载《辛亥革命》第260—264页。刘坤一当时任两江总督。前引冯兆基文第101页；前引肖公权书第237页。

③ 见1900年9月13日张之洞上慈禧太后奏折，载《辛亥革命》第264—269页。

④ 前引冯兆基文，第113页第⑩注。

⑤ 同上，第102页。

⑥ 《唐才常集》第267页。康有为为唐才常写的墓志铭承认了这一点。

⑦ 见本文308页第⑤注。

⑧ 《康有为政论集》第1卷第457—459页。

容闳同康有为和孙中山一样也介入了唐才常的密谋，因为他比康有为和孙中山更靠近现场，所以也许可以说比康有为和孙中山介入得更深。

百日维新期间，容闳任外交事务参事，^①尽管他在自传中没有提到这一事实。戊戌政变后，他逃到上海外国租界里，组织了“中国强学会”，据他说，该组织的目的是讨论天下大事，特别是变法问题。1899年他为了“人身安全”^②迁往香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在上海外国租界里议论时事也成为不安全的了。从以后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推想出，容闳这一决定似乎同唐才常1899年11月由日本回上海详细策划长江沿岸起义有关。唐才常在上海英租界内建立了一个类似以前容闳建立的组织，以此来聚集力量。^③容闳和唐才常不但不互相竞争，而且成了盟友。很有可能不是孙中山就是康有为写过信介绍他们紧密合作。假设到1899年底容闳已经十分清楚唐才常的意图，他就可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看得比起义重要，于是找借口“迁居香港”，^④必要时才回上海。^⑤

但这不等于容闳对起义毫不热心。他当过外交事务参事，（虽然时间不长），而且“熟谙英文”，^⑥显然是那封致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的信的作者，这封信暗示，除非让光绪重新当政，否则全国的秘密会党将起来迫使外国列强干预。^⑦信的语气同唐才常的属下后来在汉口以及其他地方散发张贴的传单和口号是一致

① F.O.17/1718/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兹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

② 前引容闳书，第241—242页。

③ 前引冯兆基文，第87页。

④ 前引容闳书，第241页。

⑤ 人们读过容闳的自传以及他的私人信件之后，总感到他的“救国”热忱还未达到愿意牺牲生命的程度。相反，假如他不是自传里说的那样于1899年去香港，而是在1900年8月唐才常的密谋暴露之后才迁往香港的话，人们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⑥ F.O.17/1718/第310—312页，新加坡警察总监的报告摘要（1900年3月29日）。

⑦ 同上，第372页，霍必兰致沙兹勃雷的报告（1900年8月30日）。

的，①同以后康有为致英国外交大臣和德国驻华公使的信的口径也一致。②

唐才常一直想办成一件事，就是促成康有为同孙中山结盟。他自己没能使康有为认识到这一联盟的意义，于是说服容闳再次去做说客。1900年3月容闳抵达新加坡见康有为，但也没有取得突破。倒是容闳和康有为一起向新加坡英国当局透露了一个消息——1900年5月底中国将有大事发生。③容闳说得更加清楚：“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④新加坡英国当局马上向伦敦发回密电：“此间某消息灵通的中国维新派人士预料，今后3个月之内中国会发生革命。前驻美公使〔容〕闳已抵新加坡同康有为商量有关事宜。”⑤伦敦迅速作出反应，提醒英国驻华使团密切注意事态发展，以便采取行动防止任何会影响英国在华利益的骚乱。⑥

在这个问题上，容闳同康有为一样缺乏政治头脑，不过他比康有为稍为精明，虽然英国政府拒绝支持即将到来的起义，⑦容闳看来还是在国内放出了英国政府支持起义的风声。⑧有史料表明，唐才常为了争取中国高级知识阶层中的进步人士的支持，建

① 《辛亥革命》第253—279页；F.O.17/1718/第372—373页，“变法”告示译本（1900年，无月日）。

② F.O.17/1718/第383—386页，康有为公开信副本（1900年11月14日）。

③ 同上，第322—325页，卡斯基顿致斯威特南（1900年5月29日）。从这条资料来看，计划由唐才常领导的这次起义原定的举事日期似乎是5月而不是8月，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康有为不愿拿出募捐所得的款子——于是推迟了。见下注。

④ 同上，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兹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

⑤ 同上，第309页，斯威特南致张伯伦的报告（密码）（1900年3月29日）。容闳从未任过驻美公使之职。他只当过留美学生监督。看来不是容闳就是康有为，或者两个人都歪曲了事实以便在新加坡英国官员的眼中提高自己的地位。

⑥ 同上，第309页，外交部对上注所引密件的批示。难怪后来驻汉口英国代总领事应张之洞之请于1900年8月21日晚迅速袭击了租界内两幢房子，致使唐才常与其他重要的起义首领被捕（同上，第372页，法磊斯1900年8月23日致霍必兰的信）。

⑦ 同上，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兹勃雷（1900年3月29日）。

⑧ 同上，第360页，霍必兰致沙兹勃雷（密码）（1900年8月29日）。

议1900年7月在上海英界租召开国会。^①各地对此热烈响应。数百名学者前来参加了会议，其中有许多是著述累累，很有声望的人。中国国会成立了。容闳被推为会长，唐才常被推为总干事。^②会上作出决议，要起草一份英文《公告》，以消除列强的疑惧，即使他们不积极支持，也有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情。^③这件工作自然由容闳来做。^④所有这些都是舆论，宣传。策划起义的秘密，仅有核心成员才知道。^⑤

容闳是核心成员之一。因为他的观点同唐才常非常接近以致于一位现代史学家分析了那份英文《公告》之后认为，简直象唐才常一手草拟的。^⑥在事务分工方面，唐才常负责上战场指挥作战，而容闳主管“外交”，留在上海。^⑦假如起义成功，容闳肩上的担子更重，要同列强谈判，要向国内外报界作宣传，总之，

- ① 一般都认为会议在张园召开。但1984年11月孙中山讨论会上汤志钧教授告诉我，根据他的研究，会议的地点应是愚园，不是张园。
- ②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1930年版；1980年北京重印）第41页。
- ③ 前引冯兆基文，第89页。
- ④ 《唐才常集》第277页。章太炎《民国光复》一文（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卷第839—843页）至少可以证实这一点。章太炎本人参加了中国国会的会议，据他回忆，容闳用英语起草《公告》，由副会长严复将它译成汉语（前引章太炎书第840页）。这样做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公告》的主要对象是外国人，译成汉语只是为了使与会者了解其内容而已。
- ⑤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卷第109页。
- ⑥ 前引冯兆基文第90页。可能这一误会起因于会议上唐才常同著名学者章太炎就《公告》内容发生的激烈争论。章太炎尖锐地指出，《公告》不承认满人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但同时又主张光绪当政，这是矛盾的（《章太炎年谱长编》第109页）。这一矛盾很可能反映了孙中山和康有为各自的影响。我向1983年东京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表明了这一观点。1984年1月4日《光明日报》第3版刊登了蔡少卿《略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一文，也得出相同的结论。1984年4月我访问武汉时，怀着极大兴趣拜读了《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5期发表的几篇研究唐才常的文章。还有金冲及先生在《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159—178页）发表的《略论唐才常》一文，分析细致入微，显示出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
- ⑦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3卷本，第1卷上海1928年版；第2、3卷重庆1944年版）第1卷第11章，引自《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0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兴中会（F）》（台北，1964年版）第303页。

要作义军的全面发言人。可是，起义失败了。清政府将他列为全国通缉的首犯之一。^①

综上所述，容闳参加起义远比外界一般了解到的要积极得多，面临的危险也大得多。其次就是孙中山，他冒险潜回上海，并不知道起义的秘密已经在几天前泄露。至于康有为，据《德臣西报》海外版报道，他当时亦在上海，但新加坡总督马上否定这一说法，^②因为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康有为，使他“安然无恙”。^③

五

起义的失败以及义军伤亡的惨重显然吓坏了康有为，他决心“绝口不再提武装起义”^④作为拥光绪重新当政的手段。后来，他甚至将“保皇”的口号改为“帝国宪政”。^⑤前者作为一种战斗呐喊特别能煽动人心。后者却很难为普通华侨所理解。再者，饶倖逃到海外的起义者当面质问康有为及其门下为何不如期送款。一片指责他们侵吞捐款的呼声大大抵消了康有为在曾经支持过他的华侨中的影响。^⑥另外，康有为安坐新加坡，毫无动作，而别人却为了他的事业牺牲身家性命，这使他显得比懦夫还要懦夫。一个敬仰康有为的人写信给他：

① 《辛亥革命》第1卷第266页；F.O.17/1718/第406—409页，斯威特南致张伯伦的报告（1901年1月23日）。

② F.O.17/1718/第378—379页，斯威特南致威利亚斯的信（1900年11月26日）。威利亚斯是英国外交部雇员。

③ 同上，第387—390页，斯威特南致约翰森的信（1900年12月9日）。

④ 《唐才常集》第267页。见下注。

⑤ 前引冯自由文，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0册第306页。康有为成立了一个名叫“保皇会”的组织，在香港，日本，东南亚和北美洲都有分会，后来改名为“帝国宪政会”（F.O.17/178/第405—408页，1900年1月23日斯威特南致张伯伦的报告并附件）。千万不要将后来的口号同康有为在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试图实行的君主立宪混为一谈。

⑥ 同上。

……世人多道，君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居新加坡，与一白面书生为友，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而不顾。①

康有为却不罢休。他转向其他地区没有给他捐过款的华侨求助。他派最得力的门徒梁启超去澳大利亚；②他本人则去印度、印度支那、欧洲、北非和中美洲。③可是，从康有为的日程和路线④可以看出，他的旅行与其说是去募捐，不如说是去享受。旅游花不完的钱他就公开用来添置财产，包括以他在纽约读书的女儿的的名义购入的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市有轨电车。⑤

可能人们会以为，随着康有为在华侨中的声望下降，孙中山就可以募得更多款子。但事实不然，康有为已经把整个募捐的事情搞糟了。华侨要么不愿意，要么再也没能力捐出较多的款子了。孙中山想出另一个法子。他向西方资本家借钱，答应将来革命成功之后给他们特权。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的力量大大加强。同盟会的英文名一般都译为Revolutionary Alliance（革命同盟会），但那时孙中山是把它叫做Feder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国同盟会）的，例如，1910年3月20日他准备了一份文件，上面

盖有中国同盟会(Federal Association of China)的大印和各省分会的印章，并有总会长以及17个省分会会长的签字。⑥

① F.O.17/18第412—414页，汤卓舫（音译）致康有为的信（1900年8月18日）。汤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华侨。

② 同上，第402页，罗丰禄备忘录（1901年1月29日）。罗系驻伦敦中国公使。

③ 《康有为政论集》，第1142—1144页。

④ 同上。

⑤ 《布思文件》第1卷第38号，艾伦致布思的信（1909年1月21日）。艾伦是纽约的一名咨询工程师，布思是洛杉矶的一位退休商人。《布思文件》现存斯坦福胡佛研究所。

⑥ 同上，第2卷第56号，布思致艾伦的信（1910年7月19日）。见下注。

这份文件委托美国退休商人查理士·布思“以同盟会的名义并代表该会处理谈判借款及收取款项等事宜”。^①从以后孙中山和布思先生之间的来往信件看来，布思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向孙中山打听他的革命活动情况，而不是为他冒风险去活动借款。过了一年，孙中山觉得假如布思仍然不能很快送来一些款子的话，就要向布思索回有他签名盖章以及17个省的同盟会分会领导人签名盖章的这份文件。^②我们不知道布思是否按孙中山的要求退回了文件，但孙中山没有搞到钱，这一点是清楚的。

孙中山还在一名叫G.E.马斯克鲁夫的伦敦商人身上碰过运气。他先后于1909年12月6日、1910年1月11日、1910年3月22日写信给马斯克鲁夫，向他借钱，^③但似乎也不成功。相反，马斯克鲁夫在1913年就将这些信件卖给了英国博物馆。^④

容闳则在香港一直住到1902年。^⑤为什么1900年起义失败后，他已经知道清政府悬赏缉拿他，但仍然不马上回美国呢？而且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派人刺死，^⑥容闳在香港逗留就更加危险。杨衢云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1895年密谋推翻清朝的广东省政府时他是香港方面起义者的负责人。^⑦被砍前不久他参加了1900年9月惠州起义，^⑧上文提过，按计划惠州起义

① 《布思文件》，第3卷第78号，孙中山授权布思为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的文件（1910年3月20日）。

② 同上，第3卷第73号，孙中山致布思的信（1911年3月6日）。

③ 英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B.L.Add 39168/137—1153号。

④ 1914年10月10日英国博物馆常务理事会议记录载：理事们同意向G.E.马斯克鲁夫先生购入“1909—1910年间孙逸仙博士手上的〔原文如此〕三封信”。感谢英国博物馆档案工作人员珍妮·华莱士小姐于1983年8月3日复信告知我这一资料。

⑤ 前引容闳书，第242页。

⑥ F.O.17/1718/第523—525页，兴中会香港分会致兴中会伦敦分会的信（1903年5月26日）。关于杨衢云被刺事件，法庭的审理，以及对外界的反应的评论，见笔者在《澳大利亚东方学会学报》第17/18卷（1993/21）发表的论文《中国对香港的态度：历史的观照》。

⑦ 前引史扶邻书，第63页。

⑧ 前引F.O.17/1718/第523—525页。

是同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呼应的。容闳之所以甘愿冒被刺的风险留在香港，是因为香港的秘密会党正在策划于1902年再度举事，而且决定一旦起义成功就选容闳为总统，①作为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的折衷人选。②

可是，起义一直没有举行，容闳于是重返美国，继续过他的“奢侈的流亡生活”。③在美国，容闳和他的商界朋友定了个推翻清政府的计划，梦想由他来当新皇帝。④看来1900年在舒舒适适的上海英租界里被选为那个冒牌中国国会的会长以及后来有人建议以他作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的折衷人选这两件事使他头脑发热，自视极高。“他成天都在做皇帝梦，”⑤一位同容闳有来往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如今是以朽木支撑大厦，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这一点。”⑥不过，容闳还是有一点头脑，他知道

这个大计划可能完成不了，也可能失败，所以他准备了两条发财的后路。一是经营广东省西面邻省里的一个极富的银矿，二是用新方法将苧麻纤维加工脱胶后，同真丝混合纺织丝绸，这是能赚大钱的买卖。⑦

可是，辛亥革命爆发了，1912年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容闳的美梦破灭了，他于1912年4月去世。⑧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卷第189页。

② 同上，第191页第12注。

③ 《布思文件》第12卷第107号，朱里安·哈特文章：《美国人为中国起义密谋真相大白：胡佛大楼信件揭露1908年的阴谋》，1966年10月13日《洛杉矶时报》重印。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2卷，第41号，艾伦致布思信（1909年2月1日）。艾伦是纽约有名的商人，百老汇街的咨询工程师。

⑥ 同上，第2卷第40号，艾伦致布思信（1909年1月29日）。

⑦ 同上，第2卷，第41号，艾伦致布思信（1909年2月1日）。

⑧ 同上，第12卷第107号，前引朱里安·哈特文章。

六

就理想而言，孙中山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推翻了清朝统治，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府。他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所作的努力并非统统切合实际，但他从未怀有谋取权力和财富的个人野心。康有为的理想一度很有影响，但他怯懦、贪婪，不顾他人生死，终于很快威信扫地。至于容闳，大概“开明的自私”^①就是对于他的手段和目的的公正评价了。^②

译自联邦德国《亚洲历史学报》

第20卷第1期（1986年）

区 铁 译

① 《布思文件》，第2卷第40号，艾伦致布思信（1909年1月29日）。

② 鉴于本文提出的新发现，海峡两岸的学者可能要重新考虑对容闳的评价。两卷本《容闳传记资料》（台北，1979年版）收集的38份材料总的说来使人觉得容闳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大陆的史学家亦持相同观点，比如钟叔河的《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见《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丁宝兰的《论容闳》（《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57—63页）都是这种看法。另外，写《容闳与近代中国》（台北，1981年版）的香港的李志刚先生可能也会重新考虑他把容闳当作英雄来敬仰是否恰当。

驻美大使胡适

——温文尔雅的劝导性外交

保罗·海尔

胡适在很多问题上对国民政府的立场不满，但也不同情反映共产党要求的学生们那种激进的、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的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沈阳事变后曾经对日宣战；不过后来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歼灭，举行了向中国北部延安的长征。胡适在1931年的危机中提倡在战略上和解，因而支持国民政府的姑息政策。他主要是担心，如果全面对日开战，那么已有进展的中国制度的改革必将毁于一旦。但因不能不计代价地倡导和平，所以当全面的中日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时，胡适便改变了他对日本的实用主义立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7月爆发了战争，这时胡适赞成在国共两党之间建立统一战线。

在日本全面侵入中国的前6个月，胡适感到有一种“可能稳定东方和平”的新力量正在形成。他所希望的可以对抗日本扩张的这种力量是：（1）作为太平洋地区大国的苏俄的复兴，（2）在亚洲有既得利益的非亚洲国家的重新武装，（3）较为强大的中国的兴起。然而，日益恶化的欧洲状况，使他的乐观主义迅速消失了。在危机越来越增大时，胡适中止了他的改革计划，并宣布：“我们经不起用社会革命冲淡民族主义问题。”^①胡适认为日本的目的是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复兴，并阻止中国接受西方的援助。^②根本的冲突，一方面是在日本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之

① 《纽约时报》，1936年8月22日。

② 胡适：《亚洲》，1936年11月，第737—740页。

间，另一方面是在日本的军国主义与国际秩序之间。^①在30年代初期，胡适称赞蒋介石在日本侵略满洲以后的几年中，为争取时间不使中国卷入战争的才能。不过，当国民党与日本谈判秘密协定，并背着中国人民作出让步时，他还是批评了国民党的口是心非。^②公众要求蒋介石抗日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时，胡适再一次告诫，不要对日本人采取怀柔政策，以免导致对人民的背叛。他警告说：“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与敌人进行了屈辱性和谈的政治家，都是被当作卖国贼载入史册的。”^③

胡适1938年9月被正式任命为大使。虽然他在1938年10月8日才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但实际上1937年秋他已到达美国，作为半官方的和平访问，为中国的战争努力请求支援。当他接到任命时，作为中国驻国际联盟的代表已在日内瓦呆了10个月，正在为第16项条款而努力，以便能有一项禁止战争物资运往日本的禁令。

随着日美关系中危机的加深，胡适成了中国驻美国的理想代表，这是因为他与美国人民之间“文化上的距离”比较近。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和文学家，美国人了解他，尊敬他。胡适不仅英语讲得好，而且尊重美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推崇过当代美国的价值观念。

中国政府非常需要国外的支持。由于饱尝数十年军阀混战之苦，由于被迫默认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加上日本对中国北方的军事侵略，蒋介石政权已濒筋疲力竭的地步。美国虽然同情中国的困境，却以采取史汀生式的“道义制裁”立场而自慰。公众和国会虽然倾向于照顾中国胜于照顾日本，但大多数美国人又反对有可能使美国卷入一场太平洋战争的那种对日制裁。新近通过的中立法就表明了这种矛盾心理，不过尚未在亚洲应用。中

① 胡适：《远东冲突的基本问题》，见《中国季刊》1939年10月30日，第65页。

② 《胡适对开放外交的要求及最近的某种进展》，见《密勒氏评论报》第72期，1936年1月11日，第185页。

③ 胡适：《亚洲》，1936年6月，第379页。

国人认识到，这种制裁对中国的伤害大于对日本的伤害。

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就是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宣传中国的事业，胡适就是被选中担负这一使命的，他的大使职责便是积极致力于促使美国支援中国。可以理解，胡适有他个人的局限性。他以前是一个和平主义知识分子，因需要而成了大使，他不是具有政治背景的职业外交官，因此他对卷入政治采取了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胡适经常谈到，他已经“蜕化为一个大使”，是一个“书本和学问的叛离者”，“一个只能向前的卒子”。他缺乏有关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哲理，但是，他确实相信西方政治准则的优越性；他倾向于稳健，为了解决争端，情愿采取妥协折衷的办法。^①

在成年时期影响胡适的大学环境，决定了他向外交方面的接近。他在演说和著述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通过公开演说和文章，通过他在北京大学和上海的同事，发动了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运动，也遇到了重大的国际问题。他在文学革命中担任的角色，使他在报界和具有广泛影响的机构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作为大使的胡适，集中精力，在决意要影响最大多数人民的演说和著述方面取得最好的成就，就不足为奇了。

胡适经常参加当时有争论的问题的广播节目。例如，他在1940年11月29日的“市民广播会议”中，曾与H·C·韦尔斯和R·L·威尔伯就“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一问题交换过看法。韦尔斯出人意外地谈到“世界主义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威尔伯模糊不清地谈论了“世界友谊和世界公民”问题，胡适则希望5年后成立联合国。他还使用同一术语，强调要有“强制和平”的条款。尽管胡适因“重提（国际）联盟的主张”而受到尖刻的批评，但通过这次讨论，胡适有关各国间建立国际秩序的意见的广泛性和进步性，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某种印象。

① 王业键：《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卡佩尔希尔，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10，413—416页。

胡适认为通过公众舆论，限制国会和白宫的权限，最终可以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于是他抓紧与人民建立联系，取得他们的理解。如果胡适在某些方面是徒劳无益的话，这可以用他有意识地在某些重要领域放弃责任来解释。他不想负责战争贷款或武器装备的谈判，因此，在1941年12月以前，为中国的战争努力进行这类外交谈判的许多重任，都落在了象宋子文这样的财政专家身上。即使在胡适做得最出色的公众关系方面，据说他也把为“宣传”目的而提供给他的6万美元退还给了政府，因为他并不不要钱和进行宣传。“我讲的话就是最好的宣传，这并不花费你们一分钱！”^①他坚持认为：“对于一个派给友好政府和友好人民的外交官来说，宣传是不需要的，他的责任是理解并正确评价他所派驻的这个国家……其余的都好办。”^②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具有知识的活动范围很广的人，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广泛的权力，而责任则不大。^③

胡适大使不想通过巧妙的政治手法影响美国的权力结构，也不对国务院或白宫使用“硬行推销”的外交手段。他肩负的重任是争取美国公众舆论，使它自然发挥美国在亚洲所起的更大的能动性作用。可是，他碰到的是美国因纳粹扩张、法国失利、英国和苏联处于危机之中而采取的欧洲第一的方针。胡适了解国际局势，因此美国对欧洲危机的全神贯注使他所受的挫折，要比一般中国领导人小。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清楚的概念，而且认为获得支援的最好办法，是与形成公众舆论的重要人物直接打交道。回想起来，胡适似乎过高估计了美国人民的权力，过高估计美国政治体制中决策过程的特征。他看到过中国民众运动打败军阀，通过民族主义统一中国，使国民政府执政，动员这个国家的人力物力反对日本侵略者。胡适把精力专注于美国公众，他低估了国

① 王业键：《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第123页。

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2年8月1日，第9页。

③ 《生活》杂志第21期，1941年12月15日。

会的作用和总统直辖的国家机构在决定国家行动方针时的权力。

蒋介石委员长把外交努力集中于设法说服盟国，使他们确信，中国的作战也就是他们的作战。尽管美国把欧洲问题放在第一位，他还是认为，美国要依靠中国来保护它在亚洲的利益；相信美国出于需要，最终将会听从他的要求，接受重庆有关战争的战略和策略。^①胡适知道这种观点是目光短浅的，但是为了促使广大民众同情中国的事业，他还是走遍美国，在宴会、俱乐部、群众集会和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数百次演说，用简单明了的语言阐明中国的情况。他给报纸写文章，参加会议，招待记者，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对他的工作精力和学问（如果不是工作成就的话）的赠礼是，他获得了美国大学授予的26个名誉学位。在他离开这一工作岗位时，他已促成了美国对中国斗争的同情，这是全美国对中国物质需要的一种理解，也是对于向中国提供租借贷款的一种支持。

在他任大使的第一年，经常因拒不承认战争的大好形势或拒不宣传这种形势而使他的政府感到困恼。他坚持思想的独立，严守知识分子的正直。在与美国人的会谈中，他在中国问题上有意拒绝发表有偏见的、歪曲的或宣传性的意见。他告诉美国人，中国人确实在流血死亡；为此，他几乎被中国政府召回。但到1938年12月，他因心脏病发作而病倒，被送入医院治疗了6个月，到他病愈时这种狂热已经衰萎了。

胡适在对美国人的演讲中，一般表达的是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政府官方的条文，不过胡适与蒋介石在如何获得美国援助问题上的分歧，更多的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基本政策上。胡适继续使用自己的方法，而不管蒋介石反对与否。最后蒋知道，在他认为必要时，要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看，这就是宋子文（蒋的内弟，能干的金融家）的任务了。宋于1940年秋被派往华盛顿，住

^① 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3页。

进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宋子文对胡适的猜忌，妨碍了他们的个人关系。胡适觉得呆在外面更好，所以经常不在使馆。蒋介石就是重庆政府，胡适是它的代表，而两人之间的对比却是十分强烈的。蒋是一个保守的军事家、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顽固的传统主义者，而胡是一个知识分子，进步学者，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胡适到美国后，没有迹象表明他想影响中国的政策和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或者想鼓励国民党进行改革，以扩大政府的基础。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适想使蒋介石和其他保守的中国领导人更能接受美国的意见，或者想使他们避免象有关史迪威的争论这一类的问题。他更多的是象个无拘束的学者，公开表示他想回到学术生涯中去。

在美国谴责国际动乱和侵略行为的各种声明中，胡适感到了有利于他的事业的希望。1939年夏，他敦促华盛顿的官员们废除1911年的美日通商条约，他的努力无疑是有助于美国在那年秋天中止这一条约的。美国公众舆论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化。过去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困境是漠不关心的，到1938年夏季，大多数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关心已超过了对德国侵略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关心。国务院也在改变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但仍避免明确提出会导致战争的对日制裁，只在战略物资和技术资料方面提出了“道义上的禁止”。许可对日本出口的武器和军需品，从1938年的8799219美元，下降到1939年的761684美元，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一措施的有效性。

从胡适1938年秋担任大使职务到1941年冬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中国的热情不断增长。不过除胡适个人的影响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有助于他在影响美国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功。1938年12月东京宣布“大东亚共荣圈”，1939年秋华盛顿废除与日本的通商条约，这都支持了胡适的活动。1940年9月，日本与欧洲轴心国伙伴的三国协定公布后，美国官员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日本的暴行、对广大平民的狂轰滥炸，使美国人震惊，许多孤立

主义者转变为积极的关注者。日本在1940年侵入印度支那，1941年在这一地区继续扩张，这就使美日外交接近于僵局，使中国接近于胡适使命所取得的成果。

1940年，华盛顿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决定将所有航空产品优先提供给英国，这使中国感到沮丧。这种对中国不利的情况只是在1941年才得到部分消除，这是因为向中国提供的租借物资引人注目地增加了，不过中国所得到的援助仍远远少于英国和苏联。嘲讽美国只在口头上关心中国的生死斗争，实际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这对中国并未起什么作用。中国因缺乏他们认为的对共同事业的支援而产生的苦难，甚至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不过胡适对世界冲突有比较宽广的眼界，似乎从未失望过。他所发表的言论被广泛阅读、热情接受，美国报纸对中国这一盟友充满赞美之词。尽管中国通过对外宣传建立广泛联系的工作从未好转过，但美国却放弃了长期伤害中国的耻辱性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已有人把中国作为第四个“强国”来谈论了。

胡适最重要的正式会谈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当时的各种情况和胡适所作的各种努力，必然会使美国公众舆论有重大的转变。新闻界报道了日本的暴行，赛珍珠在《大地》中对中国所作的富有同情的描述，国务院的反日情绪，以及许多其他无形的原因，都在美国人中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从孤立主义转而趋向于卷入中国的斗争。当日俄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类事件在斗争中成为挫折时，胡适正为拯救中国而努力。这一挫折由于美国宣布于1941年7月冻结日本一切财产，以及8月份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而得到了弥补，这两大事件是：美国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中国，罗斯福总统拒绝与近卫文麿在太平洋进行私人会晤。

1941年9月，一种强大的对抗势力正在威胁着国务院和白宫。在东京的格鲁大使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抑制与缓和的方式，以便加强日本的和平派。胡适依然乐观地谈论着美国，希望它的政策强硬起来，结束僵局，向中国提供援助。他说：“我总是完全

相信美国的同情和帮助，现在仍然如此。”10月份近卫政府的倒台使胡适感到，日本并没有改变基本政策的任何迹象，如果不是比以前更坏的话。

1941年10月28日到11月5日之间，蒋介石通过胡适给罗斯福发去了一系列焦虑的电报。他主要关心的是日本通过进攻云南，封锁滇缅公路。蒋要求美国对这一行动发出严厉警告，但是国务院拖延了对中国的答复。最后，罗斯福办公室召见胡适，于11月14日发出了为时已晚的通知。这一答复对消除蒋的疑虑毫无作用，因为它完全回避了关于滇缅公路的警告问题。显然美国不想激怒日本。

胡适大使在华盛顿的最关键和最有戏剧性的时刻，是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前夕，当时美国为了争取备战时间，正要与日本达成一项秘密妥协。由于11月16日日本特使到华盛顿会谈，中国更加焦虑了。11月19日上午，胡适从国务卿赫尔那里得知，头一天，由于日本的来栖采取主动，美日之间存在着缓和紧张局势的前景。暂行办法是恢复到7月份的原状——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和美国禁运以前的状况。赫尔对日本外交官防止最后破裂的这一尝试表示了一定的期望。胡适的忧虑也消除了。但是，由于使用“魔术”，美国破译了日本密码，原来东京并不打算批准按它的代表在华盛顿所提条件达成的协议。

东京的最后一条建议是11月20日由野村大使提出的臭名昭著的建议“B”。这一建议的调子和要求都有着不祥的预兆。但是，战争还仅仅存在于密电中和谈判者的心中，并未公开表明，因此双方都希望避免战争。在这一时刻，美国可以（1）不作答复，（2）拒绝日本最后的建议，或者（3）提出反建议。华盛顿选择了最后一着。

赫尔立即让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着手起草这项反建议，这是日本和美国的盟国都能接受的一种暂行协定。11月22日建议草案准备就绪。国务卿赫尔召见胡适，把与日本人会谈的关键问题告诉

了他，请他阅读这个协定草案发表意见。胡适从病床上起来，在以后的一周里几乎每天都不顾患病，如约前往国务院，对所提出的美日亲善表示中国的强烈反对意见。他感到，中国将要为这种姑息办法付出血的代价。胡也向盟国的使节指明了这一点，他们十分关切亚洲问题的解决办法，全都同意他对这种谈判所持的态度。国家利益支配着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的反应。胡适询问这一建议是否能阻止日本进一步侵入中国，破坏滇缅公路。赫尔的否定回答使胡适极感不安，但赫尔解释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①尽管中国在日本的刺刀下已生活了10年，现在中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都得计算，在日本即将经云南进攻陷入绝境的中国陪都重庆之前，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就在同一天，11月22日，胡适并不知道，东京业已通知野村大使：“由于你无法猜测的理由”，谈判有一个最后期限。并告知他：“如你能使妥贴的文件签字，我们可以等到11月29日。”此后“魔术”电报不祥地指出：“事情正在自动发生。”^②

这些天对胡适来说是很紧张的，但他仍保持着基本的人情味。一天下午，他蹒跚地走出国务院远东司，正碰上一个日本人，这人认识他，并提起1935年在北京的一次相会。这两个“尊贵的敌人”温和地交谈了几分钟。

11月24日，星期一，国务院又邀请胡适进行磋商，交给他暂行协定的最后抄本。胡适反对那项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保留2.5万人的军队的条款。他建议将日军限制在5000人。但是赫尔解释说，马歇尔将军认为这个较高的数字不会构成威胁。赫尔重申，军事上需要时间准备对付日本即将发动的进攻，而且这项协定的有效期仅有3个月。^③

① 赫尔国务卿备忘录，1941年11月24日，见联合委员会—国会调查，《袭击珍珠港》（华盛顿，政府印刷厂，1946年）第14部分，第1122—1123页。

② 东乡外相致野村电，812号，1941年11月22日。

③ 国务院备忘录，1941年11月24日，《向日本大使提出的暂行协定》，见《袭击珍珠港》第14部分，第1143页。

11月25日星期二中午，军事会议在白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首脑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会议在深切关注的气氛中讨论了与日本人谈判陷入的僵局。由于截获日本电报，破译日本密码，现在美国已经知道，日本决定在11月29日停止谈判。实际上日本已提出了最后通牒。赫尔回到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进行他下午预定的工作。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首先来到，带来一封电报，说英国支持美国就日本建议提出的反建议，以解决危机，但他极力主张要进行强硬的交易。接着，荷兰大使会见了赫尔，对易受攻击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表示关心，说他的政政赞成一项休战建议，即暂行协定。在胡适能与赫尔交谈之前，这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已经过去了。胡适的责任是陈述中国对暂行协定的反对立场。他得体地表述了不赞成的意见，并且使蒋介石委员长强硬的公报带上温和的调子，解释说：中国外交部长理解日本问题在国际方面的意义，因为这对美国有影响，但蒋介石并不理解。胡适转交了外交部长郭泰祺的电报，这封电报提出蒋对暂行协定的“强烈反应”，^①并对美国与中国磋商美日协定一事表示感谢。这封电报表明，中国坚决反对“可能增加中国抗战困难的任何措施”，并暗示美国姑息日本^②。

对于日益增长的危机，蒋介石从不具备胡适那种广泛的理解力和理性观念。蒋介石委员长和蒋夫人，采用典型的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方式，给美国重要领导人发去疾风骤雨般的电报。11月25日的电报是通过宋子文发给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这封电报严肃指出，即使是有关美国松劲的无稽之谈，也会“挫伤中国的士气”，“日本已与中国的可疑分子达成某种协议，全民的士气将有崩溃的危险，每个亚洲国家……对民主的信念都将遭受重大挫折，世

① 国务院备忘录，1941年11月25日，〈蒋介石委员长对暂行协定的反对〉，第1167页。

② 国务院备忘录，第1171页，〈郭泰祺外长致胡适大使电〉，重庆，1941年11月24日。

界上将要出现一个最悲惨的时代”。^①中国更加非正式地施加压力的另一个例子，是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在同一天电告罗斯福的秘书柯里，竭力要求把蒋的意见通知总统本人。拉铁摩尔说：

我以前从未见他（蒋）真正激动过……现在达成的任何暂行协定，都将使中国对美国的信任遭到灾难性的损害，这就象关闭滇缅公路一样，英国的威信从此永远毁坏了……以往的援助，或者增加援助，是否能够补偿此刻中国被抛弃的感觉，是值得怀疑的。

蒋介石感到痛苦，恐怕日本“利用外交上的胜利，逃避军事上的失败。”^②

11月底的情况仍然不利于美国政策的任何戏剧性转变，以符合胡适的希望：美国更加积极地参加遏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狂潮。罗斯福总统实质上将美日谈判留给赫尔国务卿去安排处理。虽然会谈没有明显进展，但局势似乎尚未处于危急状态，一般人看来是如此，大多数分析家看来也是如此。日本不愿放弃以武力在中国、满洲和东南亚维持的现状，而且还要求美国放松石油和碎铁的禁运，并结束对中国的支援，而自己所作的让步却非常之小。东乡外相通知格鲁大使，要日方为获得妥协而作出重大让步，这对日本军事首脑来说，就意味着丢脸和政治自杀。要日本妥协是不可能的。

既然美国的欧洲盟友反对采取强硬立场，罗斯福又不愿把分裂的美国投入亚洲的冲突，因此美国就采取因循姑息的办法。罗斯福设想了一个休战协定，但即使如此，也在史汀生的要求下暂时取消了。此外，“陆军部和海军部实际上已要求总统避免对日

① 国务院备忘录，第1161页，〈蒋委员长致宋子文电〉，重庆，1941年11月25日。

② 国务院备忘录，第1160页，拉铁摩尔致柯里电。

本下任何最后通牒，设法达成某种协议，以便‘度过这几个月的困难局势’”。^①在东京的格鲁大使极力劝说采取节制政策，希望能以此加强日本的和平派。美国的主要报纸认为，找到一种起码的临时解决办法，关键问题是中国的投降，而在华盛顿流行的看法是，在希特勒的进攻被阻止住以前，中国应当作出暂时的牺牲。^②

上述情况所提供的证据似乎是要证实这种看法，即直到1941年11月26日，局势是在向对日本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用了5天时间，作出重大努力，起草了一个协议，解决与日本之间的问题，即使是暂时解决也好，同时还要取得美国盟国的赞同。当前景对中国似乎极为暗淡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26日，美国官员决定放弃暂行协定，同一天下午5时，赫尔国务卿向日本使团送去一份“内容广泛的基本建议”。

在这种关键时刻，中国在影响事件的转变上所起的作用是有决定意义的。有这样的事实：最高层人物的主观决定会冲击历史的进程，他们会在几种方案中选择一种来决定历史的发展过程。政策转变的原因肯定是存在的，不过胡适很少宣传的他于11月21日与罗斯福总统的会晤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胡适的外交生涯中，这位说话温和的学者也许第一次对美国领导人发了脾气，并强烈反对任何有利于日本方面的让步。据说他曾提醒罗斯福不要忘记他主动向中国提出的许多保证。^③应当指出，罗斯福和赫尔都非常尊重胡适和他的意见。他随时都可以接近他们——他们是他们的亲密的朋友。陈受颐教授评论说，胡适在半小时前通知，就能安排好他们的约会。^④

中国在反对美国对日谈判中的调和行动时所施加的这种强大

① 见T·R·费伦巴克：《罗斯福不宣而战的战争》（纽约，麦克开伊公司，1967年版）第301页；见赫伯特·菲斯：《走向珍珠港之路》（纽约，阿塞组姆印刷厂，1946年版）第302页。

② 《纽约时报》1941年11月27日。

③ 《生活》杂志第21期（1941年12月15日），第123—124页。

④ 见埃伯：《胡适》第269页脚注。

压力，由赫尔在后来的国会调查加以证实了，他说：“中国在这时展开了可怕的进攻。”国务院备忘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11月27日早晨，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紧急会见副国务卿韦尔斯，说明头天夜晚赫尔已用电话告诉他最后一刻的决定：放弃暂行协定。他要求知道“突然变化”的原因。当他得知中国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时，他对中国反对意见所产生的力量表示吃惊。他说他曾亲自向胡适大使解释过，美国的建议无害于中国，正相反，可以减轻对中国的压力。他断言，重庆政府的态度是基于不真实的情报和歇斯底里。韦尔斯在回答时告诉哈利法克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情报说，日本军队正在不祥地调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局势的严重性。

同一天，澳大利亚外长理查德·凯西要求与赫尔会谈。他对蒋介石和其他人在废弃这一暂行协定中的行动表示关心，询问是否永远放弃这项建议。赫尔回答说，他“是这样考虑的”，并解释说，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否则将会激起与蒋介石及鹰派“不满分子”的苦斗。^①两天以后，11月29日，赫尔在与英国哈利法克斯大使的会谈中，对中国政府在这一协定的废弃中所起的作用表示了更大的失望情绪。他丝毫没有中伤胡适，但也确实指出，蒋介石除将“大量歇斯底里的电报”送给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外，还不顾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在不了解真情的情况下，硬挤进一种微妙的局势中”，并在新闻界散布有破坏性的传说。^②

当在华盛顿的谈判出现别扭时，日本的应急计划已在自动进行。局势已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美国命令它在菲律宾和荷兰的驻军处于待命状态，将在东印度群岛的部队动员起来。12月3日英国舰队开进新加坡，罗斯福要求日本解释它在印度支那的军队调动。12月4日赫尔国务卿感到裂痕已经太大，对任何和解都

① 国务院备忘录，1941年11月27日，《袭击珍珠港》中所提出的证据，第1179—1183页。

② 同上。

绝望了。12月5日日本拒绝了美国的条件。两天后，珍珠港受到偷袭。

从战争爆发到1942年9月魏道明接替胡的大使职务，这一期间胡适的活动最难探索。胡适被免职的消息象一颗炸弹。《纽约时报》就这一事件发表社论，对此表示震惊，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行动，除非在中国有更高的职位留给胡适。^①关于这一决定的流言蜚语迅速蔓延，但事情的真相永远也无人知晓。倾向于从人际关系网方面解释历史的中国人强调宋子文与胡适之间的敌意和妒忌，或这种事实：魏道明夫人是蒋夫人的密友，觊觎驻美大使的职位，并密谋作出这种安排。一些人推测，有一个因素，即中美之间在战争如何进行上意见不一，蒋介石对胡适处理问题日益不满。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一旦不再需要他用演说和文章把美国拉向中国一边，他的用处就不大了。

胡适从公共活动中隐退下来，就回到了学术工作中。他留在美国，没有担任另外的官方职务，直到1945年3月，才作为世界安全会议的代表前往旧金山。他的职位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任，但他特别赞赏该组织的计划，认为这是促进“人类知识分子团结”的可行性方式。

回顾一下可以看出，在现代国际外交中，胡适象征着中国的不断进步。如果说他在学术上发挥作用更为轻松愉快的话，他担任外交工作也是严肃而机敏的。胡适赢得了他的外交界同事的尊敬，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使。赫尔国务卿认为他是“中国政府派到华盛顿的外交使团中的最能干最有效率的政府官员之一。”^②

译自伯恩斯、爱德华合编：《危机中的外交官：
美中日关系，1919——1941年》第157—170页。

黄小玲 译

① 《纽约时报》1942年9月3日。

② 《纽约时报》1947年7月15日。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1—12辑目录

第1辑

- 英俄瓜分中国的协定（1899年）..... A·波波夫
李嘉谷译 林荫成校
- 隐忍的限度..... 克拉伦斯·B·戴维斯
李丹阳译 谢明鹏校
- 明治时期日本对华态度
的一页：小村寿太郎研究..... 冈本俊平
沈予译 赵明杰校
- 英帝国主义与辛亥革命
（1911—1913）..... П·И·奥斯特里科夫
朱宗震译 陶文钊校
- 西原借款的基本设想..... 波多野善大
朴成昊译 邹念之校
- 中国边境上的事件：
1911年的外蒙古..... 托乌斯·E·尤因
康右铭译 吴民伟、沈自敏校
- 1911年后日本陆军的对华
政策——是分岐还是分工？..... 坂野润治
黄光域译 吕浦校
- 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国际关于
中国革命战略的一场争论..... 理查德·C·索顿
林海译

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Г·维经斯基
江海译 李玉贞校

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

(1927—1929) 帕克斯·M·小科布尔
曾学白译 吕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

中国战线 石岛纪之
彤宇译 傅中午校

海兰泡惨案纪实 利奥·多伊奇
吕其苏译



《红色档案》杂志篇目

索引编者序 M·C·谢列兹涅夫
刘存宽译

介绍一本关于辛亥革命

与孙中山的著作 C·齐赫文斯基
丁如筠译 邹宁校

日本和西方的近代中国研

究——彼此更趋接近 R·苏莱斯基
黄光域译 吕浦校

《18世纪中俄关系》第1卷

(1700—1725) 简介 李玉贞 杨诗浩

第 2 辑

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 周锡瑞
江枫译

近期日本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 石田米子
宋绍柏译 傅中午校

清末经济恐慌与辛亥革命之联系·····	菊池贵晴 邹念之译
辛亥革命与孙文、宋教仁	
——中国革命同盟会的解体过程·····	永保田 文次 朴成昊译 邹念之校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	白吉尔 黄庆华译 胥森校
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论1909—1911年中国的君主立宪运动·····	IO·B·楚多杰耶夫 李金秋译 邹宁校
辛亥革命与中国陆军·····	冯兆基 吕浦译
1911年南北和议之重新考察·····	L·西格尔 丁贤俊 译 吕浦校
辛亥革命中民族因素和社会	
因素的相互关系·····	齐赫文斯基 蔡静仪译 江枫校
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	沈巨光 黄光域译 吕浦校
中国革命与幸德秋水·····	石母田 正 李士苓译 曲直校
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	
·····	竹内善朔 曲直 李士苓译
编后记	
稿 约	
补 白	

第 3 辑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

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Б·罗米纳兹
邹宁译

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И·米夫
邹宁译

中共“五大”与大革命的教训……………B·格鲁宁
丁如筠译 林荫成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摘记……………K·舍维廖夫
曾宪权译 林荫成校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森时彦
宋绍柏译 傅中午校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校史摘记……………Г·叶菲莫夫
丁如筠译 林荫成校

第一次和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栗原健
章伯锋译 邹念之校

孙中山与“满蒙”问题……………藤井昇三
朴成昊 丁贤俊译

麦克马洪线（1911—1945）：英国的遗产……………K·古普塔
金宗英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关系

——战后日美关系的前提之……………山极晃
宫毅译

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

——北洋派的企业活动……………渡边惇
邹念之译

奉票的盛衰 (1917—1928) :

中国军阀时代的货币改革..... R·苏莱斯基

沈祖诒译 李臻 吕浦校

中国早期发展经历中的西方技术人

员和技术援助: 福州船政局 (1866

—1875) 庞百腾

韩荣芳译 赵燕南校

托尔斯泰论历史过程的规律以及个人

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B·基雅可夫

吴永清译 林荫成校

近年日本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的研究..... 山田辰雄

黄光域译 吕浦校

有关孙中山的几件资料..... 李辉译

孙中山的一次未被注意的谈话 (评论) K·舍维廖夫

孙中山的一次谈话

孙中山与“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 (1924年3月)

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 (1924年9月12日)

第 4 辑

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实践 (1905—1912)

..... C·齐赫文斯基

丁如筠译 邹宁校

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资产阶级..... 白吉尔

黄庆华译 胥森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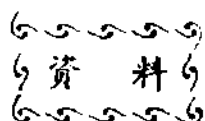
法国外交与中国辛亥革命..... 巴斯蒂

王刚译 张振鹂校

辛亥革命在东三省..... 西村成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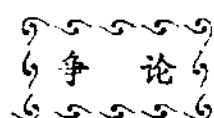
傅仲译

- 1928年中国革命新战略的出现.....索顿
林海译
- 1900年中俄满洲冲突事件新探.....郭玫瑰 辻伸久
吕其苏译 吕浦校
- 军部与第一次大战中的对华政策.....北冈伸一
郑基译 赵明杰校
- 瞿秋白与彭述之论中国革命问题.....Л.捷柳辛
曾宪权译 陶文钊 邹宁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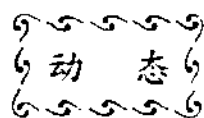


- 关于孙中山的一份未发表
过的电报.....С.胡谢伊诺夫
曾代伟译 林荫成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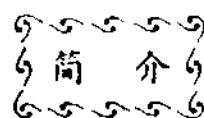
- 沙俄通过修筑东省铁路掠夺我国
东北煤矿资源的几则材料.....Е.尼鲁斯
陶文钊译
- 威廉二世关于沙俄占领旅顺口.....Л.捷列舍瓦
陶文钊译



- 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格鲁宁
吴永清译 邹宁校



- 法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最近动向的考察.....巴斯蒂
刘存宽 张振鹗译



- 苏联远东研究所简介.....吴永清

第 5 辑

国外研究艾奇逊《条约集》真伪版

本与麦克马洪线修正线问题评介……………金宗英

“麦克马洪线”是怎样炮制的……………耕砚

中印边界争端（西段）原始资料评注……………卡·古普塔

星灿译

论拉铁摩尔……………毛里和子

张静译 樊守志校

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无政政主义

……………阿·德利克 爱·克列布斯

江枫译

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1923年华商纱厂危机……………白吉尔

黄庆华译 静一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

土地问题……………H·科罗列夫 P·斯托利亚罗娃

丁如筠译 邹宁校

鲍罗廷来到广州……………丹·N·雅各布斯

林海译

鲍罗廷回到现实……………丹·N·雅各布斯

朱雪平译 林海校

李德自述——来华前的一段经历……………奥托·布劳恩

山阴译

国共合作以外：孙中山与香港……………陈福霖

曾学白译 吕浦校

廖仲恺与1924—1925年广东的劳工运动……………陈福霖

江枫译

中国工运与中共的诞生

——苏联有关史料研究述评…………… B·尼基福罗夫
林荫成译

英国工人运动与中国…………… И·列文

丁如筠译 邹宁校

清政府与俄国交收东三省的谈判…………… Б·格林斯基

罗峪华译 林荫成校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与列强

——美英学者有关著作述评…………… З·卡特科娃
曾宪权译 林荫成校

苏联近三十年阿古柏研究述评…………… 潘志平

权藤成卿和章炳麟的交游——来往笔谈录…………… 沈泽诚

黄绍海译 钱君华校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

——《共产主义运动》一书简介…………… 陈鸿寿

法国研究“西藏学”的机构和人物…………… 乔桂云

第 6 辑

清末政治与官僚资本

——以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 中村义
邹念之译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矿产

资源的掠夺过程…………… 君岛和彦
宋绍柏 邹南星译

华侨与晚清经济近代化…………… 颜清湟

虞和平译 刘存宽校

满洲的桥头堡：1897—1902年英俄

抗衡与京奉铁路…………… A·L·罗森鲍姆
刘观壁译 范琪校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

时代中英外交文件提要简介.....黄宇和

区铁译

满洲事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古屋哲夫

姚仲文译 赵明杰校

武汉政府的政策.....Г·谢尔盖也夫

林荫成译

陈独秀的一生及其政治思想.....邓玉汝

吴竟成译 章克生、匡非校

一篇历史文献——张太雷准备在共产

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M·A·佩尔西茨

姚宝珠译 邹宁校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同志谈

中共“五大”召开的前后经过.....郑厚安译

鲍罗廷来华前的革命活动.....丹·N·雅各布斯

林海译

民族因素在中国工人运动中

的作用（1919—1927年）.....T·阿卡托娃

曾宪权译 林荫成校

资料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开除

蒋中正党籍发表的声明.....刘佐汉译 郑厚安校

马日事变资料两则.....郑厚安译

动态

西德各大学的东方学研究.....大岛偕美

陈相译 邹念之校

罗斯福、杜鲁门总统的对华

政策观点……………沃尔多·海因里希斯
曾学白译 吕浦校

第 7 辑

陈独秀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横山宏章
唐宝林译 孟克校

共产国际对研究制定中共

工运策略所起的作用……………T·阿卡托娃
林海译

严酷的事实——鲍罗廷在武汉……………雅各布斯
林海 朱雪平译 林海校

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罗易
温冬暖译 林海校

史沫特莱在上海——《中国的战歌》选择……………史沫特莱
江枫译

清末的振兴实业……………仓桥正直
赵成材译

1861年—1894年德国对华的商业渗透……………斯丢克尔
李荣昌译 李必璋校

日英等国干涉交收东三省谈判……………B·格林斯基
姚宝珠译 邹宁校

宋子文与上海银行界（1931—1933）……………P·M·科布尔
杨希孟译 一叶校

国民党政权与英国和解（1927—1931）……………冯兆基
袁鸿林 陈怡均译 范琪校

奉系军阀与帝俄白卫军的勾结……………曼朱列茨
吴永清译

- 艾奇逊及其顾问与中国（1949—1950） 沃伦·科恩
曾学白译 江枫校
- “艾奇逊及其顾问与中国”讨论小结 海因里希斯
江枫译
- 孙中山与日本 苏联东方学研究所
丁如筠译
- 戊戌变法与日本——甲午战后的
日本报刊舆论 志村寿子
王晓秋译 陈逸校
- 十九世纪后半叶日中两国的现代化 依田憇家
李秀石译
- 台儿庄战役及其前后的日军战略 秦郁彦
吕万和译
- 《田中奏折》的真伪 宋绍柏
- 中国对国民党史的研究——
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重新探讨 山田辰雄
齐福霖译
- 苏联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B·尼基福罗夫
曾宪权译 林荫成校
- 香港孔安道纪念馆所藏香港史料介绍 杨国雄
元明译 杨诗浩校
而 已重校

第 8 辑

- 兴中会在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意义 松本武彦
周泮池译 白子明校
- 回忆秋瑾女士 服部繁子
郑云山译 李廷善校

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

的进步理论..... Л. Н. 鲍罗赫

吴根梁译 董进泉校

李大钊的思想演变过程..... В. А. 克里夫佐夫

В. А. 克拉斯诺娃

郑厚安 刘佐汉译

华莱士使华前后..... Роберт·菲斯

林海译

美国调处中国内战新探..... 史蒂文I·莱文

肖健宁译 王应一校

40年代末期美国对华外交策略..... А. 马鲁欣

丁如筠译 郑厚安校

耶稣会士在中国..... А. 布鲁

顾裕禄译

1899—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

的孔教复兴运动..... 颜清煌

栗明鲜译 马宁校

马来西亚华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李国卿

柳平译

在印垄断与在华开放（1830—1833）..... 黄宇和

区铁译

苏联与新疆省的贸易（1913—1926）..... 奥·布克施泰因

吴永清译 林荫成校

关于日本纺织业打入中国..... 杨天溢

唐宝林译 宓汝成校

奉天军阀的经济基础、经济特征

及其崩溃的过程..... 小林英夫

熊达云译

读者来信

第 9 辑

- “第一次统一战线”中的胡汉民.....巴雷特
曾学白译 江枫校
- 一个军阀的思想与理想：陈炯明.....谢文孙
曾学白译 江枫校
- 孔祥熙与上海金融资本家.....科布尔
杨希孟译 一叶校
- 赫尔利在中国.....菲 斯
林海译
- 清末四川的半殖民地化与仇教运动.....铁山博
施超伦译
-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
与中国革命.....冈田英弘
赵长碧译
- 关于皖南事变.....白修德
金坚范译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6—1927）.....诺思
江枫译
- 湖北的农民运动.....鲍罗廷
李玉贞译
- 冀东走私的兴衰.....中村隆英
李秀石译
- 西方学者对鸦片战争性质的争论.....谭中
萧致治 何仲译
- 有关西安事变的争论.....野原四郎
林丽蓉译 白松鹤校
- 1983年日本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针谷美和子
于文奇译

- 1983年日本史学界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内田知行
 孙玉玲译 周世铮校
- 尼基福罗夫的《中国首批革命家》.....丘多杰耶夫
 吴兴勇译
- 苏联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B·尼基福罗夫
 曾宪权译 林荫成校
- 《田中奏折》的真伪.....宋绍柏

第 10 辑

鸦片战争研究——

- 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佐佐木正哉
 李少军译
- 张喜和1842年南京条约.....邓嗣禹
 杨卫东译
- 包令爵士与广州入城问题.....黄宇和
 卢仲维译 区铁校
- 太平天国占领区的枪船集团
 ——以太湖一带为中心.....针谷美和子
 白子明译 周泮池校
- 江南教区的本地神职班.....康治泰
 顾裕禄译
- 清末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与日本教习.....荫山雅博
 田正平译
- 1920年的直皖战争与日本对华政策
 ——以边防军问题为中心课题.....藤井昇三
 郑基译 傅中午校
- 1916至1928年中国军阀制度
 演变的主要阶段.....B·B·茹可夫
 夏祖恩译

- 中俄伊犁条约谈判.....徐中约
林勇军译
-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幕.....梁敬鐸
招嘉炽译
- 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的若干问题.....卡尔图诺娃
姚宝珠译 林荫成校
-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1941年
12月—1945年9月）.....卡特科娃
王真译 刘佐汉校
- 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西里喜行
郑海麟译
- 科士达1895年马关日记.....张振鹏辑译
- 解放前上海纱厂的包身工制度与女工.....韩起澜
吴竟成译 章克生校
- 评美国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阿·德立克
卢明华译

第 11 辑

- 辛亥革命当中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小島淑男
邹念之译
- 19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弗朗兹·迈克尔
高翌莲译 邹桂芬校
- 清末留欧学生——福州船政局对近代
技术的输入.....玛丽亚萨·巴斯蒂
田正平译
-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曾田三郎
孙国群译 袁琳校
- 世界生丝市场上的上海机械丝.....曾田三郎
孙国群译 赵宗颇校

- 1891年热河金丹道起义……………仁藤公彦
白子明 周泮池译
- 汪精卫政府成立前后的日汪勾结内幕……………冈田茜次
柏如译 刘其奎校
- 1941—1945年外国对中国的援助……………阿瑟·N·杨格
任东来译 李安山校
- 美国“1948年援华法”产生背景新探：冷
战战略之一面——有限援助……………约翰·H·费维
王一泉译 何志功校
- 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沃伦·J·科恩
任东来 编译
- 柯乐布、戴维斯与1949—1950年
中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
新近公布的文件及评论……………迈克尔·沙勒
熊京民 任东来译 王冠华校
- 张作霖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列
强干涉远东年代与俄国反革命的联系……………格·斯·卡列季娜
姚宝珠译 陈春华校
- 戊戌变法与日本——论康有为
对“明治维新”的理解……………山根幸夫
郑海麟译
- 一代鸿儒康有为和他服务的日本女性……………鸿山俊雄
陈家麟 马洪林译
- 美国史学界关于孙中山对外政策的研究……………齐赫文斯基
杜华译 李玉贞校
- 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相逢——兼论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久保田博子
齐福霖译

- 孙文社会思想的再评价——三民主
 义的哲学基础及其特点……………全乐熙
 洪韬译
-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5—1927年国民
 革命时期）……………A. Б. 列兹尼科夫
 宋洪训译
-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杜宾斯基
 汤宜标译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满洲形
 成的历史过程……………Ю. М. 奥夫钦尼科夫
 杨江华译
- 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
 （1918—1920年）……………B. 乌斯基洛夫
 罗峪华译 林荫成校
- 长江流域的一段往事……………K. П. 卡扎科夫
 丁如筠译
- 关于陈炯明致列宁的信和李烈
 钧告苏俄人民书……………刘德喜译
- 简评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
 一次知识分子革命》……………冯崇义

第 12 辑

见本辑目录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稿约

本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是一种国内发行的不定期学术性刊物，发映国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1840—1949）的学术成果，研究动态等，每年大致出版两辑，每辑25~30万字。服务对象是国内史学工作者和关心中国近代史的广大读者。所刊载的论文，多具新观点、新见解，或国内少见的新资料，尤其着重刊载与国内学者观点不同的论文译文，供史学工作者比较研究。

本刊欢迎有关中国近代（1840—1949）历史的下列稿件：

- 1、专论译文；
- 2、专著摘译或节译；
- 3、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或回忆录译稿；
- 4、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或述评；
- 5、国外有关著作的书评或介绍；
- 6、其他。

本刊并欢迎推荐值得译介的有关文字，建议一经采纳，当赠本刊为谢。

译稿要求译文准确，人名、地名、官职、机构名称等，务请查核清楚，引用中文资料应使用资料原文；数字，年、月、日等标写方法，以《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注释一律采用同页脚注。

译稿请附原文。如决定采用，即发凿通知；一经发表，即按规定致酬；如不采用，妥为退稿。

无论译稿或撰写稿，均请使用有格稿纸，书写工整，译文中所附原文请用印刷体书写。

来稿请写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发表时署名听便。

来稿来信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勿寄个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12卷）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厚安

责任校对：刘佐汉

封面设计：王 鹿

版式设计：王丹丹

264-2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十二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84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册

ISBN 7·5004·0363·1/K·42 定价4.00元

限国内发行